

经济学家和说教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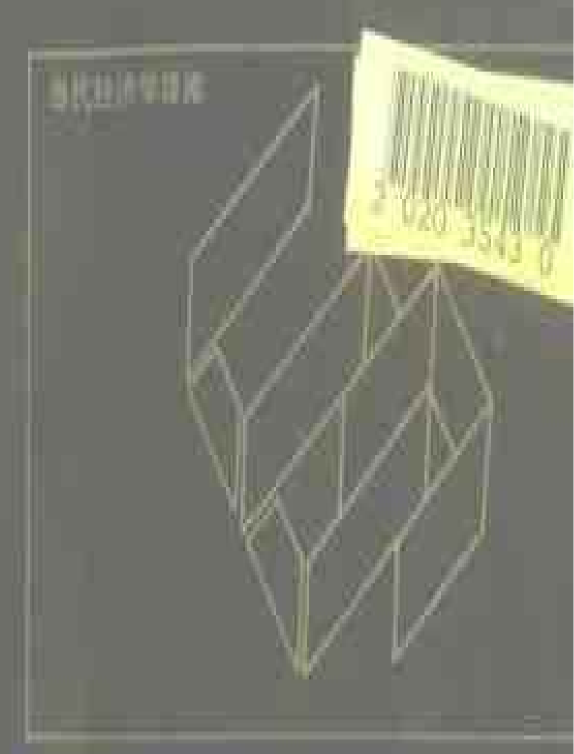
• 著者/(美)G.J.斯蒂格勒

• 译者/贝多广　刘沪生

•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DANGDAI JINGJIXUE XILIE CONGSHU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经济学家和说教者

主　　编　陈　昕
责任编辑　虞　虹
封面设计　宋珍妮

经济学家与说教者

[美] 乔治·施蒂格勒 著　　贝多广　刘沪生　郭治薇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25　插页：2　字数：257000
印数：1—3500册

ISBN 7-5426-0318-3/F·72　　定价：7.60元



译者的话

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乔治·施蒂格勒所著《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一书是他的丰富多彩的论著中的较新一部。施蒂格勒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理论、产业组织和经济学说史方面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生产和分配理论》(1941年)、《经济学说史论文集》(1965年)、《价格理论》(1966年第3版)、《产业组织》(1968年)以及《公民和国家》(1975年)等。施蒂格勒教授曾经担任1964年度的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和1977年度的历史经济学会会长。他的理论建树使他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一书恰巧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那一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的。

大约有10年的时间，我们陆陆续续接触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教材、专著和论文，但一般说来，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全部发展历史，尤其是对于西方经济学家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的伦理思想基础以及西方经济学家的写作方

法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实际上并不完全清楚。而《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一书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和阐述，使我们较多地了解到生活在西方社会里的经济学家们是如何想的，如何做的，以及他们与社会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这本著作的好处可能就在这里。

与数学和力学相比，经济学算是一门年轻的科学，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学家们的辛勤努力日益赢得广大公众的密切注意。在施蒂格勒教授生活的社会里，经济学家们不仅组成顾问委员会为国家元首出谋划策，而且还是各家大小报刊的专栏作家。每逢出现新的经济危机或新的通货膨胀，他们就评头论足，活跃异常，新闻媒介也总是在这种时候寻找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进行采访和对话。由此可见，经济学家受到了社会或者说公共事务的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们能否作出相反的表述，即经济学家也影响公共事务呢？在这本著作中，施蒂格勒教授用一种犀利的但也不乏幽默和明快的笔调，透过经济学说的发展历史，考察了经济学家在公共事务中的顾问作用，并且确信，在设计和执行政府政策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具有影响力。不过，施蒂格勒也提醒读者：尽管不能否定经济学家的这种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微弱的和难以察觉的”，并且，这种影响是产生于科学的研究而不是产生于空

洞的说教。施蒂格勒在本书中所指的“说教”的含义是：经济学家对人们或全体社会所作出的政策或行为方式提出清晰而又理智的劝告，甚至谴责。他认为，一位真正的、科学的经济学家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像传道士般的说教，而应该把对社会的影响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当然，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未必会被人们迅速地、普遍地接受；即使被人接受，也未必证明这一理论就一定正确。施蒂格勒教授考察了边际效用理论和断折的寡头需求曲线这两种理论的命运。边际效用理论虽然具有普遍意义，但却是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为专业经济学家所完全认可。而断折的寡头需求曲线早已从科学研究中消失，但至今还充斥于许多教科书之中。

说教不是经济学家的工作特征，然而，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经济学家必然是在一定的伦理思想指导下进行工作和研究，进而提出研究成果的。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说中流派林立，门户众多，那么，就其主流而言，经济学家的伦理思想基础是什么呢？是顺从于精英的知识阶层的主导思想，还是受制于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是以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为核心，还是以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为基础？施蒂格勒教授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对此作出了多层次的阐述。第一，他认为这不是一个一句话就能

解答的问题；第二，他认为经济学家受到了社会的熏陶，因而任何伦理思想都可能形成经济学家的思想来源；第三，他认为就主流而言，经济学家主要接受的是功利主义伦理体系。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数理经济学前驱埃奇沃思曾经对功利主义伦理思想作出了这样的表述："'机械社会'终有一天将与'机械天堂'一起出现，分别攀上作为道德顶端的一个最大化原理的南北高峰。如同物质世界中一个微粒或张或弛的运动都不断地从属于累积能的一个最大总量一样，各个心灵的运动，无论因自私而分隔还是因同情而联系，也会不断地去实现最大的快乐能，即天地万物间神圣的爱。"施蒂格勒教授在本书中不乏溢美之词地认为，埃奇沃思等人代表了经济学中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高峰。需要指出的是，施蒂格勒教授本人则是一位自由主义色彩较浓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一书还包括了几篇用数量方法对经济学家的写作方法尤其是引证习惯进行研究的论文。西方经济学家大多具备在大学研究生院获得博士学位的背景，施蒂格勒教授在本书中考察了研究生院对经济学博士们日后写作风格的影响。由于英语国家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英语国家的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学界日益发挥支配性作用，本书对这一作用也作了分析。对于经济学家的引证习惯，施蒂格勒教

授主要讨论了经济学论著中引证谁、在何处引证以及引证频率的意义。

对经济学说史乃至思想发展史感兴趣的人，会从施蒂格勒教授的这本论著中获取信息和知识。当然，在阅读本书时，读者对作者的思想立场和观点似应有清醒的和批判的认识，以避免食洋不化的毛病。

顺便，我要感谢刘泸生和郭治薇两位同志，当我被其他工作缠住而未能赓续本书的翻译时，他们欣然应允助一臂之力，分别承担了本书第8—12章以及第16—18章的翻译任务。本书第7章和第13章原已有中译文，我们在校译本书过程中参考了这些译文，在此向原译者表示感谢。

贝多广
1989年8月于北京六里桥



原版前言

这本书中几乎所有论文都是讨论有关智识影响的问题。决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课题及其研究方法的力量究竟是什么？科学家的研究和观点又是怎样影响社会的？我所涉及的科学家当然是所有经济学家，但是上述问题却具有普遍意义。

我无法保证读者能够找到关于这些问题的直接的、更不用说完整的答案，因为智识和政治的影响格外地微妙莫测，难以追索。一个学者只要寻求最率直地回答一下自己的观点和工作中存在着的这些重要影响，就足以证实这一关系的复杂性。然而，我还是用各种方法去"蚕食"这些问题，希望引起别人的兴趣并产生抛砖引玉的效果。

我乐于感谢与阿伦·迪雷克特、加里·贝克尔、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其他朋友的交谈对我所产生的"某种"影响。在写作第四篇"数量研究"的过程中，克莱尔·弗里德兰是一个少不得的人

物。我还要感谢有关机构允许下列论文得以重印，这些机构和论文分别是：美国经济学会，“经济学家和国家”和“经济学家和垄断问题”；杜克大学出版社，“过去的经济学有用吗?”、“斯密漫游于国家学说”、“边际效用论的采用”和“经济学中引证的习惯格局”；经济学杂志，“原文注释成为一项科研问题”；纽约科学院，“默顿论重复发现，否定与肯定”；南方经济杂志，“经济学家的作用”；多伦多大学出版社，“穆勒论经济学和社会”和“科学地应用科学人物传记，以J·S·穆勒为例”；西方经济学会，“经济学文献：以断折的寡头需求曲线为例”。

最后，另外三篇第一次发表的论文是1980年4月24、25和28日在哈佛大学坦纳人力价值讲座上的演讲稿，它们最初刊载于犹他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坦纳人力价值讲座》(第2卷)中。它们的重印得到了坦纳人力价值讲座这家公司的允许。

当·代·经·济·学·译·库

目　录

MULU

经济学家和说教者

第 1 篇

经济学抑或伦理学



经济学家和说教者*

经济学家在论争经济理论或经济行为时，很少涉及伦理问题。他们(和我)发现，与经济分析中相对的精确性和客观性相比，这一主题错综复杂，难以捉摸。当然，伦理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人们在估价政策时必须具有宗旨，这些宗旨肯定包含了伦理内容，不过很可能是深不可测的。在这几次演讲中，我将用经济思想史作为重要的探测工具，来探

* 原载于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vol.2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我对加里·贝克尔、理查德·波斯纳和斯蒂芬·施蒂格勒的重要帮助深表谢意。在准备这些讲稿和多年的友好交往中，我与阿伦·迪雷克特讨论了这些课题，他所给予的帮助是难以计数的。我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员时完成了本文的大部分，因此我要感谢提供这一良好环境的格伦·坎贝尔。

索某些伦理方面的问题。

在这个第一讲里，我打算讨论经济学家——主要是经济学发展主流中的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如何劝导人们和社会采取合适的行为。现在我的兴趣并不在于他们已经提出的劝告，而在于这些劝告所仰赖的伦理基础。对于道德或正义，经济学家并没有特殊的专业知识，问题自然在于，对一个已经完全具备这方面知识的社会，经济学家将如何传递确切的和独特的劝告。

1．说教知多少？

说起经济学家一说教者，首先，也许最重要或者最令人惊奇的事就是，他们很少说教。我想，阐明我所指的说教的含义是至关重要的。我只是指，对人们或全体社会的政策或行为方式提出清晰而又理智的劝告（或者更经常是，谴责）。要给说教贴上任何非中性的字眼几乎都是令人生厌的——的确，我们的语言词汇贫乏，以致无法对赞同或反对进行暗示。在最近一次论争中，一位经济学家声称他反对“通常的商业”。一秒钟后，有人问，他是否反对“商业，逗号，如通常一样”。

我将阐明我关于说教的不严密的定义，随后将引证著名经济学家们的许多观点，现在我暂时离题，向在座的非经济学家们解释一下那些著名人物的权威性。我引证的所有经济学家智商都极高，训练有素，他们有关经济学的观点值得你们注意和深思，但是到此为止。亚当·斯密是一个例外，他

处于不同的位置：如果第一次听到他的一段话，你就颇有微词，那么，你是在作无效的反应；正确的反应是问你自己：我想知道我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当亚当·斯密谈到通货的贬值时——当然，通货在当今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他那个时代——他说，"通过采用这些办法，君王和国家就能以较少量的银，表面上偿还债务，并履行各种契约。实际上，政府的债权人因此被剥夺了一部分应得的权利"。① 我想这就是在说教了，因为"剥夺"并不仅仅是一个说明性的字眼。这一温和的、我希望是合理的道德判断定义表明，我只是引证了《国富论》前100页中一个明显的说教例子。在后面的章节中，斯密的说教变得更加频繁，但是在李嘉图的《原理》中几乎不存在说教，穆勒的《原理》中说教也相当鲜见，而马歇尔的《原理》中根本就没有说教。当然，这些令人钦佩的人物在对许多事情表示赞同或反对时，总是斟字酌句，精妙入微。杰文斯说1861年莫里尔关税法案是"这个(19)世纪中最倒退的一项立法"，这句话隐含了反对的意思。② 搜集诸如此类的评论并不困难，但是这些名言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在经济学家的专著中，它们非常难得。

要是说经济学家并不醉心于频频提出挑战性的政策主张，这会使大多数非经济学家难以置信，甚至许多经济学家也不敢苟同。我相信，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是，在与一位非经济学家交谈时，经济学家除了谈论政策之外，是没有别的经济学好谈的。外行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具备足够的知识与经济学家一起讨论专业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他会发现那些著名的《新闻周刊》专栏作者的专业著述都是莫名其妙的。专业杂志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与公共政策是无关的——甚至往往

与这个世界也显然无关。经济学家的政策顾问活动是在扩大还是在减少，我不得而知，但是，这肯定不是专业经济学的所关心的问题。

因此，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一心致力于说教。的确，没有人会因其说教而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但马克思也许是一个例外，有些人称他为伟大的经济学家，而我认为他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世人把我们看作是各项政策的热心支持者，并不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一直是以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解释实际经济现象。近200年来，我们始终满怀信心地面对这一任务，尽管我们并不总是能取得极大的成功。

2. 向谁说教？

在我的印象中，从前的教士精心致力于修正个人的行为，而如今，他们力求修正社会政策。不管这种印象是否正确，反正经济学家很少花费时间去告诫人们应该动机高尚或者行为典范。

我仍然回到斯密先生。斯密断言道，诸如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大型合股公司的职员只考虑他们自身的荣华富贵。

此等公司的职员，既有经营贸易的手段，其办公地点，又在1万哩以外，几乎全然不受主人监视，要指望他们仅凭主人的一纸命令就立即放弃一切为自己打算的营业，永远放弃一切

发财的希望，而满足于主人所认可的一般的、不大可能增加的而且通常只与公司贸易所得真实利润相称的薪俸，那真是再蠢没有了。……如果有人干涉他们以代理人为媒介而秘密经营或至少不公开承认是他们经营的贸易部门，他们就会使用政府的全部权力，并颠倒是非曲直，加以钳制或破坏。③

斯密在描述了这些令人讨厌的、欺诈他们的主人和受害者的贪婪之徒之后，赶紧说："以上所述，并不是诋毁东印度公司职员的一般品格，更不是诋毁任何个别人员的品格。我所要责备的，是政府的体制，是这些人员所处的地位，而并不是这些人员的品格"。④ 所以，人们应该谴责的是社会制度：人们以可以预计的、也许是不可变更的方式对所处环境作出反应。这并不是对指导人们的自身利益原则表示赞同或反对，尽管斯密很可能同意我们在后面还将深入了解的弗兰克·H·奈特说过的一句话，不可避免的就是理想的！

斯密很少就个人行为对个人进行说教的习惯延续至今，已成为经济学家们的习惯。当然，道学之士仍免不了向晚辈、下级乃至大众进行指导，这些做法或许会使你们感到有趣，而我则感到难堪。马尔萨斯抱怨下层阶级过多地倾心于他称之为"性欲"的东西，甚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颇有同感地建议用严厉的法律手段来对付大众的这种欲望。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曾经指出，依靠边际效用递减法则来赌博是愚蠢的，但是后来，幸运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吉米·萨维奇能够依靠边际效用递增法则为赌博活动找到了理由。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由于对未来的需要缺乏判断所造成的过失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曾经听说，一家公司在人和事方面都毫无可指摘之处，但至今为止还横遭许多政治家的鞭挞。谅必个人

身上的毛病与某种客观的制度相比，前者更适合于成为讨厌和反对的对象。经济学家从社会现实向个人行为的这些偏离，是情有可原的——如果承认他们也是人类的成员的话。

然而，这些偏离是应该辩驳的。经济学家—说教者关心的恰当对象是社会政策和制度，而不是个人行为。经济理论的特定逻辑需要这一指导方针：我们论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们，但是，如果我们力劝人们不要这样做，那将是自相矛盾的，也是徒劳无功的。如果我们可以劝说一位垄断者不使利润最大化，于是，其他改革者也可以劝说资源不流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那么，我们的理论就变得不得要领。

3. 鼓 吹 效 率

在经济学家喋喋不休的说教中，主要的题目就是，良好的政策有利于而低劣的政策会干扰一个社会的收入最大化。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题目，但在近200年里，效率，即较完美地实现无可争议的目标，一直是规范经济学家开出的主要药方。我们在考察良好行为的这一基本法则的要旨和权威之前，先观察一个重要的例子。

亚当·斯密最持久应用这一原理通常是在抨击对自由贸易的干预和重商主义的时候；他在他的巨著中为这一事业花费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斯密为此阐述道：

> 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时，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如此强大，以致没有任何帮助，它亦能单独地使社会富

> 裕繁荣，而且还能克服无数的顽强障碍，即妨害其作用的人为的愚蠢法律，这些法律或多或少地侵害了这种努力的自由，或减少了这种努力的安全。⑤

大约40年之后，关于自由贸易的争论由于比较成本理论而得以深化，但是，中央政策的结论得到了保留，用李嘉图的话来说就是，"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力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⑥迄今为止，这一观点几乎还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

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例子来说明经济学家把效率用作判断经济政策是否合意的标准，但是它们并不比上述例子更加重要。对垄断进行批评的中心要点是，它降低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建立最低工资法或者对劳动力在地域和职业间的流动设置障碍等等，都是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对此进行批评的中心要点是，它们影响了资源的配置。经济学家正是这样的人物：一边阅读着埃德蒙·丹特斯被关在小屋里所写出的作品，一边为他失去其他创作机会而叹息不已。

在斯密时代以及以后的几十年里，关于效率的争论被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即天赋自由权抹上了一层修饰的油彩。然而，如果说人们对天赋自由权的考虑一度曾很强烈的话，⑦那么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中期，它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

只有在实现公共政策的目标和代价方面毫无争议时，对这些政策的效率进行抨击才是合适而又令人信服的。假如一项政策比另一项政策能收益更多，而资源代价相同，那么，这一政策显然就是较优的，并且没有伦理论争的余地。确实，这向来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就公共政策进行说教的本质所在。

根据这一解释，经济学家—说教者只是帮助纠正那些常

常使国家陷入混乱的问题。J·S·穆勒用他惯常的洞察力解释了支持重商主义的那些错误认识：低劣的论说如何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一个商人在把货物转换成货币之前是如何不承认事业的成功；货币是如何"超群地"支配着一般商品，并随时可以满足其他商品所无法满足的需要；国家如何"从实物税中获取相对很少的利益，除非它征收货币形式的税收"，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因素一起促使个人和政府在估算平均值时，几乎把重心都放在货币上……"

但是更应该注意其结论：

"可是，当我们已经发现表面似乎令人可信的东西时，荒谬并不终止它的荒谬……"⑧

由此我们找到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在经济学家并不拥有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伦理体系时，他怎么能够如此广泛而又毫不费力地对政策进行批评。答案是他批评错误无需任何伦理体系：他仅仅是训练有素的政治算术家。他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里，这个世界存在着各种历史的和现代的、深藏的和浅露的社会错误，他只是向社会指出它所追求的目标，社会正在无效率地追求，但他无需与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发生争论。

一个充满错误的世界能够产生种种新的错误，其速度毫不亚于经济学家纠正旧的错误的速度！这恰恰意味着，无能为力的社会需要它们的经济效率专家，而我们正是它们自选的救星。

脱去当今经济学家身上色彩斑斓的外衣，我相信这仍然是作为我们这一行绝大多数政策建议的基础的根本信念。确

实，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收入再分配问题，它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天天碰到的社会问题通常都是效率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易犯错误的世界。

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社会即使没有一直令人崇敬的目标，也有令人接受的目标，只是对实现目标的有效方法认识不足，我认为这种观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极端错误的。

这种观点的错误显而易见，因为在我所讨论的所有时期中，对政策的目标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实际上，在任何文化的社会，甚至于最独裁的社会，对社会目标都存在着批评。比如，在李嘉图时代，戈德温就强有力地指出过，政治和财产制度是社会苦难的主要原因。或许戈德温还不算是一个恰当的例证；我想无政府主义者应该是一个自由贸易者。那么，以马尔萨斯为例，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他是所谓农业保护论的支持者，而这种理论正是李嘉图抨击的目标。

马尔萨斯指出，一个专业从事制造业和贸易的国家很容易发现，来自国外或国内的竞争侵蚀了它的利益，不管怎么说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贸易伙伴的繁荣。一个纯粹农业国会发现自己困于一个停滞的封建社会制度，换言之，它会发现一旦农作物停止生长，自己就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本。因而，马尔萨斯希望建立一个农业和商业混合的制度。

我不必掩饰我的猜测，马尔萨斯实际上是在论证这种混合的农业商业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他提出了自由贸易者的后代们还很少考虑的一系列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其中有些问题涉及到经济长期增长和稳定的决定因素，迄至今日，经济学家对此还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为什么经济学家——在全体人民中——不太愿意把大量政治活动说成是错误的，对此还存在着第二项，也许更加有份量的理由。人是理性的、有效的使效用最大化者的假说恰恰和人们的政治活动与他们的愿望无关这一假说相冲突。我经常为理智的政治行为的主题作充足的辩解，因而这里我尽可能不发表议论。⑨对政治过程分析的失误是很令人沮丧的——就把政治过程当作是慈善的公共利益与无意间的铸错这两者稀奇古怪的混合物吧。

现在我们中有一些人对关于政治的经济理论寄予厚望，不管人们对这些希望是赞同还是反对，反正，假定公共政策是基于错误的观点从而认为这些政策常常是无效率的，这种看法不太正确。要相信，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在大多数国家都可看到的保护性关税或高利贷法案是因混乱而生而非因有目的的行动所长，这一事实特别地令人迷惑不解。最优秀的人物和最优秀的国家确实曾犯过错误，但是100年之后，我们还没有资格问一下，所谓“错误”产生的仅仅是无目的的结果吗？

换言之，一种理论如果认为一大套持续的政策是错误的，那么，它就有反智识的深远意义，除非它本身也成为错误的理论。这是最空洞的“解释性”原理，把无法解释的现象看作是错误因而不予考虑——太阳底下甚至太阳上面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贴上这一标签，弃置一边，而不增加一丁点的认识。

我们经济学家从古至今对各种政策缺乏效率的问题提出了无穷的批评，批评常常导致他们自我(包括我自己)完全的满足。这些批评对改变政策作用甚微，我相信，这是因为几乎一切事情的涉及范围都远远超出了效率本身——这些政策

为许多说不清道不白的目标服务，其效率也可以忍受。关税是把收入再分配给具有很大政治权力的集团，它并不仅仅表示政府对比较成本理论一无所知。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错误政策的世界，然而，政策的支持者并不认为这些政策是错误的。

我打算再稍微提一下重商主义政策，斯密把它看作是各种大小商人对付愚蠢而又尊贵的地主的聪明策略，在那个时代，地主仍然构成了大不列颠的统治阶级。斯密和他的追随者应该自问的是，拥有诸如埃德蒙·伯克这样的智者的一个阶级是否会在数百年里花费巨大代价去坚持一个简单的谬误。我诚惶诚恐地说，对重商主义的成本与效益认识有误的，更可能是斯密，而不是英格兰的贵族们。我为他而说：一个存在巨大而又持久的谬误的世界未必是经济学生存的良好场所。

4. 鼓吹平等

在实现被人们普遍接受和认识比较一致的目标的过程中，仅仅根据效率是无法顺利地评判一整套政策的；我指的是那些旨在谋求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假设纳尔逊和琼斯拥有相等的收入，一项政策征收了纳尔逊的一半收入并把它付给琼斯，那么，除了琼斯之外，所有人的脑子里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个平等的问题。

在从斯密到杰文斯的那个世纪里，经济学家小心翼翼地一起进行关于收入分配的讨论。可以设想，斯密把收入分配

看作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事情，为此他说道，“一国君主，对其所属各阶层人民，应给予公正平等的待遇；仅仅为了促进一个阶层的利益，而伤害另一个阶层的利益，显然是违反这一原则的。”⑩我倾向于接受这一观点，尽管人们偶尔也可以找到若干歧见，比如他建议通过对极尽奢华的车辆课以不成比例的重税来加重“懒惰与虚荣的富人”的负担，当然这些歧见很少出现。⑪

古典学派与斯密的做法相差并不太远。平等也带来两方面的有害影响：减弱人们节俭和工作的动力；马尔萨斯的原理认为，它还会增加人口数量。李嘉图对那些不尊重财产权的投票会持否定态度。⑫穆勒，尽管他是财富分配不同于财富生产，它具有社会伸缩性这一令人安慰的主题的作者，但他并不打算支持累进的所得税——他主要是担心收入平均化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而且这样一种税收对于政府的调查审核工作来说是无法承受的。而边沁那种从功利主义者的微积分中产生出来的平等观念没有给他的朋友、门徒甚或佃户留下任何印象。

对于收入再分配近乎沉默的这种习惯似乎有一个有趣的例外。地租，是对使用“最原始的和不可摧毁的”财产所支付的费用，从定义上讲，它不是机能性收入，所以，对地租的社会控制不会影响土地的使用。因而，穆勒热情支持对土地价值的未来增量实行国有化。但是，即使如此，穆勒还希望对现有的地主给予足够的补偿。⑬

当效用理论变成经济学的核心时，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1881年，埃奇沃思出版了《数理心理学》，他以艰深典雅、富于想象的特点卓有成效地提供了功利主义微积分。效

用论与自然选择论结合了起来，其最激进的建议是所谓不应该允许在一定能力水平之下的人有小孩⑭，以及生产能力和享受能力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甚至可能导致贵族阶层的优势。这种激情在适当的时候被那种使损失最小化的功利主义税收法则的古典理论所取代。国家在对穷人征税之前应该先对富人征税，但并不是简单地对富人课以比穷人更重的税收，因为过分的累进税制会对生产造成无法预知的危险。⑮累进制是从以下两个假设中引申出来的：收入的边际效用随收入增长而下降，以及一个人拥有的收入数量与其将收入转化为效用的效率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如果其他事情保持不变，只要国民所得的分配更加公平，就能扩大经济福利”⑯，1912年庇古把这句话称作福利经济学的一条公理。但他对广泛直接的再分配仍然抱以勉强的态度，理由是——由此足见他是个古怪的人——穷人不会理智地使用资金：“妇女，不管她们怎样用臭鱼烂虾喂养孩子，也不会丧失母亲的职位，父亲不管怎样对儿子的前途不负责任，也不会被开除父亲的资格……但是，人们一直说的，……足以建立这一命题……即穷人，作为向自身和子女投资的企业主，反常地缺乏能力。”⑰幸运的是，穷人的智商获得了迅速的提高，以致几年之后庇古就能够写道：“指控整个穷人阶级都无知和缺乏经营能力，这实际上完全是一种诽谤。”⑱难道是庇古跟上了社会的步伐？

我要宣称我只相信我可以证明的东西，在过去100年里，经济学家一说教者越来越关心收入分配的问题。当今，任何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任何政策评估首先要考虑的主题，而平均主义几乎成为社会政策无可辩驳的目标。以下两段论

述概括了收入分配在对经济决策进行道德判断时的支配性地位。

第一段论述说，经济学家对收入分配的关心程度的提高不是源自于经济学本身。迄止最近，关于收入分配的专业文献还是非常鲜见的，比较蔑视传统观念的（尤指人与人之间效用比较的可能性），并且没有累积起来。毋庸置疑，经济学家从他们所处的社会的精神主流中汲取了平均主义价值观，但他们不是形成这种精神气质的重要贡献者。在我作为范例的英国传统中，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相比，费边社会主义者才对平均主义具有重大的影响，并且是平均主义的坚决支持者。

第二段论述是，在广泛的收入再分配中普遍接受伦理原则阻碍了实证性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这样一种实证理论可以解释大规模的收入分配如何影响诸如财富增长和教育的发展、税收和其他政治行为的作用、遗产制度以及家庭性质的变化，并可解释这些因素又是怎样影响收入分配的。这种实证性理论正开始形成，我预计它将对经济学家关于再分配政策的态度产生重要影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直至最近对收入分配的专业研究还为数甚少，没有累积起来，其原因在于经济学家们仍然把这一主题看作基本上属于伦理性问题。

5. 结　论

我的这场关于经济学说教的说教应该告一段落了。从我

们作为说教者的经历中，我得出的主要教训是，我们要鼓吹社会希望倾听的东西，在此限度内，我们会受到欢迎。或许所有说教者遵循此道都会受到普遍欢迎。

一个说教者的声望大小未必能衡量出他作为说教者更不用说作为学者的影响力。事实上，人们也许可以说不受欢迎的说教反而更有影响——当然，假如对立面是正确的，而说教者只是使听众坚定信念，那么，教士就应该站在教徒的后面，让更聪明的人来引导众人。无论经济说教者是引导还是跟随，他们都需要一个伦理体系来指导他们的建议。在下一讲里，我将介绍他们的伦理学的性质和来源。

注　释

① The Wealth of Nations, Glasgow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I, pp.43-44.

② The Coal Question (London: Macmillan, 1865), p.326.

③ Wealth of Nations, II, pp.638-639.

④ 同上书，第2卷，第641页。

⑤ 同上书，第1卷，第540页。

⑥ David 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P. Sraffa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113.

⑦ 对此我有几分疑惑。例如，斯密宣称，禁止银行发行小额纸币固然是对天赋自由权的冒犯，然而为了对社会更加有利，却应当这样做。参见 Wealth of Nations, I, p.324.

⑧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5), I, p.67.

⑨ 请参阅 "Smith's Travels on the Ship of Stat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 no.2 (Fall 1971), 和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

agement Science 2, No.1 (Spring 1971),以及下面要提到的安东尼·唐斯、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和公共选择论者的文献。

⑩ Wealth of Nations, II, p.654.

⑪ 我们发现斯密抱怨窗税是累退的(«国富论»第2卷,第373页),还抱怨什一税与地租不成比例(«国富论»第2卷,第358页)。

⑫ "我认为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我看来,这一点对良好政府的构成是决不可少的,如果确有理由可以断言,他们把侵犯财产权看成是他们的利益所在,那他们的选举权就应当予以剥夺。但是,事实上只有社会中最贫困的人才会持有这样的意见。只要他略有收入,就必然会意识到,如果将国内的大宗财产在广大人民中进行平均分配,他个人所得能有几何。他必然懂得,把使他的辛劳所得安全可靠的那个原则推翻以后,他通过这样的分配所获得的那一点,决不足以补偿推翻这个原则时的所失。……因为决定全国的就业量的,不仅是资本的量,还有资本的有利分配,特别是各个资本家的信心——深信通过他的资本、技能和冒险精神得来的成果,将由他安然享受,不受干扰。如果使他失去这个信心,就立即会使全国的生产事业消灭一半,……" 见 Observations on Parliamentary Reform, in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pp.500-501.

⑬ 穆勒认为现值不包含地租增量的公正估计值,这一观点是错误的。类似的问题潜藏在他对累进的不动产税的支持之中。他的遗作 Chapters on Socialism 甚至在讨论布朗基、傅立叶以及欧文时,都没有考虑到不平等问题(除去隐含着对贫穷的讨论之外)。

⑭ 否决"一份国内快乐"的人也许从移民中获得了安慰。

⑮ Francis Edgeworth, "The Pure Theory of Taxation", in Collected Works Relating to Political Economy (Loadon: Macmillan, 1925), I, pp.111-142.

⑯ Wealth and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1912), p.24.

⑰ 同上书,第356—357,358页。

⑱ Economics of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1924), p.709.



竞争伦理学：友善的经济学家*

对一种由个人掌握资源配置决策权并决定最终产品的构成和分配的经济制度，存在着多种叫法：市场制度，企业制度，竞争的、自由放任的，或者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垄断的资本主义。这种制度在过去200年的西方世界中一直是控制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不过，政府干预的范围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扩展。

在这一讲中，我打算首先讨论一下主流派的英国经济学家对这一制度的看法——他们对企业制度赞同和反对的范围和内容。对于他们的看法的演变历程，我只是作简要地回顾，而把重心置于他们现在对市场的看

---

* 原载于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vol.2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法。随后，我将提出的问题是，这些经济学家从何处获得伦理思想，以及这些伦理价值观对他们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1. 迄至1900年：经济学家在辩论中增加戒备之心

一直到19世纪中叶，企业制度被广泛接受，是因为人们相信它的优点就是它的效率。私人财产权使沙子变成金子，没有人抱怨沙子的消失或者抱怨金子的出现。"天赋的自由制度"得到了广泛地扩展。确实，古典经济学家指定国家去纠正或增强私人行为，这类公共性的任务可以列举出许多，但是，它们并不是普遍的或系统性的"规划"，而只是少量旨在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护创膏布"。马尔萨斯人口论文的一部分就是谴责公平制度，李嘉图则嘲笑罗伯特·欧文的平行四边形思想。①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于私人企业的相对优点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充满着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出于三个原因：他具有理解和阐述几乎任何观点的古怪倾向；受经济思想史中的"和稀泥"人物的影响；以及他指出的私人企业存在着的令人惊奇并且荒谬的缺陷。他声称大约90%的劳动力的报酬至多是松散地与他们的努力和成绩挂钩——确实如此松散，以致他对此表示了愤慨，"劳动力的产出与劳动力的比率应该以与我们现在所看到几乎相反的比率进行分配。"②他觉

得可以肯定，一个竞争性市场无法实现工作时间的缩短，即使所有的劳动力都有这样的愿望。③人们常说只有大智者才会犯大错。穆勒正应了此话。

然而，尽管穆勒用明确的和含蓄的方法阐明，政治经济学并不意味着自由放任，但是，他还是创立了一条很快被广泛仿效的惯例。在列举了支持自由放任的若干理由之后——主要基于对个人自由和发展的愿望，也基于效率——穆勒归纳道："很少有人会为这些理由是否充足而争论不休，要那些建议而不是抵抗政府干预的人从所有例子中举出一个强有力的例子，从而增加他们的负担。'自由放任'，简言之，应该是一般的惯例：除去某些大好事的要求之外，任何违背这一惯例的作法肯定都是恶行。"④否认自由放任的理论性而把它暂且称作是一般准则的做法，很快成为经济学家的既定教义，而且保留至今(后面我将提出争议)。不久，开恩斯、杰文斯、西奇威克、马歇尔和J·N·凯恩斯都承认了这一传统。⑤垄断、外部性、信息不通以及其他与自由放任相悖的理由累积起来，但却只是作为一般准则的个别例外。

这种使纯科学沉默而由深沉的假设支持自由放任的折衷方法，令我比大多数经济学家更感到困惑。一种科学能够在自愿担负的界限内用一般术语解释现象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种科学是成功的。举例来说，科学应该能够告诉我们最低工资法对就业和全体工人的报酬的影响，价格变动对消费者的影响，等等。具体地说，标准的分析预测出，最低工资法会减少能力最差的工人的收入，并大致地减少社会的收入，从而产生其他各种影响。

有人会说，因为经济学家的分析框架所造成的限制，理

论未必导致明确反对最低工资法；比如，劳动力市场上的买方垄断，或者工人的无知产生了无效率的市场结果。但是，经济学家应该分析(比如)在最低工资法条件下和存在买方垄断的自由放任条件下产生的影响，分析出一个明确的结果抑或没有结果。无论哪种情形，都不致形成什么"假设"。

换言之，理论也可由于经济学范畴之外的理由而被看作是没有定论的；具体地说，理论没有认识到的社会价值可能否定其结论。⑥ 比如，最低工资法可能实现人们所希望达到的收入再分配(或某项其他社会价值)。于是，最低工资法明显的得益者是最低工资线以上的工人，确实这正是劳联—产联支持这一法律的原因。或者说，在高工资领域的工人可以不受低工资领域工人的竞争，从而维系人口分布目标。

很好，这些或其他理由足以解释人所周知的最低工资法为社会所接受并得以延续的原因。那么，难道这不是对在最低工资法研究中得出这些结论的经济理论的正当要求吗？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全部影响为什么不应该对经济学家也同样重要呢？除非我们乞灵于理性探索范畴之外的影响——比如，这项法律没有其他识别标准而只有利于那些信仰真正上帝的人——否则，同时生存于经济现象的纯科学与一套有关惯例的非派生假设之间，是不容易的。当然，可以以科学分工为由来忽视效率以外的价值，即使没有其他科学会去研究这个被忽视的部分。但是，人们至少会对这种假设来自何方提出疑问。

我猜想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经济学家也许是含蓄地默认，其他可能压倒效率假设的价值通常是脆弱的或矛盾的，或者只是加强了在研究各种影响基础上所作出的结论。我不打算

与这种正在流行的哲理进行争论：不管如何充分地解释我们拥有最低工资法的原因——这是我们应该拓宽的一项研究，我预计我们经济学家不会喜欢这个法律。但是，不应该把流行的哲理炫耀成科学。

2. 边际生产率伦理学

经济学家们醉心于对企业制度进行公开的、无条件的赞美，到了19世纪末，这种赞美遭到一次很大的中断，这发生在人们发现并普遍采用了边际生产率理论的时候。

边际生产率理论认为，在竞争性均衡中，各个生产要素得到的补偿率等于使用生产要素的企业边际的或增加的贡献价值。假如生产要素是一个劳动力，他在一个服务行业工作，没有什么资本设备，这样，在均衡点他的工资就等于他的服务给企业所增加的营业收入额。假如像通常那样，所有生产要素都是相互结合的，于是，边际产品就可能表现为更多一些的庄稼，更可靠的机器，或者其他某种可以销售的物品。

假如你向一个外行人宣称，某个人的工资就是他的边际产品，在对边际产品的含义也许解释得比我还清楚以后，又加上一句“这难道不令人愤慨吗？”我预计这个外行人会对你的评论感到惊讶。在边际生产率理论的奠基者和传播者中间，确实有若干经济学家精确地指出一个人的边际产品价值恰好等于他的报酬率。

这种观点最著名的倡导者是约翰·贝茨·克拉克。在他

的巨著《财富的分配》(1899 年)中，他指出：

工人阶级的福利情况，取决于他们收入的多寡。但是他们对其他阶级的态度(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社会治安问题)，要看他们所收入的部分是否等于他们所生产的部分，而不管他们的收入是多还是少。如果他们创造的财富很少，但全部归他们所有，他们也许就不会想到革命。假使他们觉得他们生产了巨额财富，而所得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就一定会变成革命者，全体工人也将都有革命的权利……

首先，我们必须决定社会是否给予每人以他所应得的部分，从而测定这个社会是否公正。其次，我们必须再来考察社会分给每人所应得的部分，究竟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从而测定这个社会是否为人类造福。⑦

哈佛大学的T·N·卡弗也是一位生产率伦理的代表人物：

但是，如果一种特殊的劳动力数量很少，而其他要素数量庞大，以致每增加一名这种特殊劳动力，产量就能大大提高，那么，就可以精确无误地说，他的物质产品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价值也就非常高。所以，这就是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大小的原理，并且，根据我们的公平准则，由此而成为决定一个人应该得到多少劳动报酬的原理。⑧

我没有努力探索到底有多少经济学家参加了这一对竞争的伦理性辩护。我相信许多经济学家是这样做的，他们通常并不是明确地公开表态，而是含蓄而又贴切地把边际生产率看作是报酬的依据。例如，庇古为剥削性的工资选择的定义就是：低于工人的边际产品价值的工资。⑨

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作为"朴素的生产率伦理"，其中的形容词不是为了表示它区别于其他更高级的伦理学体系，而是

表达了经济学家的不满。对这种不满的经典表述见诸于弗兰克·奈特著名的论文"竞争伦理"(1923年)。⑩他对竞争性制度的公平性提出四点异议：

1. 经济制度造就了社会成员的趣味爱好，所以不能以制度有效地满足了需求而为其辩护。⑪

2. 经济制度不是"完全"有效率：它存在着不可分性、不完全的知识、垄断、外部性等等。⑫

3. 竞争性制度最主要的缺点是，它基本上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努力只占很小比重)来分配收入。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累积。⑬

4. 如果把竞争比作一场比赛的话，它难以满足可接受的公平标准，比如给予每个人以相同的起跑线并且有参加各种各样的竞赛机会。

许多年以前我第一次读到这篇论文之时，我正在奈特教授指导下撰写学位论文，你们不用奇怪，当时我认为他的论文是关于"生产率伦理"的最终性驳论。当我在大约一年前重读这篇论文时，我为我的推论而感到震惊。奈特作出了一系列最彻底、最自信的经验判断(诸如上述第一、三条异议)，但是他却找不到一点点支持这些判断的证据。进而言之，如他的第二条异议，现实世界的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就他特指的含义来说还比较中肯：人们可以定义出一条完善的标准去判断不完善的行为，任何经济制度下的现实行为用任何普遍标准来衡量肯定都是不完善的。奈特一直提到在任何"可接受的道德体系"下反对竞争性结果，但是他从未告诉我们这种体系中到底包含什么道德内容。他自己独特的判断似乎并不强求于人，正如他有时所说的"没有人会为一瓶陈年葡萄酒的道德价值是否与一桶面粉相等而争论不休"。亲爱的奈特教

授，请原谅背叛你的学生，但是我确实好争论，假如这是酿制葡萄酒的大好时光的话。

我还要简单地说一下可接受的伦理的地位，但是现在我只想指出，关于收入分配的生产率伦理，其感召力不仅获得了来自公众的广泛支持，而且还得到那些不在乎言语而注意感情的经济学家的支持。秘密的公民投票无法计算出伦理价值，但是，生产率伦理学确实受到普遍的支持。甚至马克思也像庇古一样把剩余价值看作是工人的产品超出其工资的那部分。在技术与努力之外所得到的报酬——在奈特的例子中，有胡须的妇女获得马戏团的好职位，仅仅就是因为她们没有刮胡子——并不足以否定生产率伦理学。

3. 经济学家的伦理学

我尽可能推迟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经济学家从哪里得到伦理体系？我的回答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

可被广泛接受的哲学体系一向是非经常的来源。经济学说史中最重要的哲学体系是功利主义，边沁那个圈子里的人、西奇威克、马歇尔、庇古、乃至埃奇沃思都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已经提到过埃奇沃思的《数理心理学》，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对早先的专题文章《伦理学的新旧方法》的再创造。埃奇沃思郑重地论述了功利主义伦理思想：

> "机械社会"终有一天将与"机械天堂"一起出现，分别攀上作为道德顶端的一个最大化原理的南北高峰。如同物质世界

中一个微粒或张或弛的运动都不断地从属于累积能的一个最大总量一样，各个心灵的运动，无论是因自私而分隔还是因同情而联系，也会不断地去实现最大的快乐能，即天地万物间神圣的爱。⑭

埃奇沃思的微积分和西奇威克的《伦理学方法》代表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高峰。

直接运用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主要障碍在于，它需要其他信息，尤其需要有关不同的人生产效用时的效率的信息，但人们承认没有客观依据来衡量这种效率。埃奇沃思有可能被引向认为，贵族统治的社会可能是最好的社会。

即使比较效用的困难得以克服，而且是被意见一致所全面克服，而不是被争论或证据所克服，那么，系统的伦理学则会导致令人窘迫的结果。让我来举例解释这个问题。

当人们要描绘一种一般的伦理体系的应用程度时，人们会遇到类似于马歇尔所遇到过的那些问题。马歇尔在题为"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变动的理论同最大限度满足原理的关系"的一个章节中，考察了良好的货物税的特性。⑮根据功利主义理论，马歇尔指出，对必需品而不是对奢侈品征税更合人意，因为必需品的需求弹性较小，所以货物税使消费者效用(消费者剩余)的损失有所减少。⑯当然，由于累退税忽视了纳税能力，因此，马歇尔反对这种建议。

需要指出的是，假如马歇尔恰当地衡量出穷人的边际收入效用高于富人，那么，他就可能不会感到窘迫。这是有可能的，虽然他为此会对奢侈品税和必需品税的效用大小进行比较。但不管怎么样，很快还会出现其他令人窘迫的问题，比如，功利主义的目标意味着世界范围的收入再分配。

包罗万象的伦理体系面临的困难是：它们得出的结论并不为社会所欢迎，从而也不为经济学家所欢迎。虽然我没有进行大量的核实，但是我相信，伦理体系与普遍的社会价值观的抵触，使得经济学家不再纠缠于伦理体系。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就更有理由接受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管其包含什么矛盾。

约翰·罗尔斯曾经提出过走出这一死胡同的方法——即引申出一般的伦理价值，既具有归纳性又能够协调地应用。他的设想如下所述。选择一套可信的判断标准，让它们来确定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无数变化多样的具体矛盾。在假设它们已经作出判断的条件下，要寻求一种解释或一种原理来正确地预测出这些判断的折衷点，并称这种原理为伦理原理。通过这一程序，任何隐含于可信的判断之后的伦理原理都会重新亮相。人们也许会抱怨这种程序具有自命清高的性质，当然根本性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发现存在着什么原理。⑰罗尔斯后来提出了经过修正的功利主义正义理论，颇有影响，但不是在归纳的基础上，这表明他也认识到归纳性的伦理学很难系统化，可能也难以为人们所接受。⑱

如果与我们认识的一样，经济学家一直满足于把他们的目标建立在知识阶层的主导思想基础上，那么，这与他们简单地吸取其中隐含的伦理价值的观点是两码事，在后一种情形里，他们接受多数人的观点，或者与知识阶层所持观点的变化速度相一致，来宣传他们自己的思想。他们自己的学科拥有自身的影响力。

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人常常谈及，事实上我应该说是抱怨，理性决策的逻辑对经济学家所产生的特殊魅力。这种逻

辑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能回答如此大量而又不同的问题，这些回答对于经济学家常常是合理的，而同时对于其他人却是荒谬的。经济学家表现出来的乐观并没有减弱这种逻辑的矛盾程度。在突然发生粮荒时，富人买进粮食然后半价售给穷人而穷人并没有得到帮助，朗菲尔德在论证这一点时一定是非常喜悦。宗教界读斯密的著作的人要是知道对正牧师培训的丰厚津贴只会导致副牧师收入的降低，一定会感到非常烦恼。甚至一些经济学家对贝克尔的"病羊定理"也感到愤慨，这一定理证明了，对一个自私者施以利他主义的教育会迫使他变成一名无私者。

经济学的逻辑集中于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上。在人类行为的所有角落都可以看到这种行为——我刚刚提到的同事，加里·贝克尔，他在诸如犯罪、结婚与离婚、生育以及利他主义行为等领域进行了分析并取得了惊人的结果——但是经济理论集中应用于看得见的市场上。私利的力量以及它在复杂的决策领域里几乎难以置信的精细微妙，促使经济学家力图寻找明确的或隐含的价格在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结果，当一个时期内对竞争性市场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依赖性迅速而普遍地消失时，经济学家非但没有领导潮流，反而远远地落在潮流之后。他们固执地试图利用价格来减除污染、配给能源，或者促进治安状况。对目前一些经济领域实行的放松管制的温和政策，他们总是最积极的支持者。

经济学家对市场的这种倾向性是出于专业训练，还是出于对一种大致(但不完全)独立于所追求的目标的、可以被证明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喜爱，抑或出于经济活动的市场

组织中的伦理价值观，这要由一位比我更高明的人来判断。但是，最后一个因素，即自愿交换中的道德吸引力，在我们的态度中至少发挥了某种作用，对此作用我可举一例子说明。

市场交易是自愿性的和重复性的。这些特征很少见诸于政治交易或军事交易，当然宗教交易中也许完全没有。因为市场交易具有自愿性，所以它们必然惠及一方但并不损害另一方。因为市场交易具有重复性，所以它们(通常)使得欺诈和毁约行为无利可图。公正负责的名誉是一种商业资产——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它可以称作商誉。

理性的行为并不妨碍养成节约决策成本的习惯。马歇尔认为其中一个习惯就是诚实："现在欺诈的机会的确是比过去多了；但也没有理由认为，人们比过去会更多地利用这种机会。相反地，近代的贸易方法一方面包含信任他人的习惯，另一方面包含抵抗欺诈行为的引诱的力量，这两点在落后民族之中是不存在的。"⑲对这一观点措词更强硬、时间更早的阐发者是斯密：

> 一旦商业在一个国家里兴盛起来，它便带来了重诺言守时间的习惯。在未开化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这种道德。欧洲各国中，荷兰人最重视做生意，同时也是最重诺言的人。在这方面，英格兰人比苏格兰人较胜一筹，但不能和荷兰人同日而语，而生活在比较偏僻地区的人，又比不上商业城市的人。这种差异并不是像一般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出于国民性方面的原因。没有什么必然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英格兰人或苏格兰人不能像荷兰人那样准时履行契约。这个差异是由于利己心理的作用，就是支配个人的一切行动，使其在某一问题上根据利害观点选择某一行动的原则的作用，荷兰人也好，英国人

> 也好，都有这种心理。商人本来最怕失信用。他总是时刻小心翼翼地按照契约履行所承担的义务。比如，经常每天和人签订20个合同的人，绝对不可能因欺骗附近的人而得到大好处。他的奸诈面目一旦被人识破，失败便无可避免。但只偶尔互相打交道的人们，就常常会想行巧施诈以从中牟利。因为如果行使诡计一次侥幸成功，所得到的利益可能大大超过因此所遭受的名誉上的损失。就诚实和守约而言，我们称之为政治家的那些人并不是值得称颂的人物。各国大使更不必说。他们在外交上占一点小便宜时，人们就交口称道，而他们也沾沾自喜，引以为荣。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国与国之间100年中不过偶尔打两三次交道的缘故。假使有一次施展狡诈手腕成功，所得的好处可能远大于名誉上所受到的损失。法国自从路易十四以来，在英国的名誉并不很好，但法国的利益和光荣，并不因此有损毫厘。⑳

我不知道实际上参与经济交易的人是否在行为上比那些参与外交交易或原始的物物交换的人更诚实，我有理由相信马歇尔和斯密在写那几段话的时候也不知晓这一点，不管他们后来是否知晓。但是我坚信他们乃至大多数现代的经济学家都接受了他们关于商业道德的立场要旨。

这一信念并非基于对观点的某种投票表决，而是基于我们日常的习惯。现代经济学家几乎永恒地要求交易中不存在欺诈或强制行为。这一要求部分是由如同预算方程式那样的数学形式表达出来的，各个经济单位所收到的价值量必须等于所付出的价值量。因而，交易几乎就可定义为是非强制性交易，没有人会在进行交易之后变得更糟。

没有什么内在的理由让我们作出这种假设，倒有两条不错的理由让我们不作出这一假设。经济学应考虑欺诈和强制

行为的第一条理由是，这些行为也许无法与诚实的交易区分开来。比如每天晚上我从一座公园抄近路回家，并且平均一周一次我的裤子被人抢走——我知道不能带钱。这样，每天我付出一条裤子的 1/5 作为买路钱从而走了近路，这难道不是自愿性交易吗？再比如，我向你出售一块土地，你误认为这块地底下有油田，而我知道真相。难道我是在欺诈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修改一下条件，你知道那里有油，而我不知道，显然，我们可以发现一半的人是不承认这是欺诈行为的。

第二，即使从社会角度看欺诈和强制行为都是确凿无疑的，也没有理由认为普通的经济分析不能应用。欺诈性证券的供应数量恰好在包括销售成本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这一点上。人们不期望犯罪者的收入会超过他们在合法职业中可能获得的收入，因为干一件事所付出的代价都要得到恰当的补偿。经济学的普通命题适用于犯罪行为。

总而言之，我们经济学家习惯于排除欺诈和强制行为，因为我们认为，在企业经济社会的普通经济交易中，欺诈和强制行为在实证上并不是有显著作用的因素。

虽然，经济学家与知识阶层的其他人相比对私人企业制度表现了更大的热情，但是，这并不是说，流行的社会观念对技术性的经济研究没有影响。现代经济理论对垄断问题十分重视，在浩如烟海的对产业组织的研究文献中，实际上垄断问题占了首位。关于垄断多么重要的证据微不足道，但是，关于垄断对经济运行影响甚微的证据却很多很多。我是慢慢才倾向于熊彼特的观点的。他认为垄断在经济文献中的显要地位是由于一般社会观念影响的缘故。[21]

4. 伦理学是什么？

我刚才已经说过，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交易通常是在公正负责的高水平上进行的，因为在重复的交易中行为端正涉及到交易各方的利益。可见诚实是值得的。

不同意这一观点的，我们可以举出理查德·惠特利大主教，他既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神学家，又多少是一位经济学家。主教大人说，按诚为上原则行事的人是不诚实的人。㉒他没有进一步阐发，但含义相当清晰：因有利而诚实行事的人很显然就是一个非道德性的计算者；只有在遵循正确行为原理时不考虑行为对自身后果的人才是诚实的人。

如果社会上人人都胸怀使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功利主义目标，大概所有的人都会诚实地做人，因为预防欺诈和惩戒恶行对于社会来说就是一笔巨额的无谓损失。假如只有一个人不心存这一伦理，他的不诚实行为很可能给他带来好处——社会在对他或她采取预防措施时确实要付出代价。所以，人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诚实是整体社会的功利主义伦理，尽管诚实不给个人带来好处(不是功利主义)。

人们是否持有影响他们行为但独立于他们自身的长远效用最大化行为进而与此相冲突的伦理信念呢？这个问题说不太清，如果我们假设个人效用函数中存在无限的利他主义，那我们等于回归到了社会功利主义。如果不是回避这一结果，

而是持在实证上难以攻破的一个论点，我应该指出，在家庭内部和亲朋好友之间，利他主义是强烈的，但它随社会关系的疏远而递减——亚当·斯密早在《德道情操论》中就持这一立场。㉓这一解释并没有最终回答人们是否按照伦理原则行事这一问题。实际上它是消除了这样一种简单的回答，“当然，他们施舍博爱。”

是否存在有效的伦理价值观，这当然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从原则上说应该直接诉诸于试验。我回想起曾经有过一项实验，将装入一些现金的信封贴上邮票，写上地址，但不封口，把它们扔到大街上，然后记录信封是否寄到了指定的收信人手里。我依稀记得许多信封寄到了作为最终收信人的一家慈善团体那里，但是大多数现金都被拾遗者侵吞了。

人们可以对这种类型的试验提出异议，我记得有过这种争议，因为这一试验并没有说明拾遗者是怎么做的：也许有人拾到信封后去找教士做礼拜，也许有人去为赛马下赌注，二者大相径庭。然而，这仍然是一个有趣的探索题目，它更适合于作为现今哲学博士的论文题目，而不是新闻记者报道的对象。

让我来预测一下，当人们的私利与人们普遍声称所忠诚的伦理价值观相冲突时，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系统的综合性的测试会得出的结果。许多时候，实际上是大多数时候，私利理论（正如我对斯密学派所作的解释）会获胜。考虑到行为者的社会特征，在一些不容忽视或许并非偶然的情形中，私利假想会失败——至少对私利没有高深莫测的解释。

我预测这一结果的理由是，经济学家不仅在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领域之内，而且在对婚姻、赡养、犯罪、宗教乃至

其他社会行为的观察中，都可以发现这是俯拾皆是的结果。我们相信人是追求效用极大化的动物——同鸽子和老鼠没有多大差别——至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对人们乞灵于其他行为目标的生活片断加以剖析时能得到什么新的信息。事实上，我应该指出，我刚才提出的测试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大多数伦理价值观并没有与个人的效用极大化行为相冲突。

在我的最后一讲中，我还将探索这一充满危险的思想观点。

注　释

① 那些比较熟悉欧几里得的平行四边形的人必须知道，欧文设想了由500到2000人的社区组成的一个乌托邦，社区建立在"由大广场或平行四边形形式构成的"村落里，具有平衡的农业和制造业经济，"其中保持着充分完全的平等"；参见"Constitution, Law and Regulations of a Community",in A New View of Society, 1st American ed. (New York: Bliss and White, 1825), pp.162-163。

②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5), I, p.207.

③ 同上书，第2卷，第956—957页。

④ 同上书，第2卷，第944—945页。第5卷第11章充分提供了有关论点。

⑤ J. E. Cairnes, "Political Economy and Laissez-Faire", in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1873):"经济科学与我们现存的工业制度之间的联系没有超过机械科学与现存的铁路制度之间的联系"(第257页)。W.S.Jevons,The State in Relation to Labour(London: Macmillan,1882);H.Sidgwick,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3d ed.(London: Macmillan, 1901), bk. III, ch. II; A. Marchall,"Social Possibilities of Economic Chivalry", in Menorials of Alfred Marchall, ed. A.C.Pigou(London: Macmillan, 1925); J.N. Keynes,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4th ed. (London:

Macmillan, 1930), ch. II.

⑥ 在穆勒的观点中，强制的自由是使自由放任假设合理的主要价值；《原理》第5卷第11章是《论自由》的一个前言。

⑦ (New York: Macmillan Co., 1899), pp.4-5.

⑧ Essay in Social Jus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5), p.201.

⑨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2d ed. (London: Macmillan, 1924), p.754.

⑩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重印于 The Ethics of Competie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⑪ "……社会秩序大致形成而且满足了其成员的要求，自然的结果(是)应该用伦理而不应用它所产生的要求来评判社会……"(同上书，第51页)。

⑫ 因而，"在现实生活条件下，以'自由放任'政策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不可能证明出辩护性经济学的人所周知的伦理结论是正确的"(同上书，第49页)。

⑬ "个人或物质生产力的所有权建立在世袭权、运气和努力这种复杂的混合体基础上，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也许就是这样排列的"。(同上书，第56页)"运气的作用如此大……以致能力和努力(在事业中)也许毫无作用。而且运气的作用会累积起来，如同通常的赌博一样"(同上书，第64页)。

⑭ Mathematical Psychics, p.12.

⑮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920), bk. V, ch. XIII.

⑯ 同上书，第467页注解。

⑰ "Outline of a Decision Procedure for Ethic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0 (1951): pp.177-197.

⑱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⑲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London: Macmillan 1920), p.7.

⑳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538-539.

㉑ 最近经济学家把注意力移向资源保护和形形色色的污染，这也代表了经济学家对公众议论这些事的反应，而不表明这是专业经济研究的结果。

㉒ Nassau W. Senior, Journals, Conversations and Essays Relating to Ireland (London: Longmans Green, 1868), II, p.271.

㉓ Ronald H. Coase, "Adam Smith's View of M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 (1976); pp.529-546.

3

竞争伦理学：不友善的批评*

自《国富论》诞生之后的一个世纪里，经济发展步伐以前所未有的持续的和全面的规模加速推进。技术、经济、生活乃至西方世界的政治经历了影响深远而持久的变化。生活水准持续高涨，人们的寿命得以延长，教育普及到整个社会。

可以想象，伴随着这一惊人的经济发展而来的激烈变革会引起一些集团的强烈反对和苛刻批评。大不列颠文化界中的高贵人士很快就变得对罗曼谛克的过去怀恋不已。桂冠诗人罗伯特·索锡分别用玫瑰色和黑色的双焦镜头去观察过去的村野制度和工厂制度：

---

* 原载于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vol.2(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我们保持片刻的沉默，俯视着下面形形色色的住宅。在这里，以及在毗邻的米尔贝克村里，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和农业所产生的影响，并对它们作一番比较。陈旧的农舍，诗人和画家见了都会欣喜万分。它全然是由天然的石头筑成，而没有半点灰浆，也没有白石灰水的痕迹，低垂的屋顶上覆盖着石板瓦，它与周围的景致浑然一色，协调无比，即使由某种土生土长的安菲昂音乐的魔力来建造，也无法使它变得更加美丽动人；岁月流逝，日晒雨淋，给它留下了斑驳杂色；遍地绿苔，短草丛生，以及石缝中千姿百态的植物，这些又使它显得愈发和谐。随处可见的烟囱，有圆的有方的，虽不如小角塔那样过分修饰，但却装点了葡萄牙农宅的顶端；窗下修剪整齐的方形篱笆，门旁葳蕤繁密的蔷薇，地上几片零落的花瓣，以及门前昂首挺立的向日葵，使整个空间充盈着一种快乐的气氛；附近的花园、蜂箱以及夹杂着黄水仙和雪花莲的果园，标示着这里的主人悠闲自得，讲究精致与舒适，享受着自然、纯真和健康的快感。而工人们新的村舍则是……以简单划一的格局建造的……毫无装饰、排成一行。

我说，与工业有关的任何东西怎么会表现出如此丑陋不堪的特征？从最大的财神之塔到"饲养"奴隶的最破的陋棚，所有这些建筑都千篇一律。岁月不能令它们变得老成；自然既不能装缀也无法掩饰它们，它们总是给人以触目惊心的感觉！①

在这一情绪高涨的大合唱的无数声音中，我只注意两个人的声音。

把政治经济学称作沉闷的科学的托马斯·卡莱尔，以他惯有的热情写道：

然而，我敢相信，自开天辟地以来芸芸众生含辛茹苦、

> 辛勤劳动的日子现在很快就要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它并不意味着死亡，甚至也不是指因饥饿而死，它让人变得可怜而不幸；许多人已经死了；所有的人都会死去——我们大家的最后归宿都在一驾痛苦的战车上。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要悲惨地活着；痛苦地工作但却一无所得；心神憔悴，筋疲力尽，而且孑然一身，举目无亲，被束缚于所谓自由放任的冰冷世界里；这是一种慢性死亡，囚禁在一种无声的、死一般的、无穷无尽的非正义之中，就像囚禁在法拉利斯式的可恶的铁牛肚子里！对于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人来说，这些是并且继续是永远无法忍受的。难道我们还要对法国革命、宪章运动、三日起义感到惊奇吗？如果我们还要考虑一下这些时代的话，它们才是真正空前绝后的。②

最后，约翰·拉斯金对广大维多利亚时代的听众不断重复工业主义的罪恶。他试图把他的全部思想归纳到下列宣言中："政府和合作是生活准则的全部内容；无政府状态和竞争则是死亡的准则。"③接着便是更加明确的表达："根据需求法则生活是鱼类的特权，正如老鼠和野狼那样；但是，人类的特性是依据正义法则来生活。"④

要把当代对竞争性社会制度的批评统统浏览一遍，确实会使人筋疲力尽。它存在于戏剧、小说、教堂、学术界、低文化水平的企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费边主义者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唱反调的人之中。人们记得熊彼特曾经说过，关于1924年日本发生的地震有一点很清楚：它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人们突然之间明白了，假如没有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这个社会中的食物就将枯竭，同时愤怒也将不复存在。

现在我一点也不打算介绍一下这种相反的观点，也不打

算对此进行驳斥。人们早已写出许多精彩的回答：我前面所述索锡的那段话引起麦考利完全的蔑视——这简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 索锡先生告诉我们，他发现了一种可以比较工业和农业的影响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什么呢？站在一座山岗上，俯瞰着农舍和工厂，然后看看其中何者更美一些。索锡先生想没想过，在拥有方篱笆、花园、蜂箱以及果园的、庞大或装饰过的农舍里居住着的，或者曾经居住过的英国农民的生活实质吗？如果没有想过的话，他进行比较的参照系又是什么呢？我们鄙视那些冒牌的哲学家，他们想通过贬低文学和美术来为科学事业尽力。但是，假如有任何东西可以为他们思想的狭隘进行开脱的话，那末，这就是像这本书之类的书了。⑤

事实上麦考利相信索锡只具备"我们认为任何人都不曾如此明显具备的两项本领——盲从和无端的仇恨"。⑥

自由放任主义后来的和一般不太重要的辩护者证实了，这类批评开始落入俗套：对所攻击的制度进行辱骂；在辱骂中甚至对某些优点也加以谴责；夸大实际的缺点；当他们批评这些缺点时，唯独对其他经济制度存在的困难却视而不见。当然，这些特征并非是批评私人企业的人所独有，很可能是任何现存制度中批评者的内在特征。

我用这些早期批评的片断作为开头，只是为了说明领导公众舆论的重要人物很久以来就反对竞争性的经济制度。人们自然地被诱惑来赞扬他们以及他们的无数现代门徒，私人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下降，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大大扩展。我呼吁你们要抵御这种诱惑。在观察一下所谓随大流者之后，我将回顾那些领导潮流者并力求解释他们的态度，对他们的重要性提出疑问。如果我的解释是正确的话，这将

对私人企业的未来引申出一些有趣的问题。

1. 态度改变了吗：下层阶级

历史是由也是为知识阶级所写的。把 18 世纪贵族的思想和行为与约有 10 万人的收入和教育水准处于或接近社会底层的下层阶级相比，我们对前者知道得更多些。没有人能够从文字记载中推断出这些下层阶级对经济哲学的态度，而高贵的贵族们的言语却被收进英国议会议事录和几大卷出版的通信集之中而载入史册。因而我们无法根据直接的记录来判断这些下层阶级对自由放任主义持何种态度。

然而，有一种假设对我来说似乎是有道理的，同时我希望你们也认为它是站得住脚的：下层阶级——在近几百年中极大地提高了其财富和正规教育的水平——已经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强烈地吸引。一个极富说服力的证据是，现代史上重大的自发性移民：大批的欧洲人来到美国，直到在两端都设置了障碍；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努力涌入香港、上海和其他开放的亚洲经济社会；成千上万墨西哥人现在也公然抗拒美国的把他们约束在家园中的法律；这些并不仅仅是穷困社会向富裕社会的移民，尽管也包含了这种意义，但主要是一国人口中下层阶级的移民。开放的、分散化的经济对于下层阶级来说仍然是机遇之乡。

下层阶级在竞争性制度中的立足点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竞争性生产制度对不同身份的人将明显地一视同仁。一

个雇主会发现两个收入为每小时 3 元的非熟练工人完全可以替代一名每小时收入 8 元的半熟练工人。一个商人会发现向穷人出售 10 件 1 元钱的东西比向富人出售 1 件 7 元钱的东西更有利可图。与其说这个商人对顾客的肤色感兴趣，不如说他对他所得货币的颜色更感兴趣。

假如在有机会的条件下，现代社会(以及许多其他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都确实渴望移居到竞争性经济社会中去，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还支持许多民主社会——在这些社会中他们构成了全体选民的一个重要部分——的政府广泛扩大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呢？

现在我将假定，后面再举例论证，下层阶级并不因为受到怀有不同目标的知识分子的愚弄或支配而支持政府的管制政策和社会主义。相反，这些阶级一般倾向于为自身利益而进行投票。一旦非熟练工人进入开放社会，他们就将反对进一步的自由移民。收入最低的工人明白最低工资法对他们的不利影响，他们的代言人将投票反对这类法案。⑦ 对下层阶级政治行为的这种合理解释可以作多次检验：诸如，他们是支持政府将巨额支出用于高等教育呢，还是支持政府将巨额支出用于污染控制项目？

我相信，我所提倡的研究将证明，下层阶级向来是相当有选择地赞同对竞争性经济的运转进行人为地干预，有时甚至很斤斤计较，只因为并没有太多的管制政策对他们有利。这些阶级将寻求和接受政治制度所能提供的所有转移性支付，但是他们从降低社会收入的管制政策中得不到什么好处。

然而，这些下层阶级没有支配我们的政治制度。从长期来看，他们在市场上比在投票箱前具有更多的表决权，尽管

从表面上看情况正好相反。他们居住分散，年龄和社会背景差异很大，并且也没有因经济和社会渊源及利益而成功地结成必要的或有用的政治联盟。他们只是新闻或电讯的接受者，而不直接控制信息的传播。这些特征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某种阴谋的牺牲品，也不意味着他们对政治事务毫无影响，这些特征仅仅表明即使在大不列颠或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中，市场比文献资料或社会政治更能够准确迅速地反映出他们的偏好。

我认为，具有一定教育水平和社会特征的选民在政治上的这一标志是下层阶级之所以未能在现代政府的管理政策中发挥较大作用的两个原因之一。第二个、也是更根本的原因是，下层阶级并不占人口的大多数：竞争性经济制度的高效率消除了穷困和低教育水准的阶层；这一经济社会的生产率将移民的或贫穷农民家庭的孩子变为中产阶级。美国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裁缝的儿孙辈。

当私人企业将下层阶级中的许多支持者提升到中产阶级之后，他们就会更加关心国家的政策行为是否合适。对进入技术性职业进行限制将是中产阶级中的各种集团，利用政治力量获得好处的大量例子中的重要一例。如果格劳乔·马克斯不参加会接受像他这一类人的乡村俱乐部的话，私人企业就可能使谬论变成真理，并且开除那些有本事参加竞赛的人。

2．态度改变了吗：知识分子

几千年来知识分子都轻视商业活动，因此，他们对于竞

争性经济也采取轻视的态度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当今大多数以笔墨为生而不是以商品加工为生的人都把自身的存在归功于现代经济制度中的生产。按历史标准，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经济社会才能够向人民提供12年至18年的学校教育，并且为一个庞大的教师阶层提供就业机会。只有这样一个富裕社会才可能拥有发达的通讯事业和普及的社会服务——知识阶层的另外一些大的就业领域。所以，至少在表面上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坚持传统的阶级立场敌视工商企业——蔑视它们的动机，指责它们的成就，至少是支持扩大政府控制，而且往往支持直接的社会主义化。

许多人会给予的一个答案是，经济关系中的竞争性、利润挂帅、那些不适应市场需要的文化活动所面临的困难，正是知识分子反对工商业的根源所在；实利主义是知识阶层所怀有的伦理价值观的敌人。

第二种近乎相反的解释是，这些上层阶级发现他们主要的庇护人是政府，而他们主要的职业在于政府的活动之中。纵使政府相对于私人经济活动的成长取决于私人经济的生产效率，然而，知识分子的私利却在于公共经济的扩张之中。

我认为在短期内这是事实，这个短期至少有一两代人的时间。现代国家中政府大量的管理活动是直接的，其影响是针对私人部门的，这些活动是对知识阶层的需求保持旺盛的重要原因。例如，倘若美国高等教育部门属私人性质，学费等都由学生直接支付，而不是主要由政府补贴来支付，那末，教育部门就将大大萎缩，这并不是由于效率的提高——尽管效率肯定会提高，而是因为这样一来，对许多大龄学生来说，入校求学在时间上就不再是一项合理的投资了。对学生个人来

说，国家大大降低了高等教育的相对成本，然而对社会来说，相对成本则增加了。同样，政府这部巨大的机器为大约 50 万人创造了公职，而更多的人从事于遵循政府政策或者违背政府政策的职业。

简言之，在政府的经济作用扩大时，知识分子是受益者。由此看来，他们对政府职能的支持可以获得最高的报酬，正如我国的其他自然资源那样。知识分子难道不总是对他们的庇护人恭恭敬敬吗？

我既不想提出似是而非的观点，也没有寻求公正的结论，因此我要像亚当·斯密那样强调，我并不打算讽喻知识分子的缺陷，我天然地把知识分子视作思想的高峰。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指手划脚之后并不改变立场，他们努力发展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没有需求的思想就如同没有需求的其他产品一样难以为人们所接受。要是在座的哪一位想成为亨利·乔治经典著作中单一税制的信徒，我建议他或她先去找一个富有而又放纵的配偶。

3. 思想意识和知识分子

支持和反对私人企业的私利理论会冲击到许多人，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所指的理论非常通俗而不高深(尽管这些缺点得到承认)。许多也许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声称，知识分子对私人企业的反对是基于与私利无关的伦理和文化价值观，而且，知识分子的反对在形成整个社会的批评态度中发挥了重要的

领导作用。

有一位永远使人感兴趣的学者，他一再强调知识分子对社会趋势所产生的有力影响，他就是约瑟夫 熊彼特。熊彼特在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崩溃所进行完整的论述中，包含了一种捉摸不透的形而上学观念：他认为，对社会制度的合理性的需要以及对领导阶级的神化作用的需要，与资本主义者头脑中的理性计算不相吻合。知识分子在批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他们固有的作用：

> 一方面，公开讨论的自由，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吹毛求疵的自由，在长期内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集团又不得不吹毛求疵，因为它依靠批判为生，它的整个地位有赖于蜇人的批判。而对人物和时事的评论在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局势之下，必然会在对阶级和制度的批判中流露出来。⑧

这样，知识分子被看作特别能够使工人运动走向激进。

知识分子应该相信，知识分子在决定历史进程时是重要的这句话不难理解。但是，对于知识分子中的经济学家说来，理解这一观点并不容易，因为它把整个劳动阶级置于一边，并且认为他们具有特殊的动机。根据传统经济学的职业选择理论，知识分子自己选择各种职业和艺术、伦理、文化、政治诸种工作岗位，其数量能够使他们的收入最大化，这里的收入包括诸如声誉、明显的影响力等社会地位。按照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一个加尔布雷思是尽了最大能量为罗纳德·里根工作，一个弗里德曼是尽了最大能量为卡特或肯尼迪工作，而我也是尽了最大能量来告诉你们知识分子是极其重要的。⑨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在指出知识分子阶级下降的市场前景

是他们对市场进行批评的一个基础时，也部分地接受了这一立场。⑩

请不要将我对职业性说教重要性的低估等同于对科学事业的低估。经济现象中的一般关系一经发现并得到证实，就变成每个人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新建立的科学关系改变了人们的话题，并且为所有了解情况的集团所完全接受，而不管它们持有何种政策立场。一个人不管是喜欢价格制度，还是不喜欢价格制度进而喜欢对某种商品实行非价格的限额形式，他都必须接受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并且考虑到它的作用。甚至在公共政策领域，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就是作出最重要的科学贡献的经济学家。

自身利益理论不仅适合于知识分子，而且适合于整个社会。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来理性地支持与长期利益相吻合的立场。这些利益往往是微妙的、遥远的，而提高这些利益的政策往往是复杂的、甚至是尝试性的。比如，对于最近在能源产业实行的种种管制措施，应该作出比现在更深入、更全面的分析，从而辨清和测算出这些政策的代价和效益。但是，至少在原则上，以及从日益增长的实际经验来看，我们可以判断出公共政策的影响，并进而判断出它们有利于哪些人。

考虑到思想意识的作用，情况又另当别论，假如思想意识这个含糊不清的字眼是用来表示不导向一种扩展的、长期的自身利益观点的信念的话。假定存在一种反对市场的思想意识，并且假设这种思想意识与自身利益无关。那么，它的渊源是什么，它的内容又是什么呢？难道我们没有面临一种内在的任意的抉择吗，如果我们遵循这样一条路线的话：反

对市场的价值于是成为出于人与人之间团结目的而不是出于亲密交易目的的某种人道主义本能，或者是对一个世界的简单性和稳定性的探索，在这个世界中，竞争性技术是魔术师的工具，或者是一种人为低效的平均主义的希望，或者是其他什么。沿此方向的抉择其数量和任意性肯定就像选择伦理体系一样，确实，这就是它们的内容所在。也许没有一个人，肯定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具备贬低这种非效用最大化的体系的权利，但是，即使是经济学家也有资格对任何这类实际上在很大程度被人接受的思想意识的逻辑和内容表示怀疑。

到头来，在对公共政策的渊源进行数量研究时，思想意识开始变成转瞬即逝的现象。于是，如果有人想知道为什么某些州倾向于所得税而有的州倾向于销售税，衡量一个州的价值观念(抑或是知识分子的混乱？)的最常用的指标就是看这个州在 1972 年对麦戈文投票的百分比！在这方面，思想意识只是一堆人们不想理睬的模糊概念。

对思想意识作为非效用最大化目标的作用进行检验的最简便的方式是，弄清支持这类思想意识的人在支持过程中是否付出代价。假如平均说来和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发现(比如)“小的是美好的”的支持者与那些具有同等能力但致力于把全国制造者协会推向新的水平的人相比，收入要少的话，那么，我将接受这一证据。但是，先让我们看一看。

4. 道德的演算

我是沿着迂回的路线到达这一天然甚至无可抵挡地源自于经济理论的命题的。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政府的或私人的办公室里，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科学活动中，简言之，无论在哪里，永远是效用最大化者。他会经常地犯错误：也许是效用的计算过于困难，但更经常地是他的信息不全。他学会纠正这些错误，尽管某些时候代价昂贵。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伦理学，是指一套关于与他人进行交易的规则，总的来说，这些规则禁止那些缺乏远见的谋取私利的行为或者那些损人又不太利己的行为。普遍遵守这些规则不仅给交易者带来长期性利益，而且还产生一些外在的好处（“外部效果”），社会对伦理规则的认可是强化这些规则以实现普遍利益的一种温和的形式。⑪当然，也有人因违反规则而获得好处。更确切地说，每个人都会偶尔违犯某项规则，而少数人则经常违反一些重要的规则。

在对伦理准则的阐述加以扩展和深化时，有两项困难需要说明。首先，是持续地倾向于用一种重复假设的方式来为个人效用下定义。这一困难是严峻的，因为人们对效用函数的解释不尽一致——在第二讲末尾我提出了我的解释，一个人的效用取决于本人、家庭以及周围少数人的福利状况。然而，人们可以夸大在运用效用理论时的困难。一个理性的人从经历中学到知识，因而这与预计我们会有规则地出现偏向

性错误的效用最大化假设发生矛盾：可见人们不能偷偷摸摸地引入关于错误的理论。发展一个内容丰富的效用最大化理论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

效用最大化假设的第二项困难是效用难以测算，这主要还不在于效用本义的含糊不清，主要是因为没有一种与假设相一致，既可用于测算又能为公众所接受的伦理观念。正由于不存在这样一套定义明确的观念，于是各种各样特定的伦理价值观念应运而生，当然，没有一种像样的理论能够应付这种具有随意性的测算。

具体地说，人们从个人效用最大化行为理论中至多只能解释一个个人行为的伦理体系。社会借助于政治制裁迫使其成员遵循的政治价值观，包括了一些流行的当代政策，诸如收入再分配，在一定的行为领域禁止种族、性别和年龄的歧视(但是在另一些领域不加禁止，如婚姻中)。它需要有一种政治理论而不是个人主义的伦理观念来解释政策和目标，对于很少一部分人来说值得称道的是，接受这些政策和目标，就可以免去牢狱之苦。

在这些缺陷之下，我认为，弄清一套古往今来为人们广泛接受的个人行为的伦理戒律，并且对它们与侧重于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的一致性进行检验，正是一个可行的甚至是传统的科学问题。我在前面简要地提到过，实际上罗尔斯就曾提出过一种形成归纳性伦理体系的方法，这种方法恰恰是那种表明伦理体系建立于效用最大化行为之上的程序。我相信检验会产生这一结果。许多不同的人会对此提出异议，不过那愈发表明需要进行检验。

5. 结　论

我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即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灵通的人类社会，人们明智地开展活动以寻求他们自身的利益。在这个社会中，领导人只发挥有限的作用，其作用主要也是媒介性的，而不是作为他们所领导的那些阶级的导师或向导。

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可以发现的，其发展的进程也是可以预测的。一种综合的人类行为理论应该能解释在其宽广的领域内的一切持续的和普遍的现象，确切地说，这正是这种理论的最大优点，同时又是最大的弱点。

如果这种假设被证明对于政治和社会事务就如同对于经济事务一样，具有丰富的应变力和先见之明，那么，我们可以期待着我们对未来经济和政治制度这一类严肃问题的理解会有长足的进步。即使它达不到这一辉煌境界，我也完全相信，它将成为引导下一代人从事许多社会科学研究的强有力的主旋律。它将告诉我们，我的朋友——竞争性经济的未来前景，我会从中学到许多东西。

注　释

① Sir Thomas More; Or Colloquies on 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Society (London: John Murray, 1829), I, pp.173-174.

② Past and Present (Chicago: Henneberry, n.d.), p.296.

③ The Complete Works of John Ruskin (New York: Thomas

Crowell, n.d.).

④ The Communism of John Ruskin (New York: Humboldt: 1891), edited by W.P.B. Bliss, p.52n.

⑤ "Southey's Colloquies on Society", in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Critical, Histor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 (New York: Mason, Baker & Pratt, 1873), II, 148-149.

⑥ 同上书，第 132 页。

⑦ J.B.Kau and P.H.Rubin, "Voting on Minimum Wages: A Time-Series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1978): pp.337-342.

⑧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3d ed.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50), p.151.

⑨ 请回顾一下上一节的结论，分配制度的运转，通常不是依据那些选择有销路的思想的个人，而是依据找到市场的那部分思想。

⑩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pp.152-153.

⑪ 一个人表示的这种社会认可本身被另一个人的认可所强化，因而，形成一个不成文的法律体系。显然，这一论证的方式把我们带到(正像迈克尔·麦克弗森曾经指出的)政治(即不是纯粹个人主义的)理论中去。

4

经济学家和垄断问题*

长期以来，学习美国反垄断政策史的学生都对美国经济学家对谢尔曼法案的态度冷淡感到有点困惑不解。19世纪时竞争所产生的仁慈结果不是还受到万众的赞扬吗？对于国会通过立法将教科书中的假设变成通用的惯例，教书匠们难道不该加以歌颂吗？即使没有太多的先见之明的人也能看到谢尔曼法案也许比以往任何其他法案都更能充实经济学家们的钱袋，难道经济学家看不到这一点

* 这篇论文是1981年12月28日在华盛顿特区美国经济学会的伊利讲座上的演讲，发表在1982年5月号的《美国经济评论》上。

如果对美国垄断者协会演讲的话，我会选择的一个差不多的题目是"垄断和经济学家的问题"。我要感谢阿伦·迪雷克特和斯蒂芬·施蒂格勒所惠予的评论以及威廉·巴克斯特、布鲁斯·斯纳普和约翰·彼得曼为文中表格所提供的数据。

吗？

当然，对此已经有了一部分解释。经济学家热情的减退有时主要是因为不相信谢尔曼法案的效力而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法案本身。他们宁可选择管制之路——虽然这种偏好未必能恢复那些作为预言家的经济学家们的声誉。甚至可以说，在那个时候美国并没有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像欧文·费雪这样无可否认的大家也与一般人持相同的观点。

在这里，我打算考察一下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中涉及到的垄断问题的态度。不过，我的题目大大超出谢尔曼法案以及它所涉及的范围：我将浏览一下近200年来主要在英格兰和美国的有关垄断政策方面的经济学著作。之后，我将考察经济理论与反垄断政策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1. 从斯密到谢尔曼

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并且为英国经济学界切实遵守了近一个世纪。第一个传统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1850年狄奥尼修斯·拉德纳在研究铁路运费时第一次对这一传统提出挑战。① 斯密是何等的幸运：甚至由对一门学科的忽视也创造了一个传统！但是，正是在这一领域，我们中许多人是可以与他相匹敌的，有的甚至超过了他。

第二个传统是，将他那个时代严重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

家赋予的专营特权。斯密曾经举过两个主要的实例是同业组合和大型合股贸易公司。② 他不能不注意到还存在着许多别的例子——比如高地村庄，它在一个行业中只支持一家或两家企业，然而从理论上说，它们是无关宏旨的：这就好比经济的蚊子在经济的躯体上吸吮几滴鲜血。③

他的第三个传统观点是，对垄断以及少数竞争者之间的勾结无需采取什么行动。"想通过能实施的或不违反自由和正义的法律"来实际上阻止阴谋集会，那是办不到的。④ 当然，假如商人们见利而不逐，那么，他们那种斯密使之出名的集会也不会产生什么"娱乐"。

我将简要地谈谈这些传统的继承者。我只提一下李嘉图的一个说法，只有当生产成本不影响生产水平时，李嘉图才把价格称作垄断价格⑤——低地国家垄断理论的一项充分的证明。当然，他会要求我记录下汉萨德对他所作的评论："李嘉图先生……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投票支持过垄断行为。"⑥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识到垄断对竞争程度的有害影响："在竞争者屈指可数的地方，他们最终总是达成协议而不是进行竞争。"⑦ 因而，在诸如供水等行业，尽管国家必须控制"入场券"以防止浪费，但是国家早晚也会管理或者经营这些企业。与习惯相一致，穆勒也看不出国家除了不去创造垄断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去支持竞争。

我们可以用一个早期的反垄断政策来检验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立场。早期的许多法律已经编纂进1799年和1800年的联合法内，这些法律禁止雇主或雇员合谋影响工资谈判。那些法律条文没有引起任何经济学家（当时确实人数极少）的注意，但是，1824年在弗朗西斯·普莱斯的操纵下废除这些法

律时，确实引起了很有限的注意。⑧ 麦克库洛克措辞强硬地支持废除这些法律，坦率地表达了经济学家们对一项积极的反垄断计划的想法。⑨ 这位信息灵通的作家（“我们永远不应该向我们的读者泄露我们所掌握的一点点信息”）在讨论过程中表现出惊人的洞察力和不可思议的矛盾，他认为：

> 经济学界初来乍到的新手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嘲笑对饥荒甚至对市场供应不足的担忧，也不会担心粮食交易商集团或面包商集团会提高粮食或面包的价格：因为我们百分之一百地确信这种集团通常不会形成；即使有这种集团，那么，只要市场价格稍稍高出自然价格一点点，大批集团成员就会为逐利而退出集团，并把它们的存货抛向市场。⑩

接着，串通的脆弱性成为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的信条。

《简明百科词典》(1839年)中关于垄断问题的精彩论文，对那些经济学家乃至社会的观点作了很好的表述。我摘录其中两段。

> 在英国法律中似乎从不使用垄断这个词语，除非在皇家仅向某个或更多的人授权经营或销售一定的商品或货物之时。
>
> 如果若干个人打算联合起来生产某种具体的物品或商品，并且如果他们成功地在许多地方独家销售这种物品，那么，用流行的话来说，这些人是一个垄断集团。不过，这些人在法律上并不比其他人处于优势，很显然，他们只有比其他人生产出更便宜更优质的商品才能销售得更多。

根据这一观点，自由放任主义完成了反垄断政策的目标。

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人们开始重视垄断和寡头垄断的理论。古诺和迪普特的非凡思想开始进入英国经济学，具体地说被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和马歇尔所应用。⑪ 撇开会相互

影响的寡头垄断问题，垄断和价格歧视理论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于是，斯密的第一个传统到此结束了。

第二个传统——所有严重的垄断行为均由国家产生——自19世纪随着铁路及其他大规模公用事业的发展（正如穆勒所说的习惯）也开始消蚀。如今，已经存在一个垄断阶层，它们或许而且通常从国家那里获得权力（国家对产业的支配权）以及更多的可交换资产，但是它们的存在主要依赖于重要的规模经济。于是，人们开始普遍建议公布帐户，尔后又要求实行管制或使所有权公有化。到1890年，只有英国和美国才是世界上唯一实行私有铁路的重要国家。在此之前，英国或美国的经济学并不注意制造业或商业部门的垄断问题。这样，斯密的第二个传统分解为国家创造的垄断和规模经济创造的垄断，后者构成了这一时期中的公用事业部门。于是，斯密的第三个传统，即国家只应该抑制创造垄断，被修正成国家也有责任控制甚至经营铁路以及类似的公用事业。细心学习经济学史的学生会费劲寻找在1890年7月2日这一异常寒冷的日子里曾经建议采取积极阻止经济中的串通或垄断化的政策的经济学家。这一天哈里森总统签署了谢尔曼法案。

2. 自谢尔曼法案以来

研究美国反垄断政策的历史学家强调指出，经济学家们对谢尔曼法案的态度不甚热情，而且常常表现出直截了当的敌意。⑫ 杰里迈亚·W·詹克斯是一部标准著作《垄断问题》

的作者，他在该法案通过10年之后发表了评论：

> 27 个州和领地通过了旨在摧毁现存的这类工业联合体并防止其再生的法律。15 个州在法律中含有类似条款……除了我们国家的这一法案之外，我们还有联邦反垄断法……。研究一下这些法律的条文，以及我们的法院根据这些法律最后所作出的判决，就可以发现它们对经济发展趋势几乎不起什么作用。⑬

在英国，在美国，那一时期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或许都抱有这种怀疑。最早跟马歇尔学习市场组织的学生D·H·麦格雷戈认为，主要的经济学家都确信大规模企业的发展代表着一种强有力的历史性力量：

> 如果是这样的话，国家颁布反联合体的法案，诸如人所周知的 1890 年谢尔曼法案，就是使自己处于一种完全站不住脚的境地……如果存在经济趋势的话，国家就无法阻挡它，至多只能干扰它；经济学家们确信美国法律阻挡这种发展趋势的惨败有可能反证出联合体是合理的，尽管这些法律现在已经汗牛充栋。不仅如此，而且如果说专家还存在更大的歧见的话，那么，这既不在于国家过早判断问题的职责，也不在于国家要建立标准的正统经济学，而在于工业发展的进程使法律条文显得荒谬可笑。面对法律，垄断组织仍如雨后春笋，而总统竞选的结束往往也意味着反垄断建议的寿终正寝，这种局面是令人难以忍受的。⑭

有两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有限的反托拉斯政策多少还比较同情。J·B·克拉克认为大企业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这些大企业不能使用掠夺性政策诸如地方性大杀价，那么通过保持潜在的“进入”压力就可以消除垄断权。⑮马歇尔指出，联邦贸易委员会主要是作为一项政策的研究手段，能够搜集

实情并付之于“长期连续的、系统的和科学的研究”，并且能够区分出经济惯例对社会的有利和不利的影响。⑯我并不想嘲笑这种看法，确实，该委员会在成立之初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假如马歇尔或者和他同时代的若干不太重要的人能够解释他们所谓真正的管理手段(名声)的性质和运行方式的话，那也是很有用的。名声(毕竟，类似于合法勒索的政策)是如何以及在哪里控制不利的行为的，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说清楚过。⑰

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与其说反垄断政策变成经济学家的普遍信念，还不如说人们越来越能够忍受这一政策。直至1932年，亚瑟·R·伯恩斯还把反托拉斯法称之为“一项重大的失误”⑱，但是这项政策的同情者站了出来。亨利·西蒙斯在他著名的《自由放任的建设性规划》⑲一书中指出：

> 必须彻底粉碎我们的巨型公司，并且持续地对那些采用各种手段垄断价格或限制产量的生产者进行起诉。必须明确地无条件地抛弃所谓“理性准则”……简言之，限制贸易应该被看作是重大的犯罪……

无疑，在我的印象中这一呼声的影响特别大，我在芝加哥教室中听到时总觉得它是如此的清晰和勇敢。

不管怎样，我认为对经济学家的态度调查表明，到了本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反垄断政策。加尔布雷思教授只反对流行的观点，他津津乐道于贬低我们反垄断政策的效果，并且否认这一政策能与其他政策相配套，这多少反映了专家观点的现状。

这样大略浏览一下经济学家对反垄断政策态度的演变，又引出了许多问题，我将只简要地讨论其中三个问题：

1．经济学家的态度为什么会转变？
2．经济学对反垄断政策有什么影响？
3．反垄断政策对经济学有什么影响？

3．观点改变的原因

经济学家们早期对反垄断政策的冷淡和反对是由于他们一贯推崇市场和产业的竞争性制度，这种态度常令后人感到惊奇。自由贸易本身就是一种国际性的反垄断规划：我国的市场应该向其他国家的生产者开放。在谢尔曼法案生效前的100年里，经济学家中有如此之多的人积极支持自由的国际贸易，以致于要像支持国际竞争那样支持国内竞争并不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期望。但是，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应简要地说明一下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

如果我能够说明我们的专家改变了的观点是基于经济学家对政策作用的系统研究，简言之，如果我有充分的证据的话，那就令人满意了。不幸的是，在一个世纪里，对谢尔曼法案和克莱顿法案的作用并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研究。西蒙·惠特尼的两大卷调查报告对反托拉斯法提供了肯定性判断，⑳但是他的调查报告在有关产业和实例的一章做了一个奥林匹克式的漂亮跳跃就直接进入了他的结论。我在1967年曾试图测算反托拉斯法的作用，结论是以排除诸如禁止连锁董事会这样的论调，但也只是成为谢尔曼法案第1节和第2节的不怎么有力的推论。㉛最近詹姆斯·埃勒特就反垄断政策对被

告公司的股票价格的影响作了全面的分析，他发现这种影响是很有限的，除非接着提出3倍的损害费诉讼。[22]

实际上，早先对该法律作用的怀疑直到最近还得到一些人的认同。那时怀疑论者普遍期待着美国烟草公司尤其是美孚石油公司的解散。马尔科姆·伯恩斯证明股票市场很快就不把这些解散所产生的有关未来的影响当一回事了，这多少也证实了最近的这些怀疑。[23]关于这个问题存在无数点滴的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已足以形成一种趋势，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观察。

首先，我打算把观点转变的原因归结为简单的一点，然而我相信这是重要的一点。在通过谢尔曼法案后的头几十年里，经济学家和公众的全部——毫不夸张地说是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垄断权势之下的联合体和明显的合作安排（现在称之为卡特尔）。所有人都知道谢尔曼法案的第一节是针对勾结的，比如阿迪斯通管道案及时受到监视，但是，非正式的勾结似乎在法律目标之外。J·B·克拉克明确指出：

> 只要纯粹控制价格的集中基金或契约是可靠的，它们就不会像以后的[企业]联合的形式那样变得具有威胁性；它们至少减少了会导致更多罪恶的争斗。这样，它们就对普遍的繁荣作出了贡献，较低的价格使公众得以安顺，当然人们在支付时不会毫无怨言。正是出现了更稳固，更完善的联合体才使得全面垄断的阴影日益加重。[24]

谢尔曼法主要是反托拉斯的法律，克莱顿法除了禁止连锁董事会之外，甚至对阴谋集团也并不关心。

强化法律的重点逐渐转向限制贸易的阴谋集团。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揭露阴谋以试图避免或解散垄断集团的案例。这

一重点的转移对专家们的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

勾结性的案例至少并没有以任何容易或明确的方式提出规模经济的问题。在勾结性案件中，对解散大公司可能导致低效率的所有担心，都被搁置一边。反垄断政策的支持者像通常一样无需承担所谓造成经济低效率或阻挡历史潮流的责任。随着垄断的实际定义的主要内容发生变化，人们也变得比较容易反对垄断了。

在盎格鲁—撒克逊的文献中，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倾向于卡特尔组织的传统；确实，卡特尔和同业公会通常是一种行业或做法的贬义词。标准的理论认为与真正的垄断相比，卡特尔造成了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和较少的技术进步。卡特尔属于无法抗辩的组织之列，如果把卡特尔化看作是行业乱伦也许更能恰如其份地表达美国经济学家的态度。

除了我刚才解释的政策重心转向对付勾结之外，专家们日益喜欢反托拉斯政策可能还有第二个原因，对此我将进行比较简单的考察。替代市场的控制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公共管制和所有权公有化。随着经济活动日益从政治控制中摆脱出来，经济学家也日益希望靠市场来解决问题，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国家复兴法案、收入政策以及全面的价格管制的名声——不说邮局——并非最佳。对运输和农业的行业管制的名声也并不更好。然而，我不打算强调对政治控制的缺陷的任何批评，因为我也可以找出一些市场的缺陷。

最后，我再提出一种解释，这对经济学家来说很容易理解。经过数年的缄默之后，最近我也参与了若干反垄断案例。从这些案例中我了解了三件事：

1．公正并不总是占上风，幸运的是最高法官也并非总

是支配一切，这不完全是新闻，但给我的印象很深。

2．从事反垄断活动的经济学家，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到研究生，其数目庞大，约在数百以上。

3．经济学家从事这一活动的报酬仅相当于联邦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

我仅仅注意到，反托拉斯听证会也许是经济学家几项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比教学科研之所得当然低得多，但是也许相当于写作、开讲座和拍摄电视节目之所得，或者相当于进行宏观经济预测的所得。

不知以上关于经济学家日益倾向于反垄断政策的解释是否能令你们满意，反正我是不太满意的。

4．经济学家对政策的影响

当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提出一套建议后，不久政府通过了与那些建议相一致的法律，那么人们有可能认为这些建议被采纳了。从J·B·克拉克身上可以观察到这一程序，他的具体主张是反对掠夺成性的竞争和1914年反托拉斯法。

然而，我不太相信所有的经济学家，或者具体地说克拉克教授对反托拉斯法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人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是他们也只是使因果关系变得复杂化。怀疑的真正理由在于，经济学家并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可以向持怀疑态度的立法者提出具有影响力的建议。举两个重要例子。其一，我们只是从道听途说、马路新闻，主要是从爱

管丑闻的新闻记者那里得知，掠夺性竞争极大地阻碍和压抑了托拉斯企业的竞争。比如J·B·克拉克就指出过：

> 一个生产商……有一次被把他逼入绝境的托拉斯经理叫去，遭到粗鲁的责难，并要他"最好退出这一行业"。"难道你没看见"，这个独立的生产商说，"在我的领域里，我可以生产出比你便宜的产品？""你没有看到，"托拉斯经理回答道，"如果我们在你们经营的20个城市里亏损，而在我们经营的200个城市中却赢利，那么我们不还是遥遥领先吗？"㉕

坦率地说，我相信是这位杰出的哥伦比亚教授发明了这一对话，即使他有记录，但对于一位经济学家来说也是缺乏证据的。我注意到，现代学者对掠夺性竞争的使用频率日益怀疑，但这丝毫也解决不了它在经营中的理论问题。㉖

其二，股份掺水和诈取投资者是形成托拉斯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我看来，一些兼并对创办者是极其有利的，但却极少考虑对投资者的影响。假如J·P·摩根的游艇是一个有力的论据，那也不是得自于经济学教授。我们将再次回到现有的经济学知识中来看看这一问题。

当然，积极参与反托拉斯政策的经济学家大有增加。反托拉斯处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也许是瑟曼·阿诺德当政时的科温·爱德华兹。㉗ 现在，经济学家的数目已增至45人左右，而联邦贸易委员会中的数目还要多1倍（参见表1）。实际上，该委员会以其良好的声誉安排了大量经济研究性质的职位，在它的头15年里，经济学家的人数上升至44个（1930年）㉘，而在随后20年里也只减少了半数以上。当然，奇怪的是，大量经济学家能够在一个执法机构中幸存下来。在这些公仆之外，我们还应加上受雇于私人团体的经济学家数目，他们大

表1　反托拉斯机构中的经济学家：1913—1981年

年　　份	司　法　部*	联邦贸易委员会**
1913	n.a.（指数据缺乏，下同）	n.a.
1923	n.a.	30
1930	n.a.	44
1951	n.a.	18
1955	n.a.	26
1971	n.a.	47
1972	21	53
1973	26	56
1974	24	66
1975	36	67
1976	43	73
1977	40	73
1978	44	81
1979	45	78
1980	45	80
1981	n.a.	92

* 数字由反托拉斯处的威廉·巴克斯和布鲁斯·斯纳普提供。

** 数字由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约翰·彼得曼提供。

概要多20倍。但是，除非你相信劳动力价值理论，否则，经济学家影响的大小仍然是不确定的。即使根据劳动力价值理论，我们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也只是反托拉斯产品价值的极小部分。

那些怀疑我们的影响的人会从苏珊娜·韦弗在反托拉斯处的谈话录中获得支持，这份谈话录强调了经济学家和律师之间的紧张关系。[29] 律师们对唐纳德·特纳的经济方针的强烈不满是非常出名的。R·A·卡茨曼的类似于联邦贸易委

员会的研究表明，1970年之后经济学家占据了某些实权地位，有些人的学习曲线相当平坦。[30] 有见识的经济学家对我们的影响提出了非常有利的判断，但是他们并没有提供什么具体的证据或我们通常在专业工作中获得的权力。[31]

经济学家有他们的自豪之处，但是我不认为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是其中之一。我之所以怀疑我们对反托拉斯政策的影响力，根本的一点在于，我们并没有提供什么经过检验的经济知识来指导政策。没有人相信我们已经揭示出集中和市场权力之间的准确关系。过去10年里经济学家和反托拉斯机构提出了种种建议，诸如"分享垄断"、"产品差异先买权"等原理，以及与商业新闻界磋商以确定价格。即使经济学家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更不用说进行实证检验了。经济学家的嗜好就是起诉和辩护，但是这几乎说明不了因果关系的方向。某些案例显得相当敏感（比如普遍受欢迎的西尔维尼决议），但是，这不应该随机波动吗？

如果法律是有效的——正如我的同事（现在是法官）理查德·波斯纳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智慧所揭示的——我们就应该期望它是与经过检验的知识相关联的，至于其他，则对冲击政策形成过程的实际政治力量作出反应。谁要相信当今的产业组织经济学支持了许多具体的政策，那可真是空想。我随便假定我们现在的经济分析优于J·B·克拉克时代。我希望克拉克教授能同意这一点。如果我们确有改善，我们的影响就可能比过去大一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影响应该大。只要反托拉斯法的最大功能是加强企业经理的防御时，我们就得谦恭一点，经理们去接受建议时，力图维系他们的使用权以对付股东们的贪婪。

5. 垄断政策对经济学的影响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有关反托拉斯政策对经济学家的影响问题。我们这个特例涉及到一门科学如何反映社会利益这样一个普遍问题。

我们已经谈到在执行反托拉斯政策时——尤其在进行诉讼时——对经济学家的劳动的直接需求。没有人会否定他们所发挥的吹鼓手作用；我猜测直接利用的影响既不小也不大。我想作为贝尔系统(包括它的杂志)的受益者的大批经济学家与那些非受益者相比更难于批评那个系统。而且，反托拉斯专家在各个反托拉斯案件中肯定不能百分之百自由地处理集中化的影响或市场的定义。

雅各布·瓦伊纳曾经告诉过我他在一个较早的基点价格体系案例中为政府作证时的经历。补充一句，他的报酬也许是微不足道的。[32] 他说，他起初作为一位独立的教授，但是经过若干小时的严厉盘问之后，他发现他已成为政府立场的一名积极支持者。只有那些全然与所有政策讨论都无关的经济学家才与这种影响无关，当然同时也就与大部分现实世界无关。

《经济学杂志索引》这本常用的工具书可以推导出我们这个专业对垄断和公共管理的兴趣转变的数量指标。[33] 这一资料表明，我们完全分享了进步时代的兴奋和被记者夸张了的垄断问题：本世纪头10年美国全部文章的整整四分之一是有

表2 在垄断和公用事业方面发表的文章：英国和美国

按国家划分	1900—1909年	1930—1939年	1960—1965年[a]
	1．垄断方面[b]		
1．美国：文章	27	137	206
2．占全部文章估计数的百分比*	5.4%	2.6%	2.5%
3．英国：文章	7	16	71
4．占全部文章估计数的百分比*	1.3%	1.3%	3.0%
	2．公用事业方面[c]		
5．美国：文章[d]	100	179	195
6．占全部文章估计数的百分比*	20.0%	3.8%	2.5%
7．英国：文章	30	35	102
8．占全部文章估计数的百分比*	5.5%	2.8%	4.3%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学会，各年《经济学杂志索引》。

a 因为修订了学科代号和采用了可取的包括重印文章的政策，因此，最近几年的《索引》不是直接可比的。

b 学科代号，15.23到15.39。

c 学科代号，15.6到15.99。

d 不包括《土地和公用事业经济学杂志》，这本杂志在第二个时期有260篇文章（大部分具有非经济学性质），在1960—1965年有46篇。

* 按国家划分的全部文章估计数依据1900—1909年期间各作者索引的50%样本和1930—1939年和1960—1965年期间14%的样本。

关垄断和公共管制的。这些文章的五分之四是关于那个时代的灵丹妙药，即对公用事业实行公共管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断垄的相对兴趣减少了一半，对公用事业的兴趣减少了八分之七，如今对两个方面的注意力都不如英国的经济学家。

当然，有关这些问题的文章的绝对数还是上升了。

我发现与我们的反托拉斯政策对基本经济研究只有微小的影响相比，我们兴趣指标的相对下降不足为奇，也无需令人不安。有一位学者，阿伦·迪雷克特在与爱德华·利瓦伊一起讲授关于反托拉斯法的著名课程时，对各种产业习惯做了考察，并且对掠夺性竞争、搭售和其他形式的价格歧视以及专利政策做出了激动人心的理论贡献（实际上全部是口头上的）。但是，还没有其他人像他那样做过。

考虑一下市场定义的问题，在这一定义中规定了存在竞争或某种形式的垄断。典型的反托拉斯案例是一种毫无廉耻的经济上的弄虚作假。原告把市场价格定得极高，正如有人曾指出过的，只包括优质光圈的单镜头反光照相机以 200—250 美元出售。根据参议员约翰·谢尔曼的名字，可以把这称为市场的J—谢尔曼化。接着，被告坚持认为市场是世界性的，不仅包括所有照相机，而且还包括摄影师，甚至交通媒介，因为一次访问就可以代替一张像片。这也可以称之为市场的T–谢尔曼化，这次是根据参议员的兄弟威廉·特柯西·谢尔曼的名字命名的。集中化比率有可能很大，也可能微不足道。对法官的裁决影响大小取决于谁能博得法官的信任。我感到遗憾的是，对市场定义的这一争论，在所有私人的反托拉斯诉讼案中，已经斗争了上千次，但实际上我们经济学家却一点都不注意。除了供求交叉弹性的因果联系之外，市场决定仍然是经济研究中的一块不发达区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反托拉斯经济学的其他分支，诸如垂直合并、特许和租赁等，几乎同样被忽视。

据此断言我们的反托拉斯政策对经济研究毫无影响也是

不合适的。人们创造出诸如论述真实竞争或管理价格的文献，都不是我们科学的装饰品，而是为垄断政策提出建议。通过打官司向学者提供的数据形成了丰富的材料，它们又引出无数论述许多产业的学位论文等等。在两次大战之间，与其他地方相比，产业组织在美国是比较活跃的领域，我们的反托拉斯政策肯定是造成这一差别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一历史未必说明积极的公共政策不能确保与这一政策领域有关的基本经济研究的繁荣。

6. 结　论

通过对经济学和反托拉斯政策之间关系的这一考察，我从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经济学家对垄断政策的态度受到技术价格理论主体的很大影响。我们现在支持鼓励竞争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强调了竞争性市场和产业的突出优点。

我们的历史性考察证明了这一点。与1890年时相比，如今竞争受到越来越多的积极支持，这主要是因为今天我们对它理解得更深。1890年时，竞争在经济学中是一个普通常识性的概念，但只是大致说明了经济行为，而不是一个分析性概念。竞争的霸权决不会受到当时微小的、刚露头的关于垄断的文献的挑战。当然，一个没有敌人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没有知交的概念。经过数代人对垄断、不完全竞争以及寡头垄断(这个词在1890年是不为专家知晓的)的广泛争论，竞争的含义和力量日益被人更好地理解。举一个小例子：早期论述

掠夺性竞争的文献中指出，掠夺者在掠夺品的附近大压价格，而在其他地方抬高价格以补偿损失。今天，在专家演说中要遇到这类争论将是令人窘迫的。

我曾经论证过与此有关的主题，即与其他学科的人相比，专业经济学家比较支持利用价格制度，由此而遭到激烈的批评。㉞ 关于经济学家比一般知识分子更知道要用价格制度而不是用政治制度来解决经济问题的观念，甚至激怒了哈佛大学的温文尔雅的经济学家们。一个与此不太有关的问题是人们应该依赖什么，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应该依赖一门学科主体知识的力量，如果这门学科的实际工作者在他们专业工作之外的领域也接受这些知识的话。我们要证明经济学影响了社会，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确信社会影响了我们，倒可聊以自慰！

注　释

① Railway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1850), ch.XIII.

② The Wealth of Nations Glasgow ed. 197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关于学徒和合股公司的段落。

③ 斯密认为唯一具有重要经济规模同时参加者较少的市场是银行业、保险业、通航水道、运河以及城市供水业。(同上书，第2卷，第281页)

④ 同上书，第1卷，第144页。

⑤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249-250. 以及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1955), II, 260, IX, pp.97-98.

⑥ 同上书，第5卷，第301页。

⑦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5), I, p.142.

⑧ Willian D. Grampp,"The Economists and the Combination. Law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ember 1979; 以及 A. V.Dicey, Law and Opin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ary (London: Macmillan, 1905). 早期法律对团体的影响值得研究，格兰普发现那些法律"不起作用"，并不能阻止联合的形成，但是他也用赞许的口气引用说废除这些法律是"英国工联主义历史上一个新的大发展的起点"。

⑨ "提出的法案草案……有关工人联合等", Edinburgh Review 39 no.77 (January 1824)。

⑩ 同上书，第320—321页。

⑪ 我对亨利·西奇威克的钦佩程度与对另外两位的钦佩程度几乎差不多。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第3版，伦敦，麦克米伦，1901年)中有两章(第2卷第9、10章)是微观经济学发展史中最佳的章节，它们涉及了人力资本和非竞争行为的理论。

⑫ H. Thorelli,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311 ff.; John D. Clark, The Federal Trust Poli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31), ch.V.

⑬ The Trust Problem (New York: McClure, Philips, 1900), pp.217-218. 理查德·T·伊利也强调："如果有任何认真研究经济生活的学生相信已经通过的反垄断的法律能带来什么重大利益的话……这样的权威还不曾听说"(Monopolies and Trusts, New York: Macmillan, 1906, p.243)。

⑭ Industrial Combination (London: George Bell, 1906), pp. 231-231.

⑮ The Control of Trusts (New York: Macmillan, 1901). 在第2版中有很大篇幅讨论立法的作用，他呼吁禁止连锁董事会，以及不公平的竞争方式。参见J.B. and J.M. Clark, The Control of Trusts, 2d ed. (New York:Macmillan, 1912), pp.104 ff., ch.VII。

⑯ Industry and Trade, 1st ed. (London: Macmillan, 1919),

pp.516-518.

⑰ Hadley, Railroad Transportation (New York: G.P. Putnam's and Sons, 1893), p.137.

⑱ The Decline of Compet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32), p.523.

⑲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Fai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⑳ Antitrust Policies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58).

㉑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Antitrust Law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9 (1967): pp.225-258.

㉒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the Behavior of Stock Pric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5.

㉓ "The Competitive Effects of Trust-Busting: A Portfolio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 (1977), pp.717-739.

㉔ Clark and Clark, The Control of Trust (1912), p.4.

㉕ 同上书，第34—35页。

㉖ John S. McGee, "Predatory Price Cutting: The Standard Oil (N.J.) Cas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 (1958); L.G. Telser, "Cutthroat Competition and the Long Purs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6); 此外还有大量文献的参考资料，请查阅 J. S. McGee, "Predatory Competition Revisited",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3 (1980)。

㉗ 他在"Thurman Arnold and the Antitrust Laws"一文中提出了阿诺德的特征为非经济性的评述，参见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58 (1943): 338-355。

㉘ 这些经济学家对该委员会工作的影响似乎并不大。参见G. C. Henderson,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4)。

㉙ Decision to Prosecute (Cambridge: MIT Press, 1977), esp. pp.120-136.

㉚ Regulatory Bureaucrac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0),

ch.IV.

㉛ Oliver Williamson's commentary in R.D.Tollis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ntitrust (Lexington, Mass.: D.C.Heath, 1979), pp.84-90.

㉜ 我想起瓦伊纳在明尼苏达大学作精彩的权力均衡问题的讲演。讲演主办者要他按惯例支付他的费用的 15%，他高兴地报告他的费用是零。

㉝ 表 2 提供了数据，我应感谢克莱尔·弗里德兰所做的编纂。也许低估了较早时期对工业组织的相对注意，因为忽略了书籍，而在那一领域书籍却是重要的发表手段。

㉞ "The Pol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repinted in my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参 考 文 献

Burns, Arthur. *The Decline of Compet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32.

Burns, Malcolm. "The Competitive Effects of Trust-Busting: A Portfolio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 (1977): 717-39.

Clark, J. B. *The Control of Trusts*. New York: Macmillan, 1901.

______, and Clark, J. M. *The Control of Trusts*, 2d edi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12.

Clark, John D. *The Federal Trust Poli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31.

Dicey, Albert Venn. *Law and Opin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1905.

Ellert, James.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the Behavior of Stock Pric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5.

Ely, Richard T. *Monopolies and Trusts*. New York: Macmillan, 1906.

Edwards, Corwin. "Thurmon Arnold and the Antitrust Law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58 (1943):338–55.

Grampp, William D. "The Economists and the Combination Law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3 (November 1979): 501–22.

Hadley, George. *Railroad Transportation*, New York: G. P. Putnam's and Sons, 1893.

Henderson, G. C.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4.

Jenks, Jeremiah W. *The Trust Problem*, New York: McLure, Phillips, 1900.

Katzmann, R. A. *Regulatory Bureaucrac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0.

Lardner, Dionysius. *Railway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1850.

McCulloch, J. R. "Draft of proposed Bill ... Relating to Combination of Workmen, etc." *Edinburgh Review* 39, no. 77(January 1824).

McGee, John S. "Predatory Price Cutting: The Standard Oil (N. J.) Cas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 (October 1958): 137–69.

_____. "Predatory Competition Revisited."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3 (October 1980).

Macgregor, D. H. *Industrial Combination*. London: George Bell, 1906.

Marshall, Alfred. *Industry and Trade*. 1st ed. London: Macmillan, 1919.

Mill, J. 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5.

Ricardo, David.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edited by P. Sraffa. Vol.1 of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_____.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edited by P. Sraffa and M. H. Dobbs. 10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55.

Sidgwick, Henr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83. 3d ed. London: Macmillan, 1901.

Simons, Henry C.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Fai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Smith, Adam. *The Wealth of Nations*. Glasgow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Stigler, George.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Antitrust Law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9 (October 1967): 225-58.

_____. "The Pol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I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Telser, Lester G. "Cutthroat Competition and the Long Purs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6.

Thorelli, H.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5.

Weaver, Suzanne. *Decision to Prosecute*. Cambridge: MIT Press, 1977.

Whitney, Simon. *Antitrust Policies*.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58.

Williamson, Oliver. "Commentary."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ntitrust*, edited by R. D. Tollinson.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79.

第　2　篇

科学史中的社会学



经济学家的作用*

经济学家为关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专业作用的两种观点而困惑不安。至少，本教授是这样的。

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家是任何和所有经济政策的批评专家或辩护专家——不仅仅是批评，而且肯定还发挥着更有力的作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受此观点的熏陶。我们研究现行的和可选择的经济制度，我们用强有力的理论来强化我们的研究。我们未必能赢得所有的战斗——经济保护主义的持续和抬头足以说明我们根本不是万能的——但是，我们赢得了某些战斗，而且希望赢得更多，并为此目标而奋斗。

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消费者通常决

* 原载于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42 (January 1976).

定应该生产什么，生产者通过比较精确地发现消费者的需求以及比较廉价地生产产品来获取利润，我就受到这种相同的专业训练。有些人对这一观点还心存疑窦——这要归功于加尔布雷思教授的热情和技巧，但是即使加尔布雷思的博才几乎也不能让我因为住房和帐篷两个行业的广告费用的不同而产生一点点住在房屋里而不是帐篷里的想法。撇开这位剑桥的怪才不论，那么，说消费者指导了生产是有益的——进而言之，他们就不指导知识分子的言论和思想的产生吗？而这与第一种观点恰恰相反。

你们知道了我的困惑和我的思想。现在让我回过头来，考察一下对于普遍的知识分子以及具体的经济学家而言这两种观点的基础。

1. 作为公众的朋友和向导的经济学家

为什么经济学家向社会提出忠告时如此经常地遭到冷遇？他无休止地鼓吹自由贸易——尽管布道的次数正逐步减少——然而保护主义在美国却日益壮大。他探讨了最低工资法的负作用，然而法定最低线却有规则地每三五年提高一次。他把高利贷法定义为中世纪的迷信行为，但是没有一个州急于废除这一法律。

对于社会的不明智之处，我们经济学家提出了若干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公众不理解我们的观点，从而也就不理解他们的自身利益。关税有利于我们，因为一般民众不懂得

比较成本理论。比如，有一位疲惫的工厂工人或内科医生拿起李嘉图的书念道：

> 英国的情形可能是生产毛呢需要100人1年的劳动；而如果要酿制葡萄酒则需要120人劳动同样长的时间，因此英国发现对自己有利的办法是输出毛呢以输入葡萄酒。
>
> 葡萄牙生产葡萄酒可能只需要80人劳动1年，而生产毛呢却需要90人劳动1年。因此，对葡萄牙来说，输出葡萄酒以交换毛呢是有利的。即使葡萄牙进口的商品在该国制造时所需要的劳动虽然少于英国，这种交换仍然会产生。虽然葡萄牙能够以90人的劳动生产毛呢，但它宁可从一个需要100人的劳动生产毛呢的国家输入，因为对葡萄牙说来，与其挪用种植葡萄的一部分资本去织造毛呢，还不如用这些资本来生产葡萄酒，因为由此可以从英国换得更多的毛呢。
>
> 因此，英国将以100人的劳动产品交换80个人的劳动产品。这种交换在同一国家中的不同个人间是不可能发生的。不可能用100个英国人的劳动交换80个英国人的劳动，但却可能用100个英国人劳动的产品去交换80个葡萄牙人、60个俄国人或120个东印度人的劳动产品。关于一个国家和许多国家之间的这种差别是很容易解释的。我们只要想到资本由一国转移到另一国以寻找更为有利的用途是多么困难，而在同一国家中资本必然会十分容易地从一省转移到另一省，情形就很清楚了。

这个令外行人很可能困惑不解的输入品，并不是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而是一瓶葡萄牙的葡萄酒。

第二种解释实际上是第一种解释的延伸，它认为追逐特殊私利的集团——保护性行业和他们的依附者，贿赂了政治决策人员，并混淆了公众的视听。毫无疑问，这些追逐私利的集团竭力营私自肥，但是他们靠欺诈他人来赢利，所以我

们又回到第一种解释：愚民们不会相信他们正在受到欺诈。

这些关于社会对经济政策的谬见的解释，意味着我猜想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的一种认识，即非经济学者在接受我们这一学科中的合理可靠的结论时显得迟钝而且刚愎自用。而我们其他一些并非比较一致的结论，诸如作为帮助低工薪工人的一种手段的邪恶的最低工资法，不是很早就得以通过了吗？

鉴于公众对经济学的落后认识，这帮经济学家通常又引伸出第二种看法：最终，这些迟钝的公众至少可以在有效经济生活的初级课堂中受到教育。假如这帮人不减少用这种方式对公众理解力的嘲弄，我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窘迫的问题：何必为教育公众而操心呢？那么，至少在短时期内，我们经济学家才会真正受最低工资法的支配，这是多么可怕而又难以想象啊。

然而奇怪的是，自然科学家在让公众接受他们的研究成果方面没有遇到我们经济学家所遇到的困难。公众随时都准备接受比经济学复杂和抽象得多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理论，他们资助空间探索，吞食抗菌素和避孕药，甚至把一生献给 IBM 公司。仅仅用复杂性解释不了经济学家相对来说缺乏说服力的原因：可以肯定，公众对上述几门科学理论的理解并不会比他们对经济理论的理解更深一点。

人们可以提出特殊的答案，比如经济学家对他们自己的结论也有分歧，但这不太可信。即使我们大致取得相同看法时，我们也难得成功，自由贸易就是一个例子。相反，在有分歧的地方——比如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对总量经济活动水平的理论分歧——一种理论（现在是货币主义）倒是得到广

泛的(口头上的)接受。

简言之，经济学家认为公众是迟钝的和不确定的，但在经济学的课堂中还不是完全冥顽不灵的学生，这种认识与我们社会中接受科学的程序并不相符。这样一种认识并不能用于解释我们微弱的成功和巨大的失利。

2. 站在客户一边的经济学家

关于经济学家把哪些现象看作经济现象这一主题，可以写成一篇有用的论文，但它不会是一篇流行的论文。对于用理性地追逐私利这样的术语来解释政治现象，很少有经济学家会表示强烈反对，但是，对把同样的分析用之于宗教或战争，他们会感到有些疑虑不安。他们可以自由地谈论劳动经济学，但是对婚姻经济学或生育经济学却犹豫不定。他们允许丹尼斯·罗伯逊奢谈节约爱情，但不希望把爱情本身解释成效用最大化。

经济学家尤其不喜欢用普通的经济术语来解释他们自己的科研行为。如果对一位经济学家说他所选择的工作是为了使他的收入最大化，他便会激烈地叫嚷这种观点是一种蓄意的侮辱。这种市场导向行为的特征不是我们惯用的所谓消费者主权，而是诸如“御用文人”之类的尖刻用辞。要让一个人的观点适合于他的听众，这与篡改证据和其他不体面的行为并无二致。

这一敌对的反应过于急躁。知识分子能够取悦于他的客

户而无须借助于假称承认他实际上不相信的观点或其他不名誉的习惯，这是有可能的，事实上也是常见的。每个经济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我们暂且假定它们直接来自于天堂或者来自于地狱。如果我们所持的观点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点的话，那么，总有一些观点会投某些人所好，一些观点投另一些人所好，它们所取悦的听众范围很广泛。如果我们不去树立那些最能博得人心的观点，那倒是令人惊奇的。实际上，要不形成这些观点是很困难的，因为人们最经常并且付出最多报酬而要求给予阐述的，正是这些观点。有时有人会要求我谴责管制性机构，我用有限的知识和足够的诚意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没有人向我征询对大学授予学位方法的有关看法。

当然，我们的观点并非“直接”来自天堂或地狱：它们通过诸如家庭、公共媒介以及学校这样的渠道传递给我们。许多众所周知的想法没有传递给我们，或者以歪曲了的形式和充满感情色彩的形式传递给我们。我们全然依赖于我们的文化中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因此，一旦一个人产生一个新的想法倒反而令人大吃一惊。

反映经济学家职业整体性的一项证据是，要列出支持保护主义方案或最低工资法的一批优秀经济学家的名单是不可能的。那些寻求此类立法的集团必然同时还要寻求他们的代言人和理论家——并且根据他们的成效来进行评判，那些“假冒”的经济学家就精于此道。

但是，知识分子提供投社会所好的思想，主要是出于需求方面的缘故而不是供应方面的缘故。我有一个观点，只要有充足的时间来了解各种政策的影响，人们总是会搞清楚他们的真实利益所在的。于是，各个公共部门就需要知识分子

提供有利于其部门利益的服务。那些在技术上和观点上与大集团利益相一致的人将由此得势并成为“观点的领导者”，而那些既缺乏技术又缺乏被人接受的观点的人则只能给一些地方小报投稿。

可见，知识分子只有在向听众提供听众想听的信息时才能发现其自身的价值。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一过程通常与全部知识分子的整体相和谐。向听众提供悦耳的信息时常可以由知识分子良心上的伸缩而得到自慰，对于我们来说，否认这一点将是不太公正的。指出这一点并没有多少(只有某种)目的：我们偶尔也应提醒自己，知识分子并不见得比其他人拥有更多或更少的勇气和完整性。

3. 客户想要什么

我暂且撇开本文的目的，考察一下经济学家耗时最多的领域——经济学教学。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名牌大学的大多数博士，除了教学以外别无所为。最近克莱尔·弗里德兰和我合作研究了一些主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的引证习惯，从中发现在他们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的头15年里，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他们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次数大约是2篇。就整个专业而言，文章产量大概是每位经济学家每20年发表1篇。

社会认定教书是有用的、受人尊敬的工作，对此毋庸置疑。然而，为什么社会希望经济学比较实用，从而可以教学？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肯定有一个间接的但不是最终的理由。

社会的第一种也是最纯粹的需求是对科学知识的需求：有关经济制度如何运转的知识，有关经济措施后果的知识，有关失业的原因、各种税收的作用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原因等知识。无论是保守的人还是激进的人、保护主义者还是自由贸易论者、世界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教徒或者异教徒，都可以从了解经济现象的前因后果中得益。如果一个人知道了关税对生产要素的价格、各种产业的规模和国民收入的影响之后，他就能成为更有效的保护主义者或更能干的自由贸易论者。

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这种科学信息是不计价值的：不管一个人的目的是什么，只要他能更好地掌握行动和后果之间的关系，他就能更有效地实现其目的。

我推测一个社会——社会整体——最终会接受有关行动与结果之间关系的显然正确的研究成果。如果一个社会不将其政策适应于它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人所周知的特性，那么它将是一个道地的反理性的社会。即使一个人相信女巫，他也应该考虑骑着扫帚的巫婆的难处。我想，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经过检验的经济知识，比如需求曲线具有负的斜率的原理，我们将发现，不管一个社会的政策偏向如何，那个社会都不会否认或者忽视这一知识。

经济学家的第二项职能是提出和保卫有利于社会中大的或小的集团利益的经济政策。我们的倾向使一个集团特别受益，这就是广大的消费者阶层，有时我们忘记了他们是一个阶层而不是整个社会。与发现经济现象的规律相比，经济学家为消费者耗费了也许大得多的时间和智力，我们称之为福

利经济学：比如，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各位得主，除库兹涅茨外，大多在这一领域作出过贡献。这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职能，正如我的同事罗纳德·科斯最近所指出的，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使一项会降低1亿美元现值国民收入的政策推迟一个星期——这是一项很小的政策！——那么，他就为社会节省了2倍于他的一生薪水的钱，然而他的教育服务却不再得到报偿。根据科斯的代数计算，美国也许有相当于5000个全日制的经济学研究者，每年耗费2.5亿美元，包括辅助性的服务。如果各种特殊的生产者利益政策使全国每年耗费400亿美元——这是一个粗略的但却不易推翻的估计——那么，只要我们能为消费者把这些勒索减少大约半个百分点，我们就是值得被雇用的了。

广泛的消费者阶层是经济学家极力支持的许多特殊利益集团中唯一最大的集团。这些经济集团中既有界限清楚的，例如美国的工会和农会会员，也有界限不太清楚的集团，诸如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阶层，黑人，说外语集团，以及各种宗教集团。必须发现这些形形色色集团各自的利益，并且把它们溶合于协调一致、切实可行的政治方案之中。必须探索和宣传新的事件——诸如能源危机或新的税法——对利益集团的影响，必须认清一个集团内部的利益冲突，并进行一定的协调，必须形成天然的或暂时的利益联盟。

社会中重要集团的思想首领作出成效时，这个集团自然会对他们的服务给予报偿。他们的著作会畅销无阻，他们的演说会听众甚多，他们的大学则会受到物质上的褒奖。这些首领可能并且已经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我必须强调，他们的重要性与那些发现现实世界的内在关系的学者属于不同

的类型。一个集团的首领对"他的"集团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学者迫使所有的集团重视他的研究成果。一个是积极制订政策以领导一个集团，另一个是变换方位以进行政策辩论。

收入再分配是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的标志：总产量的增加一般会由每个人来分享，因此，政治力量的有效使用通常涉及到收入再分配。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所有重大的政策问题都要涉及收入再分配：累进税，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对教育的公共资助，以及卫生和福利项目，等等；这些政策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国民收入，都会对重要的收入再分配发生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较小的政策，从石油利用到对艺术的公共支持，同样都会导致收入再分配，任何一个派别都有自己的发言人。

4. 经济学说史专家的问题

如果我对经济学家的作用的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它也应该完全适合于当代问题。然而，最好考察一下经济学家早年的作用，以验证关于他们的影响的假设。在还允许拿女人开玩笑的时候，有过一段出名的对话：

> 他说："女人的麻烦是她们总是从个人立场出发来解释抽象的主题。"
>
> 她说："我不是这样的。"

但是，当然，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我在这里将提出一项个人意见。我的朋友罗伯特·福格

尔曾经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许部分原因是我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是社会中的重要集团的代言人。我的回答是，如果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卡尔·马克思就不再是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的犀利的笔锋确实时常投向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和早期的制度。平心而论，我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斯密是英格兰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受人尊敬的发言人，同时也是所有时代的首席经济学家。但是，马克思显然是上升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同时也是首席社会学家。我不相信每个人的每一个观点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实际上我就无法完整地解释我正在陈述的观点。非经济阶层，比如宗教集团，也提出了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左的观点。如果说人们按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生产的观点需要有一个名称的话，那么斯密的名字比马克思的名字更加适合。

我的中心意思是，经济学家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所发挥的影响是很小的，并且是很难觉察的。这一主题当然应该经受检验，而研究经济学说史的专家最有资格从事这一检验。无疑，除检验我的假设之外，他们还有别的事要干。但是，我相信要评价经济学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就会引出他们的一般历史地位的问题。

例1：自由贸易理论被普遍认为导致了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①

关于谷物法被废除的传统说法是这样的：李嘉图严密地提出一个重要的经济观点，即比较成本理论，这一理论反对亚当·斯密已经构画出的保护主义，同时发现这一理论的托伦斯以及李嘉图的追随者诸如詹姆斯·穆勒和约翰·穆勒、麦克库洛克以及汤普森将军等人，把这一理论推向知识阶层。

在这些受过教育的先生中，以雄辩著称的科布登和布赖特，以及反谷物法联盟中的一些次要人物又将这种论点传播到全国——最终传到了伟大的首相皮尔那里。爱尔兰的饥荒可能激发了谷物法的废除，当然，暂停征税也许可以对付那次饥荒。最终，正确的经济原理实现了对大不列颠的征服，而这在西班牙最强盛的年代也没能实现。多么令人振奋的故事！经济学家把一个伟大的国家从谬误引向真理，从缺乏效率转变为产量最大化。

反过来说，我相信，即使科布登只会说侬地语，并且还有些口吃，即使皮尔是一个头脑狭窄的蠢人，但随着英格兰农业阶层的衰落和制造业、商业阶层的兴盛，他也会在粮食方面实行自由贸易。也许只是在几年之后，而不用很多年。1846年时，英格兰的农业阶层减少到占劳动力大军的大约四分之一(C·R·费伊颇有说服力地论证到，消灭农民的圈地运动致命地削弱了支持地主的政治力量)。真正有效的进口限制会把粮食的价格推到难以忍受的水平，然而一般的常规却是，难以忍受的事情总是无法忍受的。

由此可见，废除谷物法是对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变化所作出的合适的社会反应。实践能够检证这一不同于伟大经济学家的历史理论的假想。有些国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且跨入对食品进口的需求旺盛的时期，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些国家关税的历史。如果对采取自由贸易的国家的人口净增加进行一下估算，那么我预计，当人口增加相对快于国民收入时，换言之，农业已相当庞大但远不足于在国内养活下一代时，自由贸易就将不可避免。

或者，作为另一种观点，考虑一下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

之间的联系。同一种贸易理论统治了瑞典、英格兰、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并且在整个20世纪都统治了它们。我们如何解释这些国家在政策上的差别，以及如何解释保护主义上升的趋势呢？

例2：西方充分就业政策的产生常常被认为是由于凯恩斯勋爵和与他的名字有关的理论。这种说法给科学史学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如何确定在任何时候一门科学在社会上的流行观点？大多数人，甚至一些有影响的人，并不公开他们对所有流行问题的看法，我们知道新颖的思想并不会很快传遍整个社会。实际上，诸如两个单位都从自愿性交易中获益这种简单的经济原理也被普遍忽视。对于经济学说史学家来说，确定主流观点是一项富于挑战性的任务。

在西方世界采用充分就业政策时，凯恩斯主义发挥了引导作用而不是跟随作用，为验证这一假想，我们必须设计并且应用普通的经济思想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当然，即使不容易但也有可能确定什么思想占了上风——人们只需观察什么政策占了上风，就能确定支持这些政策的观点也占了上风。但是，思想领域，就像法律领域一样，是局部的和有限的，对法律或者思想的作用进行数量分析就需要许多富于想象力的研究。

我们查明普遍盛行的专业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时候，我预计会发现凯恩斯主义者的调查统计数字并无助于解释充分就业政策，相反诸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和工业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强化倒是更重要的因素。特伦斯·哈奇森的著作《不列颠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1946—1966》认为，经济学家相当迅速地适应了正在变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

例3：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论述一个公正的税收制度的适当特征。在西方世界，他们通常支持按收入累进征税。这里，因果关系是相当明晰的。由于不存在对收入平等目标赞成或反对的出名的"科学"论断，因此，经济学家一直把政治统治集团的观点转译成经济学的语言和分析工具。在这方面我最欣赏的榜样是马歇尔。他证实了，如果消费税只对缺乏需求弹性的商品征收，或者，如他所补充的，如果对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征税，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就比较少。但是，当然，他反对这种累退性的税收。我们从社会理解到平等的概念，因此，我们在社会选择收入分配政策时无法发挥大的作用。

例4：同样有利于理解经济学家的影响的是有关政府管制的经济理论。随着各个潜在的管制领域博得政府的赞同，管制的理由需要迅速用经济学语言重新表述出来。比如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土地使用权，我们说，地主和雇农不知道如何区分长期投资的成本和效益；比如今天的污染问题，我们说存在着外部非经济性；比如19世纪的铁路运费，我们称之为垄断问题；比如1910年的工人伤亡事故，我们推测是因为工人没有索取劳保费用或者保险市场不完善。但是，经济学家针对发现的和普遍了解的一个问题提出过一项管制性政策吗？我要提醒大家，谢尔曼法案遭到美国经济学家相当普遍的反对。还有，什么地方的管制政策采取了最优价格理论的形式？诸如"历史成本"这类概念肯定不在经济学家价值理论的考虑之列。

尽管我无法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样对我不赞同的观点保持不偏不倚，但是我试图这样做。所以我必须承认，我

正在寻找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产生影响的明显例子。我必须承认，如果有效地使用经济学家，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就会很小。请记住我的估算，经济学研究的费用大概是一个季度10亿美元，其中相当大部分用于支持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那些认为经济学家要比这一低水准的绝对数重要得多的人，必定认为社会对经济学的投资远远不足。对这一乐观假想的实证检验，我并不绝望。

5. 若干总结性评论

两种影响同时对我们起作用时产生了一种难以理解的紧张状态。我们希望成为科学家，具有正确的理论逻辑，在实际运用理论时具有可靠的程序，而对我们知识的局限性保持客观的和公正的认识。我们也希望成为重要人物——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我们希望干好事——非常好的人，并且得到公众的认同。

我已经指出过，在有限的范围内，这些目标可以得到协调：社会需要并且能够从经济生活的客观知识增量中获益。有些人实际上只拘泥于这种工作，而回避对现实政策事务发表任何看法（这类看法和参与最终会影响他们的科研工作，而不仅仅是占用了时间）。这些接近于圣人的学者完全不为公众所知，并且在专业圈子里也不总是出名的。弗兰克·奈特也许就是这种稀罕类型中的一个样板。

我们中大多数人对干好事没有什么耐心，也许我们对有

效地用完整时间从事科学工作的能力并不乐观。也许，我们不完全满足于萨缪尔森要我们自己喝采的内容——实际上，我们无法确信这种喝采是否受我们的政策立场的影响，然而，我向萨缪尔森承认，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受过教育的手能拍出比无知的手更优美动听的掌声，但是，受过教育的手被受过教育的傻瓜所压制，这似乎更是家常便饭。

归纳一下我对经济学家的影响的性质的看法，这是一件似是而非的事情。当经济学家正在扩大关于经济制度运转的知识时，他的重要性是真正的、彻底的。经济运转的新知识几乎肯定是专业性的并且具有技术性，所以，它将首先并且主要为某个专业同事所知。可见，一个经济学家工作的影响和他所享有的(非专业性)名声很可能是负相关的。这一论述并非没有例外——在适当的时间之后，一个爱因斯坦可以为千百万并不懂得他的发现的人所知晓；但是，一般而言，可以肯定的是，广泛的名声和重要的影响犹如鱼翅和熊掌不可兼得。

注　释

① 以下三段大致取自同一篇论文——"知识分子和他的社会"。这是为1972年10月21日在弗吉尼亚州查劳特维举行的讨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一书的会议所提供的论文。参阅Capitalism and Freedom: Problems and Prospects,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原文注释成为一项科研问题*

在《经济学》杂志最近刊载的一篇论文中①，H·巴开教授面对着经济学说史上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的若干篇文章的观点互不一致时，你接受其中的哪一篇？他的具体问题是李嘉图的对"谷物"的人均需求的理论。巴开正确地指出，李嘉图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命题：

1．在《原理》中有两段文字，认为谷物的需求弹性为零：

"在人口相同并且不再增加的情况下，不会存在对谷物增量的需求……"

2．在《农业保护主义》的下列段落中，认为谷物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但弹性不为零：

"在人口既定情况下，对谷物的需求必然是有限的：并且，尽管这可能而且无疑是真实的，即谷物充

---

* 原载 Economica, November 1965。

裕且廉价时，消费量将上升，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谷物的总价值量将下降。”

巴开选择了后一种观点，认为它是李嘉图的基本观点。选择是基于两个显而易见的理由：

1．马歇尔没说过李嘉图习惯于假设谷物的需求弹性为零(我可以补充一句，马歇尔也没说过李嘉图习惯于不假设零弹性)。

2．存在着与《农业保护主义》的论点相反的观点。

这个例子所提出的推断性问题比例子本身更有趣。

如果讨论一个实在的经济关系——比如对谷物的人均需求的弹性为零这样一个命题——我们不能希冀通过引证一个或几个事实(比如观察若干年)来确定它的可靠性——更不用说像巴开所做的那样，引证两个相反的“事实”和一个相同的“事实”。我们都会同意对这个问题应该选择更多、更客观的证据来加以说明。

如果我们反对用精选的事实来实际验证一项假设，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用精选的引证来解释某种现象呢？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基本上是一回事。

实质性的假设力求把所考察的经济现象中的主要变量区分开来，并且在这些变量之间建立起重要的关系式。一项成功的假设能说明合适的数据中的重要关系，但是它不必说明随机变异。与此类似，对原文的解释应该揭示出一个人著作中的主要观点以及这些观点之间的重要关系。当然，解释无需顾及那些多余的水分或者无关紧要的知识。

对一项数量性假设进行验证和作出一项分析性解释，在具体过程上是不相同的。要提高对假设的统计验证的可信度，

其基本途径是扩大样本，在两个样本中有一个具备零需求弹性，这几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这个零弹性是100个样本中的一个，那就近乎证明了需求弹性不为零。我们不应该咬文嚼字，以致于只根据一本著作中的某个段落来推断作者的一般立场，因为各个段落的重要性不尽相同。我们只有通过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个作者的主要理论结论，并能够从中(根据我们的解释)推断出他的分析框架，才能提高解释的可信度。

对一项解释进行验证，就是看它与所考察的思想体系的主要分析性结论是否一致。如果一个作者的思想的主要结论不存在于一种解释之中，而存在于另一种解释之中，那么，后一种解释就是比较好的(这显然与最大或然性相似)。

这一解释问题的原则使得一种理论的价值上升成为科学。把一个人的核心理论观点区分出来，然后以能够面对各种矛盾现象的严密形式表达出来，这样既可认清一本著作中可能存在的科学贡献，也有可能进行必要的修改，而且可以经受评价并为人们所接受。这种与主要结论相一致的原则可以称为科学注释原理。

当然，一个人在其著作中总会有一些逻辑上的谬误或赘述，甚或若干小疵点。人们可能会力求确定这个作者的真正观点，尽管这种探索与科研的进展并不直接相关。于是，人们在选择不同段落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标准；与作者思想最相适合的解释变成是最决定性的。这可以称之为个人注释原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谈李嘉图和小麦的人均需求曲线。

用科学注释方法的话，我们会问：如果劳动者对食品的

需求具有(1)零弹性和(2)很大的弹性的话，李嘉图一般理论的观点将是什么。("几乎"是零的弹性在科学上是否能够被忽略也是值得讨论的。)回答如下：

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我在这里假设)资本量会随之而扩大，这样，只要报酬递减法则发挥作用，粮食的实际价格就会上升。由于非食品性商品包含了农产品原料，因此它们的价格也可能上升，但是这种微小的运动被搁置一边。如果对食品的需求不是零弹性，李嘉图必然会对产品结构如何随人口增长而变化进行解释。他有可能认为产品结构是随相对价格而变(正如巴开所认为的)，也可能认为产品结构是由固定系数的预算所决定的(正如我所认为的)。

固定系数的分析方法在分析上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它易于运用；二是它没有代价——李嘉图对食品和非食品之间的工资结构没有什么兴趣。固定系数分析方法还有一个长处：它的主要理论观点积极推进了经济进步："可见利润的自然趋势是下降；因为，在社会和财富进展的时候，只有付出越来越多的劳动，才能得到所需的食品增量。"如果随着食品的相对价格上升，非食品成了替代品，那么，利润的自然趋势就会减缓(而在食品和非食品完全替代的极端情况下，这种自然趋势就根本不复存在了)。如果对小麦的需求不是零弹性的话，李嘉图的一项重要结论会因此被削弱。实际上，巴开论文中的主要意见显然是指，李嘉图的理论体系是模糊的，因为他没有一条食品的需求函数。

如果我们转向讨论"他的真意何在"，或者说应用个人注释原理，对李嘉图的解释会得出与上面相同的结论。简化的假设是李嘉图的商标；固定消费系数的假设进入了实证性的

劳动价值理论、简化的通货膨胀货币数量理论以及类似的抽象理论。

更具体地说，李嘉图从不讨论产出结构——然而，可变的消费系数分析方法的整个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的分配理论的算术依赖于固定系数分析方法：工人家庭对小麦的需求函数如下所示：

消费量 （夸脱）	小麦价格 （每夸脱）
3	41.
3	41. ，8 先令，8 便士
3	41. ，10 先令
3	41. ，16 先令
3	51. ，2 先令，10 便士

当然，李嘉图知道在谷物歉收时，消费量就下降——算术法则确保了这一点。《原理》可以提供合适的引证。他像凡人一样明白他没有使他的理论具体化。

让我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解释一个人的立场——尤其在那个人具有复杂微妙的思想时——是一个推断过程中的问题，而选择不同的引文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注　释

① "Ricardo's Static EquiLbrium", Economica, February 1965.



边际效用论的采用*

效用理论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前就作为一种有关人类行为的学说而得到普遍发展。这是在本文第一节中受到支持的一个命题，虽然它所需要的只是适当的支持。效用理论在经济学中成功地占据地位是在它被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引入经济学之后。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虽然这项理论被有效地采用的时期比一般常识所认为的要晚一些。说明效用理论在经济学中的采用何以会延迟以及它在后来的发展，正是本文的中心任务。

1．早期和可以理解的效用理论

* 原载于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Fall 1972。

在对效用理论的早期论述中，经济学家们最熟悉的而不仅仅是道听途说的，是杰里米·边沁的说法。让我们回忆一下《道德与立法的原则》中开宗明义的关于效用原则的高明见解：

大自然使人类受两个最高主宰——痛苦和快乐——的支配。只有让它们来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并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拴在它们的宝座上的一方面是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另一方面是因果的链条。它们支配我们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所想的一切。我们为了要摆脱自己所受的支配而能作出的努力，只不过表明和证实了这一点。①

无论效用作为一种精神导向的作用是什么——并且我认为边沁把他对效用的分析基本上局限于这种作用，这是他一生中理智上的悲剧——总不能怀疑效用原则是一种包容一切的关于有一定目的之行为的理论。一个人为着预期的后果而行动的时候，所希望的后果(快乐)和不希望的后果(痛苦)一定支配着这个人对行动的选择。

到《导论》第4章，边沁已经列举了效用的许多方面(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接近的程度，等等)，并断定了效用的普遍性：

一件财物，如一片土地，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使人产生各种快乐，它还能够使人避免痛苦。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一件财物的价值的增减，决定于一个人对它占有的时间长短，是否一定会占有，以及(如果能占有的话)实现占有的时间远近等条件。

边沁并没有完成发展一种关于经济行为的效用理论的全部任务。他没有提出关于相对价格的边际效用学说，而他却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让我们现在至少还模糊不解的观点。② 然

而，他把这方面的分析推进了一大步——远远超过一个李嘉图或者一个穆勒能够轻而易举地接过接力棒的地方。有关"惩罚与罪过之间的比例"的很有分量的第 14 章，足以证明这一点。让我们观察一下他的"准则"中的几条：

1．惩罚的价值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超过从犯罪中获得的利益。③

3．在两种罪过发生竞争的时候，对较大罪过的惩罚必须足以诱使一个人宁愿犯那较小的罪过。④

5．惩罚不应超过使其符合这里提出的准则所必需的程度。⑤

7．为了使惩罚的数量能超过从犯罪中获得的利益，惩罚的数量必须加大，按照它的确定性降低的程度加大。⑥

快乐与痛苦的计算普遍存在于一切人类行为之中："所有的人都在计算。我可以说，连疯子也要计算。"⑦

《立法论》中还有关于效用的计算的更详细的说明，这本书是由边沁的弟子杜蒙根据许许多多手稿汇编而成——边沁主义者对此都很熟悉。⑧ 这位大师很少会长久忘记效用的计算，我们最后一句引语来自他的《司法证据的理论基础》，这一著作是年轻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根据汗牛充栋的手稿用极大的劳动和本领编写出来的：

……就其在幸福方面的影响而言，财富的物质没有价值。一个人的财产总数可以增加一倍、十倍、百倍、千倍，但没有丝毫理由可以想象他的幸福总会成比例增加，或者接近这样：把他的财产增加 1,000 倍，这样的巨额增加，给他增加的快乐是不是和你把他的财产除以"2"而仅仅拿走一半时使他失去的快乐同样的多，可能还有疑问。⑨

效用推理的第二个独立的组成部分，可以比较简略地表述如下：这是D·贝尔努利在对付圣彼得堡反论时首创的对精神预期的计算。⑩这个反论涉及一种赌博的适当的价格，在这种赌博中，用一枚清清楚楚的硬币一次又一次地向上一抛，使其在空中翻转。直到出现一个正面为止，付给赌者的钱如下：

正面	1金币
反面、正面	2金币
反面、反面、正面	4金币
………………	………
反面^n、正面	2^n金币

这种赌博的预期值呈无穷大⑪，并且，为了解答这个反论，贝尔努利假设赌徒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精神上的预期，而不是数字上的预期。他采用了这样的假设："在财富方面任何小量增加所产生的效用和原先拥有的物品数量成反比。"⑫使用效用法则，

$$du = \frac{bdw}{w}$$

式中w是财富，u是效用，b则是常数，可以为这场赌博找出一个有限值，这个值决定于那个人最初的财富。⑬ 这种分析被应用于保险理论，而且贝尔努利还推断出风险分散的值。

贝尔努利的论文激励了许多最著名的概率论专家讨论精神上的预期和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问题（更多的人则讨论这一反论本身）。拉普莱斯在他的重要论文《概率论的理论分析》中用了一章的篇幅（第10章）复述贝尔努利的理论。这方面的文献中比较次要的人物是傅立叶⑭、奎特里特⑮和古诺⑯，当

然大多数论述概率的作者都会想到圣彼得堡反论。此外，像著名的自然主义者布福温这样的作家，也非常注意这个问题。⑰

这两种著作可以使经济学家理解效用论的程度大不相同。边沁主义的观点直接谈到社会生活，并且尽可能说得具有最大的普遍性；至少有三个重要的当代经济学家熟悉这种理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大概每一个受过教育的说英语的人也熟悉它。贝尔努利的说法，对经济学家来说，不是那么容易接触到的，因为，它是在数学文献中以几种语言出现的，而且写作的时间前后经历了一百多年。但是在某些方面这些特点却增加了它引起某一位经济学家的注意和兴趣的可能性——毕竟 1840 年以前还有许多懂数学的经济学著作家，其中包括巴贝杰、休厄尔、马尔萨斯(非常好辩的人)、屠能、古诺和卡纳尔。

还有一个理由使人相信效用论对经济学是有影响的：它受到细心的研究；偶尔也有人对它作过系统的阐述；后来效用论的作者把它遗忘了，同时代的人更不重视它。我们可以列举出朗菲尔德⑱、劳埃德⑲、西尼尔⑳和萨伊④等许多有名的人物，无可争辩地证明效用论是容易为经济学家所理解的，并且他们想要对它产生兴趣。

2. 假　设

一门科学承认一种理论，这是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个

人行为。巴贝杰的聪明才智不可能在1830年使计算机诞生；到1940年的时候计算机的运用已不需要重大的科学进步，并且实际上任何行得通的社会政策都不可能过分推迟它的出现。㉒同样，我们切不可把1870年和1890年之间边际效用论普遍的再次出现和获得承认看作是一个杰文斯、一个门格尔或者一个瓦尔拉的非凡的成就——实际上他们的复合性和共生性，常常被人恰当地用来证明科学环境的重要性。

在此我要说明一个事实，即在科学承认效用理论之前，它至少已经存在75年了。经济学是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基本上成为一门学术性的学科的。从前它是一种由非学术研究人员从事的科学，这些人的主要兴趣是在这门科学的政策涵义方面，在那以后它就由大学教授从事研究，他们承认学术性活动的主导价值和激励作用。

学究式的经济学家的兴趣和学术研究专家的兴趣大致相同，他们在某些重要方面与新闻记者、政治家、官僚以及事务家不同，但这些人在早期的经济学界中却占据多数。在学术研究以前的时期，主要的目的是了解和影响公共政策，而且，搜集事实和建立理论都是为了完成这一基本目的。甚至李嘉图极其抽象的关于价值衡量标准的讨论，对他的主要的动态命题也是重要的：他说经济发展会导致地租上涨和工资上涨，"这两者必然会降低利润。"

没有几个学究式的经济学家能使自己完全脱离于当代问题的讨论，但是随着这门科学越来越成为一种绝对的大学的专业，政策问题的权威意义就减小了。学术界的主要价值观是，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当代的现实生活，追求那种比实际的和眼前的利益所需要的知识更基本的和更耐久的知识。实事

求是地来看，学术性的头脑特别重视普遍性。学者不是为当地的商业或者当今的国会服务的仆人。

一种次要的但有关的学术价值观是对知识结构的强调。工作的形式具有一种和工作内容没有关系的价值：一个学者应该是精通文墨的，他的工作应该用非庸俗的工具来进行。古代的学术遗产往往是这种知识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掌握优良的数学方法更是不可缺少的。“严谨”和“雅致”这类字眼描绘了这种学术趣味的成分，而事务界则比较爱用“有效的”和“有说服力的”这一类的字眼。

这些摆脱当时或者那个年代报刊文章危机的价值观，重要结论的巨大的普遍性，以及对治学方法的培养，由于物理和生物科学在19世纪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得以加强。这些科学力求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它们在中心理论结构（分别是牛顿学说和达尔文学说）上的深入的统一，成功的科学工作的标志正是其所解释的现象范围的广泛性。物理学和天文学已经表明，在一种真正先进的科学里其主要结论适宜于用数学公式来表述，这样就便于广泛地、巧妙地推论和应用。

对李嘉图或穆勒来说，效用论是一个虚弱无力的助手。古典经济学文献所涉及的任何重要领域都不会从效用论方面得到多大的好处，即使在它已经达到帕雷托和费雪把它推进到的那种发展阶段。关于谷物法和自由贸易，效用论都没有什么可说的（除了双方国家的利益！）；关于中央银行的经营和皮尔法令、关于殖民地和人口过剩、关于济贫法或者工厂法令，甚至关于萨伊定律或者征税，效用论都没有什么可说的。效用论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露面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的确没有介入任何政策性的争论。

效用论的贡献恰恰是我们归功于学术界，特别是归功于学术性科学的那种东西。古典学派已经提出一个适用于可生产的货物的价值理论，并且把一些其他理论（地租）或者模糊的说法（“购买者的热情”）用在非生产性的货物方面。现在，效用论可以对皮鞋、小麦乃至莎士比亚著作的对开本作出统一的解释。古典学派没有中心逻辑或行为，他们认为，企业家是一些使利润最大化的人，而消费者和劳动者则是表现出社会学上的行为特性的一群愚钝的人。现在，效用论可以对行为作出统一的解释，它认为每个人都是使效用达到最大化的人，一切经济问题变成仅仅是爱好和障碍的问题（正如帕雷托所说）。古典学派的方法曾经是文字的和数字的。现在，效用论显然允许甚至欢迎使用数学方法。

效用论的采用有第二阶段：在这段时期内效用论为广大能干的经济学家所吸收。这个时期是理论家们已经把效用论发展到它在实质性的经济研究中能起作用的地步以后开始的。在下一节中我还要简略地评述效用论在经济学专业中被采用的过程。

3. 效用论的采用

效用论是什么时候被“采用”的？对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学家来说，要提出一个至少是近似的日期，并不困难：这种理论至少在 1884 年就被菲利普·威克斯蒂德采用，被欧文·费雪采用则不迟于 1892 年。㉓但是，既然我们关心的是一门

科学，而不仅仅是个别的科学家，我们就需要一种方式来表示这门科学采用了一种理论。

让我们首先说明一下简单的效用法则：每种商品对每个人的边际效用递减，这一现象是他的每种商品的需求曲线的基础。我们现在可以参考一下文献，并把经济学家按照他们是否“了解”这一前提分为两类。我们给每个经济学家定出等

表1 经济学家们第一次承认边际效用论的年份

姓名	年份	地方
杰文斯	1862	英国科学促进会
门格尔	1871	《国民经济学原理》
马歇尔	1872	评杰文斯
开恩斯	1874	《主导原理》
瓦尔拉	1874	《经济学要论》
J·B·克拉克	1881	《新英格兰人》上的一篇文章
埃奇沃思	1881	《数理心理学》
西奇威克	1883	《政治经济学原理》
沃尔克	1883	《原理》
威克斯蒂德	1884	对《资本论》的评论，见《今日》杂志
维塞尔	1884	《价值的起源》
庞巴维克	1886	《商品价值理论》
坎南	1888	《政治经济学基础》
奥斯皮茨和利本	1889	《价格理论》
潘塔莱奥尼	1889	《原理》
费雪	1892	《价值与价格理论中数学的研究》
帕雷托	1892	《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文章
陶西格	1893	美国经济协会的论文集
威克塞尔	1893	《价值、资本与地租》
巴伦尼	1894	《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文章
卡塞尔	1899	《全部国家学说》杂志上的文章

级，就像我们现今在教室里所做的那样，把他们区别为（例如）“了解法则”和“不了解法则”两大类（或许在“了解法则”这一项下再分两个等级：“承认法则”和“反对法则”）。既然忘记和改变主意大概是不寻常的，单独一个日期通常就能表示每个人的特性：即他第一次显示他了解这种法则的那年（或那天）。在表1中，我们提供了1860—1900年间一些主要理论家（包括效用问题专家）的统计数字。日期以各种书刊为根据；根据信函、回忆录等往往可以推断出一个较早的日期。

表1中列出的经济学家第一次承认效用论的中间日期是1884年，但是那些人当中有几个是在此以后才开始就经济学问题著书立说。㉔理查德·豪伊教授在他的论文《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870—1889年》中提供了一张列有许多1890年以前写过关于效用问题的文章的不太重要的著作家的名单。㉕

表2　边际效用论文献中的一些主题

1. 效用和需求函数之间的明确关系。
2. 递减的边际效用对需求曲线形状的影响。
3. 收入的边际效用的不变性。
4. 根据效用来解释互补性。
5. 具有添加性效用功能时效用的可测量性。
6. 具有非添加性效用功能时效用的可测量性。
7. 无差异曲线方法。
8. 埃奇沃思困境。
9. 可积性的问题。
10. 斯卢斯基方程：收入和替代效应的分离。

如果我们提高对效用论的专业知识水平的要求，就会遇到一套比较晚的日期。表2列出了一种比较复杂的知识标准的一些可能的成分。即使要得到效用论的这些成分中的一项知

识，也会把表 1 中任何一年的经济学家减去也许四分之三。但是我认为，我们的简单的效用法则足以证明下面的这些说法：

1. 这个时期中，凡是认真地和专业地研究效用论的经济学家差不多每个人都具有学术的基础。仅有的重要例外是奥斯皮茨和利本、巴伦尼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威克斯蒂德。
2. 这个时期中还有不少的非学究式经济学家——除了刚才提到的那几位——并不忽视这种理论。这份名单会包括吉芬、博纳、法勒、希格斯、阿克沃思、韦布夫妇、帕尔格雷夫、霍布森、巴奇霍特、麦克利沃德和戈森。㉖ 在学术研究岗位以外的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家，都是一些基本上和"实用的"以及着重政策问题有关系的人物，这一点并非出于巧合。
3. 到这个理论以即使是这种初步形式普遍地被理论家了解的时候，这门科学正在迅速走向学术研究的特性。就英国主要的经济学家来说，如果我们用他们的平均出版年作为他们的年代，就会看出学究式人物参加的人数在增多，如表 3 中所示。㉗ 在美国出现了一种类似的格局，在法国也许更早一些就达到学究式经济学家居于支配地位的情况（参阅本文末的注解）。

表 3　主要经济学家和学究式人物的数目

时　期	总数	学究式人物
1825—1850年	14	0
1850—1875年	10	3
1875—1900年	7	2
1900—1915年	8	5

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德国这个世界上主要的讲究科学的国家竟然没有一个重要的效用理论家（虽然劳尔哈特应该受到注意）。和这一出人意外的事实有一些关系，德国的经济学在几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之前就有了固定的、占优势的学术基础，这就是效用论在德国如此被忽视的原因。

门格尔对德国主要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对于效用论在德国被人接受简直没有帮助㉘，但人际关系最多也只是德国对效用论的冷淡态度的一个次要原因。德国的经济学确实是渊博的；它对学问的重视，以及它那种细致的、高度专门化的历史研究，肯定不是为了需要在现实世界中使用经济学。然而，德国的经济学有一种深刻的反理论的态度（这一点我不打算解释）；历史和法学这两个学科——而不是物理学和生物学——是社会科学方面科学工作的模式。《方法研究》一书确实是施莫勒对门格尔的一部著作的评论引出来的㉙。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学派的领袖的并列是象征性的：效用论是第一个形式逻辑的、抽象的和（除了门格尔那样）用数学表达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它强调向自然科学模式发展的趋势，其强调的程度即使是古典学派的吃苦耐劳的理论也无法比拟。一个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可以钦佩斯密和穆勒，而在李嘉图身上发一通反形式逻辑的脾气。有了效用论以后，形式逻辑的理论对历史传统的挑战变得明显了。英国的历史学派在敌视效用论方面态度同样坚决。㉚科学的和历史的方法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两方面都认为应摆脱眼前的应用性、而着重于治学方法以及理智工作本身的学术性价值。总之，这种矛盾是经济研究的策略上的矛盾。

在常规分析中使用效用论

表4 《政治经济学杂志》和《经济学季刊》上关于效用论的讨论

	1893年	1903年	1913年	1923年
1. 主要的专门讨论效用的文章的篇数	2	2	1	4
2. 占全部文章的比数	2/35	2/36	1/66	4/62
3. 带有非浅薄的关于效用的讨论的文章	2	1	0	1
4. 浅薄地提到效用的文章	2	1	0	0
5. 用于讨论效用的篇幅（页数）	54	68	32	93
6. 占全部页数的百分比	6.7%	7.1%	2.5%	6.4%

在一门科学中创立新理论的人致力于研究一个问题，是一回事，这个新理论要成为这门科学的有能力的实践者的工具，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效用论在被引进经济学以后的大约60年内在经济理论家中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题目。表4说明美国经济学杂志对效用论是否重视的大致情况。有两个特点很突出：一是人们对效用的兴趣不大，二是在这个表所包括的30年中这方面的兴趣没有明显增加的趋势。

无疑，在这个时期中效用不是经济学家的研究手段的一部分。著述关于税收、贸易、劳工或者这一类题材的文章的经济学家，并不把效用功能引进他的分析以作为一种发挥主题的方法。论述其他课题的理论作品中不提起效用论这一现象，又继续存在了20年。1940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中没有一篇文章以任何方式用到效用论。效用论的应用只是在最近20年才开始出现。对1970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中的文章作了一次同样的检查，发现有15篇关于其他主题的文章在分析中提

到并利用了效用功能。经济理论家给予效用论实际的承认，是边际效用革命以后几乎一个世纪的事。可见，科学的演变是缓慢的。

4. 结　论

我希望，这些一鳞半爪的证据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以上提出的关于主要经济理论家采用边际效用论的时间的解释。根据随着这个学科的学术研究性越来越浓而产生的新价值来解释效用论，还有另一种优点，即似乎没有任何重要的可以和它相比的解释。

无论人们对现在这种论点的说服力怎样看法，关于科学采用种种理论的说明，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但被忽视的课题。只要我们同意那些看法，即认为一门科学中有一些居于主导地位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被一些通常由许多人单独发现的新理论所取代，我们就是把科学理论方面的变化作为一般的科学问题来对待。我们不一定同意库恩的那种特殊的科学变化的顺序，但是我们不能再仅仅默认天才过着它自己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和无法预言的生活，也不能认为偶然提到当代的理智现象或社会现象，就是对某些特殊变化的一种值得尊重的说明。

经济学说史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差不多将要消亡的学科，并且在别处也日益衰落。因此值得我们高兴的是，支配一门科学的进化的那种非常复杂而微妙的力量提出了一项理

表 5　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1850—1915 年

平均出版时期	经济学家的人数：总数	经济学家的人数：学究式人物
1850—1875年	4	3
1875—1900年	14	7
1900—1915年	23	21
1915年和以后	9	9

姓名		
Adams, C.F.	George, H.	Seager, H.
Adams, H.C.	Green, D.I.	Seligman, E.R.A.
Anderson, B.M.	Hadley, A.T.	Smith, J.A.
Atwater,L.H.	Hoxie, R.F.	Sumner, W.G.
Bellamy, E.	Johnnsen, N.	Taussig, F.W.
Bowen, F.	Johnson, A.S.	Taylor, F M.
Carey, H.	Kinley, D.	Tuttle, C.A.
Carver, T.N.	Kleene, G.A.	Veblen, T.
Clark, J.B.	Laughlin, J.L	Walker, A.
Commons, J.R.	MacFarlane, C.W.	Walker, C.S.
Cooley, C.H.	MacVane, S.M.	Walker, F.A.
Davenport, H.J.	Mitchell, W.C.	Wells, D.
Del Mar, A.	Moore, H.L.	Will, T.E.
Dunbar, C.F.	Moulton. H.G.	Wood, S.
Ely, R.	Newcomb, S.	Wright, C.D.
Fetter, F.A.	Patten, S.N.	Young, A.A.
Fisher, I.	Perry, A.L.	

论说明的任务，它在理智的要求方面可以和实际经济生活提出的任务相媲美。

注：经济学在美国和法国的学术地位

人们曾初步研究过在美国和法国经济学家成为学究式人物的程度。③

从约瑟夫·多夫曼的《美国文明中的经济思想》第3卷(纽约，1949年)中引用了一份美国经济学家名单，又从C·吉德和C·里斯特的著名法文教科书《经济学说史》中引用了

表6 著名的法国经济学家，1800—1925年

平均出版时期	经济学家的人数 总数	经济学家的人数 学究式人物
1800—1825年	4	2
1825—1850年	7	3
1850—1875年	8	5
1875—1900年	2	2
1900—1925年	5	3

姓名

Aftalion, A.	Cournot, A.	Proudhon, P.J.
Aupetit, A.	Dunoyer, C.	Rossi, P.
Bastiat, F.	Dupont-White, C.	Saint-Simon, C.H.
Blanc, L.	Dupuit, J.	Say, J.B.
Blanqui, J.A.	Fourier, C.	Simiand, F.
Cabet, E.	Garnier, J.	Sismondi, S. de
Chevalier, M.	Landry, A.	Walras, A.
Colson, C. L.	Le Play, F.	Walras, L.
Courcelle-Seneuil, J.	Leroy-Bearlieu, P.	

相应的法国经济学家名单。法国的名单范围较窄，比较严格地限于理论性的经济文献，因此或许偏于提出过多的学究式经济学家。就每一情况来说，各个经济学家的平均出版时期是根据通常的百科全书计算的，经济学家则是以担任或者不担任学术性职务来区别的。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

美国的格局大致和英国相似，其中学究式经济学家到20世纪初期仍占压倒的优势。1900年以前没有几个经济学家对效用感兴趣，实际上德国式的训练普遍流行，以致把或多或少的历史循环论和反理论思想逐渐灌输到美国经济学中。②

法国的名单似乎人少并且是有偏见的：著名经济学家的人数应该和一个国家的这门科学的水平几乎没有关系！无论实际情况如何，这个例子表明在法国学术研究的基础比在英语世界中建立得更早，也更为牢固。

注　释

① J.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ed. J.H.Burns and H.L.Hart (London, 1970), p.11.

② "……很明显，有些时候一定数目的钱对一个人的价值比同样的数目在另一个时候的价值大得多：例如，在一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个人恰恰需要非常大的医药帮助"(«导论»，第59页)。需要很大的医药费支出，也许不会提高一定数目的美元的边际效用，如果把健康效用计算在这个人的总效用之内。

③ 同上书，第166页。利益"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利益，而且也是快乐"(«导论»，第166页注)。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话，在边沁一生中没发表过，它说得非常明白："如果我口袋里有一枚5先令的硬币，当时我并不口渴，因而在犹豫是不是应该买一瓶红葡萄酒给自己喝，或者用这个钱接济我见到的一个因为无人帮助而快要饿死的人家（就长期来说，这样对我更不好）。但是，显然，只要我继续犹豫不定，这两种快乐(一

种是口腹的享受，另一种是同情的愉快）对我就是完全相等地值5先令。"

"在这里我有必要请求我们的多情之士暂时休战，而且只是由于必要，我自己讲并敦促人类讲一种钱财的语言。寒暑表是测量天气温度的工具；气压表是测量空气压力的工具。那些不满意于这些工具的精密度的人，必须寻求较为准确的其他工具，否则就向自然哲学告别。钱是计量痛苦或快乐的工具。"参阅 C.W.Everett, The Education of Jeremy Bentham (New York, 1931), pp.53-36.

④ Betham, Introduction, p.168.

⑤ 同上书，第169页。

⑥ 同上书，第170页。

⑦ 同上书，第174页。

⑧ Betham, The Theory of Legislation, trans. Hildreth (London, 1864), esp. pt. 1, chaps. 6, 16.

⑨ J. Betham, Rationale of Judicial Evidence (London, 1827), 5:656.

⑩ D. Bernoulli, "Exposition of a New Theory on the Measurement of Risk", Econometrica, 1954; 此文第一次发表于1738年，参阅我的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pp.108 ff。

⑪ 因为这些结果的概率分别是

$$1/2,\ 1/4,\ 1/8,\cdots\frac{1}{2^{n+1}}$$

并且 n 无穷大的预期增益是

$$(1/2)1+(1/4)2+(1/8)4+\cdots+\left(\frac{1}{2^{n+1}}\right)2^n+\cdots=\infty$$

⑫ Bernoulli, p.25.

⑬ 求积分，即得 $U=b\log(W/a)$。如果赌博者最初的财产是 W，他赢得 2^{n-1} 金币，则他在效用上的增益是

$$b\log\frac{W+2^{n-1}}{a}-b\log\frac{W}{a}=b\log\frac{W+2^{n-1}}{W}$$

他从参加赌博中预期增得的效用是

$$\frac{b}{2}\log\frac{W+1}{W}+\frac{b}{4}\log\frac{W+2}{W}+\cdots$$

$$=b\log(W+1)^{1/2}(W+2)^{1/4}\cdots-b\log W$$

会产生等于预期从赌博中赢得的效用的数目 D 是

$$D=(W+1)^{1/2}(W+2)^{1/4}\cdots-W$$

如 $W=10$，则 $D=3$；如 $W=100$，则 $D=4$；如 $W=1000$，则 $D=6$。

⑭ J.B.J.Fourier, "Extrait d'un Memorire sur la Theorie analytique des assurances", Annales de Chemie et Physique, 2d ser., 10 (1819):177-189.

⑮ L.A.J.Quetelet, Letters addressed to H.R.H. The Grand Duke of Saxe Coburg and Gotha (London, 1849), Letter VIII.

⑯ A.A.Cournot, Exposition de la theorie des chances (Paris, 1843), pp.93, 106-109, 334.

⑰ G.L.Leclerc de Buffon, Essai d'arithmetique morale, in vol.21 of his Histore naturelle (Paris: Dufart, I'an VIII).

⑱ M. Longfield,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1834; reprint ed., London, 1931), pp.27-28, 45-46, 111 ff.

⑲ "The Nation of Value", reprinted in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Journal Supplement, May 1927.

⑳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1939), pp.11-12.

㉑ J.B.Say, Melanges et correspondence (Paris, 1833), pp.116-117, 287-289.

㉒ 这种见解由 R.K. 默顿用强有力的辩论证明，并且实际上说得略微过分一些，参阅 R. K. Merton, "Singletons and Multiples in Scientific Discovery: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05, no.5 (1961). 又参阅拙著: "Does Economics Have a Useful Past?"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69):225-227(chap. 10, below)。

㉓ Wicksteed, review of Das Kapital, reprinted in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934), 2:705; Fisher, Mathemat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Prices (1892).

㉔ 那些较晚的著作家是帕雷托、巴伦尼、卡塞尔、威克塞尔、坎

南和费雪。

㉕ 一个有趣的姓名是G·B·肖，他在一篇评《资本论》的文章中使用了边际效用论（该文1887年发表于《民族改良者》杂志）。他的老对头H·M·海因德曼曾对肖之未能攀登逻辑分析的高峰提出一种解释："真可惜，肖竟然阻碍了自己思想的自然发展，而由于他吸取了非常讨厌的不适当的东西，把聪明才智浪费在无聊的小玩艺上面。……现在你们把肖找来，给他吃几个月巧妙配合的和细心烹调的鲜美肉食，在他那种可怕的艺术的各个部门配备一位手艺高明的法国厨师，给他规定结实的皮革制的盛酒器，或者更好是，最高级的法国葡萄酒，如果出生于一个丰年，肖的理智的成就会立刻提高无穷倍。"参见Further Reminiscences (London, 1912), pp.233-234。

㉖ 这些人之中有几个人的著作里可以看到一些对效用论的猛烈攻击。

㉗ 参阅我的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Chicago, 1965), p.38. 1915年以后，要在研究院外面找到重要的英国经济学家，就相当困难，霍特里和斯坦普除外。

㉘ 门格尔的《历史主义的错误》（维也纳，1884年）一书中对施莫勒的攻击，可以被引证："出于友好的关心，你曾告诫我，和施莫勒的争论不仅有科学的一面，而且有一个很不同的方面。在德国或者也许在任何地方，没有另一个学者在和一个反对者争论时像这样不负责任地选择手段。也许有人会用各种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意思来解释我的话，并且我本人刚得到令人震惊的证明，施莫勒在人身攻击和粗野庸俗这些方面同样是能手——顺便说一句，这可以说是他擅长的唯一的文学本领。"

"我的朋友，当你把跟施莫勒进行的科学讨论看作不仅仅是一件科学的事情，你是对的；人们都知道他非常喜欢曲解别人的意思，同时又专门要参加科学的争论，尽管他不宜于参加。"（同上书，第6页）

"施莫勒在历史和统计方面的工作，无论如何是很不高明的；实际上我们对这位著作者可能要热烈得多，如果这些成绩出于一个商会的秘书、商业杂志的编辑，或者普鲁士省某一个城市的历史学会的秘书的手笔。这种来源的历史和统计作品，理论家使用时要适当地小心，以便保证资料的可靠性以及原作者的能力合格。显然这确实是一种不寻常

的现象，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从事于他不能充分掌握其专业技术的一种工作，而要求这种质量的工作差不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已经完成的工作。如果施莫勒因为这种著作而认为他自己当真是个历史家，那就简直可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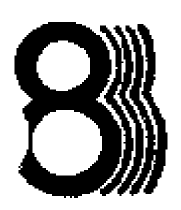
"确实，施莫勒这个例子不是十分令人难以了解的，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竟然会发展到放弃他自已的科学研究专业，成为历史学方面的一个外行的业余爱好者。"（同上书，第41页）

㉙ Gustav Schmoller, "Zur Methodologie der Staats-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Jahrbuch fu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7 (1883): 239-258.

㉚ J·K·英格拉姆认为杰文斯对效用的研究"事实上永远不过是学术性的玩物"。见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1888), p.234; 又参阅 T. E. Cliffe Leslie, "Jevons'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2d ed. (London, 1888), pp.66-72。

㉛ 除了克莱尔·弗里德兰以外，我还要向T·比佐格鲁和彼得·卡恩表示谢意。

㉜ J. Herbst,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Scholarship (Ithaca, N.Y., 1965); also J.B.Parrish, "The Rise of Economic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The Formative Years to 1900",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July 1967.



以J·S·穆勒为例*，科学地应用科学人物传记

科学的发展日益被看作是科学本身的问题：科学是怎样演进的？原因何在？科学只有在托马斯·库恩所说的那种著名的革命性转变过程中才会容纳剧烈的和基本的变化吗？真像罗伯特·默顿所说的那样，科学的发现几乎总是由学者们独立作出的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正确地表明，科学的演进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微妙而又复杂，但是却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而这种规律最终是能够被人们所认识的。

有关科学演进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是：对科学家生平的研究是否能够提供有关科学演进的有用知识？如果我们只知道M先

---

*原载于James and John Stuart Mill: Papers of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edited by John M. Robson and Michael Lain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nto Press, 1976)。

生在1848年写了一本题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书，而且后来又作了6次修订，我们是否就不太能够充分地理解这本著作的内容和作用呢？的确，如果我们不能肯定M先生在1848年革命后是否还活着，那么极有可能这些修订是由某位聪明的冒名者进行的，这样我们是否就不能够充分地理解这本著作了呢？

也许有人会断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眼前：信息总是越多越好，由此可见，人物传记中的信息肯定会增加我们对科学的理解。但是，正如马歇尔对经济学所下的断言那样，任何简短的回答都将是错误的：我们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信息的成本决不会等于零，因此，信息少一点或许反而更好一些。更具体地说，科学人物传记的数量已经非常庞大；试问，这些传记是否并没有增强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甚至造成了某些误解呢？我们需要更细致地考察这一问题。

1. 习惯做法

通常用人物传记来解释科学著作的做法是十分笨拙和令人惊讶的。没有其他领域比传记更缺乏科学性的了，这些传记只是不完全地表现了在运用精选的例子、隐含的荒谬和对证据的厌恶等方面的简便性甚至通俗性。这些言词似乎过于苛刻了，但是我打算通过实际运用穆勒的生平来解释他的经济理论的例子来为上述言词提供佐证。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对例证的选择并不受对漫不经心地使用穆勒传记的文献的某种

特殊偏爱的支配，而是仅仅取决于在他去世一个世纪以后纪念重建他的科学地位的恰当时机。

利用传记的最简单的形式是：为了理解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熟悉作者的自传。”① 不幸的是，传记知识在加强理解方面的作用并不明确，因为也许人们必须知道历史学家（在这个例子中是科萨）的生平以理解他所表达的思想。对所谓“厌恶证据”的问题就讲这些。

莱斯勒·斯蒂芬在他的著作中提供了有关隐含的荒谬性的早期例子：“写作此书（指《政治经济学》）的速度表明，它并不包含着对其最初原理的任何修订。”② 一本书中的独创性和非正统性总是与作者在写作（就此而言，或者说在构思）上所花费的时间成正比（或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时间的递增函数）。这个教条如果说并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谬论的话，那确实是一个精彩的假说。莱斯勒·斯蒂芬曾经评论过，穆勒花了大量的时间来从事《逻辑学》一书的写作。他说：这本书的写作是从1830年开始的，而且那本论述演绎推理的书或许早在1832年就开始写作了，但是直到1842年才完成手稿。斯蒂芬是不是说这本著作的写作时间超过10年（而《政治经济学》只花了2年时间），于是其质量也相当于最初的5倍呢？不。“它与以后的著作之间更多的是一致而不是分歧。基本的原理得到了发展而不是被取消了。”③ 由于这一断言也适用于《政治经济学》一书，因此，斯蒂芬所能推断的仅仅是，穆勒或许在1842年到1847年的某个时间进修过快速写作的课程。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描述了准备时间与结果之间的不那么精确却是十分肯定的联系：“对穆勒作品的批评不能忽略以下事实。在他参加正式工作前的一小段空闲时间里，穆勒就

那些已被大思想家们所讨论过的广泛问题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无论他的思想中存在着什么缺陷，他在几乎每个问题上的思想都包含着某些方面的新内容。因此，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精细地解释他的思想。”④撇开穆勒只有很短的空闲时间这一断言中的错误以及马歇尔此言是在为他自己后来在出版工作中难以置信的拖延作辩解(是在1876年，那一年他发表了那篇论述穆勒的论文)的因素不谈，人们会坚持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穆勒有大量的时间。在《原理》发行第1版到最后一版的23年里，他有足够的时间来修正他未能确切表达的观点。马歇尔也在尽力使穆勒少受人们的批评，这是一项必须经常重复进行的工作，但是，这并不要求基于如此荒唐的理由而回避穆勒在分析上的缺点。⑤(那些抱怨穆勒的著作缺乏连贯性的三、四流甚至更次要的经济学家——似乎他们有能力评论穆勒的著作——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致很难把他们一一列举出来。)

弗朗科·特雷沃(穆勒著作的一名法国编辑)发现，除非十分熟悉穆勒本人的生平，否则人们就无法理解穆勒对马尔萨斯学说的观点。特雷沃说，这个岛国的居民本能地害怕人口过剩，而且穆勒的父亲把这一担心传给了他。此外，“一个家庭有9个孩子的现实向他证明了大家庭所带来的是不便而不是愉快，”⑥“自然，他没有生儿育女”。⑦

如果我们能通过詹姆斯·穆勒所掌握的情况来解释约翰·穆勒的某种观点，那么我们将发现老穆勒在《政治经济学精义》一书中所论述的全部学说都在他儿子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得到了重新的表述。实际上，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下面我们还要讨论这一点)，而我们现在还未涉及

到实际上哪些学说会被继承下来这一任务。如果詹姆斯·穆勒非常信服马尔萨斯的学说并且有了9个孩子，那么为什么他儿子抱有类似的观点(和更多的收入)却没有子女呢?(詹姆斯·穆勒非常熟悉1805年8月20日出版的那本著名的《人口论》，根据我的推算，那时斯图亚特尚在母腹之中。)⑧然而，我必须给特雷沃一个公正的评价：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有1个兄弟和6个姐妹，我估计如果相反他是有6个兄弟和1个姐妹的话，还会早几年提出他的理论。

欧文顿·泰勒已经在一段文字(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专业性的，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传记性的)中发现两个明显的重迭部分，正如我们将要指出的，它可以解释体现在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各种版本中的一个重要倾向：

>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先后发行的几版《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穆勒充实并越来越多地强调了他在评论“社会主义”时的那种赞同性倾向。毫无疑问，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的思想正在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或许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讨厌一个保守派评论家对该书第一版的不着边际的奉承。那个评论家基本上把穆勒的那本书看作是对当时英国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优点以及自由放任原则的有力而正统的证明，而有关“社会主义”的那几章则不过是要对它进行指责和反驳。在一本已经出版的杂志中，穆勒对这种评论进行了愤怒的回击和反驳，声明他反对那个评论家对他的评论和态度……⑨

对下述问题人们无需进行辩论：(1)穆勒对社会主义越来越多地持一种赞同的态度；(2)评论家以及(3)穆勒对他的反驳，虽然泰勒的意见在这三个方面受到了严厉的批评。⑩甚至在作了这些让步的情况下，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极其特殊的关联：一个评论使得穆勒连续几次修订了他的论著。无疑，

穆勒（还有泰勒）应当已经看到了所有评论家和读者的反映：如果他们通常都夸大了穆勒对社会主义的赞扬，他就应该修改他的正文以对社会主义作出更多的批评。

当然，并非所有运用穆勒的生平来进行分析的做法都那么不可靠。现在我们继续分析另一个相当不错（但并不令人满意）的传记解释法。我们从埃德温·坎南开始，他有着敏锐的头脑，里面储存着丰富而准确的古典经济学知识：“（从1830年到1844年间）穆勒的头脑虽然极其活跃，但是他似乎还没有想到建立科学的经济学的问题。当一个人对一门学科进行研究和思考时，他是不会拾起已在抽屉里搁了14年之久的废旧手稿，并且仅作几个文字上的修正就拿去付印。”⑪这段话暗指《论悬而未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一书把问题过分地简单化了。那5篇论文只讨论了经济学中的很少一部分问题，也没有就穆勒的其他著作提出例证。而且，在一个人已经完成了他的手稿的情况下，如果手稿中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他所信服的，那么他就可能会不加修改地予以发表。确实，除非进行细致或全面的修订，否则是很难作出中间选择的。⑫

穆勒对他那位执拗的父亲的反抗受到了像瓦伊纳这样的博学之士的重视。⑬ 在纪念穆勒的《原理》问世100周年的时候，瓦伊纳发表了一篇非常奇特的论文，但它的主题却是为边沁作辩解。瓦伊纳以穆勒的父亲1836年的去世来解释穆勒对边沁的评论。这个解释可能会得到很好地纠正（只有穆勒本人才会使用这个解释）⑭，但是它并没有什么价值。除非人们（包括哈里特·泰勒）系统而确切地归纳出詹姆斯·穆勒那些被他儿子所重视的观点——小穆勒非常自信地不同意他父亲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否则就不能解释任何问题。如果约

翰·穆勒在感情上对詹姆斯·穆勒的挂念显得随机可变，那么，用抛硬币的办法也一样能够解释约翰·穆勒观点中的矛盾。

我要举的关于错误运用人物传记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本人。我不打算求助于他那个著名的关于不可能（即不可能估价哈里特·泰勒对他本人和他的著作的影响）的观点。⑮ 我选择穆勒从为东印度公司服务中所得到的好处作为例子：

> 我倾向于同意已被他人猜测过的内容，即我的官方地位赋予我通过亲自观察处理公共事务所必备的条件来进行学习的机会，这个机会对于作为那个时代的舆论和制度的理论改革者的我来说是十分珍贵的。的确，为了能对地球的另一边产生影响，并非所有纸上谈兵式的公共事务本身都能提供大量的实用生活知识。但是，这一职业使我习惯于耳闻目睹每一阶段上出现的困难和消除这些困难的手段，并且从一种实施的角度着眼来进行谨慎的陈述和讨论；它也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了解在什么时候公共措施和其他政治现实并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以及其原因何在…… 我能够因此而很好地通过某种方式来进行观察，这种方式能够最容易地把某种思想灌输到些由于传统习惯而并不准备接受这种思想的人的头脑中去。然而，我已经在实践上熟悉了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困难、妥协的必要性以及丢卒保车的艺术。⑯

如果穆勒是正确的，那么，由于他的经历，他是一位不寻常的、成功的、思考型的改革家。据我所知，还没有发现支持（或否定）上述结论的证据。如果他已表现出对土地国有化、有限责任公司和其他不同背景的经济学家所不曾提出来的政策问题的关切，我们也许会对他的观点进行某种程度的检验。正如这种检验将会表明的那样，以上断言都是并没有

什么意义的。

2. 问 题 所 在

什么是人物传记？如何把它与科学的发展区别开来？无论是尖端科学的作者还是基础科学的作者，他们都是有知觉的人，他们不能完全摆脱工作中的希望和烦恼、友谊和仇恨、消化不良和饮酒过量——即使他们比平常更努力地工作。然而，那张限制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域的死亡之网并不是科学；科学是由那些使别的人接受或拒绝接受科学观点的论点和证据所组成的。科学是一项社会事业，在科学家的生活中，那些并不能影响他和同伴之间关系的部分是超出了科学的范围的。当我们被告知必须研究某个人的生平来理解他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时，那我们就是在被要求放弃科学。穆勒的同时代人并不全知道他的个人生活，只知道他是个很少朋友也很少社会活动的人，但这未必会影响他们对穆勒著作的理解，并且如果我们想要理解 19 世纪的经济学，有关他的生活细节将不会影响我们对他的著作的理解。科学信息的接受者就是那些确定哪些是信息的人，如果不能对这些接受者产生影响，即使是天才的智慧，也无法起到影响科学发展的作用。

即使从科学交流的角度来考虑，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以便于对这个人进行了解，特别是，某些词句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该了解斯密先生究竟是指亚当·斯密还是指别人，比如，悉尼·斯密等等。简而言之，

要理解一名科学家，就应该像他的同时代人那样来理解他。这种理解当然无需传记来提供多少情况，传记是写给范围广泛的读者看的。的确，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知道，对别人的私生活感兴趣的人是多么少。

因此，我坚决不同意最杰出的经济学说史专家之一威廉·雅费那谦和而引人注目的相反观点。⑰当他抱怨那些“不愿花费力气去理解李嘉图或马克思到底想说什么”的人时⑱，我回答说，如果要理解某些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演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那么学者们在他们的传记上下一点功夫是完全正确的：这种作用是由他们所写下的文字而不是由他们所要表达的思想来完成的。

即使人们接受我的看法，也无法从中推断出人物传记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对于以前的评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矛盾——它指出了理解某个人的科学著作（按照它问世时的原样）和理解科学的演进过程两者之间的区别。在我引证的这个句子之后，雅费继续写道：“他们（指那些对经济学说史有所涉猎的人）也根本没有兴趣去探索诸如李嘉图或马克思是如何或为什么形成他们的理论这样的问题。他们对一种理论是如何和为什么在它第一次被阐明的时候就被接受或拒绝这一问题就更是漠不关心了。”也许有那么一些人受这些可笑的信念的驱使而涉猎经济学说史领域，但是这种信念并不来源于以下观点，即传记所提供的详细的知识与如何理解某个人的科学著作并无关系。

科学学（即所谓科学社会学）显然与以下一类问题有关：即，为什么有的科学发现被很快地吸收而其他的发现就不可能呢？为什么经济科学在英国获得了繁荣而在法国却衰败不

堪？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创新者需要全面接受公认传统的训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们必须从那里而不是从科学著作的内容中去寻找传记研究的潜在作用。

传记是一种信息，但又不仅仅是一种信息，如果确实如此的话，则在某种程度上任何信息都是自己的代言人。我希望，人们对在一个人的生平和他的思想之间的和谐之中所包含着的假像已有足够的重视。

对传记搜集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且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文学传记。不过，相对来说，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这一技巧在科学史上得到了令人感兴趣的应用。⑲我又是略微利用了一下传记中的资料来确定经济学是何时进入大学的课堂的⑳，而且毫无疑问，其他的例子也是存在的。

显然，要提出一份人物传记比较研究的清单是并不困难的，其数量之多，种类之繁，令人叹为观止，例如，要了解经济刺激对学术工作所起的作用就要求采用传记研究的一种比较办法；要了解选择研究院对一个人的知识能力甚至学术生涯的影响也是可能的，而且，我目前也确实在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参阅本书第 17 章)。

不过，我不想再接着谈论这个"购物清单"了，本章的其余部分将用于讨论如何系统利用某个人的传记的问题。

3. 两 个 穆 勒

一般人都认为，老穆勒向他儿子灌输的是李嘉图—斯密

的经济学，而这一点成为小穆勒构造更新颖和更完善的经济学的重大障碍。我们已经在一个更为特殊的水平上碰到过这个问题，即 1836 年詹姆斯·穆勒死后，约翰·穆勒公开放弃了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某些信条，而这些信条都是他以前不愿公开加以拒绝的。

而且，由于两个非常不同的原因，对这种灌输的做法的指责是并没有什么力量的。首先，如果约翰·穆勒学习的是李嘉图和斯密的经济学，那么他所接受的就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经济学教育。人们会争辩说，科学家正是由于受了他那个时代最先进的科学知识的全面训练才在后来的工作中受到阻碍的，虽然这一观点十分流行，但我还是认为难以置信。穆勒能够做出贡献，他并不是不能做到这一点。这并不是说可以从斯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那里找到 1817 年的全部有功力的经济学。具体地说，J·B·萨伊对循环流量和一般均衡都有过十分恢宏和现代的见解，不过他没有力量将其推进到一个可以进行分析的水平。但是，无论是穆勒的同时代人还是现代经济学家都必须承认，他接受了他那个时代的主导经济学的训练。

第二个理由也使得对灌输做法的指责显得苍白无力。詹姆斯·穆勒投入了全部身心去追求"真理和逻辑"而没有向任何人——除了那个他默默钟爱的儿子——教授那些严谨的大师们所不同意的东西。当然，还必须说，詹姆斯·穆勒不仅坚持了真理，而且他相信他的努力是会得到报偿的，就这一问题而言，他只是在相互尊重的程度上与我们这些凡人不同。让我们看看小穆勒的《自传》中的一段话："我父亲决不会允许我去学习那种只能锻炼记忆力的东西。他努力使我不仅是按

照他教学中的每一个步骤来进行理解，而且只要有可能，就超过它。只要是通过思考能够弄清楚的内容，他就决不会告诉我，直到我绞尽脑汁搞懂为止。”[21] 对于詹姆斯·穆勒来说，看到儿子反驳自己的理论无疑是一件既痛苦又甜蜜的事，但是，我怀疑，这种甜蜜又是其痛苦程度的近似反映。

在确定詹姆斯·穆勒对他儿子的经济学的影响时，我们应当区分两种层次上的潜在影响。第一种是詹姆斯·穆勒特有的学说（对李嘉图经济学的扩展和背离）对他儿子的影响，这一影响是很容易确定的；第二种是李嘉图学派所共有的学说对他儿子的影响，在这一方面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李嘉图学说的背离从科学上说是更加根本性的也是更少个人色彩的。

在《政治经济学精义》(1826 年第 3 版)一书中，詹姆斯·穆勒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作了刻版、但不那么精确、也不那么吸引人的解说，并进行了很大的修正和改进。[22]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詹姆斯·穆勒在知识上从李嘉图、马尔萨斯和斯密那里获益匪浅（“我声明：我并没有作出任何发现”），但是他仍然在很多问题上背离了他们的学说：

1．穆勒根据一种基本上是演绎的办法得出结论说，资本的增长不可能赶得上人口的增长。其论据不那么令人感兴趣：即，拥有超出生存水平的收入的富人缺乏储蓄诱因，而许多有这类收入盈余的人也缺乏储蓄的必要性（同上书，第 52 页以下）。（至少，就能够正视被古典经济学家们忽视了的问题——为什么资本的增长比人口的增长慢——这一点来说，穆勒是值得称赞的。）

2．物品的相对价值完全是由直接或间接地在生产过程

中耗费的劳动(通过资本)来决定的(同上书，第96页以下)。酿制陈酒的利润也是衡量劳动的真正尺度。穆勒的这种观点完全是一种胡说八道或者说是同义反复。

3．穆勒赞同银行券发行中的自由竞争(同上书，第152页以下)。李嘉图并不反对这一想法，但是他并不像穆勒那么积极。

4．穆勒指出了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之间的区别，实际上这一区别比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别更大(同上书，第220页以下)。生产性消费是指为维持一个人的生产能力所必须的耗费，而非生产性消费则是指超出生产性消费之外的消费。

5．穆勒对萨伊定律有两点见解，他很可能是这一方面的一个独立的发现者。㉓在《保护商业》一书中，穆勒提出了以下命题：如果总产量中的各种物品组合得当的话，它们总是能够卖出去的。如果他再加上一句"以相当于成本的价格"，那么这就是一种均衡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精义》一书中，他(像萨伊通常所做的那样)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算术恒等式。他把一个人的供给定义为这个人所没有消费的那一部分，并指出供给是需求的"手段"，因此，对每个人来说(对每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供给等于需求(同上书，第228页以下)。穆勒接着又在分析中重新引入了使个别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相等并影响生产格局的价格运动(同上书，第233页以下)，使他的早期观点得到了改进——因此这非常接近于李嘉图的观点。所以，尚不能断定穆勒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究竟是李嘉图式㉔的还是萨伊式的。

6．穆勒赞同对土地的未来增量实行社会化，或至少是重

税化(同上书，第248页以下)。这是一项岁入的来源，根据他那简化的地租理论，这项岁入不产生任何分配上的效应，其价值完全不依赖于任何地主的努力。

7. 与那种短期的一般收入(如薪金)相比，对更为持久的收入来源(如地租)应该加重征税。对收入的课税实际上应当以资本的价值为基础(同上书，第270页以下)。

在以上的创新之见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忽略了第一条又反对了第二条：无论是在《论悬而未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还是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都不存在纯粹的劳动价值论或在储蓄问题上的那种模棱两可的演绎的观点。[25]他赞同银行券发行中的自由竞争，但也作了很大的修正。[26]他对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之间的区别也作了很有限的辩解。[27]在对待萨伊定律的问题上，小穆勒更清楚同义反复和定理之间的区别，比李嘉图和他父亲都要高明一些。[28]若干年之后，穆勒积极地将地租增量社会化的计划融合到自己的理论中去，[29]而且也接受了对非持久性的收入征收不同赋税的想法(而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人们通常错误地把这一点归功于他的儿子)。[30]除了一个例子外，这些正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根据当时经济理论的一般水平所吸收的一些正确观点。一个明确的错误在于对地租的增量实行社会化：两个穆勒都认为，对土地上的合理投资的征税不应比对其他收入或财产的征税更重，而且，如果土地市场能够有效率地运转(从而可以不带偏见地预测出地租的平均增量)，就会失去税收的源泉。

除了智力上的长处外，很难从别的角度来解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待詹姆斯·穆勒本人所作出的创新的态度：

他既没有系统地接受也没有加以拒绝，更容易解释的是为什么小穆勒会背离他父亲的理论，那是因为他更看重的是更为优越的理论而不是心理上的关系。还必须补充一点，在《政治经济学精义》第三版中，詹姆斯·穆勒回答了他儿子提出的批评，并修改了他在国际贸易和利润问题上的观点。[31]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只能说约翰·穆勒对他父亲的观点是持一种谦恭而不是捍卫的态度。要是能够弄清楚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这父子俩所广泛论述的其他主题（心理学、政府和印度事务），那将是十分有趣的。

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否对斯密—李嘉图经济学有一种盲从的问题可以很容易地解决。在较早的一篇论文中，我指出了穆勒在经济理论中的非凡的创造性，并且列举了他的六大贡献。[32]我还应当补充他的若干其他贡献，这里仅举两点：

1．穆勒在他18岁的时候写了一篇论述《谷物法》的论文，他在这篇奇特的文章中提出了补偿原则，这一原则成为福利经济学的一大支柱。

2．在更早的《论悬而未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一书中，他首创了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相互需求理论，这一理论也成为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基本内容。[33]

在经济学说史上，那种极富创造力的创新者只是极少数，穆勒完全有资格和斯密、马歇尔和埃奇沃思等人相提并论。

4. 结　论

科学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使对科学假设的客观检验变得科学化，经过这种检验，假设有可能被证明是不能成立的。我希望能说明一点，前面我已经超出了为方法论布道的范围，因为我并不认为为方法论布道有多少科学价值。但是，即使这种说教的作用很有限，我还是希望它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即提醒我们人们是多么容易把说明和证据相混淆。

注　释

① L. Coss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93), 330;其他一些思想史专家也作了同样的说明，如L. H. Hane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3rd, ed., New York, 1936), 443。

②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London, 1900), III, 161.

③ 同上书，第75页。

④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London, 1925), 120.

⑤ 其他一些人也对«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进行了同样的解释，例如，F. W. Taussig, Wages and Capital (New York, 1899), 217。把陶西格放弃工资基金理论的原因部分地归因于他与桑顿的友谊是过于牵强了(同上书，第248页)。

⑥ Stuart Mill (Textes choisis et Preface) (Paris, 1953), 30.

⑦ 同上书，第31页。

⑧ 他对«人口论»的第二版作了评论，参见 The Literary Journal, Dec. 1830; D. N. Winch, James Mill (Edinburgh, 1966), 447.

⑨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1960), 254-255.

⑩ 关于后两点，我可以简述如下：

(a) "评论"和"联合进步"(The Leader, 27 July, 1850, 416)，是附带的两段对穆勒著作的评论，署名"ion"："近来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首先承认了联合观点的合理性，然而却预示了随着刺激动物的因素被抑制或被消除而必然产生的空虚和单调"。ion 已就富人受无聊的驱使而成为"最后的制鞋者"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但是一无所获。

(b) 穆勒回答："共产主义的约束"(The Leader, 3 Aug., 1850, 447) 仅有一段较长的文字，署名"D"。它只是修正了他怀疑"合作的社会"的理由："现在我害怕的正是'合作的社会'中的这种约束，我所担心的是这种强求一致的压力将会更大而不是更小；人们将被迫按照使别人而不是使自己感到快乐的方式来生活；人们将生活在大多数人制定的规则之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并且任何人都不能逃避，也没有行动的独立性，因为每个人都是某个社会的成员，正是这一点(就像政治经济学中所争论的那样)使生活变得单调不堪；没有欲望的自由，而这个词的每一个含义都是好的。"

⑪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ories, 3rd ed. (London 1924), 390.

⑫ 因此，米尔顿·弗里德曼最先提出了一篇重要文章："本文写于1935 年，……我计划更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做到，所以这篇文章也就一直搁在我的档案里" "A Method of Comparing Incomes of Families Differing in Composition",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XV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52)。然而弗里德曼并没有对盛行政府干预的 17 年的经济学进行"研究和思考。"

⑬ "Bentham and J.S.Mill: The Utilitarian Backgrou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49. See The Long View and the Short (Glencoe 1958), 321.

⑭ Autobiography, ed. Jack Stillinger (Boston 1969), 123.

⑮ 同上书，第 145—160 页。

⑯ 同上书，第 52—53 页。

⑰ "Biography and Economic Analysis",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III, 1965.

⑱ 同上书，第225页。

⑲ 参见Lawrence Stone, "Prosopography", Daedalus, winter 1971. R·K·默顿的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Osiris, IV(Bruges 1938)一文是将此方法应用于科学的最早尝试之一，参阅J. Ben-David and R. Collins, "Social Factors in the Origins of a New Sci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6, 和H. Zuckerman and R.K.Merton, "Age, Ageing, and Age Structure in Science", in Ageing and Society, Volume 3 of A Sociology of Age Stratification, ed. M. W. Riley, M. Johnson, and A. Foner (New York 1972)。

⑳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Chicago 1965),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V, fall 1972(chap. 7).

㉑ Autobiography, 20.

㉒ 李嘉图将他本人不同意《政治经济学精义》的地方告诉了穆勒(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IX, 126—133)。不谈细节和评注，李嘉图解释了我所列举的第1、2、5和第6点差别。我忽略了穆勒的某些较次要的创新，诸如对区域价格水平的精彩的讨论等(见《精义》第174—176页)。

㉓ "Sraffa's Ricardo",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Chicago 1965).

㉔ 某些细节上的差异确实是存在的，因此，李嘉图承认，如果每个人都只消费必需品，就有可能造成供过于求，而穆勒则否认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形（同上书，第236页)。对于李嘉图的让步，参看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I (Cambridge 1951), ed. P. Sraffa, 292-293。在这一问题上我赞同穆勒的观点。

㉕ Essay IV of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Collected Works, IV (Toronto 1967), 293ff;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w, III 477ff(III, IV).

㉖ Principles, cw, III 682ff (IV, XXIV, 5).

㉗ Essay III of Essays, cw, IV, esp. 283ff.

㉘ Essay II of Essays, esp. 263ff.

㉙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Society, cw, V 689ff.

㉚ Principles, cw, III, 813ff(V, II, 4).

㉛ Autobiography, 108.

㉜ "The Nature and Role of Originality in Scientific Progress", 原载于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㉝ 雅各布·瓦伊纳讨论了穆勒的许多较次要的贡献（特别是对比较成本理论的贡献），参见 Jacob Viner,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New York 1937).



默顿论重复发现，否定与肯定*

每一门科学的研究都是由一个追求知识的内在结构发展的学者群体来进行的，而且，每一门科学都包含着一个理论的核心。这些群体使用诸如专业化和相互交流（我们把它同经济社会中的交换联系起来）这样的做法来检验公认的学说，拓展它们的适用性，并试图对那些用公认的学说无法解释的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科学的探索是一项社会性的事业，所以只有由社会成员来分享的知识才是科学的。正如在其他社会事业（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中那样，把社会的进步看作是少数英雄人物的产物的观点是十分肤浅的和容易

---

* 原载于 Science and Social Structure: A Festschrift for Robert K.Merton, Transaction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series 2, vol. 39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80)。

使人误入歧途的。

没有任何人比罗伯特·默顿更多地发展了关于科学和科学家的观点的内涵——的确，没有任何人如此接近于把科学研究作为一项社会事业。① （默顿的贡献是如此具有根本性，以致几乎构成了对他关于科学是一种社会事业这一论点的自我反驳！）在他所得出的所有结论中，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地说明了“原则上所有的科学发现都是重复性的，包括那些表面上看来是一次性的科学发现在内”。② 本文将考察这一论点，并把它看作是解释经济学方面的科学发现的一项原则。

1. 关于重复发现的命题

默顿并没有对他的这一论点作出正式的说明并提出证据，而是描述了科学中的各种现象和行为，这些现象和行为直接或间接地说明，很有可能任何重要的科学发现都并非一人所为。③

有关重复发现的各种例证包括，科学发现被证明都有或多或少的完整的预期，宣布某些重复的或接近完成的研究由于其他人的发现而被放弃，发表新成果的竞赛，以及获得和保护科学发现优先权的努力。这里简要地讨论一下与伊利诺·巴伯博士合作提出的有关重复发现的证据：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经济学中重复发现的清单，其中第一个无疑也在默顿的清单上，因为他引证了麦考利提出的观点：

1．“……现在已被政治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地租学说就是几乎在同时由两个没有联系的作者提出来的。”他们是T·R·马尔萨斯和E·韦斯特(1815年)。

2．杰文斯(1862年)、门格尔(1871年)和瓦尔拉(1874年)近乎同时发现了边际效用理论。

3．边际生产力理论是由马歇尔(1879年)、埃奇沃思(1881年)、斯图亚特·伍德(1888年)、威克斯蒂德(1894年)以及巴伦尼(1895年)、J·B·克拉克(1889年)发现的，无疑还有其他一些人。

4．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理论是由张伯伦(1934年)和J·罗宾逊(1932年)发现的。④

5．现代效用理论(包括斯卢茨基方程)是由斯卢茨基(1915年)、希克斯和艾伦(1934年)发现的。

6．比较成本理论的发现可归功于李嘉图和托伦斯(1815年)。

7．对工资基金理论的反驳是由桑顿(1869年)和弗朗西斯·朗格(1866年)进行的。

8．国际要素均等化理论的发现则可归之于勒纳(1933年)和萨缪尔森(1948年)。

此外，人们知道还有许多较次要的重复发现。⑤ 比如，在效用函数具有可加性时证明了存在一个可测度的效用函数(威克斯蒂德在1888年，费雪在1892年)；再比如，保罗·斯威齐(1939年)以及霍尔和希契(1939年)发现了断折的寡头需求曲线。

2. 重复发现的原理

在论述重复发现的这部基础性文献中，默顿基本上是用暗示的方法指出了存在重复发现的理由。在那些给这篇重要文献下结论的说明中，人们陈述了这样一点，即从长期来看，重复性的发现并不需要是同时出现的。有两种发现可以"在社会和文化的时间表上被看作是'同步的'或近似同步的"，这要取决于"它们所处的文化社会中的知识积累状况"⑥。

在一篇稍后发表的文章《作为战略研究重点的重复发现》中，这些暗示都得到了更为详细的说明：

> 重复发现是由独立工作的科学家发现的这一事实证明了以下更为关键的事实，尽管他们在空间上相距遥远，但是他们还是对冲击他们的社会和知识力量作出了同样的反应。⑦

在这篇文章中，重复发现被赋予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

> 通常一种新思想或新的经验发现在它后来被揭示或被独立地再发现并融合到一门科学中去之前就已经取得并公布了，只是不为其他人所注意。……重复性的发现——即过度的发现——将使它有更多的机会被社会体系中的其他人所获知。因而也就影响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⑧

关于科学的早期发展推动新的发现这一观点无疑是预期出现重复发现的重要基础。科学的演变突出了科学方法或原

则上的问题。这些方法或原则使得持续不断的发现成为以后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韦斯特和马尔萨斯(以及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对于岛国经济是适用的。在这种经济中，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工业生产的迅速扩张给农业体系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斯卢茨基方程描述了效用最大化行为理论固有的一种基本关系。

但是，如果重复发现是对普遍感受到的需要所作出的反应，我们就必须确定这样一点，即重复发现是在科学演变的某一阶段上出现的。如果本世纪30年代卡莱茨基就在波兰发现了凯恩斯经济学的重要因素，那我们就几乎不应该把这称作是重复发现，因为在波兰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英国的经济学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无论是在相同的时代还是在不同的时代，要确定甲国科学发展的状况是否与乙国相同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也并非不可能做到。如果甲、乙两国的科学家在研究同样的问题，或许他们会引证同样的文献；他们也都有一种潜在的需要，即为使科学进一步发展需要有科学中的发现。⑨ 例如，杜尔哥对收益递减规律的表述(1767年)与48年后英国的马尔萨斯和韦斯特发现的规律是重复性的发现吗？我说不是。因为杜尔哥的理论未被重农主义者们采用，也没有像英国经济学家那样涉及到农业保护对价格和收入的影响；另一方面，欧文·费雪和威克斯蒂德在他们关于用可加性函数来测度效用的建议中都涉及到了同样的效用理论。

没有证据表明默顿对决定重复发现的科学环境的相似性进行过系统的检验。如果我们采用这种检验，许多重复性发现就会消失。让我们再来看看经济学中的几个例子：

1．地租理论和收益递减规律是一个可靠的例子：那三个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是在同样的科学环境中进行写作的。

2．边际效用理论则是一个更值得怀疑的例子，与英国相比，法国、瑞士和维也纳在经济科学的发展状况和方向上都是颇为不同的。

3．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发现就不那么具有重复性了——例如，美国的伍德、意大利的巴伦尼与英国经济学家们所处的科学环境是不大相同的。

4．就背景而言，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是一个真正的重复性发现，但是这两个理论在基本的方面有所不同。

5．1915年斯卢茨基在俄国以及本世纪30年代希克斯和艾伦在英国的写作是在完全不同的科学环境下进行的。

6．比较成本理论是一个真正的重复性发现。

7．对工资基金理论的反驳也是一个真正的重复性发现。但是又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直到后来出现更好的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为止，这种反驳都是没有效力的。

8．虽然早期的观点（是在一个主要的经济学中心提出来的）没有公布这一事实提出了令人困惑的问题，但是要素均等化定理或许仍然是一个重复的发现。

在上面这个简单的清单中，大约一半的重复性发现都超越了在类似背景下提出的重要条件。

但是现在让我们回到这样一个主要的观点：大多数重复发现其实根本就不具有重复性，然而它们都支持了默顿的基本论点。因为大多数重复性发现都是早先提出过但是被忽视了的；

1．詹姆斯·安德森(1777年)提出过地租理论（但还没有提出现代意义上的收益递减概念)；杜尔哥在1767年阐述过收益递减规律。

2．边际效用理论有许多早期的发现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戈森(1854年)。

3．边际生产力理论是由朗菲尔德和冯·屠能提出来的。

4．张伯伦和琼·罗宾逊的理论(它们在重要的方面并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都被马歇尔和后来的斯拉法预见到了。

5．斯卢茨基应被看作是希克斯和艾伦的先驱。

6．比较成本理论也有过若干不完全的预见(参见瓦伊纳《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第440页)。

7．对工资基金理论的反驳（通过否认工资基金的固定性）不能归之于早期的作者，虽然我完全相信这一反驳的主要论点(工资基金的数量不是固定的)在激进的文献中已经很普遍了。

8．要素均等化定理缺乏早期的预见。

实际上，我们总是合乎情理地希望大多数超越了类似的科学背景条件的重复性发现能够得到早期的预见。同一思想的早期发现是不会那么成功的。

早期发现的不成功是科学进步的“必然性”的有力证明，这种进步被设想为后来出现的重复发现。如果一种理论的早期的、有力的表述并不为人们所理解，而后来的重新表述却被这门科学所接受，那无疑是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只有当一种思想符合当时科学发展的状况时，它才能被这门科学所接受。戈森是在德国历史学派处于高潮的时候进行写作的，他只是不适宜于当时所处的科学环境。爱尔兰的朗菲尔德、

德国的屠能则提出了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的经济科学都不曾想到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斯卢茨基、古诺和其他不成功的发现者也都大致如此。

根据以上观点，默顿的关于重复性发现劝说一门科学接受某一思想的第二种观点是与这种基本理论不相协调的。如果一门科学准备吸收某种思想，那就不那么需要用重复性发现来劝说它接受这种思想。精心地表述、重复和争论将是进行劝说的主要工具。重复发现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们是不断发展的科学所需要的。

3．结　论

根据目前的阐释，重复发现确实为下述观点提供了证据，即推动科学的发展需要有新的分析(或实证)工具，而且这种需要是由能干的科学家来满足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完全的重复性发现(被完成并经过检验)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研究人员的不完备的知识和他所取得的结果。一门科学的信息网络越发达，由不同时期分割开来的重复发现也就越少。

就科学的社会特征而言，不成功的早期发现是同样有效的例证。的确，它可能比重复性发现更为频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已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默顿的基本论点得到了证实，但是重复发现只是提供了一点小小的支持。

注　解

① R. K.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73).

② R.K.Merton, Ref. 1:356.

③ 人们会希望这一论题更充分地适用于那些不那么重要的科学发现。但我估计人们对列举这样一些未经讨论的科学发现兴趣更小，列举起来也更困难。

④ 这里把两个概念结合了起来，因此必须向张伯伦表示歉意，因为他倾注了大半生的精力来解释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⑤ 马克·布劳格已提请我注意另外一个重要的（也是尚在争论中的）重复性发现，参见 J.V. Pinto, "Launhardt and Location Theory: Rediscovery of a Neglected Book",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7 (1977):17-30。

⑥ R. K. Merton, Ref. 1:369.

⑦ R. K. Merton, Ref. 1:375.

⑧ R. K. Merton, Ref. 1:380.

⑨ 这意味着如果同一国家同一时期的两个科学家在两个不同的领域进行研究，那么他们就不会作出重复性的发现。

第 3 篇

经济思想史

10

过去的经济学有用吗*

如何确定“过去的”经济学和“现在的”经济学的分界线或分界区，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划分这两者的目的，而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回到马歇尔对需求曲线的讨论，其目的将决不是指望能从需求曲线上学到什么新东西。需求曲线并非马歇尔最突出的贡献，而且一个非常熟悉现代文献的人也不可能从马歇尔那里获得什么益处。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去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以及《工业和贸易》那里学习有关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论述，那么我们的兴趣就不仅仅是历史意义上的了。因为即使没有理论，马歇尔也能够在这里给我们提供新的思想和建议。需求理论的进展已经使马歇

---

* 原载于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 (Fall 1969)。© 1969.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N. C.

尔的著作显得陈腐不堪，但是，经济增长理论的进展却还远远没有完结。

我把经济学说史这一学科定义为：不必学习也可以掌握"现在的"经济学的经济学（虽然也可以学习以便了解经济学是如何发展到目前这一步的）。某些经济学说史专家——熊彼特是一个突出的代表——认为，理解一门科学的演变过程有助于理解它的现状。①人们可能会同意下述论点并把它作为一个似乎有理的假说来加以重申，即正确的知识决不会有负的边际产品。然而，我们无需阅读经济学说史——即"过去的"经济学，就可以掌握"现在的"经济学。

这对目前这一代经济学家来说不会是什么新鲜事。那些构造日益规范化的、抽象的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的年轻理论家们，甚至发现很少需要向19世纪后期的经济学家们求教。他会假设（就像数学家或化学家那样），早期作品中一切有用的和有效的原理都能够——以更纯粹和更精美的形式——出现在现代理论中。的确，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应当研究更为先进的现代科学，而把学说史的研究工作留给那些不具备现代学术水平的人去做。这种态度在彼得·麦达沃爵士对詹姆斯·沃特森的《双螺旋线》一文的评述中得到了很好的描述："这些内容属于科学史的范畴，而且大多数科学家都对科学史持有不耐烦的态度。一大批极富创造性的科学家都把科学史看作是当然的，虽然他们通常由于客气和害羞而不肯这么说。对科学史感兴趣是能力下降或能力尚未发挥的标志。"②

当然，在不再把科学史当作一种研究的工具这一点上，这些科学家通常是正确的。对于那些只对增加他们著作中的

脚注的分量感兴趣的现代经济学家来说，庇古会比西尼尔有用，而欧文·费雪则更比1600年以前的经济学家有用得多。但是，有一个相反的例证：如果一个理论家在1838年以后发现了古诺，或在1915年以后发现了斯卢茨基，那么他会获益良多。19世纪的经济学就像19世纪的天气预报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过时了。

让我们回到经济学说史学科的定义上来，这一学科是对早期经济学的研究而不是对经济体系运行原理的理解。这一定义看来简直是要否认研究科学史有什么功利主义的目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们确实能从经济学说史中学到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先讨论这一作用，然后再讨论对科学史进行研究的重要理由。

1. 如何读书

"有文化"的定义是：具备阅读能力；而对一个不想落伍的教授来说，还得包括写作能力。"有文化"当然也还有一个程度的问题：一个人能够"阅读"(用少数人能懂的语言)报纸并能从中学到某些东西。相反，如果反复阅读像斯密的《国富论》这样的伟大著作，甚至读它个五遍十遍也会有新的收获。我怀疑人们是否充分理解了斯密所要表达的全部思想。从一种饶有趣味的思想那里学到的东西甚至会比思想者想要传授给我们的东西更多。许多教授不知道如何阅读好一本科学著作，这种技巧只有通过有目的的实践才能得到发展。

为了理解一个人（这种理解的性质是会发展的），必须了解这个人所研究的学科的主题，这就使得一个经济学家必须去阅读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我可以断言，大多数经济学说史专家未能完全经受住这种考验。困难是由不可靠的经济学知识引起的。亚历山大·格雷爵士在他的令人愉悦的小册子《经济学说的发展》中讨论卡尔·门格尔时说明了这一点。这就自然产生了那些使门格尔把消费品称作高阶货物的许多因素以及与此相关的某些问题。我们如何能从高阶货物中分离出一阶货物的价值呢？格雷评论道：

> （门格尔）所指出的是，高阶货物的价值是由它的存在所造成的差别或由当它脱离一组货物时所造成的损失来代表的。不过，这种看法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无需借助精致的数学形式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土地的退耕或损坏会对农业产生破坏作用；因而，按照门格尔的原理，产品的全部价值都应归之于土地。然后，农业生产工具和肥料的贡献也是不容否定的。（该书第352页）

与同时发现这一原理的杰文斯和瓦尔拉不同，门格尔的主要声望是，他直接和正确地应用了他的边际价值理论，并推衍出一般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格雷却认为这个成就是一个错误。③

阅读一个经济学家的作品时还要能够理解其立场是不偏不倚还是抱有同情。即使是最杰出的人物也难免犯错误——既有深刻的见解，又有错误的认识；既有深思熟虑，也有粗枝大叶的思想和著作。人们可能会非常可笑地带着显微镜去分析别人的作品，审查其中的每一个句子、短语和单词——但是却决没有理解人家到底想说什么。在那些已不在人世的人中间，我最喜欢举的例子是埃德温·坎南。他是一个敏锐

的分析家，也是英国古典学派的一个优秀学生。以坎南的智力和学识来说，他所不能理解的只是像李嘉图那样的人。他那篇只有5页的叫做《李嘉图复活纯粹劳动理论的企图》的文章是说明过份挑剔是一种一叶障目的做法的有力证据。④

过份挑剔的反面是奉承，它同样也很难对事物作出解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也饱受这一缺陷的折磨。在这里我只引证罗纳德·米克和奥斯卡·兰格⑤评论杰出经济学家约瑟夫·斯大林的文章。我还要补充的是，对近年来美国总统的经济思想的评论却不那么引人注目。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经济学最好是留给首相和主教们去评价，甚至葬礼也不是平心静气地评价伟大学者的场合。

理解一篇科学论文的标志是要能够阐明作者的分析体系的基本结构。我们理解得越好，就越能从作者的作品中引伸出更多的东西。的确，我们可以用预测的办法来测试我们的理解；一个能理解李嘉图著作的前5章的人也应当能够写出该书中论述赋税的那几章。当然，我们也无法将这一分析体系与那些不连贯和不完整的知识细节协调起来。正如存在着某些经验观察，而这些经验观察会使那些建立得当的关系式减少某些标准误差。一个人的作品质量越高，其中不完整的知识也会越少和越微不足道。如果一个经济学家的分析中有很大一部分不能与另外一部分协调起来，那么无论是这个经济学家本人还是他的读者都不能充分理解其作品中的这一部分。特别是，实际上无论是金钱利诱还是心理疾病甚或简单的遗忘都不足以作为其分析中相互矛盾部分的解释；而只能说是承认错误的一种体面的托词。

理解一个人的理论体系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表达对他的宽

容，也不是为了表达对他的恶意，而只是为了尽最大努力探索他的作品对科学进步作出贡献的可能性。只要一个理论体系定义得当并清除了不相关的离题和谬误，我们就能决定是否值得对这门科学的主题或至少是对它进一步进行探讨的线索作出补充。

因此，精读一篇科学论著本身就是对这门科学的进步的一种贡献：完全专业性的阅读将能改进一种理论的最初表述。

我们在讨论如何阅读好科学著作的时候并没有使用“过去”这个词，阅读亚当·斯密作品的正确方法就是阅读未来的专业杂志的正确方法。可是，有许多理由可以相信，如果从阅读早期经济学家的作品开始，学会阅读就会更容易一些。

也许这种办法的主要优点是能够比较容易地对这些作品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每一个重要的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教育中心都有攻读当代经济学专业的学位。有一批教员在当代经济学的研究和出版方面十分活跃，并不可避免地在研究生课程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青年博士们一出来就准备不加批评地阅读“好”的经济学著作，而在阅读“坏”的经济学著作时采取吹毛求疵的态度。他们也知道如果他们在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的作品中发现了错误，他们就能拿出一篇有份量的文章。这个问题在经济学说史上则要平缓得多：确实，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不会太欣赏马歇尔的著作。但是，与对弗里德曼的态度相比，他们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对马歇尔的态度使得正确阅读的障碍会小得多。而且要针对从前的伟人们的错误而写出一篇大作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

的错误早已被人发现。

第二个优点是，时间能够告诉人们哪些经济学家的著作值得认真阅读。下一期专业杂志上大部分(也可能是全部)的文章都不值得认真或花力气去阅读。

早期作品的最后一个优点是，它具有明显的内部演进的性质，因而具有研究的价值。科学论著决不会是思想的最后版本，因而也决不会是第一个版本。

研究经济学说史不仅能教会一个人如何去阅读，并且还能够教会我们如何对我们所阅读的作品作出反应。科学文献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争论性的文献。人们在推销新汽车时总是吹嘘它比老式汽车好得多，新的思想也是这样被推销出去的；不过，在推销方法上有所不同的是：尽管一种新的理论最终有可能比它的创立者所相信和宣称的还要重要；但是，早先的理论的价值肯定比他所承认的要大得多。科学创新的前进更多地是受到对手的贬低而不是过分的自我吹嘘，这也许是因为这种前进通常显得非常有限。

的确，争论激发了兴趣和敌意。只有在一种理论受到怀有敌意的评论之后，它的缺点和局限性才能被认识从而能够对其作出修正。早期的瓦尔拉体系之所以没有结果是因为它被大多数经济学家忽略了，只有少数经济学家采编了这一体系，但却几乎无人对它进行批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注定会在经济科学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并赢得广泛的影响和经受严格的考验，这是由于弗里德曼具有引发人们注意对当代杰出学者进行探索的惊人的能力。

那些细心阅读早期的有争议作品的年轻经济学家们肯定会获得一种(也有可能是两种)教训。一个无法回避的教训是，

在阅读了早期有争议的作品之后，人们会变得无法非常专注于研究当代的有争议的作品。人们变得无法确信某个人的新思想的正确性或重要性。一个更为微妙的教训是，不值得花费代价去获得前一个教训：稳健地、严谨地和完全公正地对待一个人自己的理论对这些理论乃至这个人的学术地位和薪金来说都没有什么好处。科学家们不愿接受未经良好宣传的新模式。因此，我接受斯塔布斯大主教的观点：研究历史也许会使人聪明，并且也肯定会使人悲哀。

这一切就是我想说的研究经济学说史的功利主义作用。在教学上，作这种研究的好处是存在的，也是不小的，但它未能向这门科学的研究者提出一定的程序。研究科学史的真正利益在别的方面。

2. 科学社会学

科学史提供了观察科学变迁的信息。由于某些并不充分的理由，对科学变迁的研究被称为"科学社会学"。社会学家们(其中开先河者是罗伯特·默顿)研究了科学的变迁，但是，像托马斯·库恩这样的物理学家和像埃德温·博林这样的心理学家也对这一学科进行了研究，并且实际上几乎所有学科中都有一两个专家进行过这种研究。一个人必须是数学家才能理解数学的演变，或者必须是一个经济学家才能研究经济学的演变。而社会学却在这一领域获得了"帝国主义"般的权利，其理由仅仅是，社会学是由全人类来实践的，因而应涉及

到社会行为。在同样的意义上，把科学经济学表述为关于经济组织和科学演变的科学是可能的和有功绩的。

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广泛的范畴。第一个范畴是关于科学的知识内容的发展，诸如它的理论、测度方法、例证的标准等等。这是科学史研究中比较传统的工作，我将很快给出这一方面的几个事例。第二个主要的分支是，一门科学的知识内容和它的专家们的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把科学纳入学术圈的作用，研究基金的作用，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关系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几个例子。

我们先来考虑一下托马斯·库恩在其杰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研究的问题，即居于统治地位的科学理论是如何被新的理论取代的？被一门科学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团成员所接受的这门科学的理论知识、分析和实证方法被称为这门科学的范式。这种范式就是学者的社会生存所需的共识。这种范式是没有尽头的，因而可以持续地运用其手段来处理基本上是无限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库恩的研究也许可以表述为：一种范式是如何被另一种范式所取代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范式中会出现如库恩所说的日益增多的变异和矛盾。

> 由于这些原因或类似的其他原因，当出现的变异比正常科学中的其他难题更多的时候，一种向危机和向杰出科学的转变就开始了。现在这种变异本身通常比同行们所公认的还要多。这一领域越来越多的最著名的人物都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如果这种变异持续下去（由于通常并不如此），则许多著名人物可能会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看成是这门学科中的“主题”。对他们来说，这个领域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

了。这种不同的状况部分地起因于科学研究的新的着眼点。这一变化的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根源是许多局部解决的问题在性质上有差异，这使得人们有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到主题上来。早期对持续变异的攻击都紧密地伴随着范式的规则。但是，由于变异不断地持续下去，对它的攻击越来越多地涉及到这一范式的某些较次要或不那么次要的连接点。它们之间没有两个是相同的，每一个都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但是没有一个足以被人们接受作为一个范式。由于连接点的增多（它们越来越经常地被描绘成特别的调整），正常的科学规则已日益变得模糊起来。虽然仍然存在着一个范式，却几乎没有什么实践者倾向于赞同它的内容。甚至以前解决问题的标准办法也被认为存在着问题。（该书第 82 —83 页）

最终将会出现一种新的范式，它能够解释引起危机的变异。

从一种处于危机的范式向一种新的范式的转变会产生一种正常科学的新传统。这种新传统远离积累的过程，它是通过对旧范式的连接和扩展而形成的。它是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一个领域，这种重建改变了这一领域中某些最基本的理论归纳以及许多范式的方法和应用。在转变期间，在能由旧的范式解决的问题和能由新的范式解决的问题之间将有一个较大但不完全的重迭部分。但是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也将有一个决定性的区别。一旦这个转变完成，同行们对这一领域的看法、方法和目标都将改变。（该书第 84—85 页）

库恩的论题是，一种范式被另一种范式（如被凯恩斯一般理论所取代的新古典主义）所取代必然是迅速的和革命性的。以前的范式不会以逐渐地和顺利的方式来改变它的形式和内容进而包容新的范式：

> 当进入到对范式的选择进行辩论这一阶段时（这是必不可少的），范式的作用必定是十分迂回的。每一个集团都会用它自己的范式来进行辩论以保卫他们的范式。（该书第93页）

这就是范式的变化是通过征服而不是通过同化而产生的原因。新理论对某些现象的解释与旧理论不同，因此，两种理论在逻辑上是不可调和的。库恩所虚构的历史是，不间断的知识积累带来了科学的发展。

我与库恩的主要争论在于，他未能详细地指明范式的性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他的中心论题将能够得到实证检验。如果一门科学的主题和手段的巨大变化能够容纳在一个范式之中，那么就不会构成一场革命。库恩断言，对于一种新范式的出现来说，危机是必要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同义反复。⑥反之，如果一门科学的巨大变化构成了一场革命，库恩断言以前的范式将被抛弃，而这实际上也许从未发生过。具体地说，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效用革命取代了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中作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论据的个别经济主体。古典理论的基本要素丝毫未受影响（一种可能但是不确定的后推效果是20年后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发展）。直到库恩给我们提供了包含着直接的经验内容的衡量革命的尺度（或范式），才有可能把他那令人炫目的假设投入检验。

作为研究科学发展性质的第二个例证，让我们来看看罗伯特·默顿关于新科学思想的重复发现理论。⑦ 他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即任何科学发现原则上都是重复的，包括那些表面上看来是单独作出的科学发现在内（第477页）。他提出了不下十种例证来支持他的论点。由于找不到十条有说服力的理由，这一论点本身就是令人怀疑的。在此我简单地引证

几条：

> 首先，长斯被当作是单独发现的科学成果又成为以前未公布的著作的再发现。（该书第 478 页）

长斯被认为是重复发现尔后又成为某个人过去未发表或已发表的著作的再发现，而我更加看重与那些情况不相同的科学成果。

> 第三，……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科学家们（虽然被抛在后面）还是继续报告他们最初的，尽管已被预料到的工作……（第 479 页）
>
> 抢先报告一项发现的这种竞赛证实了这个假设，即如果某个科学家没有很快获得这一发现，其他人则会很快获得。于是，这就提供了支持我们假设的第八种例证。（该书第 480页）

我假设，所有并非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最新杂志上的科学发现都是相反的例证，虽然默顿并没有从所有的出版物中去发现它们。所以，默顿得出结论说，所有的事实都表明，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科学发现都是重复性的。在默顿和伊利诺·巴伯博士所研究的 264 个例子中，有 51 项是由 3 个人发现，17项是由 4 个人发现， 6 项是由 5 个人发现， 8 项是由 6 个人发现的。在一年之内作出的发现占 20%。

当然，基础的原理是，一切科学发现都是受科学演变的逻辑支配的——正像人们经常提到的那样，新的思想不是悬于空中，而是接近于刚刚完成的工作的表面。即使存在着很多独立的发现，这也是一种非常正确和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默顿通过两项评论把科学的特点与天才人物的存在调和了起来。其中一个论点认为，伟人们会比普通人更快地发现新思想，我发现这并没有什么说服力，理由很快会给出；另

一个论点则非常中肯：伟人们作出了很多发现——例如，默顿发现，开耳芬和弗洛伊德各自都作出了不下30个重复性的发现——由此可见，一个伟人能顶得上许多个普通人。

默顿的主要论题中似乎只有一个方面令人生疑：他没有对重复发现可能下降的范围作出时间上的限制。在这一点上他说：

> 理论并不完全是相互独立的，从长期来看，重复的发现必然会趋于同步，这仅仅是一个限制性的问题。甚至在日历表上相距很远的科学发现在社会和文化的时间表上也可以颇有教益地被认为是"同步的"或相近的，这取决于它们出现的社会中文化和社会结构方面的知识积累状况。（该书第486页）

我发现这种论点是令人迷惑的。虽然同步性是各种科学发现独立出现的某种证明，但是，还有可能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证明这种独立性。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两项科学发现出现于不同的时期（或相同时期的非常不同的智力环境中），它们将不再被说成是那个季节的科学之树上的成熟果实。爱尔兰的朗菲尔德在1833年创立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环境不会与60年后威克斯蒂德、克拉克、巴伦尼、伍德、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其他经济学家创立理论的环境相同。如果要我们等到这一时期的最后才能进行检验，那么关于一旦举行罢工就得在每一个地点举行至少两次闪电式罢工的建议就不会有什么趣味了。

作为这种研究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例子，我将对科学的学派作一个简要的评论。一门科学的学派是指一群科学家的集合，他们对这门科学中的某一组特定观点表现出更高度的一致意见。对于一个学派来说，其根本之处在于还有许多

科学家不属此学派，否则这一学派就没有进行争论的对手。人们几乎没有对学派进行过什么研究，以下的评论仅能给人一个松散的印象。

一个学派必须有一个领袖，因为其成员的一致性通常要靠这一门科学的主要创导者来取得和维持。在很多情况下(如李嘉图学派)，主要的默契就是对领袖的赞誉。除了在出现类似的新领袖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我怀疑基于主要科学观点的一致性的科学学派能否比它的领袖生存得更长。新的分析和实证上的挑战继续出现，对于这些挑战通常只有强有力的领袖才能作出可以接受的反应。马歇尔学派未能比马歇尔生存得更长，凯恩斯学派也是如此。

如果一个学派统一于研究方法而不是实质性的原理，那么它的寿命将会更长。方法论并不局限于实质性的问题，因而学派的成员能够更容易地适应新问题和新挑战。帕累托可以从瓦尔拉那里继承一般均衡学派的领袖地位，虽然他们除了在一般均衡理论内在地优于局部均衡理论这一错误观点外，几乎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奥地利学派之所以能生存到 20 世纪仅仅是因为它的主要默契是，反对历史性的和实证性的研究而忠诚于经济自由主义——这一学派的成员早期在价值理论上达成的一致未能坚持下去，也没有延伸到资本理论或货币理论中去。

一个学派也可以建立在政策观点而不是经济分析或科学方法的基础上，这样它的寿命通常还将变得更长。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学派又是一个政党，但是，作为一个学派，它的长寿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并不是一个科学知识的主体(虽然它的作品中包含着科学内容)。假定作为经济改革的工

具，马克思主义具有非科学的作用，它可能忽略并且已经忽略了经济理论和研究中的每一项进展，这些进展已经不可能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协调起来。一组不那么重要但是基本相似的问题是亨利·乔治引出的单一纳税人的问题。

科学史中第二个并且只能依稀辨认出的研究范畴涉及到这门科学的组织和环境对其演变过程的影响。这类研究的一个例子是约瑟夫·本—戴维的研究论题，即美国医学研究的竞争性结构是20世纪医学的卓越成就的基础。⑧我还可以引证我的研究，即关于经济科学与从社会中推衍出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⑨ 以及经济科学与经济研究基金会的作用之间的关系的研究。⑩

科学协会在科学演进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但是没有人比查尔斯·巴贝杰更对此感到愤怒的了。随着现代计算机的出现，查尔斯·巴贝杰的声誉大大提高，有关他的知识也急剧增加。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计算机之父。至少有30年时间他在英国科学界是一个不成熟并使人难堪的幼儿。他在两本书中表达了对皇家学会的不满。这两本书是《对英国科学衰落的反思》(1830年)和《1851年概览》(1851年)。

巴贝杰认为，科学团体的会员资格应该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并基于此点来反对皇家学会的接纳程序。

> 一个申请人必须有三个会员签署的一张证书，表明他渴望并有可能成为一名有用的和有价值的会员。从而，这张证书被传递到秘书手上，最后经过会议讨论而完成这一程序。到了第十个星期的末尾，如果他有幸由于只有少量的作品和小小的科学成就而完全不为人所知，那么他的当选就是不言而喻

> 的了。另一方面，如果他不幸已就某些学科撰写过著作，或被认为非常熟悉某门科学的一个分支，那么学会的会员将开始调查他所做的工作中哪些与其荣誉相符；并且，除非他有势力强大的朋友，否则极有可能遭到排斥（«反思»第50—51页）。

巴贝杰定律可以更清楚地表述为：如果你是粗心者，最好就做个好心人。

按照我所理解的巴贝杰对这门科学的并非独创性的主要贡献，他认为，每一个学术团体都是由自我永续的内部小集团来管理的。我相信这一点，而且这对于这门科学的生存来说也是必要的。私人财产不仅能使沙子变成黄金，而且能使召开委员会会议和编辑杂志成为一种职业。巴贝杰对这一状况的义愤令人想起安波罗斯·比厄斯对"负责任者"一词所下的定义："一个热衷于不负责任的人。"⑪

3. 结　　论

因此，我认为，过去的经济学是有用的，它在处理后来的问题时会有用处。许多有用的商品和劳务并不在某个社会生产，因为它们的价值比成本还低。这就给经济学说史专家们留下了尚未完成的任务，研究这一学科是有价值的。

注　　释

①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1954), pp. 4ff.
②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28, 1968.
③ 埃奇沃斯对约翰·A· 霍布斯类似观点的评论："设想一下微积

分空物理学中的类似应用，这种应用'失去了它的最为广泛的基础'。反对者用 x 来代替数学家所使用的 dx 或 Δx"。见 Papers Relating to Political Economy 1: 19 n。

④ A Review of Economic Theory, pp. 172-177; 可以将其解说和P·斯拉法的《大卫·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引言，或我的"Ricardo and the 93% Labor Theory of Value"，相对照。拙文载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Chicago, 1965), pp. 326—342。

⑤ Meek, "Stalin as an Economis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1(1953—1954):232—239; Lange, "The Economic Laws of Socialist Society in the Light if Joseph Stalin's Last Work",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4 (1954):145—180.

⑥ 如何确定科学变迁的大小本身就是一项极为微妙和复杂的工作。

⑦ "Singletons and Multiples in Scientific Discovery: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05, No.5 (Oct. 13, 1961).

⑧ "Scientific Procuctivity and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Medicin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1960): 828-843.

⑨ "The Influence of Events and Policies on Economic Theory", reprinted i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⑩ "The Foundations and Economics", in U.S.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ed. Warren Weaver.

⑪ The Devil's Dictionary (New York: Dover, 1958), p.65.



经济学家与国家*

1776年，我们那位德高望重的大师曾就以适当的方式来取得国家的经济繁荣，向他的同胞们提出了明确而有力的劝告。这一劝告理所当然地也传给了他的正在美洲殖民地的同胞，虽然那时我们正忙于建立一个现在被称为巨大的税收漏洞的制度。大家知道，斯密奉劝的重心在于，经济事务的处理最好留给私人去做，而国家如果能在诸如赢得战争、维护正义和维持各种商业渠道等无法回避的任务上获得成功，那它就干得相当不错了。

这些都是几乎两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几乎没有多少现代经济学家把这样有节制的作用看作是国家的经济责任。事实上，大多数

* 在美国经济学会第77届年会上所作的主席演说（1964年12月29日，芝加哥），原载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5 (March 1965)。

现代经济学家在把某一重大的经济角色分给国家这一点上与斯密否认这种角色一样具有信心，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经过188年之后，学术观点常常会发生变化，经济和政治制度当然也就更不会那么一成不变了。

但是，不论是否令人惊奇，研究公共政策的行家们的主导观点发生了转变，于是提出了一个我希望在此加以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经济学家们准备基于何种基础就国家的适当职能提出有用的意见？斯密和他的信徒采用了何种方法来证明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无能？后来赞同国家对铁路、股票交易、工资率和价格、农产品以及成百上千个其他方面进行控制的经济学家又采用何种方法证明这些事务最好由国家来指导和经办？经济学家是如何像对收益递减规律或企业家的利润最大化倾向那样赢得对自由贸易政策和财政稳定政策的信心的？

这些问题背后的思想是十分简单的。经济学家们通常和别人一样持有在他们所处的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但是，他们的专业能力并不在于把大众的愿望转化为令人望而生畏的专业语言，而在于能够理解一种经济体制是如何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中运行的。如果说他们有某些自己的东西来为经济政策的广泛讨论作出贡献的话，那就是对经济政策和政策结果之间关系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解。

由此可见，科学家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基本作用是，确定不同制度安排的成本和收益。在专业上斯密无权劝诫英国遵守《航海条例》，除非他掌握了这些法令的效应或潜在效应的证据；现代经济学家在专业上也无权劝告联邦政府管制铁路或放松对铁路的管理，除非他们拥有有关政策的效应的例证。

必须注意，人们并不熟悉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并无科学上的地位——的确，我既不怀疑也不颂扬价值判断。如果某一项课题是能够研究的，那就更是如此，一个学者在向立法者提出劝告之前应该对此进行研究。假设你为疾病感到悲哀，或者相反，你非常赞赏受到严重损害的细菌。我的意见是，无论你持何种立场，在弄清楚人们求助于医生是会增加还是减少死亡率之前，你都不应该支持强迫或禁止人们去找医生的建议。如果这个特殊的例子像一个可笑的学究那样打动了你，我将作出两种反应。第一，无论一个国家的医学状况如何，你的回答都将一样吗？第二，我们将转向更为困难的问题。

于是，我的任务是，以尽可能冷静的方式提出这样的疑问：经济学家们为他们的政策建议所提供的例证——这些例证成功地将他们的建议与他们所要表达的目标联结了起来——究竟是什么？我将从亚当·斯密开始。

1.

斯密将其经济政策建议的基础建立在两个主要的基点上。这两点并不是以规范的和系统的方式提出来的，而且在确定他为什么如此希望经济生活脱离国家的管制这一点上还有不少严重的问题。

斯密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基础是，他相信天赋自由权制度的效率。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个意志坚强的苏格兰人、冷峻

而明晰的思想家大卫·休谟的亲密朋友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然法则有着深深的依恋。但是，斯密却没有提出把天赋自由权作为政治生活的信念，而是用可以证明的经济分析来论证，寻求自身利益的增长的个人将把资源投向能给他带来最大收益的地方，并且作为一个法则，资源也将给社会带来最大的收益。而在个人不知道或者没有权利获得自身利益的地方，斯密明显地感到存在着国家干预。

因此，斯密说，阻止人们进行自愿的交易"是对天赋自由权的明显侵犯，这种天赋自由的权利完全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所以不应违背，而应予以支持"。不过，他继续写道：

> 但是，一部分人行使的天赋自由权可能会危害整个社会的安全，因此它受到并且应该受到各种政府法律的限制。在这些法律中，既有非常宽松的，也有非常苛刻的。为了防止火灾的蔓延而到处设墙设卡是对天赋自由权的侵犯，与这里提出的对银行交易的管制恰好属于同一类。

天赋自由权似乎并不是一个正在起作用的规则。斯密举出了许多由于参与者没有能力或未能考虑到他们的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效应以致背离天赋自由权的例子。①他通常认为，以实物支付工资是非法的，他相信那样做是在欺骗工人；他也认为应对利息率加以限制，因为高利率会鼓励贷款人把他们的资金投放到没有把握的项目上去；并且他还认为需要有一个精巧的税收体制来改变对土地的使用。

斯密强烈倾向于私人经济活动的第二个基础是，他对国家持一种很不信任的态度。必须强调，这主要是对国家的动机而不是能力的不信任。斯密并不在意不适当的政府行为——的确，他非常相信，就效率而论，联合股份公司、甚至

大学都是比国家更糟糕的冒犯者。他对国家的真正抱怨是，它是有组织的、联络起来的、自我服务的集团（首先是商业和制造业者）的产物。与“喋喋不休地纠缠于局部利益”（参考文献11，第438页）相比，立法程序较少受扩大了的共同利益的指导。

作为纯粹的学术评价，我要说斯密在支持他的第一个论点（即自由的个人将更有效地使用资源）时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但是在表述其第二个论点（即承认政府机器的能力却否认它的公平）时就显得过于教条了。他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国家有能力达到它的政策目标，特别是，他宣称而没有证明商业制度对英国的资源分配有着重大的影响。他也没有证实，国家常常成为“局部利益”的俘虏。

除了利用各种不可抗辩的学术武器和无休止的重复外，斯密的学术继承人几乎没有进一步加强他对自由放任原则的论辩。不过，他们也有可能沿着两个方向这么做了。

在斯密发现竞争性市场不起作用的地方，他们可能会作某些修正，因为斯密也可能出错。例如，斯密认为市场低估了农业投资的价值，而高估了外国投资的价值，对这一点麦克库洛赫作了适当的批评。高利贷的异常当然也受到了边沁的激烈挑战。但是，就被纠正的斯密的每一个错误而言，又引伸出了几个新的问题。例如，J·S·穆勒坚持认为，即使所有的工人都希望减少工作时间，竞争性的市场也做不到这一点。我不打算原谅这一错误只是因为后来如此之多的经济学家都重复了它。

然而，我认为斯密的观点中更为严重的缺陷——他的未经证实的假设，即国家在实现错误的目标方面是有效率的②

——不仅被他的追随者们接受，而且被强调和重申了。詹姆斯·穆勒证明了政府以不民主的方式控制其掌握的工具的罪恶，这是一个极端的、也是有教益的和有影响的例子。掌握政府权力的人总是利用这种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穆勒的辩论给人一种具有严密的逻辑性的印象。这意味着只有民主治理的国家才能寻求全民的利益：

> 社会不可能有与自身利益相反的利益。证实这一点会碰到术语上的矛盾。在社会内部和与其自身相关的方面都不可能有邪恶的利益…… 社会的行动也有可能因失误而出错。要假设社会会因制度而出错，必然还会假设人类希望自身出现悲剧。③

因此，与君主专制和贵族统治不同，除了在某些不知情的情况下，民主制度不会做出不明智的事情，而且这种不知情的例外也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 毫无疑问，给科学、艺术和立法本身带来了最高贵的装饰物的中间阶层是所有已被提高和升华了的人类天性的主要源泉，也是社会的一个部分。在这个社会中，如果社会所代表的基础得以大大地扩展，则舆论最终也将被确定。在处于中间阶层之下的人民当中，大多数人无疑是以中间阶层的意见和榜样为指导的。④

公众的教育水平和他们天生的对中产阶级领袖的崇敬以及那些社会的装饰物，都将保证民主国家一般不会偏离公共利益太远。这个论点意味着在写作这篇论文的时候，美国政府是实现公共福利的可靠工具，并且50年后英国政府也将成为这样一种工具。⑤

为古典经济学家主要反对的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不明智干预这一论点提供详细的佐证，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里我

只提供两个颇有教益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由优秀的爱尔兰经济学家M·朗菲尔德提供的。他就某些令人怀疑的援助劳动者计划中肯地写道："在这里，政治经济学仅仅是一门防御性的科学，它试图阻止某些投机性法规的不明智干预"(参考文献3，第18页)。这个论点听起来有点保守，但是让我们继续分析下去。几年之后，作为皇家铁路委员会的证人，朗菲尔德抱怨南部和西部大铁路公司的那些懦弱的董事们低估了对铁路服务的长期需求弹性。为了产生必要的勇气，他建议任命一个拥有改变每条铁路的收费标准这一无限权力的董事，而政府抽取由此产生的利润的一半，并补偿所有的亏损。⑥朗菲尔德不赞成自由放任，但是不那么彻底。

第二个例子是由争取女工每天工作十小时所引起的重大辩论。这场运动在1847年获得了成功。这是现代英国第一次对能干的成年人之间的契约进行干预，以致经济牧师们要求开除英国的教籍。实际上，这个《工厂法》已受到两个重要的经济学家(即托伦斯和西尼尔)的强烈反对，但是并不像反对侵犯天赋权利时那样明确。托伦斯在这一批评的前言部分有一段读起来似乎振振有词的话。

> 不干预原则仅仅适用于干预可能会造成危害这样一种情况；在所有那些中央当局对个人间的交易进行干预能够产生福利或防止灾难的情况下，自由放任原则错误地放弃了中央当局的职能，而正是由于这种职能，中央当局才得以建立和维持。⑦

因此，托伦斯和西尼尔⑧都批评十小时工作日的法案，因为它会降低周工资，增加生产成本，并由于会削弱英国纺织工

业在国外的竞争地位而减少就业机会。

西尼尔和托伦斯都死于1864年，所以，人们会设想，他们都有充足的时间来验证他们对实行十小时工作日的效应的预测。

令人惊讶的是，詹姆斯·穆勒的长子与他那保守得多的父亲相比对国家控制经济生活提出了更为强烈的反对例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没有跟着他的父亲接受民主国家拥有永恒的智慧的观点，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写作远在《改革法》⑥通过之后的缘故。他把例证更多地放在对个人自由的捍卫上，在他所列举的5个理由中，他用了3个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作为实践准则的自由放任是个人的尊严、独立、自主以及个性发展的变异。

虽然我认为自己也是个人主义的最热情的赞颂者之一，但我还必须承认，小穆勒的观点是模棱两可的。他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判断一种政策是自由的还是限制了个人自由。假设我正在考虑一项公共住宅规划。如果我引诱或强迫人们住进了这样的住宅，当然也就减少了他们的选择余地和责任。但是我也希望目前这一代儿童能够在一种完全卫生以及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的居住区里成长。穆勒没有向我们说明，这种政策是支持还是限制了个人主义，虽然我设想他会支持公共住宅计划，因为他确实已使公共教育自由化并解除了对年轻人工作时间的限制。然而，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要想成为一名道德哲学家——无疑我们也能干得不错——那么他应该使他的哲学发展到这样一个水平，在这个水平上，政策的含义已经成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而不是表达个人偏好的工具。⑩

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马歇尔，他使许多英国经济学家成

为这一传统的基础。他承认国家在控制垄断、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和处理贫困问题上的潜在作用。可是，他竭力坚持对私人企业的偏好。这种偏好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官僚主义的管理必定是难于负担的和无效率的。⑪ 在这一点上，马歇尔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勇敢的言论：

> 如果100年前(1807年)政府的控制就取代了私人企业的控制，那么就会有很充分的理由设想，我们的制造方法的效率将和50年前一样，而不是比那时高出3倍或5倍。⑫

然而，这种"充分的理由"从来没有被提出来过，虽然论证这一观点比回答马歇尔用一章或一本书的篇幅来论述的、甚至贡献了一生精力研究的其他问题更为重要。马歇尔不重视政府的其他理由是，担心议会成为特别利益（特别是工会利益）⑬ 的产物——这是对亚当·斯密的不自知但并非不可知的复归！

关于自由放任的一个世纪就讲这些。经济个人主义的主要学派甚至还没有提出一点有力的证据来表明，国家没有处理(部分或全部)细致的经济问题的能力。除非准备接受某种一般理论的推理作为证据，否则实在难以找到宝贵的证据来说明，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是不明智的。非干预学说只有在人们愿意服从的范围内才是有力的。

2.

经济学家们从未停止过鼓吹减少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

用，也不会转向主张加强这种作用。在对《谷物法》的攻击达到顶峰之前，对童工的工作时间进行限制的建议就已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在为保护移民而对船舶通行进行管制之后才于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放宽财产交易限制的法令。

其他方面的情况如何呢？所有人都接受的古老的警察功能与一些人提出的新型的管制功能之间存在的区别是最难以理解的。同一个经济学家可能而且确实在某些方面排斥国家的作用，而在另一些方面又要求国家发挥作用。⑭

政府加强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发生在19世纪的英国，后来，在美国这种控制也放松了。通常的情形是：国家的传统功能扩大了，或者新的功能非常相似于传统的功能而被人们接受。它们的经济效应通常是一种附带的保护性功能，诸如对工厂和矿山的调查，有关城市的卫生立法，建立初级教育体系以及对大部分铁路实行控制。

不过，从自由放任的全盛时期以来，有一件事是始终未变的：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认为需要为他的下述信念提供证据，即国家能够有效地履行他所提出的新功能。过去关于政府无能的断言只是与相反的断言相对抗；过去指望民主制度能使政府权力的行使更为明智，这已被认为太具预言性，以致经受不住严格的历史检验。我将引用两位经济学家的作品来说明对这种经验例证的长期忽略。这两位经济学家除了都有杰出的才能这一点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第一位是杰文斯。他认为，如果能满足四项条件，则政府经营某一行业就是合适的。这四项条件是：(1) 工作具有不变性和惯常性，以便使其能够在固定的规则下进行；(2) 工作必须是在公共监督之下进行，每个个人在工作中的失误

和松懈能够被迅速查明和揭露；(3) 没有什么资本支出，以使每年的收益和支出帐能够大致准确地代表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真正成就；(4) 政府的工作必须具有这样的性质，即在全方位的政府垄断下，各种业务的结合会带来更大的利益和经济效果。对一个城市供水系统的歪曲描述是基于什么基础？——当然是基于一种慎重的反省。

杰文斯在讨论政府管制时同样致力于演绎的方法。他的《产业立法原理》第一次对危险的机器所带来的问题作了说明。杰文斯说，无论是工人还是雇主通常都没有对隐伏在未受保护的机器中的危险给予同样的关注。

> 但是，仍然存在着另外一种既简单又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法律可以规定应给有危险的机器安装防护装置，执政的政府可以任命督察员进行巡视并追究那些不服从法律的雇主。

杰文斯的看法中有几点是颇有教益的。还没有证据表明，雇主和雇员没有控制危险的机器的作用，也没有证据表明直接控制是简单的和有效的。直接控制在工厂中无疑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工厂太小，不足以引起督察员的注意，而且，它在别处是否有效也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最后，杰文斯没有考虑到价格体系具有补充(即使不是取代)法律规定的直接督察的潜在作用。在这种法律下，雇主对事故负有责任。⑮

但是，让我们回到“杰文斯是谁”这个问题上来。杰文斯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最高天赋体现在他要求对理论关系进行测定以及在进行这种测定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上。他那寻求实证的强有力的本能还表现在他的政策建议上，这一建议认为，无论何时潜在的新政策都应该首先在地方政府一级进

行试验。他说："我们不能完全基于理论上的理由来筹划社会改革。"⑯ 但是，无论是否可能，实际上他就是这样来筹划社会改革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位经济学家庇古，或许我们能从中弄清楚经济学家是如何处理问题的。在《财富与福利》一书中，他列举了不相信法律具有控制垄断的能力的四点理由。虽然这些理由都不大充分，但是颇有启发性的是，"这些理由大部分都能够由于'钦差大臣'新近提出的关于由政府任命一批人来表明产业运营和控制的目标的发明而消除"。因此，"现在政府在某些条件下有能力对产业部门进行有益的干预，而早先这些条件都不成其为对产业部门进行干预的理由"。

如果时间不是一位教授让位于另一位教授的过程中的最宝贵的因素，我将从庇古那并不吉利的开端出发，严格按照他的思路来作一番巡视。我们或许会从某些例证中得到启发。庇古发现这些例证足以说明他关于国家能力的一系列观点。

> ……旨在直接"维持竞争"的法律在实践上肯定是要失败的。
>
> ……在工业方面，产品的质量是最重要的，但是在私人那里却有被忽略的危险。因此，由政府来经营是可取的。
>
> ……与私人经营相比较，政府经营的相对低效率在具有很高投机性的业务中可能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在那些实际上不存在投机性因素的行业中，这种低效率将不复存在。⑰

几乎不用提醒，这些例证来自关于城市贸易的几本书。

和他的先辈们一样，庇古关于国家的能力的大多数观点是从最近出现的诸多观点中随意地挑选出来的，又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进行了升温。他认为，依靠这些零散的一般意见是

不可避免的。在政府经营的产业和私人经营的产业何者在生产上更有效率这一问题上，我们被告知："在开始时必须明确一点，根据统计资料来对这两者进行比较，肯定是行不通的。"那么，如何才能明确这一点呢？很简单：指出公营企业和私人企业不可能在相同的生产条件下运行。对统计研究的可行性检验会排除所有这种研究的必要性，当然，庇古在他的一生中都接受了这种研究的含义。

可以说，在对国家的经济能力的判断十分肤浅这一点上，庇古与他那些略逊一筹的同事们并无不同——至少可以说他同他们一样精明和慎重。与20世纪的其他经济学家相比，庇古的不同仅仅在于他用较多的篇幅撰写了具有很高学术质量的经济分析著作。

我并不打算把其他经济学家作为样板，而只是在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赋予他们的角色以更为一般的特点。诸如征税和控制货币体系这样传统的和不可回避的经济职能将不在下面加以考察。这些职能没有给国家经济活动的合意性带来什么问题，并且与经济学家在政策中的作用这类问题也相当不同。以很不齐备的资料为根据，我作了三条归纳。

首先，有一个广泛并日益扩展的政策领域被经济学家们完全忽略了。如果考察一下英国在商店停止时间，食品卫生和药物检查、城市公共设施、铁路、卡车和海洋运输、工会的法律地位和其他许多问题上的立法，我们将会发现，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们并未就这些问题发表过什么意见，也没有向皇家委员会陈述见解或参与政策的制定。1714年以前，超脱于当时的政策制定的人是非常高傲的，因而这种超脱终究是

要完结的，也是令人生畏的。也许是他们受过德国训练的缘故，美国的经济学家对政策问题有更大的兴趣。所以在有关公用设施管制和工人补偿法方面，人们能举出像约翰·R·康蒙斯和J·B·克拉克这样的例子，在托拉斯问题上还能举出其他的经济学家。然而，即使是在美国也有许多重要的政策问题被忽略（现在仍然如此），其中包括食品清洁法、工资法、公平就业法、土地使用区的划分以及对资本市场的控制等。

其次，即使在经济学家们对政策问题有了强烈的和直接的兴趣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以确定问题的范围和性质以及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的潜在效率。

很难支持关于不存在科学工作的特定模式的见解，通常这种见解只是说明了作者的阅读习惯。不过，我合乎情理地确信，并没有人对下述课题进行过哪怕是起码的研究，即，(1) 管制对价格以及公用事业费用水平和结构的影响；(2) 通过竞争性市场和管制机构而取得的生产过程的安全性和产品纯度；(3) 与保险成本相比较，通过抑制竞争的办法来防止金融机构的破产所带来的社会成本；(4) 与其他政策相比较，对陷入困境的产业实行价格支持对收入分配的影响；(5) 旨在保护竞争的各种政策的作用。虽然这是一个并不很长的清单，但是我认为，作为例子，它们的重要性足以证明我关于对经济政策手段的系统缺少实证研究的归纳。从1776年到1964年，对国家的经济能力进行实证分析的主要工具一直是停留在口头上。

第三，经济学家对经济决策的影响通常较小，这是因为他们缺少对国家的经济能力和私人企业的经济能力进行比较的专门知识。经济学家可以使用他们的经济理论，而且他们

也的确这么做了，而且不能否认，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会比其他人的经济理论更好。但是，由于我马上就要提到的原因，经济理论还不具备坚实的基础。缺乏真正的专门知识和传播的热情，因而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的演变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3.

如果经济学家们的政策观点缺乏坚实的实证基础，人们或许会指望能从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得到指导。实际上，理论体系已经受过各种实证检验，比之封闭条件下的经济均质性，它们是更为可靠的知识源泉。一种理论会使得对各种经济关系的验证融合到别的理论中去，因此，这种验证更容易引起争论。

事实上，经济学家们的政策观点受他们的理论的影响很大。对自由贸易的强烈偏好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受了关于比较成本的古典理论。反对国家进行直接价格管制的一般根据也可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竞争性的价格体制才是最适度的。经济学家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政府对经济活动实行管制，也至少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关于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不一致的理论的发展，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关于最优经济运行的标准变得日益严格起来。

如果说否定经济理论对经济政策观点的影响是错误的，那么认为政策紧密地和明确地遵循一般理论就更错误了。我们关于自由贸易的第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松散的。斯密之所以支持自由贸易是因为他认为关税将使资源从更具生产性的领域向不那么具有生产性的领域转移，缺乏对国内外商品交换比率的解释也未使他受到困扰。一个世纪以后，西奇威克认为，从理论上说，关税通常对一国来讲是有利的，但是，"由于在实行保护主义以有利于本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很难获得足够的知识和力量再加上目标的单一性"，因此，政治家应当避免使用这种保护性的关税。无疑，指导西奇威克的是一种政府理论而不是经济学理论。

一般说来，理论对政策不具有强制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理论的信奉者必须承认：一种理论是可以被用来支持不同的政策观点的。理论所描述的是一般的关系，而在一种特定的背景中，具有决定性的理论部分是实证。如果无需附加任何前提的话，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著名的工资基金学说。这个理论断言，在短期内，工资的数额是固定的。如果一部分工人有较高的工资，则其他工人的工资就要降低甚至失业。这表明，如果一组特定的工人组成工会并设法提高工资，则其他工人就要为此承受负担。大多数工资基金学说的信奉者接受了这种政策观点。⑱ 但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却从相反的角度提出，由于大部分工人的生活都只是停留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成功的工会至多在短期内给其他工人带来损害，但他们的较高的收入却可以永远保持下去。⑲ 而且十分明显，无论短期成本或永久利益何者更大，这都是一个数量上的问题。

适用于工资基金理论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理论：一个实证性的问题总是介于正规的学说和它的具体应用之间。真正引人注目的事实并不是接受同一理论的经济学家有时会在政

策问题上发生冲突，而是他们不一致的时候是很少的。我设想，如果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同样的隐含的实证假设，那么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将达成广泛的一致。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把工资收入者不进行储蓄看作是事实，尽管他们并没有证据来说明这一点。而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都认为他们决不会碰到埃奇沃思的税收之谜。任何时代的经济学家都承认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普遍性，然而他们也没有去认真地寻找相反的实证依据。

毫无疑问，这些实证上的一致性通常是正确的——人们无需进行艰深的学习也能理解。真理在现代统计学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然而，历代经济学家都认为，从长期来看，农业中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不可避免地要超过技术进步的作用，这种观点在最近100年来的农业史中被冷漠地忽视了。

理论和政策之间联系松散的第二个也是次要的原因是由于实际中的政治或行政管理上的因素。经济学家们一般都避免作出政策上的结论，因为政策的执行会带来更大的社会或行政管理上的代价。穆勒取消所得税是因为它会给纳税人带来调查上的负担，有人可能会想到，他会记得西班牙早先是欢迎调查的。至少100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建议以五年为期分阶段逐步推行贸易自由化以使这一过渡能够比较平缓地进行。而且，如果保护主义仍在发展，那么过渡期通常会延长。我时常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一个老酒鬼，不要太快地减少他的饮酒量。

把理论和政策制定割裂开来的第三个（不幸也是更为次要）的原因是严重的不一致性，通常是因为在那些富有智慧和热心肠的人中存在着严重的不一致性。马歇尔证明——但是

我要说他不那么具有说服力——消费者剩余学说引导我们向必需品而不是向奢侈品征税。这一思想只在脚注中作了表述，因为它忽略了支付能力的作用。反对最低工资法的经济学论点也经常被关于愈穷的人需要愈多的收入的观点所批驳。

然而，一般理论体系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的不明确性一直是我们所面临的困难的主要根源。如果一个有才能的经济学家能使现存的经济理论服从于最可行的辩论的任何一边而又不违反专业工作的规则，那么经济学家的声音必将在立法大厅中回响。

4.

两个多世纪以来，国家的经济职能一直在吸引着经济学家们的注意，但却没有能激发起他们的好奇心。我相信，关于长期以来辩论已不愿意脱离抽象论述的判断对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的文献来说是适用的。经济学家既不愿意将问题搁置起来，又不愿意在那上面下功夫。

为什么甚至以论述如何估价资产的费率的文献减少1％为代价也没能弄清楚管制机构对价格和费率的影响？为什么甚至把对侵犯个人自由的谴责减少1％为代价还是不能确定福利活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又为什么甚至以将论述消费者剩余的文献减少1％为代价仍然不能估计出政府在弥合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上所取得的进展？我们为什么甘愿使某些政策问题得不到研究？

由于存在上述问题，可以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有关国家行为的正规理论或对公共控制和私人控制的比较优势进行一套实证研究。

首先，把如何对经济生活进行控制作为一个正式的理论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确定未经控制的私人企业、竞争性的私人企业、政府管制、政府经营和其他形式的经济组织的比较优势时没有一种理论来加以指导？这种理论将能预测国家进行经济活动的各种方式，诸如保护消费者免受垄断和欺诈的损害，帮助处于困境的行业和地区或刺激创造发明等等。这种理论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些规则，例如，对于引进新产品来说，竞争性机制可能更为优越；或者在有许多方面参加单一交易的情况下，公营企业可能更有优势。根据我的推测，之所以还没有进行这些工作是由于存在两个方面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政府管制的中心问题是不断变化的：在某一年可能是劳资关系问题，而在后一年则可能变为如何向进行农业改良工作的农民提供补偿或者对铁路的收费标准进行控制。历来很少对某一经济生活领域进行严肃的辩论，因为大多数经济活动是无可争辩地属于私人或公共性质的。如果试图让某一种理论来指导社会以解决这些多样化的和不断变化着的问题，则这种理论或许是过于抽象和庞大了，以致难以鼓励人们为之作出重大的努力。

此外，第二个困难是，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标准工具很难说是适当的。由于经济分析的报酬和障碍，普通的最大化行为似乎不能直接适用于上述问题。国家能力的界限以及国家优于各种受控制的私人活动的领域，是很难容纳在一个完整的体系中的。

简而言之，公共政策理论可能是一种很难设计的理论，虽然在我们试图作出这种设计之前，这种意见仍然不很明确。

不过，一种关于对经济生活进行社会控制的适用的理论对于专门的政策研究来说并不特别重要：经济学家不可以对处理特定问题的各种办法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吗？如果国家对工厂的机器进行管制，这种做法能有效地减少事故吗？国家对从英格兰和爱尔兰到新世界的移民客运进行管制——这种管制达到了什么目的呢？成百上千种价格受到了管制——它们比未受管制的价格更低或更为稳定吗？经验性的解决办法很显然对于公共政策和关于公共与私人经济的一般理论的发展都是有用的。

在此我们必须(尽管不那么容易)停止上述讨论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可能需要对某些传统的经济学领域和那些不完整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所不屑一顾的领域进行实证研究。我认为，当我们对寡头垄断者的行为所知甚少时，我们也就几乎不了解国家管制的作用，这是不足为怪的。马歇尔关于长短期价格差异和受长短期供给反应差异控制的利润的理论到明年将有 75 年的历史了。虽然这一理论影响巨大，但还有待于经受充分的实证检验。如果这些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都脱离了对其数量意义的检验，那么，我们的反托拉斯法、机动车辆管制以及我们对保险公司投资的控制也未经受这种检验，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几代经济学家都在对经济理论进行实证检验，而且比我们在社会实践领域看到的检验进行得更为频繁，并花费了更多的精力。早在 1863 年，杰文斯就弄清了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金矿而出现的黄

金价值急剧下降的原因——在1849至1862年的13年中黄金价格下降了26%。但那时对国家管制的研究并没有付出诸如此类的精力和智慧。半个世纪以后，亨利·摩尔开始计算统计意义上的需求曲线，然而，对公共政策效应的研究依然远远滞后。

我们正处在经济分析数量化的时代。我们所拥有的数量分析的技巧日益增强，其功力(与未经训练的常识相比)犹如鸟枪换炮不断得到加强。但是，与更为基本的发展结果相比，这还是更为次要的原因：测度经济现象的意愿目前仍在上升。最低限度也要建立起重要性的顺序，而且最好应该比较准确地弄清楚各种经济函数的实际状况，这已成为经济研究的一项基本内容和现代经济学家的信念。

请注意，对经济关系的实证分析的增加既不是德国历史学派对正规理论遭到攻击所作出的反应，也不是美国制度主义者对排斥理论所作出的回答。它是一项缓慢的发展，可以部分地归因于早期自然科学的某些发展，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数量分析的先驱者们——杰文斯·米契尔、摩尔和费雪——的显著成就。

这是一场更为重要的科学革命——的确，我认为，与日益坚持经济分析数量化的重大意义相比，所谓理论上的李嘉图、杰文斯或凯恩斯革命都只是较前作了小小的修正。我确信，经济学最终将站在黄金时代的门口——甚至只需一步就可以跨过这道门槛。

在我们的思想中，革命已经触及到了公共政策领域，并且很快就会向我们提出不可抗拒的要求。在不知道是否会产生哪怕是最小的作用的情况下就对证券市场的垫头规定每年

变动一次，这将是无法想象的，进口配额制要想回避对收益和成本的计算将变得不可能。如果私人和国家从事经济活动是参照诸如外部经济性这样的术语或求助于完全竞争理论而进行解释的话，那将会变成那些怀旧人物玩弄幽默感的机会。

这只是一种预言而不是一种说教。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已经在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这个问题上听过许多传奇式的告诫。如果你曾经注意过这种告诫，那么你将一事无成，但是你会对范围广泛的课题进行研究并且还有大量令人炫目的方法。幸运的是，你已经知道，这种告诫尽管在诸如专业学会的官员退休这样的场合也无法避免，但是，只有在它已获得成功的例证的支持下才值得注意。我没有理由相信，你会在晚上使你那僵硬的头脑变得松弛下来，并且我也很重视这一点。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进行我所希望的那种研究，但是，没有人能够推迟这一天的到来。

最后，我高兴地注意到我们这门科学有着美好的未来。我们都是优秀的理论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200 年来，我们在理论的准确性、清晰度和普遍性方面不断取得进展，虽然这一点并不总是很明确。尚无广泛的历史证据表明，我们正在成为优秀的实证研究者。但是，最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学已经证明，我们的数量研究工作者在力度、深度乃至气度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不断扩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不可避免并且不可抵御地要进入公共政策领域。我们要发展一种知识体系，它对于作出明确的决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由此坦率地说，我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民主社会的点缀，在这个社会中，有关经济政策的意见将得到广泛的传播。

注　释

① Viner, "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in Adam Smith 1776—1926(University of Chicago, 1928).

② 麦克库洛赫，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被低估了的人，在这里再次向斯密提出了挑战；参见"Navigation Laws", Edinburgh Review, May 1823。

③ The Article on Government (reprinted from the Supplement to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London) 1829, p.7.

④ 同上书，第32页。

⑤ 穆勒的文章遭致麦考利的批评，他用穆勒关于每个人都只顾寻求自身利益的观点来反对人们争取投票权的普遍要求：很少有人否认，少数富人所拥有的财产可被用于为大多数穷人谋取欢乐，但是穆勒却提出要授予大多数穷人以超过少数富人的权力。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安排究竟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个观点被用于一个很有趣的预测："至于美国，我们只有等待20世纪的到来了"，见"Mill's Essay on Government", in Critical, Histor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 (New York 1873), II, pp.36—37, 40。

⑥ Royal Commission on Railways, Evidence and Papers Relating to Railways in Ireland (1866), pp.126—130, 359—360.

⑦ A Letter to Lord Ashley (London 1844), pp.64—65.

⑧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London 1844).

⑨ 他确实为国家的无能作了某些解释："……大多数事情都由于国家的插手而变得更糟，由那些对此感兴趣的人来处理这些事情会更好一些；如果交给他们自己去处理，或许会促成问题的解决。"不过，上述论点并没有对形成他的见解产生重大的影响。

⑩ 穆勒的著名论文《论自由》几乎没有能减少我们的疑虑，他在那里断言：

> 假如能对目标作一些改进，达到目标的手段也被证明是正当的，那么专制主义的行政管理方式在对待野蛮人时是合理的。
>
> 在许多大陆国家那些规定除非双方都能证明他们有维持一个家庭所必需的财产，否则不能结婚的法律并没有超出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度。

由于个人自由的原则与自由贸易学说无关…… (The English Philosophers from Bacon to Mill, pp.956,1023, 1035)。

要否定上述结论是不容易的，因为穆勒的“自由”概念可以很方便地用他个人所赞许的行为方式来进行修正。

⑪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1925), pp.274—276, 339ff.; Industry and Trade (1919), pp.666—672.

⑫ Memorials, p.338.

⑬ Official Papers by Alfred Marshall (1926), pp.395—396.

⑭ 因此麦克库洛赫就邮局写道:“虽然人们对相反的情况进行过争论，但似乎没有证据表明，由其他人经营邮局会比政府干得更好，只有政府才能使它的下属机构有条不紊地工作”(Dictionary of Commerce, 1854 ed. articke on “Postage”)。

⑮ 对我们来说，这是下述有害教诲的源泉，即在订下了这个处理有危险的机器的颇为教条的规则后，杰文斯紧接着就谴责那些把经济学家视为“专横拔扈的理论家，他们总是不断地为别人的行为订立一成不变的规则”的人。

⑯ “Experimental Legislation and the Drink Traffic”,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37, 1880, p.192(reprinted in Methods of Social Reform, p.275). 然而，他没有在缺乏正规试验的情况下看到实证研究的潜力，并且否认了统计方法的可行性。

⑰ 这是后一本著作中更为成熟的观点，参见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4th ed., 1932), p.399。

⑱ J. E. Cairnes, Some Leading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73), pp.258—260.

⑲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shley ed. (London 1929), p.402.

参考文献

1. W. S. Jevons, *Methods of Social Reform*. London 1883.
2. ______, *The State in Relation to Labour*. London 1882.
3. Mountifort Longfield,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1834).
4. Oliver MacDonagh, *A Pattern of Government Growth*, 1800—

60. London 1961.
5.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London 1920.
6. John Ramsay McCulloch, *Principls of Political Economy,* 1st ed. London 1825.
7.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st ed. London 1848.
8. A. C. Pigou, *Wealth and Welfare.* London 1912.
9. David Roberts, *Victorian Origins of the Welfare State,* New Haven 1960.
10. Henry Sidgwick,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83.
11.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Modern Library ed.

12

斯密漫游于国家学说*

《国富论》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石的一座辉煌的宫殿。它的广泛基础是："虽然谨慎从事的原则并不能支配每一个个人的行为，但却影响着每一个阶级或阶层中大多数人的行为。"① 追求个人利益的强大动力将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使用，促使劳动者们辛勤地工作，促使发明者们开辟新的分工领域——简言之，它支配着那些自由放任的国家并使之富裕起来。 确，只要能够宽厚地对待个人利益，它就会创造出奇迹：

> 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时，每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个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致没有任何帮助，亦能单

---

* 原载于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Fall 1971。© 1971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N.C.

> 独地使社会富裕繁荣，而且还能克服无数顽强的障碍，即妨害其作用的人为的愚蠢法律，这些法律或多或少地侵害了这种努力的自由，或减少了这种努力的安全。

这一段引文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形成本文主题的基本反论。

这个反论简单说来就是：如果个人利益的原则支配着大多数人的商业行为，那为什么它就不能支配大多数人的政治行为呢？为什么立法者要对创造国民财富的经济行为设置“无数顽强的障碍”呢？人们在计算金钱的时候总是很有逻辑性并带有某种目的，那么他们在计算政治选票的时候是否就那么思维混乱和富有浪漫情调呢？

提出这样的问题当然是为了回答。一个商人会仔细地盘算每一批货物的适当的目的地，每一个代理人的适当职责，谈判每一笔贷款的适当银行——当然他也会盘算每一种关税、每一笔税收和补助金、每一项有关劳动就业的政府法令所带来的效果。的确，很难区分商业行为和政治行为之间的差别，因为建立促进性的法规就是一种商业行为。

对于博览群书、见多识广的《国富论》的作者来说，无需告诉他个人利益已经渗透到政治生活这一明显的事实。立法是根据若干经济集团的利益来解释的，本文的表1总结了其中的几个例子。但是这个清单在两个方面是不完备的。某些参照因素无疑已被忽略了，除非斯密明确提到某些利益已经得到保证，否则一条也不会包括进去。通常的情况是斯密并不引证支持某项法律的经济利益，因为这些利益是不言自明的。当劳工法固定了工资增长率以对付“目空一切的雇员”时，斯密甚至不愿提及雇主在制定法律中的潜在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这种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即使是一个不完备的清单也足以说明个人利益在经济立法中的广泛作用。商人和制造业者被挑选出来是因为他们都兼有不同寻常的贪欲和才干，而这又标志着他们在立法上所作的努力。几乎没有什么经济集团不包括在这个清单上：大地主们争当本地的节约大王，债务人也在盼望更为有利的立法，甚至连君主也更加强烈地追求他的私人利益。

各经济阶层可以得到一份编辑得更简短的政策清单，他们误认为这些政策对他们是有利的。主要的例子有：

(1)试图增加牧师助理的报酬的做法只会使更多的人加入到牧师队伍中去。

(2)1688年首次通过的关于给予谷物出口奖励金的法令并没有显著地使农民和地主获益，因为这一法令提高了货币工资。②

(3)长子继承权的实施已经失去了它曾经起过的维护财产安全的作用，并且损害了地主阶层的利益。

(4) 奴隶制度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但是它迎合了某些人的狂妄自满。③

(5) 对付囤积者(或独占者等等)的法律，只能用于平息普遍存在的偏见。

甚至诸如此类对政治权力的错误运用也是公共决策者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证明。

可是，迄今为止，我们还只是证实了斯密在讨论立法时提出的两项命题。

A. 有时(经常？)经济立法是按照那些希望从这些立法中获益的经济集团的要求而通过的。

B. 有时某个集团正是由于某项立法而犯了错误，而且并

未从立法规划中获得益处，甚至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第一个命题完全是一种陈词滥调，而第二个命题则很可能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有效：斯密所举的某些例子完全是错误的（具体地说，谷物出口补助肯定会使土地所有者获益），而且其他的例子（如长子继承法）也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人们常常会在经济生活中犯错误——请看南海泡沫的例子，在

表1　经济阶层及其政治行为

政治行为	受益阶层	出　处
1．通货贬值	君主：削减债务	第1卷：第31页[第27—28页]；第38页[第34页]
2．禁止工人的联合	雇主	第1卷：第75—76页[第66—67页]
3．高利贷法	君主：减少债务支付	第1卷：第102页[第90页]
4．排他性的公司特权	公司（行会）成员	第1卷：第133页以下[第119页以下]
5．学徒法	公司成员	第1卷：第150页[第134页]
6．财产授与法	地方社团	第1卷：第151页以下[第135以下]
7．固定工资法	雇主	第1卷：第158页以下[第141—142页]
8．反对设置收税栅	伦敦附近各郡	第1卷：第165页[第147页—148页]
9．禁止开辟新葡萄园	葡萄园主	第1卷：第172页—173页[第154—155页]
10．限制烟草种植	烟农	第1卷：第176—177页[第157—158页]
11．奖励谷物出口	农业阶层	第1卷：第219页[第197页]

（续表）

政治行为	受益阶层	出　　处
12．保护羊毛业	羊毛业	第1卷：第256页[第230—231页]
13．保护皮革业	皮革业	第1卷：第258—259页[第232—234页]
14．纸币作为法定货币	债务人	第1卷：第347页[第310—311页]
15．长子继承权	地主阶层	第1卷：第408页[第361—362页]
16．各种关税	受保护的各产业	第1卷：第474页[第420页] 第2卷：第96—97页[第550—551页]
17．取消货币铸造税	英格兰银行	第2卷：第62页[第519页]
18．殖民政策	商人	第2卷：第87—88页[第541页—543页]；第129页[579—580页]
19．选择"被列举的商品"	商人和渔民	第2卷：第91—92页[第546—547页]
20．原料的自由进口	制造业者	第2卷：第161页[第609页]
21．向受管制的公司提供赔款	商人	第2卷：第255页[第691页]
22．挫败华尔坡的税收改革	"走私商人"	第2卷：第412页[第883页]
23．家庭酿酒业免税	富裕的消费者	第2卷：421—425页[第840—845页]
24．利用债务为战争筹集资金	避免纳税人的反抗	第2卷：第455页[第872页]
25．通货升值	罗马的债务人	第2卷：第468—469页[第883—884页]
26．取消宾夕法尼亚的奴隶制	几乎没有奴隶的教友派教徒	第1卷：第412页[第366页]

政治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人们可能会设想，个人利益的首要信徒会恰如其分地引出一项有力得多的命题。

C. 所有经济效应显著的立法都是由各有关经济阶层有意安排的。

无论这个论点是否合适，反正斯密隐晦地拒绝了把个人利益作为立法的一般解释的做法。他通过各种方式来表明这一点。

1. 最重要的证据是，就大多数立法而言，没有一个集团被证明是支持某项法律并从中获得了益处的。在被忽略了的领域中，最重要的是对税收问题的讨论。每一种税都得了描述，税收的归宿得到了解释，其优点和缺点也得到了评价——但是，几乎没有解释某一个税种为什么会存在。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不考虑税收的政治基础将给斯密的政策建议造成严重的影响。

2. 立法中的难题将出现在那些斯密未能周密地考虑个人利益在立法中的作用的地方。试以禁止支付实物工资的法律为例。斯密注意到："立法当局在规定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时，从来都是以雇主为顾问的。所以，对劳动者有利的法规，总是正当而公平，但对雇主有利的法规，往往不正当不公平。"斯密用禁止实物工资的正当和公平的法律来说明了他的这一结论。

这是一件多么令人费解的事！立法机构这一雇主的产物，剥夺了雇主们用定价过高的货物来诈骗其雇工的机会（斯密说有时候雇主们也利用了这种机会）。毫无疑问，斯密的这一难题是和下述事实密切相关的，即在某些非农业（纺织业、炼铁和服装业）行业中，通过禁止支付实物工资的法律的立法机

构是受农业阶层操纵的。④

其他的例子也很容易找到。禁止下等阶层穿优质纺织品的法律肯定不仅仅是用来防止他们穿着“非常昂贵的服装”的——人们有权猜测这种立法是在支持便宜服装的制造商。与使银行券保留在有知识的人手中相比，禁止银行发行小额银行券更有可能是为了防止人们都拥入金融业。人们对诸如专制政府会比共和政体更好地对待奴隶这样的论点也表示了更大的怀疑。

3．斯密认为，情绪、偏见和无知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比它们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更大。重商主义政策的目标在于改善特定国家的贸易差额，这些差额起源于“国民的偏见和敌意”。有关谷物商人的立法是如此离奇，以致斯密把它比作是关于巫术的法律；的确，关于谷物的法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和关于宗教的法律相比拟。实际上，所有那些政治上强有力的选民都不能从中得益的不明智的立法必定都不是一种理性的立法。

农业阶级（这个阶级在斯密居住的英国有着政治上的优势）由于他们的善行和愚昧被挑选了出来：

> 地主在关于商业及政治问题的公众集会上，为本阶级的利益打算，决不会贻误国家，至少，在他们对本阶级具有相当知识的场合是如此。但实际上，他们往往缺乏这种知识。他们在上述三个阶级中，算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不用劳力，不用劳心，更不用任何计划与打算，就可以自然地取得收入。这一阶级所处的安乐稳定的地位，使他们自然地流于懒惰。懒惰不但使他们无知，并使他们不能用头脑来预测和了解一切国家规章的后果。⑤

然而，斯密常常对那些农业阶级为他们自身利益着想而建立的法律予以足够的注意。⑥

几乎没有人注意政治进程的作用，而且情况各不相同。就某些方面而言，君主是一个无能的管理者。他不能指导一个贸易企业的经营：

> 但各国君主往往从事其他商业，他们同普通私人一样，为改善其财产状态，也常常不惜成为普通商业部门的冒险家。可是他们成功的不多。一种业务，让君主经营，往往不免流于浪费，浪费就使他们的成功变为不可能了。君主的代理人，往往以为主人有无尽的财富；货物以何种价格买来，以何种价格售出，由一地运往他地，花多少费用，他们都草率从事，不去精打细算。

而且，“掌理国政者，对于自身乃至其直接从属者，大概都倾向于给予超过充分限度以上的报酬”。斯密只有在少数转移洞察力的时候才指出，只有邮局才能被“每一种政府”成功地管理。一般说来，君主制国家难免出现“怠惰和疏忽的浪费”，而民主国家则容易犯“无打算的浪费”，但是像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这样的贵族政治却是“有秩序的、谨慎的和节约的”。

可是，在其他一些场合，斯密却用完全冷酷的和理性的术语来解释政治行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形成美国革命的“最近的骚动”所作的讨论：

> 人们所以要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是因为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可以取得重要地位。自由政府组织的安定和持久，就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领导（即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如何保持或保卫其重要地位。所以，国内的派别活动和野心活动，就在于此等领袖人物不断地互相攻击别人的重要地位。他们觉得或想象，如果他们的议会——他们把它叫做国会，

> 认为其权力与英国国会相等——大权旁落，仅仅成为英国国会的低声下气的臣仆或执行吏，他们自己的重要地位就大部分丧失了。所以，他们拒绝议会派征赋税的建议，像雄心勃勃、意气昂扬的人一样，宁愿剑拔弩张地来保卫自己的重要地位。

斯密精明地提出，通过使殖民地在英国国会中占有一定的代表席位，从而使那些野心勃勃的殖民地领导人得以"从英国政治界那张大彩票中"获得大奖，而不是"从殖民地这张小彩票中"获得小奖。⑦

然而，一般说来，斯密对待政治行为的态度与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同：孩子们常常会犯错误，有时还会误入歧途，但是，如果能得到适当的教诲，他们就会有所进步。

关于税收的准则既表明了斯密的态度，也说明了他的观点中的缺陷。以下是有关赋税的若干原则：

1．一国国民，都应在可能的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库，维持政府……

2．各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更。

3．各种赋税完纳的日期及完纳的方法，须予纳税者以最大的便利……

4．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

由于斯密所考察的许多特定的税种并不满足这些原则中的一条或几条，所以他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

财政大臣可能会发现这些规则非常奇怪。如果采纳了这些规则，他们至少会暂时赢得道德哲学教授们的赞扬。不过，要组成一个集团，这批人仍然是无力的，也是很不稳定的。有两个赋税准则肯定是颇为不同的。

1．岁入体制不能危害对政府的政治支持。

2．岁入体制必须能够产生岁入。

斯密提出的原则触及到了岁入体制的方方面面，而这是与生产力和税收可得性密切相关的——虽然并非总是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但是，作为判断个人纳税情况的基础，这些原则都是很不完备的。

人们会提出许多劝告(好几代经济学者都得到过这种劝告)，而没有考虑到政治势力的作用，但是这些政治势力却限定和指导着政策的实施。在不了解这些政治势力的情况下，这些劝告往往是十分糟糕的和缺乏说服力的。如果人们并没有取消商人和制造商们已经获得的保护主义措施的方法，那又为什么要告诉君主自由贸易是可取的呢？当只有通过一场革命才能取消某些阶级所受到的税收优待时，为什么要告诉法国君主废除贡税和人头税而增加二十分取一税呢？⑧ 为什么要相信好的道路只能指望由一个更为优越的阶层来管理呢？

对照一下斯密对政治改革和其他改革的讨论是很有教益的。他说，牛津大学的教师们完全忽略了他们的教育职责。斯密是否向每个教师鼓吹道德改革，以寻求一种勤奋和优良意识的保证呢？斯密认为这样一种救治办法是愚蠢的：教师们精明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是"尽可能轻松自如地生活"，因为他的收入并不依赖于他的努力。一种建立在努力和成就，而不是每周一次的布道基础上的报酬制度，将带来斯密所希望

的那种变化。

在政治方面，斯密并没有相应地去追求有效的行为准则。因此，如果说改革将受到某种影响的话，那么它必然是受到道义劝说的影响。从好的方面说，这至多是一种格外缓慢而又不确定的改变政策的方法；而从坏的方面说，则可能会导致出现危害社会的政策。当然，错误的和不尽如人意的公共政策起源于理解上的失误以及自我服务集团的努力，但是，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接受斯密暗含的假设，即错误的主要根源是无知或"偏见"。然而，斯密解决错误政策的唯一办法就是强有力的分析，而这种办法只适用于遭到反对的政策中的一小部分。

对于斯密将个人利益的原则用于研究政治行为的失败似乎无需作什么解释。在斯密之前的2300多年时间里，政治科学就一直是一门规范性的科学，至今也仍然如此。伟大的边沁（他确实用他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假设来分析了政治和其他社会现象）从未超出鼓吹他的理论如何恰当地解释了立法的范围——那正是为什么他的那套大原则始终无效的原因。

然而，用其他人的失败来解释斯密的失败是不会令人信服的，因为斯密是一个更为卓越的人物。他考察最正规的机构和最高傲的经济学大师们带有偏见的行为——显然他以此为乐——的能力是他的学术水平的标志之一。如果说"无数个人都在普遍地不断地努力以改善自己的境况"，那么，为什么这种努力会由于某一个人进入议会而被打断呢？如果说一个视野宽阔的人会把 1739 年的西班牙战争看作是上帝的恩赐，会把封建主义的衰亡归之于消费格局的变化，他怎么会没有注意到在政治家和选民面前提出个人利益呢？如果要否认国

家除了邮政之外还有经营任何其他工商业的能力，他又怎么能赋予君主以根除公民的懦弱这一任务呢？怎么会这样呢，斯密教授？

对个人利益机制失灵的最后总结

正是在政治斗争的竞技场中，斯密发现个人利益在引导人们的行为方面的失误是大量的和一贯的，但是，这并不是个人利益机制失灵的唯一地方。由于个人利益机制的有效运转在斯密的著作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把斯密所描述的这种失误的性质加以概括是有用的。

可以把人们在为个人利益而作决定时的每一个失误看成是逻辑上的错误：所选择的手段不适用于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不过，区别一下几种失误的类型也是有用的，这些失误在《国富论》中均有所论述。

第一种类型：一个人可能知道“事实”，但是他没能预测到他的行为将造成的结果。在斯密的著作中有一个例子是地主的偶然行为。斯密不只一次地指出：“改良土地未必都由地主出资。不过，在续订租约时，地主通常要求增加地租，好像改良是由他出资搞的。”出于贪婪，地主的眼光常常是很短视的：他消除了承租人改良土地的刺激因素，与现行的收益率相比，这种刺激因素将给承租人和他本人带来更大的收益。因此，存在着一种地租制度，这种制度会使承租人和地主的境况都得到改善。这一更为优越的承租形式并不要求任何第三者的合作——只要求在书写租约时能够有一种明晰的推理和那么一点儿创造性。个人利益机制的失灵完全是因为未能恰当地进行推理。

以下是未能恰当地进行推理的几个补充例子：

（1）学徒制度并没有给学徒以勤奋工作的适当刺激。

（2）只有地主才能经营没有地租的土地，因为他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得地租。

（3）如果能将王室土地廉价出售，则它们将更有价值。

有关个人利益机制失灵的一个重要附类是有关未来的知识不完备：未来的收益被高估了，或者未来的代价被低估了。其例子有：

（1）相对于潜在的亏损而言，风险行业的潜在收益被高估了。

（2）工人们在供应品充足的季节往往不能预见到在短缺季节里将要出现的价格上涨。

（3）计件工资"很容易使工人们过度地工作，并在几年之内就损害他们的健康和体格"。

（4）在没有高利贷法的情况下，将由贷款人来和那些"浪费者和投机家"打交道（他们将无力归还贷款吗？）。

第二种类型：在一些十分重要的情况下，雇主或主人无力控制他的代理人，所以他们将根据自身利益来采取行动。以下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1）奴隶们常常由那些"不留心的和疏忽的监工"来管理。

（2）垄断是优良管理的大敌。

（3）东印度公司的雇员是按照他们自身的利益来开展贸易的。

斯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并非所有的代理人或雇员都表现出自我服务行为的同一倾向，也许这一指责只是针对他基于

其他理由而反对的制度的。

第三种类型：在现在被称为公共产品的政府服务的生产过程中，个人利益并未导致个人供应出正确的产品数量。斯密举出了由公民个人准备战争是不充分的这个例子。与其说这是个人利益机制的失灵，不如说是个人行为的失败。

如果其重要程度是根据所举事例的数量和种类来衡量的话，那么第一种类型(非政治性的)的失灵将是《国富论》中所论述的最重要的失灵。这一类失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关于现实情况的信息不完备，而且痛惜斯密没有能讨论个人在获得知识方面的最适度投资也将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应该注意到，人们已经含蓄地指责所有阶级都未能充分地分析已知的事实，这些阶级是：贪婪的地主、急躁的工人、疏忽大意的雇主和目光短浅的贷款人。尚未找到一个明显的原则，人们能够依据它来把这些失误和那些有效地促进了人们的各种个人利益的决定区分开来：这些决策并不是那么特别微妙或特别需要信息。我相信，人们可以作一个公平的判断，前面所说的每一种失误都是不存在或微不足道的。像其他所有高级牧师一样，个人利益的高级牧师们同样是需要罪人的。

注　释

①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Cannan (London: Methuen, 1961), I, 313(279).

② 在必需品的赋税上还有一种有关的论点。

③ 因此，这种制度是为个人利益而不是为生产服务的。

④ 我们无需探索为什么在某些行业中实物工资更受欢迎的原因；乔治·希尔顿的解释似乎并不那么具有普遍意义；"The British Truck System in the Nineteenth Centa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57。

⑤ 劳动者也不一定更好："但是，劳动者的利益，虽与社会一般利益密切相关，但他们没有了解一般社会利益的能力，更没有能力理解本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

⑥ 在一个与此相反的有趣的论点中，斯密认为，如果承租人拥有选票，那么，他们的地主就会更好地对待他们。

⑦ 可以把英国保留不能获利的殖民地的原因归究于行政官僚阶层的利益(第2卷：第131—132页)[第581—582页]。至于用君主的利益来解释政治行为的一个更为次要的例子，请参看第2卷，第252—253页[第688—689页]。

⑧ 而且斯密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参见斯密：《国富论》第2卷，第437页[第855—856页]。

13

斯密教授的成功与失败*

《国富论》问世于1776年3月9日，至今或许已经历了足够的时间，可以容许我们对斯密教授的成功与失败作一个公正的估价。这是斯密本人可能原来就已表现出强烈而自然的兴趣的课题。约翰·雷曾描述过斯密临终前的情况：

> 斯密在感到自己行将就木之时，急于要毁掉他的全部文稿（只有少数几篇他断定是十分完善、值得发表的除外），但是他显然太虚弱，不能亲自处理这件事了，他就一再恳求他的朋友布莱克和赫顿代他烧毁那些文稿。……布莱克和赫顿经常推迟答应斯密的恳求，希望他能恢复健康，或者改变主意；但是，最后斯密在逝世前一

---

* 原载于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 (1976)。© 1976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周，特地请他们来，要求他们就在当时当地烧毁他指定的16卷手稿。他们照办了，不知道也没有问手稿的内容。"

一个人只有当他对后代子孙将会对他有什么意见极端敏感时，才会坚持这样的行动。斯密这样做自然是错了：在那16卷手稿中，并没有什么毒害和谬论是我们所不能原谅的，特别是因为我们知道斯密既不喜欢放毒，也反对乱发谬论。

如果说作出评价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我对于自己是否有写这篇评论的资格却不那么有把握。有时我和孩子们作游戏，我称这个游戏为"三个问题"。如果三个问题都回答正确，我答应给100万美元。毫无疑问，证券和交易委员会最终会禁止这个游戏，或许联邦储备体系将会让它存在下去。前两个问题不难，也许是问孩子有几个兄弟姐妹，他住在什么城市。第三个问题却全然不同。有一次，我问："亚当·斯密最好的朋友是谁？"这个孩子回答道："你就是，乔治叔叔。"我心目中是指如大卫·休谟、詹姆斯·赫顿或约瑟夫·布莱克那样的人。然而我早就是斯密的一个好友，尽管我无权说处于斯密友人的前列。我相信，我的友谊不会使我对斯密作出偏颇的判断。

我提出的任务，无论如何都不是索然无味地去颂扬或者责备斯密。任何一个学者的成功，在于他的学说中他想劝说其同辈和继承者留意阅读的那些部分。李嘉图或约翰·穆勒，抑或托伦斯采用了斯密的某个理论，这并不一定说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它，而是说他们的作品和思想受到斯密理论的指导。相应地说，斯密的失败则在于他那些为继承者所忽视或拒绝的理论。如果斯密错了，我们自然期望有能力的后继者会加以纠正；但我们也将发现，斯密的一些最精采的理

论被忽视了。不管怎样，在评判一个学者的成功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对其学说的判断。

我希望，我们对斯密的成功与失败会真正感兴趣，理由很简单，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伟大的经济学家。我提出的问题也具有较广泛的意义，即我们能否确定理论的哪些特征有助于或有损于这一理论被人们所接受？①

1. 恰当的成功

经济学上的一个命题，如果成为同时代的和后继的经济学家的实际工作体系(所谓的范例)的一部分，那就是一项成功或胜利。那些经济学家们要么接受和使用这一命题(特别强调"使用"这个词)，要么否认和怀疑这一命题(特别强调"怀疑"这个词)。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他们的工作都受到这一成功命题的影响，也确实都是对成功大小的衡量。所以，我再说一遍：一种理论分析，如果它成了后继者们充满活力的经济学的一部分，这就是一项成功；如果某种理论(不管是否由斯密所创立)日后的运用是受到斯密理论的强烈影响的话，那么这种成功也应归之于斯密。因此，我不打算去确定斯密从他的先驱者那里得到哪些东西；我只要说他得到的东西虽然多，但比起我们从斯密那里得到的东西要少得多。可以用牛顿说他自己的话来比喻斯密，牛顿说："如果我看得更远一些，这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这句话适宜于用来同先驱者相比较，而不适于同辈间的比较，因为同辈可以站在同样的肩

上。

斯密有一个极端重要的胜利：他把在竞争条件下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的系统分析置于经济学的中心地位上。这个理论是《国富论》王冠上的宝石，它成了(而且至今仍然是)资源分配理论的基础。各种资源都在寻求最有利的用途，因此，平衡起来，每种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的收益率将会相等。这一命题仍然是一切经济学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命题。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将这个竞争性价格理论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应用，即斯密的各种行业工资率和利润率存在差别的理论，列为斯密的第二个胜利。斯密提出的著名的引起工资率和利润率表面上(而非实际上)差异的成本因素——训练，难易程度，职业安定程度和信任度，100年以来一直为他的继承人所接受，而且实际上常常被逐字引用。②这个材料是马歇尔著名的工资理论和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直接起源。所以，价格理论的这一特殊应用或许值得列为斯密的第二个成功。

斯密的第三个即最后一个主要的成功，就是他对重商主义的抨击。我衡量成功的标准是看一个学者对其他学者的影响，而不是看他对公众思想或公共政策的影响。斯密抨击了保护主义的一切基本形式：关税、奖励金、强制使用本国船只、对殖民地企业的限制等等；这种攻击是牢牢立足于他的竞争性价格理论的。在公共政策方面，关于自由的个人选择的重要论据就是竞争的有效性：企业主或农场主，工人或船主，在寻求自己最大限度收入的过程中，就会将资源投放在对国家最有利的地方："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

字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价格理论的这一应用，也是主要命题的一个推论。但其发展如此广泛，成就如此伟大，显然值得称之为斯密的第三个主要的胜利。

我一向很少引用斯密的原话，仅想举出一个例子来表明他论证的有力。下面是他对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部分描述：

"仅仅为了要培植顾客而建立一个大帝国的计划，乍看起来，似乎只适合于小买卖商人的国家。究其实，那种计划，对于小买卖商人的国家，也是完全不相宜的，但它适合于政府受小买卖商人影响的国家。这样的政治家，也只有这样的政治家，才会认为，用同胞的血与财宝来建设并维持这样一个帝国是有若干利益的。你对一个做小买卖的商人说，你卖给我一块地皮，我就会常常在你铺子里购买衣物，虽然你铺子里的卖价比别家铺子昂贵。他不见得会很踊跃地接受你的提议。但若另一个人卖给你这样一块地皮，并吩咐你要在那个小买卖商人的铺子里购买你所需的一切衣物，这小买卖商人对他便会非常感激。有些英国人在国内不能安居，英国给他们在远地购买了一块大地皮。诚然，其价格很小，不是今日的普通买卖即30年年租，而只等于初次发现、踏勘海岸和夺取土地的各种费用。但土地是良好的、广阔的，耕作者有大量的土地可耕作，有时又能自由随意地在任何地方售卖其生产物，所以不过三四十年(1620—1660年)，就变成了一个如此富庶繁荣的民族。于是，英国的小买卖商人及其他各种商人，都想长久独占这些人的光顾。他们不敢说，他们原来用一部分货币购买土地，嗣后又用一部分货币来改良土地，他们只向国会请愿，要美洲殖民地人民将来只许到他们的店铺购买：(一)殖民地人民所需的一切欧洲产货物，都得到他们的店铺购买；(二)殖民地人民要把他们认为适于购买的那些殖民地产物，全数卖给他们的商店。他们并不认为全部产品都适

于购买，因为其中有若干部分如输入英国可能会妨害他们在国内经营的某些商业部门。这若干部分产品，他们自然希望移民们尽量对外出售，卖得愈远愈好；因此，他们提议，把这些产品的销售市场限定在菲尼斯特海角以南各国，这种真正小买卖商人的提议，在有名的航海条例中定为一个条款了。"

从1776年到今天，这种强有力的抨击，因李嘉图、穆勒和其他人的理论发展而加深，其结果是确定了自由国际贸易的传统。这种传统，即使是最坚信经济干预主义的人，也很难与之正面交锋。

斯密第四项相当大的成功，在于他对工资基金理论所作的论述。这个理论用支付劳动的基金（工资基金）对雇用劳动者人数的比率来表明短期的平均工资水平。它有一个暗含的条件，即在中等长度的时期内工资基金大体不变，因此，它并非同义反复。姑且不论这个理论是否有用（我认为它是有用的），它统治了其后100年的英国经济学，这却是毫无疑义的。不能肯定的是，斯密对此理论阐述得是否清楚。他明确说明了这个理论的实质，例如他说："很明显，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定随着预定用来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而成比例地增加。这种资金有两种：一，超过维持生活需要的收入，二，超过雇主自己使用需要的资财。"下面将说明，斯密的工资理论是以工资基金机制为基础的。唯一的真正缺点是，斯密没有明确地规定工资基金的内容。③

我是在用粗线条勾勒，那些使一些次要的经济学家引以为自豪的管见和论据，不值得落笔。例如，关于钻石和水的价值的著名反论，便以无可回避的方式提出了边际效用学说

的中心问题，这在任何次要人物的著作中都引起注意。但我所举出的这四项成就中的前三项，已成为经济学的永久性部分。

2. 不恰当的成功

不恰当的成功是指一种错误，或指一种没有成果的、不能发展的课题或分析方法，但它对同辈或后继者有影响。我们都希望并且相信，大多数可以论证的错误会很快被查出来，但对于多少未能就一些有用的知识加以辨认、组织和利用的分析，则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发现。

符合后一种情况的，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即斯密书中一个重要的题目：他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理论。

> "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制造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候，不会随生随灭。那似乎是把一部分劳动贮存起来，在必要时再提出来使用。……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固定亦不实现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上。家仆的劳动，随生随灭。……"

这种区分的目的很清楚：如果我们按照其产品能够积累起来的特点来说明生产性劳动，则资本的形成只能来自生产性劳动的产品。这种区分有两个困难。即使斯密是正确的，广泛使用生产性劳动也仅仅是为资本的积累提供可能性，而新

资本的实际形成，需要一个完全独立的储蓄行为。因为大部分有形产品并未积累为资本，而通常是被消费掉，这样，在生产性劳动与资本增长率之间就只存在着极为松弛的联系。

另一困难是：还有并非生产性劳动的结果的投资行为。在我们现在称为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不会如一般所理解的那样，会具体化于有形的、可卖的商品之中。然而，斯密同意，社会资本有一部分是由其居民学到的有用才能所组成，对于这一点他还应加上新发现的知识。斯密说："学习一种(有用)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除非我们把教育和训练包括在生产性劳动中(斯密把"各类文人、学者"列入非生产性劳动)，否则生产性劳动的存在对于资本的形成也不是必需的了。④

生产性劳动的概念，对于斯密的继承者从未产生深刻的印象。西尼尔和麦克库洛克就否认这种区分，约翰·穆勒对其加以改良，使它几乎不存在了。⑤所以斯密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小的、不恰当的成就。⑥

3. 应有的失败

斯密在劝说经济学家们方面的失败，如他的成功一样，可分为两类：一些失败是应有的，而另一些则是本可以取得成

功的。我们首先考查应有的失败。所谓应有的失败，包括分析上的错误，或是指一种在实证上肤浅的或错误的世界观。

斯密最明显的应有的失败是他的资本用途体系，见于《国富论》第2篇第5章"论资本的各种用途"："资本有四种不同的用途。第一，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须使用和所须消费的原生产物；第二，用以制造原生产物使之适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费；第三，用以运输原生产物或制成品，从有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以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产物或制成品，使之成为较小的部分，适于需要者的临时需要。"所有这四种活动彼此之间，以及对"全社会的福利"都很重要，然而，如将资本投入这一系列活动的前面阶段，就比投入后面阶段能使资本更富于生产性，即能动用更多的劳动，使社会年产量增加更多。理由很简单：零售商的资本只雇用他自己，可能还有一个营业员，其余的资本都用去购买他出售的货物，从而偿还前面阶段的资本。在另一端，"农业家的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最大"，因为他的全部资本都用来供养劳动者，此外还利用了自然的肥力。

斯密的错误是明显的。他用资金供应体系掩盖了经济生活的事实。如果消费者不付钱给零售商购买谷物，而是付钱给农民让他种植谷物，付钱给磨粉人让他碾磨，付钱给船长让他运输，付钱给零售商让他贮存，这样，每个人的资本都会全部用于直接支持生产了，但是情况却没有什么大变化。

假如斯密确实将这个错误纳入他的理论体系，其后果必将是灾难性的。举一个重要的例子来说，关于私人控制投资的论点就会受到损害而不可弥补。但是这一点仍然是一个局部性的缺点（虽然斯密在书中重复提到过一次），麦克库洛克

曾正当地加以反驳，西尼尔和约翰·穆勒未予以重视。

人们一般地(无疑是正确地)将这个错误归因于重农主义者的影响：并没有免费到巴黎旅行这种事。但这是关于错误由来的一种说法，不能解释斯密犯错误的原因。是否可以用他反对奢侈的观点来解释他的错误呢?——下面我将提到他在这方面的态度。

与此有联系的另一个错误（如果以它在《国富论》中重复出现的次数来衡量，也是斯密比较重视的论点)，就是规定出国内贸易、国外贸易和在各国间进行转运贸易的社会有效性体系。他认为国内贸易，例如从苏格兰购买制成品运到伦敦卖掉，又再买进英格兰的谷物运回爱丁堡，这种贸易往返一次可以偿还两个英国的资本，然而国外贸易却只能偿还一个英国的资本，转运贸易则一个也不能偿还。此外，本地贸易的收益比远地贸易来得快。斯密的这种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如果各类贸易每年提供相等的资本收益率，则由国外贸易转为国内贸易将减少国民生产总值（尽管资本的输出自然要影响工资)。斯密的继承者对这一错误观点却不大赞成(如李嘉图)。

一个迥然不同的错误(或许根本不算什么错误)，就是斯密的价值尺度，这个错误的根源同使他对农业估价过高的根源是一致的。斯密曾敏锐地感觉到价值的货币尺度很不稳定。《国富论》中就有相当可观的关于货币品质降低和通货膨胀的史料。他提议，以普遍劳动1小时的劳累程度，作为最终的价值尺度：

> 等量劳动，无论在何时何地，对于劳动者都可以说有同等的价值。如果劳动者都具有一般的精力和熟练与技巧程度，

那末在劳动时就必然牺牲等量的安乐、自由与幸福。他所购得的货物无论多少，总是等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只有本身价值绝不变动的劳动，才是随时随地可用以估量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和真实标准。

如果说，这确是一个错误，那末斯密的错误就在于假设从事1小时劳动的心理消耗，就其对于一个人的意义来说，要比经由消费某包货物得到的心理上的快乐更加稳定。劳累的不稳定性至少起因于3种情况：(1) 它随着技术条件而变化——例如，在现代社会中，举起重物(的劳动)几乎已被消灭了。(2) 它随着人的训练程度而变化：在从事工作的劳累之外，还必须加上学习劳动技巧的劳累，而这一追加额已随着分工的发展而不断在增大。(3)它随着劳动时间(从而随着收入)而变化。与此对应的一种观点，是把会带来同等程度的满足的一包消费品作为价值的单位，这种观点可以免除上述的第二个困难，也许还能免除第一个困难(取决于人们怎样看待新产品)，但是它当然不能免除第三个困难。

斯密之所以反对用消费品作为确定价值的尺度，是由于他认为奢侈品都是无意义的东西，它们提供的是一种虚幻的享乐，随同消费而消失。这个观点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有广泛的论述，在《国富论》中也得到充分的表述。⑦斯密认为，几乎一切经济行为都有一种幻觉，一种或许永不会破灭的幻觉，即较大的财富总会带来较多的满足。斯密的这种观点是他最大的特点之一。

斯密的第三个错误，或许我们应该说是属于使用不当的错误，这就是他的货币理论。斯密认为，社会上只需要一定数量的货币流通，多余量将输出(如果货币是金银)或兑换成

黄金(如果货币是银行券)；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讲，一个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是固定的。假如像斯密所假定的那样，外汇是固定的，而纸币可以充分兑换，则这个理论可作为初步近似数而站住脚：这个理论隐含着一个简单的购买力平价论。⑧

人们对斯密理论的不满，不在于它的正式错误，而在于它从休谟货币理论的普遍性和预测力方面的后退。

4. 不应有的失败

还有一些是斯密本应该取得但未能取得的成功。以他的巨大威信和说服力竟未能使那些正确、深刻而丰富多彩的观点获得人们的承认，看来似乎是荒谬的。

这些高超理论中的第一个，就是对生活维持费决定工资的理论的反驳。我们可以回忆，斯密认为在大不列颠，工资一般与生活水平不相一致；为此，他举出4个明显的理由：(1)夏季工资高于冬季工资，但生活费的变化正相反。(2)生活费用逐年变化很大，而一些工资的变动却很缓慢。(3)各地的生活费用差别很大，但各地工资差别较小。(4)生活费用在时间上和地点上的变化，常常与工资的变动相反。所有这四点理由，特别是前两点，不足之处是只集中了工资和生活费的短期对比材料。但它们是相当值得重视的。此外，斯密还提供了关于英国与北美殖民地实际工资不同的很有说服力的长期例证，这个例证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愈来愈有力量。

斯密提出了另一种理论，它在预测工资率时肯定比生活费理论更为有效。他提出，(例如)非熟练劳动力的"那种"工资率是按下列公式决定的：工资率＝生活费水平＋λ(Δ[资本]/Δ[时间])，(λ>0)，这就是说，人口的变动落后于资本的变动，所以"……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的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社会静止的状态下，他们的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的状态下，则是困苦的"。这种工资理论，尽管像是很有道理，却被马尔萨斯的简单理论（它假定λ＝0)轻易击败，达百年之久。

斯密的第二个理论历时一个多世纪才得以流传，这就是他的地租理论。他始终按照应有的方式去对待地租：地租是一项生产费用，是将土地从其他用途转而用于任何一种用途所必须支付的代价。而就一切用途来说，地租总是一种剩余。这个理论是在第1卷第1篇，第11章"论地租"中提出的，既不含糊，又不明确。的确，我过去一直怀疑自己对斯密地租理论的理解，直到我发现D·H·布坎南(1929年)较早的并且完全一致的看法为止。斯密说过："因此，同是一亩土地，家畜肉的出产量，比谷物出产量少得多，家畜肉较低的产量，必须以较高的价格得到补偿。假若价格的优越程度超过这个限度，那末就有更多的谷田，改为牧场；假若价格的优越程度没有达到这个限度，那么已用作牧场的土地，一部分又必改为谷田。"他在这里提出的关于"替换成本论"的许多认识几乎没有受到注意，何因使然？要追溯原因是困难的。对这一理论，约翰·穆勒只是胆怯地予以承认，而马歇尔则拒绝给以充分的信赖。但是与所讨论的斯密的其他理论不同，这里的

正确理论表述得比较零散，有些部分不清楚，所以这一理论之未受到注意，斯密本人要比他的后继者应当受到更多的责难。

斯密的最后一个令人遗憾的失败，就是使他享有很高声誉的劳动分工论。怎么能把他书中著名的开头几章（以及他使其不朽的扣针制造厂）看作一个失败呢？难道那些论述不是在所有经济学论文中像任何其他段落一样经常被引证的吗？的确，许多年以来它们一直为人们经常引证。⑨

这种失败是另一回事：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没有人使用斯密的分工理论，因为几乎不存在这种理论。在巴贝杰关于制造业的说明中，大大增加了对分工的描述。对分工的描述也是马歇尔外部经济性理论的有关部分（工业地方化）的基础。在亚林·扬和我自己的论文中，更多地称颂、甚至稍为利用了的是斯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原理，罗纳德·科斯关于企业的著作显然属于同一类。但是，对于说明斯密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东西并不存在标准的、有效的理论。

斯密对分工作了极其令人信服的说明——这在我看来，今天讲专业化的力量同样有说服力。然而，就我所知，没有迹象表明，从斯密那个时代以来，这个课题的理论有何重大进展；专业化没有成为现代生产理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正好可以解释这样的事实，即现代的规模经济的理论，不过是一套可供选择的概率。

5. 对于成功和失败的认识

科学工作的一般规律是：一个学者的成功和失败，由他的同辈来鉴定，而他们的鉴定又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鉴于斯密写作的时期，经济学家(即使是兼搞经济的人)很少，所以我们或许可以把19世纪初期看作接近于斯密同时代。他的实际情况证实了这个一般规律。斯密的一切成功，恰当的和不恰当的，在《国富论》首次出版后50年内肯定就已经达到。他的一切失败，应当的与不恰当的，同样如此，这几乎是(也不完全是)多余的话，即恰当的成功与失败，能迅速地被识别出来，但是对一项不恰当的成就(回想一下，斯密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就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就不一定能很快作出处理。

说到不恰当的失败，饶有趣味的是它们并未影响后人对被忽视了的贡献的采用。当地租理论最后被校正时——这项进度主要发生于1890至1910年间——正确的阐述与斯密的深奥而不清楚的见解完全没有什么联系。从1825年起，马尔萨斯的工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抛弃，这个时候，人们并未采用斯密的似乎很有见地的人口变动落后论。实际上，人们长期没有采用别的什么理论，而人口(问题)也不再受到经济学界的注意。人们又主张，专业化理论的出现与斯密（的分工论)无关，这就完成了“三部曲”(因为这些理论正是三个科学上的悲剧)，这样做或许是轻率了；但从历史的立场看，如

果提出相反的主张，那甚至是更加轻率。

当然，一般的规律也有例外。一个人的同辈的评价有时到很晚才为科学继承者所接受。康替龙、屠能、古诺以及戈森或许就是经济学史上的主要例外。这些例外对熊彼特来说，是对同辈人闭塞的头脑和狭隘的眼光感到相当可悲的泉源。但是如果希望一门科学能立刻评定一切科学作品的最终价值，不犯不足或过头的错误，那似乎是徒劳的。

然而，同辈人的鉴定具有权威性的规律，尚有其他的根据：科学是社会性的追求知识的活动，而不是独立的个人调查。一个学者如不能影响他的同辈（不去说服他的同辈以不同方式工作），就不是那门科学的有效成员。有时候他确实可能是太有远见了——要在内燃机未出现之前，去发明圆盘刹车——但这是如此罕见的失败原因，以至于认为读前人的书对于发现新的美好的观念是效率最低的方法。在学者们失败的原因中，占压倒优势的是，他们的观点或错误，或是缺乏创见，或是很不成熟，以致不能对他们的同辈提供有益的指导。这就是为什么要以社会为单位来鉴定失败的正当理由，而后来的学者们接受这种不朽的判决，是十分明智的。

6．成功和失败的来源

对于一个理论来说，正确毕竟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正确仅仅意味着有限的错误，否则我们甚至得不到一个新句子。理论必须有助于向世界解释：经济学正试图

去了解(世界)，而局部的解释总比没有解释好。

逻辑上的错误，有时足以使一种理论不成其为理论。斯密关于资本的四种用途的理论，在科学上没有发展的前途，原因正在于此。然而，有的理论往往可能通过逻辑上的修正，保留它的实质。这或许就是对斯密的资本用途体系的理论进行逻辑上的批判不那么普遍的理由——经济学家们(如李嘉图)根本不理睬这个理论；而且我们相信，他们的反感至少部分地是来自一种看法，即这一理论的整个研究方法是无成效的和费事的。

然而，任何理论都难免有缺点：逻辑可能相当严密（尽管严密的标准不是不变的)。但是问题的表述本身总有一天会被证明是愚钝的。

斯密理论的可接受程度，且不谈其逻辑的一面，很少受到他用以支持其理论所列举的特定例证的力量的影响。他为反对生活维持费工资理论而举出的强有力的实际例证遭到忽视。而他对自己在竞争条件下收益率均等化的理论的支持，仅仅是偶然的和讲故事般的。我们说，证据缺乏针对性，没有定量，这并不是说它就没有分量。如果理论与广泛观察到的现象(如生意兴旺的商人人数的日益增长，一段时间内新产品价格的下跌)相一致，就能说服人们遵循这一理论，探索未知领域。然而，100年后，当克里弗-莱斯利否认收益率均等化的趋势时，却几乎没有记载在案的宝贵证据去驳斥他。

但是，有关分工的普遍性的证据肯定也经受了与广泛观察相一致的这一考验，事实上，必然如此。试问一个现代经济学家，要他举一个非专业化劳动的例子，他就只有回想鲁滨逊·克鲁索。然而，我们看到，在经济分析中很少系统地

或正规地使用分工的概念。

我们在前面已暗示了分工原理与收益率原理的两种不同的命运。后者是高度有力的概括，可立即应用于最突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上：为什么有一些行业比其他行业赚钱多一些，为什么重商主义和类似的国家干涉，以及私人独占，会引起资源的分配不当；谁应当负担各种租税，分工的理论不是没有后果的——举例来说，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理论便与保护主义有关——但是用到分工理论之处极为少见。

所以，斯密在他该成功的地方取得了成功，首先是在人的行为方面提供了一个几乎具有无限威力的原理，他创造了在竞争环境中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这个创造就其普遍性而言可以与牛顿的创造媲美。今天，我们正忙于将这一创造扩展到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各个领域(在这些方面，斯密自己仅仅作了并不系统的研究)，这一行动便是对斯密成就的宏伟和持久性所表示的敬意。

注　释

① 我在1965年的著作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目前研究的途径完全不一样，尽管答案是一致的。

② 对"信任的作用"斯密的分析不够令人满意，远未为后人所完全接受，斯密举出的引起差异的第五个因素——成功的可能性，不是以费用为依据的差别，并未被人普遍接受，争论很多。

③ 这是陶西格在其工资基金的标准历史中的主要保留。但是这个基金并不像斯密的后继人及陶西格设想的那样规定其内容——它并不单纯是"在经销人手里、准备卖给工人的消费品"(或消费品总额)。工资增长的时期决定着这些消费品需要具备的"准备"程度，这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④ 威廉·普莱费尔在他编印的《国富论》中指出，即使是家仆的使用也可能是一种生产性行为："……比如说厨师，他是个家仆，在旅馆中，他像其他任何旅客一样使老板增加财富；另一方面，一个在私人家庭里为其主人司缝纫事的仆人，是仅仅作为家仆在活动的，她不过是供给主人的需要，为主人提供舒适，但她的活动方式与她去点燃炉子、洗擦房间的活动完全一样，而根据这一定义，她是一个生产性劳动者。"

⑤ 大卫·布坎南，一位影响较小的人物，是划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强烈支持者。

⑥ H·迈因特希望将生产性劳动的概念(扩而大之，经济发展的概念)定为斯密著作的中心，并认为完全是恰当的成就。我的主张恰好相反：增长并不是斯密体系中走向经济福利的唯一重要的途径，生产性劳动的概念对于增长并不重要。但是斯密这一划分取得小小的成功，是有历史记录可查的。

⑦ "(封建领主)他们就宁愿把足以维持一千人一年生活的粮食或其价格，用来换取一双金刚石纽扣，或其他同样无用且无意义的东西，随之也把这粮食所能给他们带来的权威一并舍弃了。"

⑧ 斯密假定纸币可以充分兑换。

⑨ 巴贝杰讲了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即普罗尼怎样因读了斯密这个题目的论述，就能计划出法国革命政府的伟大数学表。

参 考 文 献

Babbage, C.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Knight, 1842.

Becker, G. S., and Stigler, G. J. "Law Enforcement, Malfeasance, and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 *J. Legal Studies* 3 (January 1974): 1–19.

Buchanan, D. *Observations on the Subjects Treated of in Dr. Smith's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the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Ogles, Duncan & Cochran, 1817.

Buchanan, D. H.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to Rent and Price

Theory," *Economica* 9 (June 1929): 123-55. Reprinted in *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Philadelphia: Blakiston, 1946.

Coase, R.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s. 4 (November 1937): 386-405.

McCulloch, J. R.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Edinburgh: Tait, 1825.

Malthus, T. 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urray, 1820.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961.

Mill, J. 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4,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Society*. Toronto: Univ. Toronto Press, 1967.

Myint, Hla. "The Welfare Significance of Productive Labour." *Rev, Econ. Studies* 9 (Winter 1943): 20-31.

Playfair, W., ed. *The Wealth of Nations by Adam Smith*, London: Cadell & Davies, 1805.

Rae, John, *Life of Adam Smith*. London: Macmillan, 1895.

Ricardo, D.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Vol.1,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1.

Schumpeter, J. A.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54.

Smith, A.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Dublin: Beatty & Jackson, 1797.

______.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Clarendon, 1976.

Stigler, G. J.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J.P.E.* 59, no.3 (June 1951): 185-94.

______.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Chicago: Univ. Chicago Press, 1965.

______. "Mill on Economics and Society." *Univ. Toronto Q.* 82 (October 1968): 96-102.

Taussig, F. W. *Wages and Capital*. New York: Appleton, 1899.

Young, A.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Econ. J.* 38(December 1928): 527-42.

14

穆勒论经济学和社会*

在一篇和老穆勒一样公正的入门性论文中，罗宾斯勋爵正确地批评了约翰·斯图亚特的最朝气蓬勃的著作中的傲慢自大和教条主义。穆勒后期的关于劳工和经济改革的重要论文中存在着一些缺陷，我为此深感痛惜。但是，罗宾斯勋爵的抱怨使得许多精彩的论文无可哀叹，这些论文构成了这两卷中的主要部分，剩余的部分将编进有关题目的以后几卷之中。毫无疑问，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穆勒的声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一代人心目中处于最低点，而现在却蒸蒸日上，并且由

* Review of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s. IV, V: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Society, edited by J. M. Robs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7). Reprinted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October 1968.

于这种编纂精巧的经济学论文选集而声誉鹊起。

穆勒作为经济学家的声誉在他死后不可避免地趋于下降。他的声誉受到影响的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在其抽象思维和实证研究方面变得比较正规化，因而与他的风格相去甚远，并且不太考虑他所研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位谦谦君子没有宣扬他在理论分析方面的成就。

人们越来越把穆勒看作是李嘉图主义经济学的一位卓越忠实的捍卫者，他归属于(但未必真正加入）一种范围广泛的和富于同情心的社会哲学。埃里奇·罗尔爵士傲慢地批评到：

> 简言之，他的经济理论缺乏逻辑的严密性，而他的社会哲学则缺乏当今日益需要的坚定的连贯性。
>
> 但是，尽管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一位经济学家，尽管他未给后人留下一套庞大的政治哲学体系，然而他不应被认为不重要而遭忽视。他能够将理论折衷起来，并且把政治调和成一种能广泛被人接受的体系，他的重要意义恰好存在于这一事实之中。

在大量论著中描绘出立场模糊的思想，要比教科书更具有权威性：人们可以从熊彼特（然而从整体上说他是穆勒的崇拜者）、布劳格和研究经济学说史的老前辈瓦伊纳等人的著作中得到验证。

我曾经指出，穆勒是一位格外具有创造力的理论家。这里所评论的著作进一步说明了这一情况。实际上，穆勒在18岁时（1825年）发表的一篇关于“谷物法”的论文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我第一次听说穆勒反对一项关税：

> 已经证实“谷物法”将危害社会中所有的人，而只对地主有利，我们在这里可以结束评论……
>
> ……假如消费者和资本家所失去的为地主所得到，那么，

可能存在着劫掠而不是浪费……"谷物法"的罪恶并仅不限于这个毛病：它们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引起绝对的损失，并且大大超过租金收入者由此而能获得的利益……

消费者被课以税收，这不仅向地主多缴了租金，还大大补偿了生产谷物的农民，而这些谷物也许可以从国外以比较低廉的价格购得。

因此，我们郑重地建议，这种间接税应当转换成直接税，从而认真改善现行制度；这样做，即使仍然给地主以不公正的好处，但至少可以使公众付出较少的代价；或者地主应当对取消"谷物法"后可能带来的损失作出估算，并且据此提出补偿的要求。

以下的事件可能充分证明了这一极好的分析，即尼古拉斯·卡尔多在1939年独立发表了包括重新引进补偿原理的相同观点，并且引起福利经济学界的广泛争论。单就这一项分析就足以给穆勒冠以理论家的称号。这几卷中还重印了他的一些最优秀的论文，其中包括《关于政治经济学中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论文集》。

人们可以并且应该将这一观点推向其他方面：穆勒的智慧和忍耐力是有逻辑性的而不是凭直觉的。一位天才人物（诸如德·托克威利）的微妙的难以表述的思想，往往在证据和逻辑上显得零散，使得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变得深奥复杂，很难用系统的、明确的术语加以分析。而像穆勒那样的智慧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寻求通过自觉和明确的理性过程来最大可能地回答复杂问题。经过训练的智慧是令人钦佩的，但不幸的是，它严格限于有用的范围，一超出这一范围，它就变得肤浅和不可靠。实际上，这不是智慧而是分析力。穆勒的判断常常是表面的和不可靠的。

考察一下他在《原理》中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将不变的生产法则与政治上和社会上可变的分配法则区别开来。他认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关系不在议会的考虑范围之内，而另一些关系很容易经立法程序而被歪曲，这一点肯定是正确的。但是这些形式的关系分别与生产和分配都完全不相一致。(我们尚未发现哪些经济关系是可变的。)再考察一下他支持对地租的未来增量实行社会主义化，从他过去所信奉的学说来看，这一努力是将李嘉图的租金理论(和错误，因为未来增量已经在土地的现价之中)和平均主义的伦理观拼凑成一个大杂烩。一个明智的人会对这一方案的成本和效益作出估计——并把它弃置一边。但是对于最公正的经济学家公正地说，还必须指出，1931 年和 1947 年的议会甚至更不明智，它们将这一堂·吉诃德式方案的变种溶进了法律之中。穆勒在比较私有权和社会主义时的那种犹豫不决的态度，同样反映了他缺乏大智，这几卷中就有这方面的重要文章。

然而，穆勒宣布放弃工资基金理论，这倒是我想要探讨的例子。工资基金原理是一种短期性的工资理论，我们可以概括如下：

(1) 雇用劳动力的资金，即工资基金，在短期内基本上是不变的。

(2) 平均工资率可以用简单的公式表述为，

$$平均工资率=\frac{工资基金}{雇佣工人人数}$$

(3) 各行各业的工资率与平均率不一样，其差额大小没有人讨论过，但可以用穆勒的国际贸易中互补需求理论来加以分析。(有关长期工资率差异的理论非常

完备其中穆勒的非竞争集团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说这一理论是正确的，这也许是最重要的，同时毫无疑问也是最邪门的评论。

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它对工资率、资本以及人口变化的影响作出了正确的预测。它预测：

(1) 如果建立一项有效的最低工资法，失业就会增加。

(2) 一个集团工资率的提高在短期内的重大代价通常是其他集团工资率的下降。

(3) 如果劳动大军因瘟疫(黑死病)而减少，工资率就会提高。

这一理论无法解决许多问题，诸如工资率结构等，因而可以由边际生产率理论来替代，这一替代发生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但是有这一理论总比没有理论要好得多。

1869年，穆勒在东印度公司的老朋友威廉·T·桑顿发表了《论劳动力》一书，在这本书中桑顿零散地攻击了工资基金理论。桑顿进行批评的方法是，搜集供求方面的特殊例子(包括间断的或多重的均衡)来导出不确定的价格。劳动力市场被看作是供求高度缺乏弹性的最主要典型，工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受任意力量的支配。桑顿的著作在分析上并非上乘之作，其历史作用也犹如昙花一现，早已被人忘却。

穆勒在他的回答中正确地分析了桑顿所举的例子的独特性，但是随之又继续接受了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分别具有零弹性的供求曲线组合的观点：

> 雇主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或者出现新的雇主，仅仅是因为劳动力便宜了吗？可以肯定，不是这样的。当物价下降时，消费者想要更多的物品，或者出现新的消费者；但是，雇主

> 购买劳动力并非是为了得到消费它的快乐；他购买劳动力的原因在于，他可能从其生产能力中获利，并且，他购买劳动力的数量恰好足以使产量达到他认为能在销售中得到的水平。工资下降未必让他预期商品的销量会扩大，因而也未必扩大他对劳动力的需求。

穆勒的这段话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低工资有利于降低成本以及产品销售量的扩大，从而就业量也扩大——这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例外的结论。

穆勒概括了他的论点：他否认“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固定额注定要用于支付工资”。现在他承认，劳动者向资本家的开支或储蓄竞争，因此，劳动者能向雇主索取的最大金额“不仅包括(雇主的)资本，而且还包括雇主从个人开支中能节省出来的全部”。而且，在寥寥几行中，我们就看到了结论，“行业合并会提高工资”这一原理从谬误转变成政治经济学的真理。强大的工会能够把老板娘的珠宝都如数取来。

穆勒宣布放弃工资基金理论，并没有令凯恩斯信服，同样也没有使我们信服。人们可以提出一项正式的异议，即除非工会拥有漫无边际的权限，否则，资本运动就能不受其影响，于是，消费者，而不是资本家，将支付较高的工资，这一点正是穆勒本人后来所详细阐述的。但是，穆勒引出的主要抱怨是，他所宣布放弃的理论并不是只强调工资基金大致不变的那一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穆勒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可见穆勒的立场不具有理论意义，也许他是想为工会建立一道防线或是想扩大国家在帮助工人方面的作用。

穆勒对工资基金原理的立场，从根本上说是对科学不负责任。他屈服于有争议的观点，而没有考虑这对一般理论会

带来的影响，而且也没有提出任何严密的理论来取代已经过时的观点、坦率而又迅速地承认错误，无疑会让人感到态度诚恳，值得钦佩。但是，错误和真理一样的难以捉摸，——事实上，错误就意味存在着真理——穆勒接受桑顿的"真理"无助于他的学问。因为现在这一"真理"已经成为谬误性分析的典范。穆勒是一位伟人，也是一位极好的理论家，但他不是圣人。

最后，再议论一下这几卷的特征。这些论文具有一丝不苟发表评论的特点，它们起了两种不同的作用：一是为现在和将来的研究提供了精细入微的范本；二是使一位伟人的著作方便地进入喜欢宏篇巨著的读者圈里。但是，当作者评述许多细枝末节时，或者当作者随时间的变化而在著作中作出难以计数的细小调整时，这两项作用是有矛盾的，适合于研究性学者时就不适合于一般读者（这就好比用英语和德语交叉写成句子来适应巴伐利亚读者一样)。学者总是徘徊在两种读者之间：19世纪时甚至任何可以忍受的细述都会被贴上"冗长的德意志风格"的标签，而当今任何一位平庸的美国总统的片言只语都会变得流芳百世(事实上，撇开初版不说，现在的版本已经影响了研究功能)。我希望现代技术迅速发展起来，既能用有效的办法为我们专家节约耗费在印刷谬误上的时间，又能将卷帙浩翰的宏篇巨著精心编纂得饶有趣味以适合更一般的读者。

这些批评，即使可以接受，主要也与《原理》有关，而与这几卷关系甚少。如果不能为人所接受——现行的学术标准是断然不接受这些批评的——那就权当对罗布森教授和他的同事所作出的这一宏伟工程的赞誉，别无他意。



亨利·卡尔威特·西蒙斯*

亨利·卡尔威特·西蒙斯是假想王国——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即使在今天，介绍他和他的事业中的主要事迹仍有必要。

1899年10月9日，西蒙斯诞生于伊利诺斯州弗登市的一个中上阶层家庭中。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他的祖父是一位来自英格兰的移民，起先他祖父给一家教堂当风琴手，后来成为一个成功的粮食商；他的母亲是一个专横跋扈的南方美女，为此，西蒙斯在1916年一念完高中就匆匆离开了家庭。

西蒙斯的第一站在密歇根大学，他专攻经济学，并在1920年获文学士学位。在那时，令他毕其一生潜心治学、成果辉煌的迹

* 本文是为《美国名人词典》撰写西蒙斯条目时的一项副产品。进一步的家谱细节可查阅该书。原载于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7(April 1974)。© 1974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象已经露头：他学业优良(经济学成绩是 9 个A， 5 个 B)，但会计学成绩欠佳(1 个A，1 B， 2 个 C，1 个 D)。

1921年 1 月，他进入衣阿华大学，最初当经济学原理和铁路经济课程的助教(年薪 700 美元)。1926—1927年间，被提升为助理教授，年薪 2750 美元。在衣阿华，他遇到了弗兰克·奈特，并最终成为奈特最得意的学生。他开始迈向博士学位，最初于 1922 年夏季在哥伦比亚大学体验这一生活，随后又转向芝加哥大学 (1923 年和 1924 年的夏季和 1925—1926学年)。他着手以个人所得税为题撰写论文，然而当他于 1927 年随奈特到芝加哥大学当讲师时，他被派出学习德语。1928年上半年，他呆在德国，有一部分时间在柏林大学。读过他写的《个人所得税制》(1938年)一书的人会记得他在引用德文原版文献时的那种自鸣得意的情绪。

1938年他回到芝加哥，当一名助理教授，在那里，他度过了他的一生。从表面上看，西蒙斯治学杂乱无章(那是超越他的时代的!)。直到 1932 年他才发表了 3 篇书评，在此之前没有什么作品问世。1932 年以保罗·道格拉斯为首的一批人强烈反对续聘他。主要也许是唯一的拚命执着地并且成功地支持西蒙斯的人是弗兰克·奈特。但是奈特所能做的就是保住西蒙斯的职位，直到 1942 年，他才被提升为副教授——那时他只得到法学院的支持，因为 1939 年时他在那里讲授经济理论。西蒙斯在他著名的论文"对工团主义的若干思考"中攻击了工会，因而得罪了一位系主任，以至拖至 1945 年他才得到教授资格。

他的事业实际上是另一种景象：1933 年时西蒙斯实际上在所有方面的立场已经基本形成。一篇著名的但没有发表

的论文"银行和货币改革"(他是该文的主要作者)已经包含了他的货币理论的精髓，并且透露出他的其他思想，而《自由放任的积极方案》(1934年)一书则反映了他的全部观点。这本小册子的成功也许使他在芝加哥的地位得以确保，尽管1935年道格拉斯还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解聘他。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收到过别的大学的邀请。

人们都以为西蒙斯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单身汉，但是，灵智战胜了一切，1941年西蒙斯与(我介绍给他的)玛乔里·鲍威尔结婚。许多年里，他与一些老派绅士一起活动于方格俱乐部，他在音乐趣味方面也是一个古典崇拜者。他非常擅长打台球，在桥牌成绩上也咄咄逼人，偶尔还喜欢打网球。当我还是学生时，西蒙斯并不是一个很出名的教师，因为他过于老练深沉：他不喜欢哗众取宠。正如我们将了解到的，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基本上是一位自省性的经济学思想家；他对实证经济学没有兴趣(保留了奈特的特点)，而更致力于通过思考来研究经济学而不是通过广泛阅读来研究经济学(这一点恰好与奈特形成对照)。实际上，他的哲学观与他的老师的哲学观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冲突：西蒙斯坚信有可能实行有目的的公正的改革，而知识分子在这种改革中将发挥重大作用，①相反，奈特认为社会生活基本上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也是不可改善的(因而也是不切实际的！)。

西蒙斯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理论家，他的《经济学读物》是关于价格理论的最重要概念的最系统的材料。在这本未经正式出版的读物中，他建立了一套清晰的分析卡特尔的方法，后来帕廷金深化了这一方法，并且公开发表(帕廷金为此向西蒙斯表示了感谢)。②但是，他从未为研究生讲授过理论课

程，一直讲授初级经济学(包括在法学院)和财政学课程。

有必要对他在法学院的工作加以评论。这项工作始于1939年，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正是法学院为此建立了纪念性的讲座，按年月顺序先后有我、瓦伊纳、卡特(加拿大税收委员会)、弗里德曼、托宾以及H·G·约翰逊(所有这些人都在《法律和经济学杂志》出现过)。尽管西蒙斯在芝加哥大学开创了经济学家去法学院上课的习惯，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他的课程是有点说教性质的；看不出他在法学院的同事对他本身的工作有什么影响，然而他却变成一位极其出名的教师，并且对一些法学教师产生了重大影响。西蒙斯的主要兴趣在于宏观经济政策，而不是分配性的价格理论，因而对货币政策与法律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只有继他之后的阿伦·迪雷克特才使两方面相结合产生出成果。迪雷克特也到法学院授课(尤其与爱德华·利瓦伊一起讲授著名的反托拉斯法课程)，并在这一过程中解决一系列有关产业组织方面的问题，诸如搭售、掠夺性竞争和专利许可证限制等经济学问题。开创法律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紧密配合，这种配合在芝加哥赓续至今，这是西蒙斯的重大贡献之一。

《自由放任的积极方案》是西蒙斯的"宣言"，包含了他在以后10年里进一步加以深化的全部重要思想。这本著作完成于当代最大萧条的低谷时期，他在该书中一直呐喊着：西方社会濒临灭顶之灾。

《积极方案》的中心哲学观就是高度的个人主义。西蒙斯认为，私有化地和竞争性地组成经济生活的一个大部门，是保障个人自由的基本条件——我们当中许多人，也许是越来越多的人仍然认为，这是自由立场的根本要素。然而，在这

一前提下，他也认为国家承担着广泛而又复杂的任务：

1．用最小限度的法律和反托拉斯政策来积极谋求竞争；

2．对“自然”垄断实行公有和公营(有可能的话，最好由地方政府来办)；

3．对广告和推销采取严厉限制；

4．取消关税障碍；

5．取消长期债务以外的任何公债，取消短期信贷以外的几乎任何私债，以加强货币政策的措施，并且取消经济萧条引起的强制性破产；(1933年的备忘录中已经完整形成100%储备的计划。)

6．货币当局有义务维系货币数量或货币价值的稳定。

除了有可能把广告限制取消外，所有其他政策都可以看作是保持私人企业部门庞大和有效的必要条件。对于这一主题，西蒙斯补充了第二条，肯定独立的重要条件：主要依靠精致而又简单的个人所得税以实现收入平等方面的较大改善。收入应该包括资本收益、遗产、馈赠，换言之，就是增加个人对资源的相对支配权的任何东西。这一强烈的平均主义思想在西蒙斯和大多数保守主义者之间划出了分水岭，实际上，人们可以用有力的例子说明西蒙斯是懂得价格理论的一位现代自由派人士。对于穆勒的收入分配是自由社会选择的一个要素这一命题，除西蒙斯之外，肯定没有其他经济学家会如此全盘接受。③

西蒙斯从未背离规范经济学，然而，他对于国家作为经济政策的工具有着模糊和矛盾的看法。这一国家从历史上看一直殷勤地向强大的少数民族授予关税权，愚蠢地向企业授予许可证，而自己却承担起难以负担的重任，诸如经营铁路

和保险公司，管理一个设计上十分精致、财政上空前严格的税收制度，西蒙斯有一种关于对政府服务的需求的理论，但是没有关于政府从事服务的能力的理论。只有利奥·沙夫曼以前的一个学生才会把州际商业委员会写成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能干的和作风严谨的公共机构”，而任何学生都会难以理解西蒙斯在1934年时对联邦商业委员会的信心，他当时说该委员会“必定成为也许是最有权力的政府机构”。

篇幅较小的《个人所得税制》(1938)是一篇精美(他最喜欢用的词)巧妙的专题论文。论文除首尾一致地应用了一项综合收入指标之外，还包含了早期收入平均化的一个有影响的例子。他曾经说过，希克斯和洛斯塔斯的著作《战争财富税》是为数不多的优秀财政学著作中的一本；毫无疑问，他的著作当然亦属此例。

著名论文“货币政策当局与货币政策规则”(1936)最充分地揭示了他的货币和周期理论，西蒙斯自称这是他的最佳之作。这里我只介绍一下米尔顿·弗里德曼研究了西蒙斯的货币理论之后的评论，弗里德曼对他的货币理论给予高度评价，但是批评了他的政策建议，弗里德曼认为西蒙斯致错的主要原因是(错误)理解了1933年货币危机的原因。④

亨利·西蒙斯的思想与他所生活的年代和地点息息相关：他生活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这是一个巨大的恐惧与无畏的改革相交织的年代——实际上无畏的改革需要巨大的危机，西蒙斯就经常把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当作推出他的政策建议的理由。1946年他溘然长逝，他用全部身心期待着的那一灾难终于没来，难道他的去世与那一灾难的失踪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在人们心目中，"芝加哥学派"的外延越来越宽，而它的确切内涵却越来越模糊。30年代时该学派的领袖人物并非凤毛麟角：奈特是一个伟大的几乎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哲学家和理论家，瓦伊纳在政策思路上认真但不固执；明兹是一个深入研究货币史的学者，并把自己局限于那一领域；西蒙斯则是一位乌托邦主义者。该学派中没有人对数量分析感兴趣，确实——像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没有人(除了瓦伊纳以外)苛刻地认为西蒙斯对经济生活的认识是不完整的或错误的。在原理方面，直到今天弗里德曼的论著中还坚持的一项具体思想就是西蒙斯的需要有一个固定规则来指导货币政策的观点。而在芝加哥经济学家形成当今最新的政策观点时，迪雷克特和弗里德曼在思想上发挥了主要影响。

制度和理论的演变已经使我们远离西蒙斯的立场——甚至远离诸如凯恩斯、汉森和托尼那些当代人物的立场。然而，西蒙斯的中心思想在今日仍然如40年前一样具有生命力并且无可阻挡，那就是设计一个分散化的、非政治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个人自由和经济效率拥有弘大的空间和蓬勃的生机。

注　释

① 举个明显的例子："如果我们(负责的经济学家)自己能达成一致意见—— 不包括那些运用所有财政和其他手段以阻止这种制度生存的人—— 我们就很容易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并且迅速引致公众和政治上的共识。" Henry C. Simons, 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 207 (1948)。

② Don Patinkin,"Multiple-plant Firms, Cartels,and Imperfect Competition", 61 Q.J.Econ. 173(1974).

③ "而且，通过税收来控制收入分配代表了民主政府能够比较正确地运用的一种控制形式，即不削弱其自身生存的基础。对整个制度也没有根本性的干扰。"Henry C. Simons, Personal Income Taxation 29 (1938).

④ Milton Friedman, "The 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 of Henry Simons", 10 J. Law & Econ. 1(1968).

第 4 篇

数量研究



经济学中引证的习惯格局*

1. 导　言

引证是对学者的著作特征的外在的、客观的(或多或少地)以及数量化的反映。在目前这种定量的年代，仅此一点就足以诱使学者们去从事研究。这些引证可能是正式的，并且是定式化的，因此，它们显示了对上乘写作手法的肯定。事实上，我们的写作手法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而对引证的分析已经表明，

---

*原载于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1 (1979)。© 1979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N.C. 与克莱尔·弗里德兰合著。

我们对戴维F·米奇和斯蒂芬R·韦斯布罗德在收集引证材料的过程中所给予的非常宝贵的帮助表示感谢。

引证是衡量学术影响和学科发展的方法。

一个学者的著作的质量与他的著作被其同事引用的频率有一定的关系。比如，J·R·科尔和S·科尔发现，1961年，一般物理学家的著作被引证5.5次，在1956—1960年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为42次，而那些紧接着在1961—1965年间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为62次。① 从科学上看，价格理论比货币和财政理论更加成熟；这一点可被以下事实证实：在不同大学中，价格领域的学术著作被引证的普遍程度要高于货币和财政领域。②

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1885年以来经济学家引证习惯的不同特征。我们要将著名的经济学家（由职位划分）和名气稍差的经济学家的引证习惯加以比较。我们还将对关于书籍的引证与关于论文的引证加以比较，这一特征很少有人研究。我们将提供被引证最频繁的经济学家的名单，并且还将考察出版物的数量对经济学家被引证的频率的影响。最后，再看一下在经济学的引证中，自身引证和外语翻译的作用。

从美国经济协会的《经济学杂志索引》中，我们挑选了一些需要对其引证习惯加以说明的论文样本。在表1.1中，对这些论文进行了概括。

从这些实例可以引出几个基本结论：

1．由于对每篇引证他人文章的论文都必须根据它们的引证来进行分析，因此，样本的有限数量决定了无法用更短的时期概念来划分，也无法对论文作者的职业声望作两个层次以上的分类。

2．引证的计算单位是原作者的著作：一篇论文中所有参考出处均是斯密的《国富论》，那么视为一个引证，如另有一

表1.1 在研究中所包括的经济学家、论文和引证的数字

	第一阶段：[a] 1886—1925年	第二阶段：[a] 1925—1969年
A. 院长(美国经济协会的会长和十字勋章获得者)		
作者的人数	42	44
选取的论文样本	76	97
引证的著作：		
论文	148	458
其他	390	683
合计	538	1141
B. 其他经济学家(不包括A中的随机样本)		
作者的人数	47	47
选取的论文样本	76	97
引证的著作：		
论文	137	275
其他	351	408
合计	448	683
C. 对每篇原始论文的平均引证次数		
会长	7.08	11.76
其他	6.42	7.04
D. 全部引证中杂志的引证所占百分比		
会长	27.5	40.1
其他	28.1	40.3

a 对全部的论文我们给出了时间和其他间隔，例如：1886—1925年，意思是包括1886年，但不包括1925年。

处参考的是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则视为第二个引证。只有在脚注和文献目录中出现的参考书目，才算作引证，统计表

中的资料来源不算引证。如要分析宁要"至少一个"引证而不要大量引证的原因，可参阅我们以前的文章(上述的注释2)。

3．挑选了两组样本，(1) 美国经济协会会长(和十字勋章获得者)——下面将简称为会长；(2) 其他经济学家。

每位作者的论文的抽选数量限制在9篇(随机选择)，对会长组的划分按年龄段，而对"其他"组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生平材料经常得不到)，则按出版时期划分。③

2．文章与书籍

经济学说史专家发现，大约在1870年以前的时期中的著名论文，相对于书籍而言是非常少的：没有斯密、李嘉图或古诺的文章，马尔萨斯和西尼尔的文章也几乎看不到(虽然有一些穆勒和麦克库洛克的文章)。其部分原因是具体情况的差异，因为在那个年代，写作和出版小册子的速度之快能使现代的作家们羡慕不已。即使在1850年以前出版的文章被全部毁坏了，那个年代的经济学也不会失去多少；但是，如果1930年以来的文章被全部毁坏了，人们就会认为经济学研究遭受了重大损失。

分析文章的便利与分析书籍的不便更加强了并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这种感受。1886年以后的文章都在《经济学杂志索引》中列出并加以分类，而且目前对文章中引证的分析，也由于《社会科学引证》一书而变得容易起来。1973年以来，《社会科学引证》一书已经记录了在大约100种经济学杂

志中发表过的所有文章中的所有引证。

我们估计大约在1885年以后，作为经济论著初版的形式，书籍相对于杂志中的文章减少了。从那以后，专业的(学术的)经济学杂志的数量持续上升。在表2.1中，我们汇编了由《经济学杂志索引》(I.E.J.)所收入的杂志的初版日期。如果把外文杂志也包括在内的话，那么早期的杂志数量会相对升高，但是总的增长趋势不会受到很大影响。我们没有相应的经济学书籍的出版数字，但后面要给出的几张抽样统计表(表2.4和表2.5)说明它们是相对下降的，这一点从表1.1的时间划分上也能得到证实：在两个阶段间，对杂志的引证的百分比提高了50%。当代书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以前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汇集而成的。

表2.1 《经济学杂志索引》按最初出版年份收入的英语经济学杂志的数量

初版年份	杂志数量
1890年以前	3
1890—1900年	2
1900—1910年	0
1910—1920年	4
1920—1930年	11
1930—1940年	11
1940—1950年	15
1950—1960年	22
1960—1968年	31
	99

对书籍进行的正确的抽样调查的结论会不会影响我们将

讨论的引证形式，这一点只有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才能肯定。(讨论著名经济学书籍中的引证习惯是一种对书籍中的引证进行研究的适宜的而且有趣的方式。)

相反的问题是，将书籍引证与由抽样统计中所包括的杂志文章的引证加以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存在一个区分这两种引证的非常好的理由。总的来说，杂志文章的专业性比书籍更强，而且，如果撇开G·D·H·科尔和西摩·哈里斯不谈，文章的写作和出版时间平均仅为相应出一本书的时间的1/2～1/5。因此，杂志文章在研究的广度和进度上都体现着一种不同的形式，它在传播方式、竞争力以及辩论方面更突出一些。的确，在拥有论文的静电印刷网的主要大学中，杂志的出版甚至日益成为证明某篇论文存在的一种公开的证书。

专著与论文在传播上的这些不同之处也许是符合事实的，但这些区别显然并不能导致所引证的文章和书籍发表时间长短上的太多差异。我们汇集了近来三种杂志中对1899年以后的论著引证的平均发表年数(表2.2)。

我们已经观察到在构成基本样本的文章中杂志和非杂志来源中引证的相对频率(见表2.3)。当然，非杂志的引证包括除了书籍以外的内容诸如小册子、署名的政府出版物，等等。④ 除了在诸如经济理论这样的最时髦的领域中，非杂志性来源仍然是引证的主要形式。⑤用杂志性出版物来代表所有出版物已形成惯例，⑥但表2.3表明，这一假设不太守信。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显著的指标，它能说明当我们以杂志和非杂志性原始资料为基础，确定被引证最频繁的经济学家时，杂志和引证总数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不明确，在第4节中，我们

表2.2 引文的发表年份

	《美国经济评论》1975年12月	《政治经济学杂志》1975年12月	《经济学杂志季刊》1975年11月
引文数量			
专著	83	50	27
论文	226	124	89
引文的平均年数			
专著	12.4	13.2	12.5
论文	8.7	9.0	11.5
标准偏差			
专著	12.9	10.9	10.9
论文	9.2	9.7	13.0

表2.3 按引证文章的不同学科划分的对杂志和非杂志性原始资料的引证，1925—1969年

美国经济协会学科分类	引证论文的数量	引证总数	对杂志文章的引证占引证总数的百分比
经济理论	59	648	50.9%
数量、统计和其他分析工具	10	119	42.9
国际经济学	9	79	41.8
农业经济	16	73	41.0
经济学范围和方法	7	101	32.7
产业组织	23	134	30.6
货币，信贷和银行，不包括货币理论部分	14	109	29.4
经济思想史	4	94	26.6
所有领域	194	1824	40.2

还将对杂志和非杂志性原始资料进行考察。在1886—1925年间，21位权威作者的非杂志性出版物和杂志文章出版物的引证频率之间的秩相关系数为.06，在1925—1969年间41位权威作者的秩相关系数为-.05。⑦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权威作者中，这两种类型的引证几乎没什么关系，这个结论容易作出，但不易理解。现有的引证研究不得不被视为存在大量的未知偏差，除非将书中的引证以及对书的引证都进行彻底的考察。

文章和书的写作数量

根据以前的引证研究和为此目的进行的抽样(见下面的注释11)中得到的引证频率，我们选出了一组经济学"权威"，在下面的第4节中，将列出这些经济学家的名单，并分析对这些人的引证。我们搜集了这一组经济学家1886—1968年间发表的所有经济学文章，以及到1968年为止出版的几乎所有书籍的完整数字。⑧因为，相对来说，对经济学家的书籍类出版物所作的研究很少，所以只简单地介绍一下这部分原始记录的考查结果。

第一个总的结论是著作的数量相对于文章的数量来说，一直在稳步下降，从这一阶段早期的1比3发展到后来的1比5甚至更多。在表2.4中，我们计算出了每五年间每位有作品的经济学家的写作效率，以便于对权威的人数和所包括的年数的变化进行调整。在按出生年月对权威人物进行分组时，书籍出版大势已去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表2.5)。如果我们逐个阶段地对每位权威的书和文章的写作数量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秩相关系数一直在持续下降，虽然下降

的幅度不大。

表2.4　各阶段经济学"权威"的文章和书的写作数量

阶　段	各阶段中"权威"的写作数量	每人的写作量，在第1、2、10阶段调整为5年的平均值 文章	书	比率：文章/书
1．1886—1905年	28	2.2	0.68	3.2
2．1905—1925年	46	2.8	0.72	3.9
3．1925—1930年	47	3.8	0.85	4.5
4．1930—1935年	59	4.5	0.95	4.7
5．1935—1940年	72	5.3	0.71	7.5
6．1940—1945年	66	5.9	0.83	7.1
7．1945—1950年	74	5.4	0.77	7.0
8．1950—1955年	80	5.6	0.83	6.8
9．1955—1960年	76	5.8	0.88	6.6
10．1960—1964年	80	6.1	0.75	8.2
11．1964—1969年	72	5.2	0.94	5.5

表2.5　按出生阶段划分的每位"权威"一生书和文章的写作量，到1968年为止

出生阶段	人数	平均出生年	到1968年为止，每人平均写作量 文章	书	比率：文章/书
1815—1865年	22	1850	20.5	8.2	2.5
1865—1890年	21	1878	46.3	9.1	5.1
1890—1915年	49	1904	36.5	6.0	6.1
1915—1936年	28	1922	29.1	3.1	9.4

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即使把挑选作者的圈子划定在有影响力的“权威”之内，每位学者写作量的变化还是很大（见表 2.6）。书的平均出版册数为 6.0，标准偏差为 4.7；发表文章的平均数为 33.8，标准偏差为 26.0。如果我们只统计那些到 1968 年为止已逾七旬的“权威”(不论为了他们还是为了我们，都希望这一组人已经很有建树)，那么这些数字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表2.6 1886—1968年间[a]“权威”出版物的分布状况

出版物的数量	书籍		文章	
	全部作者	不包括到1968年未满70岁者	全部作者	不包括到1968年未满70岁者
0—3	26	9	3	3
3—6	40	20	6	5
6—9	26	10	8	4
9—12	15	6	8	6
12—15	5	5	8	2
15—20	5	4	11	3
20—30	2	2	20	4
30—40			15	8
40—50			10	5
50—75			18	8
75—100			9	7
100以上			3	1
作者总计	119	56	119	56

[a] 不包括1825年以前出生的经济学家。

3. 领导者和不重要的追随者

这里，杰出的经济学家由抽选出的美国经济协会会长和其十字勋章获得者组成(我们注意到，到1968年为止，13名十字勋章获得者中的5名就任过会长)；“其他”一栏的名单

表3.1 我们的研究中抽选的经济学家在规定阶段发表的文章总数[a]

文章篇数	1886—1925年		1925—1969年	
	会长	其他	会长	其他
1—6	12	36	2	21
6—11	9	7	0	12
11—16	9	3	7	2
16—21	3	1	2	2
21—26	4	0	3	5
26—51	4	0	21	5
51—76	1[b]	0	7	0
76—101	0	0	0	0
100以上	0	0	2[c]	0
总计	42	47	44	47
平均	14.0	5.1	36.7	9.8
σ	13.7[d]	3.1[d]	23.2[d]	9.9[d]

a. 只有那些被抽选到的，并在某一阶段中著书立说的经济学家才能列入相应那段时期的表中。b.F·W·陶西格。c.J·D·布莱克和P·萨缪尔森。d.由未包括在上述分组中的数据计算得出。

由除"权威"外随机抽选的其他作者组成。⑨

两组间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他们发表的文章的篇数。可以作这样一个假设：名望和能力不是堂兄弟而是双胞胎。当然这对双胞胎也并不完全相同。但不管怎么说，会长写作的文章数量均是随机抽选的作者的4倍（见表3.1）。⑩

文章涉及的学科领域（表3.2）显示了经济学作品中的两个广为人知的事实。第一是会长的写作普遍集中于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在第二阶段，几乎会长作品的半数均在经济学理论这一领域中。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大的差异是方法论方面

表3.2 样本论文所涉及的学科领域

美国经济协会分类		论文数量				
编码	领域	1886—1925年 会长	1886—1925年 其他	1925—1969年 会长	1925—1969年 其他	总计
1.	范围和方法	5	0	6	1	12
2.	经济理论	17	5	47	13	92
7.	数学和统计工具	1	1	4	6	12
8.	社会会计学	0	1	2	8	11
9.	货币、信贷和银行	10	7	2	8	27
10.	公共财政	7	13	2	4	26
11.	国际经济学	2	3	4	8	17
15.	产业组织	8	17	5	17	47
18.	农业	2	4	5	11	22
19.	劳动经济学	8	13	2	4	27
	其他	16	12	18	17	63
	总数	76	76	97	97	346

的，虽然此处的原因很可能被推翻，即只有会长才能使其有关方法论的作品得以出版！而其他作者写作的重点则相对集中于产业组织、农业和劳动经济学。

4. 什么人的著作被引证？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列出了被引证的经济学家的名单，并编集了对名单上每位作者的引证频率。这个名单包括了我们以前引证研究中的 85 位著名“权威”，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 65 位经济学家，主要是侧重早期的人选，这些人是从为这一研究所作的对文章的抽样统计中脱颖而出的。⑪

名望不会长久持续下去，表 4.1 和表 4.2 给出的两个时期的权威名单更说明了这一点。在 1925—1968 年间发表的 194 篇文章的 1824 处引证中，马尔萨斯和佩蒂只被引证过 1 次，瓦尔拉和李嘉图为 2 次，亚当·斯密是 4 次，至于古诺，则一次也没有。在 1925 年以前的阶段中的 20 位最著名的权威，仅有 3 位（费雪、马歇尔和庇古）仍列于第二阶段中的前 20 名之列，而其中的 2 人（费雪和庇古）一直活到几十年后的近期。的确，除了马歇尔以外，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作到这一点——其主要工作是在 1900 年前做的，而他于 1925—1969 年间仍在前 41 位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列；经济学的历史数字看来不能表明他们亲身参加了当代的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著名前辈销声匿迹这个问题，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错误观念。一个完全成功的贡献传播面如此之

表4.1　1886—1925年被引证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家

姓　名	引证次数		
		被引证者	
	总计	会长	其他
I·费雪	32	20	12
J·B·克拉克	17	13	4
E·庞巴维克	16	11	5
F·W·陶西格	13	6	7
F·A·费特	12	9	3
A·马歇尔	12	9	3
D·李嘉图	11	10	1
E·R·A·塞利格曼	11	7	4
T·N·卡弗	10	5	5
F·Y·埃奇沃思	9	0	9
J·S·穆勒	9	7	2
A·C·庇古	8	6	2
A·斯密	7	5	2
F·A·沃尔克	7	5	2
S·N·帕滕	6	5	1
S·韦布	6	1	5
E·坎南	5	1	4
H·J·达文波特	5	2	3
H·R·西特	5	4	1
D·弗赖迪	4	2	2
J·A·熊彼特	4	2	2

广以致其著作先是被想当然地承认了，但接着就被遗忘了。

表4.2　1925—1969年被引证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家*

姓　　名	引证次数		
		被引证者	
	总计	会长	其他
J·M·凯恩斯	32	23	9
欧文·费雪	21	21	0
P·H·道格拉斯	20	20	0
J·R·希克斯	20	10	10
D·H·罗伯逊	19	16	3
P·萨缪尔森	18	17	1
W·里昂惕夫	16	9	7
G·哈伯勒	15	14	1
A·马歇尔	15	12	3
R·M·索洛	15	12	3
A·C·庇古	14	13	1
R·F·哈罗德	13	11	2
S·库兹涅茨	13	9	4
J·M·克拉克	12	10	2
M·弗里德曼	12	9	3
F·A·哈耶克	12	6	6
W·A·刘易斯	12	7	5
J·K·加尔布雷思	11	9	2
H·G·约翰逊	11	8	3
A·H·汉森	10	8	2
W·C·米切尔	9	8	1
J·罗宾逊	9	9	0
R·霍特里	8	5	3
A·P·勒纳	8	8	0
J·A·熊彼特	8	7	1
G·J·施蒂格勒	8	6	2

（续　表）

姓　　名	引证次数		
		被引证者	
	总计	会长	其他
J·D·布莱克	7	5	2
E·布坎南	7	3	4
E·H·张伯伦	7	5	2
F·H·奈特	7	7	0
F·马克卢普	7	6	1
N·卡尔多	7	5	2
R·纳克斯	7	3	4
T·B·维布伦	7	7	0
J·W·安杰尔	6	5	1
F·A·费特	6	5	1
W·I·金	6	5	1
H·莱本斯坦	6	4	2
S·H·斯利克特	6	5	1
J·瓦伊纳	6	4	2
J·H·威廉斯	6	5	1

* 被引证5次的经济学家有R·G·D·艾伦，K·J·阿罗，S·法布里肯特，W·J·费尔纳，Z·格里奇斯，J·S·穆勒，C·斯奈德，F·W·陶西格和J·托宾。被引证4次的是J·B·克拉克和A·斯密。

马歇尔主义的概念，如短期行为、需求弹性、准地租以及外部经济性和内部经济性等，都经历过这个过程。更近一点的例子有弗里德曼的有关永久所得和暂时所得的概念和马思的理性预期概念等。

如果引证记载着曾对一个人产生过影响的文献的历史，那么它们是无穷无尽地持续下来的。约翰·克拉彭的一篇著

名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 我想描绘的是一个在美国第一流的学校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经济学家，他目前正在仔细检查一个制帽工厂。他走进的第一间屋子是一个仓库，在货架上摆放着装有帽子的盒子。他意识的架子上也存满盒子。货架上有一层贴着这样的标签：报酬递减行业、报酬不变行业和报酬递增行业[1]。在这层之上，还有一层落满灰尘，贴着的标签是报酬递减行业、报酬不变行业和报酬递增行业的专卖商品[2]（对三个等级有所区别）。⑫

标有[1]的句子是对马歇尔的称颂——但是并没有对他加以引证。标有[2]的句子同样清楚地是指庇古，但是他也没有被引证。在现代经济学中，所有直接对原始资料进行引证的文献都被称为现代文章和书籍，但是我们根据这些文章和书籍能很快地追溯到马歇尔，甚至更早的作家。在经济学中，大概没有任何一类对某种见解的援引要比对这种资料的分配更频繁，因此，他们获得了不同用途的相同的回报率，但是，将这种见解引入经济学中枢的经济学家却从没人提及。⑬

我们还应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引证的频率在发生变化。在为此研究而抽选的样本文章中，不含任何引证的文章的百分比，在1886—1925年和1935—1945年间高达30%，但是此后一直下降，到1964—1969年间，仅为10.3%，相应地，每篇文章中（包括不含引证的文章）引证的平均数从1886—1925年间的大约5次，提高到1964—1969年间的10.8次。引证的增加标志着与19世纪相比，近代著作的治学标准更趋于规范化。经济学文献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其相互间的依赖性也更强（更专门化）。

我们的引证名单显示了美国和英国权威间的一点区别；

美国的学术权威通常是教科书的作者。在早期，除了克拉克以外，每位著名作者都步入了教科书的作者行列，虽然名望(比如费雪)并不是由此而来的。即使在以后的阶段，国际间的差别依然明显。其原因应取决于两个国家中教科书市场的差异以及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明显地需要沟通。

早期的名单使我们进一步确信引证与影响力以及著作的质量有关联。费雪是这一阶段中(很可能是到此为止整个历史上的)美国最优秀的经济理论家，他列在这个名单之首。但是这一阶段其他两位最杰出的肯定应该是马歇尔和埃奇沃思，在美国经济学家近期的文献中，他们在数量上占优势，我们相信，他们并没能将名次排得更靠前一点。⑭另外，我们的名单所反映的当然远不止于理论分析的才能，因为我们包括了各种分枝学科的文献。

即使是对所有学科进行抽样，在名单中独占鳌头的仍将是综合性的理论家。虽然这个名单中的下一位是米切尔，但在后期的20位杰出经济学家中仅有两位是著名的实证研究者，道格拉斯和库兹涅茨。⑮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名单中没有一位经济史学家：他们已经自成一体。

自然，我们急切地想确定为什么有些经济学家被引证的次数要比其他经济学家多得多。引证是取决于一位作者写作的数量吗？我们想通过下面的办法来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即考查引证数量与某位作者已出版的文章或书的数量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因此，我们对1886—1925年间的情况进行了回归分析：

$C' = a_1 + b_2$(1905年前的书) $+ b_3$(1905～1925年间的书)$+$

b_4(1886～1905年间的文章)$+ b_5$(1905～1925年间的

文章）

这里C′代表引证数量，令$C'=\sqrt{C}+\sqrt{C+1}$，这种变形适合于二项式和泊松分布，并接近于引证数量的分布。[16] 圆括号中给出了t检验值，结果是

$$C'=2.29+0.200B_{to05}+0.070B_{5,25}$$
$$\qquad(1.68)\qquad(0.60)$$
$$+0.064A_{to05}+0.0047A_{5,25}$$
$$\qquad(1.05)\qquad(0.05)$$
$$R^2=0.237\quad n=53$$

系数有相当大的标准误差，但它们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格局。早期的书比近期的书更多地被引证，文章也大体一样；这个结论可能部分地是下列事实的产物，即早期的书和文章在整个阶段均被引证，而晚期的作品只能在晚期被引证。从早期来看，在引证方面，书的重要性为文章的3倍。R^2值很低说明出版物的质量所起的作用要比其数量的作用大得多。[17]

我们将后一阶段的出版物按时间又分为3部分，1925年以前，1925～1950年和1950～1969年。回归方程为

$$C'=3.00-0.066B_{to25}+0.162B_{25,50}-0.0081B_{50,69}$$
$$\qquad(1.28)\qquad(2.09)\qquad(.10)$$
$$+0.028A_{to25}+0.046A_{25,50}-0.263A_{50,69}$$
$$(1.89)\qquad(3.37)\qquad(2.67)$$
$$R^2=0.398\qquad n=126$$

这里，反映早期影响力的精细的时间格局仍然部分地显示出来：对于总的引证来说，近期的书的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而文章的引证对近期的影响则逐渐上升。除了近期以外，书籍的影响力的系数为文章的2—3倍。在1925—1950年间，

写出的文章的影响力仅及1950—1969年间写出的文章的1/6(0.046/0.263=0.175)，这说明每年大约下降7.7%。⑱ 残差的格局说明有几位经济学家被引证次数最多，并超过了回归预测，他们是(依次)：马歇尔，凯恩斯，索洛和罗伯逊；相对于预测，下列几位是被引证次数最少的(按顺序)：T·N·卡弗，布莱克，卡莱斯基。R^2值要比早期的高得多，但在决定引证次数多少的因素中，其它因素仍比出版数量更重要。

在分析对广泛的、各种年龄的人所作的引证时，存在着模棱两可的解释，为了澄清此事，我们将对样本中50～70岁(在1968年)的所有权威到1969年的累计引证进行一次总的回归分析。对于这个更具有同一性的小组，回归方程为

$$C' = 2.343 + 0.0363A_{to69} + 0.178B_{to69}$$
$$(3.69) \qquad (2.83)$$
$$R^2 = 0.378 \qquad n = 48$$

因此结论是，书籍的影响力相对于文章来说为5：1。这个方程与为所有权威所作的方程⑲相比，差别不是很大。

5. 自身引证

自身引证是引证中一个饶有趣味的部分。一个人如不引证其以前的作品，将是非常罕见的；他对自己以前的作品最为了解，况且以前的作品与他目前的著作经常是主题相同的。同一主题的专题著作可能会以一系列文章的形式出版，

因此随之而来的自引即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自信是从事科学工作所必需的——它的冒险性与其趣味性和潜在的重要性是成比例的——这更证实了学者不会轻易放弃其以前的努力。每个人当然都肯定会承认这一点，即为以前的著作做广告的需要加强了，不用过多的劝说，几乎每个作者都承认，这种广告宣传并不十分为其同时代的人所欣赏。

不论动机是什么，自引现象很多：会长的引证中，1/10为自身引证，其他作者的自引部分相对小一些(见表5.1)。表5.2中逐一列出了对自己的引证最为频繁的会长的姓名。这一组与我们的“权威”组并不相同(虽然38位会长和十字勋章获得者包括在“权威”组中)，但他们肯定在过去或现在都被其他经济学家所引证。然而，一个作者所有的自身引证部分有时会达到如此程度，以致于我们要对消除自身引证的作法予以称赞。

表5.1 论文中的自身引证

	1925年以前	1925—1968年(含1968年)
会长		
全部引证	538	1141
自身引证	56	112
百分比	10.4	9.8
其他		
全部引证	488	683
自身引证	38	53
百分比	7.8	7.8

是不是越多产的学者对自身的引证也相对地越频繁些呢？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按全部出版物的数量对自

表5.2 会长自身引证的相对频率，25个最频繁的自身引证者

姓　名	出生年份	样本论文中的全部引证	自身引证所占百分比
大卫·金利	1861	12	33.3%
托马斯·S·亚当斯	1873	16	31.2
欧文·费雪	1867	94	30.9
J·W·詹克斯	1856	7	28.6[a]
W·Z·里普利	1867	18	27.8
I·L·沙夫曼	1886	4	25.0[a]
约翰H·威廉斯	1887	83	22.9
西蒙·库兹涅茨	1901	73	21.9
弗里茨·马克卢普	1902	95	21.1
T·W·舒尔茨	1902	96	20.8
富兰克林·费雪	1934	20	20.0
P·A·萨缪尔森	1915	60	20.0
S·H·斯利克特	1892	21	19.0
E·W·凯默勒	1875	37	18.9
卡尔·C·普莱恩	1870	11	18.2
亨利·R·西格	1867	11	18.2
保罗·H·道格拉斯	1892	94	18.1
M·A·科普兰	1895	67	17.9
E·R·A·塞利格曼	1861	39	17.9
弗兰克·A·费特	1863	86	17.4
K·E·博尔丁	1910	12	16.7
弗兰克·W·陶西格	1859	30	16.7
W·里昂惕夫	1906	19	15.8
F·C·米尔斯	1892	13	15.3
J·R·康芒斯	1862	22	13.6

自身引证百分比为10—13.5%：7人；自身引证百分比为5—10%：19人；自身引证所占百分比少于5%：32人。

[a] 分母<10。

引占所有引证的百分比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我们对文章和书均有统计数，因此我们把两者相加，不过尝试着赋予书籍各种不同的相应权数(相当于文章的数量)。确定了相应权数为6以后，所加的书籍权数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自身引证百分比

$=6.67+0.050$(文章＋6书籍)

$(t=2.22)$

$R^2=0.065$; $n=73$

这里只包括了那些被引证10次以上的会长。[20]很明显，在学者的写作量与其自引程度之间只存在很微弱的关系。最能解释自身引证原因的应是一个人著作的质量、他研究的广度、他的自负以及其他因素。

6. 使用哪一种语言?

直到20世纪50年代，对哲学博士通常要求要懂一点(虽不能说是自谦，但确实是不太多)法语和德语，而从那以后，对法语和德语的要求已经被对数学的要求取代了。这个变化所带来的后果远远超出了它使经济学写作改观的影响。在1925年以前，对外语资料的引证占1/5，主要是对德语和法语资料，自那以后，在更近的阶段中，这一比重下降了一半以上(见表6.1)。

即使这些对外国文献的不多的引证，都很可能是对英、美经济学家引证外语资料的频率的过高估计。在我们的样本

表6.1 引证的语言

	英语	德语	法语	意大利语	其他语种	总计
会长:						
1925年以前	435	51	32	8	11	537
百分比	81.0	9.5	6.0	1.5	2.0	100.0
1924年以后	1,035	51	44	7	5	1,142
百分比	90.6	4.5	3.9	0.6	0.4	100.0
其他:						
1925年以前	374	52	44	1	17	488
百分比	76.6	10.7	9.0	0.2	3.5	100.0
1924年以后	642	19	12	8	2	683
百分比	94.0	2.8	1.7	1.1	0.3	100.0
会长和其他合计						
1925年以前	809	103	76	9	28	1,025
百分比	78.9	10.0	7.4	0.9	2.7	99.9
1924年以后	1,677	70	56	15	7	1,825
百分比	91.9	3.8	3.1	0.8	0.4	100.0

中，一些文章是由外国人写的；例如海因里奇·戴兹尔在早期写有两篇文章(在随机选择组中被选为样本)，而这相当于这一阶段中德语引证的1/3。

实际上，我们可以将争论的焦点对准这个事实，即如果考虑到早期经济学家所具备的语言上的学识，很显然他们对国外文献引证得太少。在我们的样本中，有16位早期的会长曾在国外学习过并通常取得过学位，一般是在德国。他们是：詹克斯、帕特恩、詹姆斯、费特、格雷、盖伊、普莱恩、波加特(上述这几位，均获德国哲学博士学位)、塞利格曼、费

表 6.2 在抽选的1900年、1935年和1970年的外国经济学杂志中，对不同语言的资料的引证所占的百分比

杂志和语言	1900年	1935年	1970年
政治经济学评论			
英语	16.9%	20.8%	58.8%
法语	67.5	55.0	34.9
德语	15.0	13.9	1.7
意大利语	0.6	7.6	0.3
斯堪的纳维亚语	0.0	0.3	0.0
其他	0.0	2.4	4.3
(引证总计)	(360)	(331)	(347)
学术年刊			
英语	5.0	31.6	30.1
法语	6.9	10.0	9.0
德语	82.8	5.72	59.0
意大利语	0.7	0.0	0..6
斯堪的纳维亚语	1.0	0.7	1.0
其他	3.6	0.5	0.1
(引证总计)	(419)	(402)	(691)
经济学家杂志			
英语	13.1	20.8	52.3
法语	13.1	13.9	4.7
德语	13.1	8.3	1.8
意大利语	60.2	56.6	41.1
斯堪的纳维亚语	0.6	0.4	0.0
其他	0.0	0.0	0.0
(引证总计)	(176)	(505)	(384)
经济杂志*			
英语	15.9	30.1	79.0
法语	4.3	4.1	1.3
德语	40.6	12.3	0.0
意大利语	0.0	0.0	0.0
斯堪的纳维亚语	39.1	53.4	19.6
其他	0.0	0.0	0.0
(引证总计)	(69)	(73)	(153)

* 于1970年用英语出版，

雪、西格、米切尔、顿巴、陶西格和法能。他们的每四次引证中，对国外文献的引证只有一次。

在英语文章中，对外文引证的减少并不仅仅是由于民族沙文主义，而是因为目前经济学明显地是一门英语的科学。为证实并测定这种趋势，我们分析了挑选出的外文杂志在1900年、1935年和1970年三年中所引证的资料的语言分布情况(见表6.2)。在70年间，不仅每种杂志的英语引证部分大大增加，而且(1)比起本国的语言，英语被引证得更频繁(德文杂志是唯一的例外)；(2)虽然在《学术年刊》中，法文引证仍勉强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但除英语外，对所有非本国语言的引证都急剧减少，并(或)接近于零。如果你对引证和以每种语言出版的杂志数量都很留意的话，那么目前在经济学中，被引证著作的90%以上很可能都是英文著作。

7. 结　　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引证习惯的两个重要特征。

第一是对著作引证习惯的短暂性。成功的学术性著作成为科学主体的一部分，而其出处却很快被忽略了。少数概念还标有一个人的姓氏，如埃奇沃思的盒子(但不是他的无差异曲线)，帕雷托最优化，奈特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以及凯恩斯主义理论。但是尽管或尤其是当这些标签变得通用时，在引用它们时却反而很少特别提及原作品(因此也很少包括在我们的引证统计中)。最终，它们几乎总是在意图或含意上与原

作品的用法大相径庭。

第二个结论是，出版著作的数量对一个人被引证次数的多少所起的决定作用比较小。如果我们估算一下文章的长度，这两者间的联系也许能得到加强，因为就引证来说，一本书的影响力肯定比一篇文章要大。我们觉得质量是造成引证与出版物数量之间不一致的一个较大的根源，对有关这两方面的回归方程残差的分析结果也倾向于这一解释。当然，在经济学的一些特殊领域，无疑存在着等级制度——从而说明了在我们的样本中，在经济理论方面占据强有力的中心位置的会长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在写作领域中的那种相对分布。

注　释

① Jonathan R. and Stephen Col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cience (Chicago, 1973), p.22.

② G. Stigler and Claire Friedland, "The Citation Practices of Doctorate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75(chap. 17, below).

③ 对于"会长"组，从每个人的每个年龄段：40岁以下，40—60岁和60岁以上中抽取的文章不超过3篇。由于有这些限制，我们抽选的论文在1886—1925年间为76篇，在1925—1969年间为97篇。对于"其他"组，作者是从《经济学杂志索引》中1925年以前和1925年以后（相应地为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的两组作者间随意选择的。为了在使用《经济学杂志索引》时方便起见，我们把1925年作为第二阶段的开始。由于样本数量有限，我们在大部分分析中无法将时间划分得更小。在第二阶段，对于选择的作者的大约半数，我们的挑选原则被错误地实施为随机挑选作者的文章，而不是随机挑选作者。因此，在这一时期许多多产的经济学家被抽选的机会过大了一些，但是，在我们利用这个资

料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数量上的偏差并不重要。对于第一阶段，只能包括每位"其他"作者的 3 篇文章；对于第二阶段，文章的最大限度是 9 篇。在1925—1940年、1940—1955年和1955—1960 年这三个阶段中，每一阶段只能挑选 3 篇以下的文章。在第一和第二阶段，这一组挑选出来的文章总数与"会长"组相同。对于两组来说，我们均没包括讣告、书评、反驳以及综述性文章。

④ 这里的表格将所有对非杂志性文章的引证均视为其他，或不严格地当作"书籍"，但在有关书籍出版的表2.4 和表2.5中，以及在第 4 节的回归分析中，对书籍出版物的统计是指严格意义上的书籍。

⑤ 1925年以前，杂志文章的有关引证的格局是相似的，因此学科领域的特点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杂志出版这一点似乎很重要。虽然抽样范围有限，特别是文章篇数不多，但总格局的稳定性使我们消除了疑虑(在这两个阶段中，杂志文章引证部分的秩相关系数为.83)。

⑥ M.C.Lovell, "The Production of Economic Liter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1 (1973):31.

⑦ 在第二个阶段，如果不包括主要是对凯恩斯、费雪和马歇尔的书，以及对道格拉斯、里昂惕夫和萨缪尔森的文章的大量引证，相关性要强一些(但秩相关系数也不大)。

⑧ 书籍来源于芝加哥大学的瑞根斯坦图书馆。通过国会图书馆目录的检验表明，我们的统计还是相当完整的。在统计中只包括了每本书的第一版。对有些作者，我们用国会图书馆的资料对瑞根斯坦的表格进行了增补。

⑨ 追溯以往，我们抽选的会长中还应包括皇家经济学会的会长。

⑩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哪些人被挑选的作品相对于所有非会长作者来说，一直呈适度的上升趋势(见第1节，注释3)。

⑪ 100篇文章样本(会长50篇，其他作者50篇)的抽选是随机的，在主要名单中增补的65位"权威"包括的是那些在这次抽样统计中，其姓名被两名或两名以上的作者引证过的经济学家。

⑫ "Of Empty Economic Boxes", Economic Journal 32 (1922);

305, reprinted in Readings in Price Theory, ed. Stigler and Boulding, (Homewood, III, 1952), p.119.

⑬ A.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 chs.7-10.

⑭ "其他"经济学家并不是对英国或其他非美国经济学家（即使讲英语或常被译为英语）有偏见，况且埃奇沃思在这儿仅次于费雪。

⑮ 可能还应加上里昂锡夫，因为定量性著作与分析性著作的比值超出了投入产出分析的统一体。

⑯ 由于这一转换，我们最长阶段的回归的残差分布接近正常状态。见 F. Mosteller and C. Youtz, "Tables of the Freeman-Tukey Transformation for the Binomial and Posson Distributions", Biometrika 4 (1961): 433,以及其中引证的参考书目。

⑰ 较大的正数残差依次为费雪，庞巴维克，J·B·克拉克和李嘉图。

⑱ $(0.1749)^{1/22}=0.923$，为两个时期所列文章的22年间的平均差。

⑲ 为所有权威所作的相应的方程为

$$C'=3.237+0.0296A_{to69}+0.137B_{to69}$$

$$(t=4.15)\quad(t=3.41)$$

$$R^2=0.268\qquad n=126$$

⑳ 这个回归用了会长的446篇样本文章（抽选办法同第1节注释3），这些文章中的自引情况已用表列出。其中包括第2节一第4节中作为分析基础的173篇文章。



经济学博士的引证习惯*

在经济学的讨论中，学派已是一个很平常的概念——或许可以称之为标签。像重农论者、李嘉图主义者、奥地利学派、马歇尔主义者以及凯恩斯主义者，都是一些著名的例子，但我们也愿意谈谈那些小一点的团体，诸如可控竞争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以及芝加哥学派。

一个团体中的每个人在观点上的协调一致，对于他们有资格成为一个学派来说是必需的，然而，这种协调一致的程度却不容易划定。随着一个领域的发展，所有有资格的同仁趋向于取得大范围的共识——库恩就是一个著名的范例，而不论其属于哪个"学派"。

相反，不能指望科学上的学派会像宗教

---

* 原载于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3 (1975)。© 1975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与克莱尔·弗里德兰合著。

团体或按政策行事的机构所坚决主张的那样，显示出信仰的专一和对异端的不容忍。毕竟，科学是崇拜首创性和论证的独立性的，而这些正是变革的引擎。不过，在严密的学派中，如果知道一个人是其中的成员，还是能够准确地预计他对某个争论性问题的看法的。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存在着下列问题：美国主要的研究生教育中心，是不是指那些在其博士生身上留下与众不同特征的“学派”？更确切地说，是不是芝加哥的研究生与哈佛的研究生在重大的科学方面有所区别？然而当我们回答第二个问题时，所有能看得到的区别的起因，不论是由于大学中的研究院所逐渐灌输的，还是由于影响他们对研究院的选择的基本看法，基本上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围。

下面是基本的探讨方法。我们编列了1950—1968年这一阶段里，在经济理论的两个主要领域——价值理论（相当于我们下面所称的价格与资源配置理论）和货币与财政经济学（我们经常简称为货币理论）中，6个著名研究院各自的博士生所写的文章（表1）。① 甚至连我们研究中包括在内的第五大研究院，也只有很少的博士生的写作涉及这两方面，这使得我们在统计上如履薄冰。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经济学家引证习惯中的另外一些问题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尽管我们的样本在当初设计时没考虑要应付这些问题，但还是要作一些基础性的研究。这些额外的题目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学家领袖的引证习惯。

首先，我们对这些博士在研究院的背景情况以及他们随后的职业生涯作一个浏览。在对引证习惯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之后，我们将转入中心议题：研究院的选择对博士的影

表 1 构成这一研究整体的机构、博士(1950—1955年)和论文(1950—1963年)

机构	博士总数	博士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领域		论文所涉及的领域	
		价值理论	货币理论	价值理论	货币理论
伯克利大学	80	16	14	32	23
芝加哥大学	106	26	27	82	73
哥伦比亚大学	116	19	15	61	35
哈佛大学	225	38	32	127	77
麻省理工学院	30	8	*	17	*
威斯康星大学	143	*	8	*	19

* 对于分析来说数字太小。

响。然后，我们将研究被引证的经济学家领袖们在引证中所揭示出来的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1. 博　士

在我们的研究中所包括的对博士特征的必要的简短调查，将经常针对那些来自所选择的研究生院中1950—1955年间所有的博士，而不仅仅是写作中涉及引证研究中所包括的两个学科领域的博士。②

博士是什么人?

首先，我们从博士的起源——学士入手。一般说来，公

立研究生院主要是从公立学院招生，而私立研究生院更多地从私立学院招兵买马(见表 2)。这种离隙越来越大。除麻省理工学院外，所有大学中的研究生主要来源于本校的大学生(见表 3)。也许所招收的新学员的分布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大部分大学和研究生院之间的配合是由于地理上的接近。

表 2　博士就读本科时的大学的类型(百分比分布)

大学院校的类型	伯克利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威斯康星大学	总计
美国:							
私立	21.7	53.8	44.2	55.1	43.3	19.6	41.6
公立	68.1	30.2	40.7	30.9	26.7	63.8	43.0
美国合计	89.8	84.0	84.9	86.0	70.0	83.4	84.6
加拿大	5.8	7.5	2.7	6.3	13.3	3.6	5.6
其他外国院校:							
欧洲	4.3	3.8	7.1	1.0	6.7	1.4	3.2
亚洲	0.0	2.8	2.6	3.4	6.7	5.8	3.5
外国院校合计	4.3	8.5	12.4	7.7	16.7	13.0	9.8
全部已知类型的院校	100.0	100.0	100.1	100.0	100.0	99.9	100.0
不知类型的院校*	13 8	0.0	2.6	8.0	0.0	3.5	5.3

* 占所有博士的百分比。

不同大学的学生在主要研究领域的分布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我们的探讨仅针对价值理论和货币与财政理论方面的文章，因此，这一局限性对引证研究中出现的每个研究生院博士的份额会产生很大影响。表 4 中按博士研究的主要领域，对他们进行了分类。③

表 3　博士就读本科时的主要大学

本科大学	伯克利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威斯康星大学	合计
哈佛大学	1	5	3	39*	1	0	49*
威斯康星大学	2	2	2	5	0	29	40
芝加哥大学	1	25	2	2	0	0	30
伯克利大学	15	2	1	2	1	0	21
纽约市立大学	0	1	17	2	0	1	21
哥伦比亚大学	1	1	17	1	0	0	20
华盛顿大学	3	2	2	4	0	2	13
伊利诺斯大学	0	0	3	3	0	3	9
衣阿华州立大学	2	0	1	2	1	3	9
明尼苏达大学	2	2	4	0	0	1	9
得克萨斯大学	0	0	5	3	0	1	9
奥伯林大学	1	1	1	5	0	0	8
纽约大学	0	1	3	2	0	1	7
西北大学	0	4	1	1	1	0	7
普林斯顿大学	0	3	1	2	1	0	7
布鲁克林大学	0	1	3	1	0	1	6
俄亥俄州立大学	1	3	0	1	1	0	6
康奈尔大学	0	2	1	2	1	0	6
斯沃索莫大学	1	0	0	4	1	0	6
阿肯色大学	0	0	0	2	0	3	5
堪萨斯州立大学	0	1	0	2	0	2	5
昆斯学院	0	1	3	1	0	0	5
阿默斯特大学	0	1	1	3	0	0	5
罗切斯特大学	1	0	0	2	1	1	5
波莫纳大学	2	0	1	1	1	0	5

* 包括五个拉德克利夫文学院。

表 4　按主要研究领域对博士的划分(所有研究院的百分比)

研究院	主要领域	
	价值理论	货币和财政理论
伯克利大学	28.4	3.1
芝加哥大学	20.2	19.1
哥伦比亚大学	20.0	14.4
哈佛大学	18.9	11.1
麻省理工学院	21.7	0.0
威斯康星大学	11.9	23.9
总　计	19.1	13.3

在1969年，各研究生院博士在就业类型上的差别之大出人意料(表 5)。伯克利的博士仅有 1/30 进入政府机关，而哈佛大学则将近 1/5 。麻省理工学院不多的博士中，有 1/4 步入了企业，相反，伯克利、芝加哥和威斯康星仅为 1/14 。

表5　1969年博士从业的类型(百分比分布)

雇主类型	伯克利	芝加哥	哥伦比亚	哈佛	麻省理工	威斯康星	总计
学术机构	86.4	74.2	68.8	59.1	58.6	63.9	66.8
企业	6.8	7.2	10.7	13.4	24.1	7.3	11.0
政府	3.4	11.3	5.4	18.8	10.3	12.1	12.3
非赢利机构	1.7	3.1	6.4	3.4	3.4	3.6	3.7
所有其他机构	1.7	4.1	8.6	5.2	3.4	13.2	6.3
所有有资料来源的	100.0	99.9	99.9	99.9	99.8	100.1	100.1
所有情况不详的 *	27.5	8.5	19.8	7.6	3.3	42.0	18.7

* 所有博士的百分比

如果资料能再完整一些，各研究院之间的差别会有所缓

和。我们的主要资料来源是美国经济协会(AEA)的《手册》，不过，已通过一些大学的校友卷宗对其进行了增补，后者反映出那些不属于美国经济协会的博士，更可能是在企业和政府中，或从事其他职业，也可能已退休或亡故了，在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的可能性较小。④ 威斯康星和伯克利有关博士的资料特别不完整，哥伦比亚也明显地糟糕。对于哥伦比亚，我们可以用从校友档案中得到的职业分布情况来对情况不明的那一组进行分类；这样产生的学术机构组的百分比稍低一点，大约为 65 %。至于伯克利和威斯康星，虽然其毕业生资料无法得到，但我们通过更详尽的资料推断出这两个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的毕业生相对来说更少一些，因此，伯克利的这一比例可能接近其他研究院的水平，而威斯康星还要低一些。同样地，每个研究院在企业和政府中的博士的比例之间的不平衡很可能趋于缓和。

跻身于学术圈的 2/3 的博士在各院校之间的分布较之当年大学时代更为广泛。不过，研究院显然更喜欢雇用自己的博士毕业生。博士生就读的研究院是他们独一无二的最大的雇主(见表 6)，在我们的样本中，对于这条规律只有一个例外。这种近亲繁殖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自己拥有的某个博士的材料要比别的研究院所提供的详细得多也可信得多。这个论点主要适用于年轻的博士们，但在任何院校，一个助理教授在本校提升的可能性是其他地方相应学者的10倍，甚至20倍，这一点也是事实。

对博士所在的地域位置的详尽分析，更使我们确信在学术市场上肯定存在着地方主义色彩：52%的哈佛博士生在东北部的院校任教(1969年)；46%的伯克利博士生在西部；威

表6　1969年各院校博士所属的主要研究机构

1969年研究机构	伯克利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威斯康星大学	总计
伯克利大学	3	1	2	2	1	…	9
芝加哥大学	…	6	…	…	…	…	6
哥伦比亚大学	…	2	6	2	1	…	11
哈佛大学	1	…	1	7	…	…	9
麻省理工学院	…	1	2	2	2	…	7
威斯康星大学	4	1	2	2	1	4	14
纽约市立大学	1	1	6	1	…	…	9
伊利诺斯大学	1	2	1	2	…	2	8
密执安大学	2	…	3	2	1	…	8
西北大学	1	3	…	1	1	1	7
纽约大学	…	…	3	3	…	1	7
华盛顿大学	3	2	…	…	…	1	6
耶鲁大学	…	…	…	5	1	…	6
迈阿密大学	…	1	…	1	…	3	5
密苏里大学	1	…	…	1	…	3	5
拉特格斯大学	…	…	4	1	…	…	5
匹兹堡大学	…	1	1	1	1	…	4
普林斯顿大学	…	1	…	3	…	…	4
斯坦福大学	…	1	…	3	…	…	4
加州大学	1	1	…	2	…	…	4
韦恩大学	…	2	…	1	…	1	4

斯康星55%的博士生集中在北方的中部地区；等等。作为博士来源的学生，也存在着类似显著的地区上的分割，因此，可以断言非竞争集团原理还在发挥着作用。⑥

博士的出版物

表7中列出了1950—1955年间各研究生院授予的博士学位的总人数，以及他们在1950—1968年间在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总数。出版物的详表中多少存在点沙文主义，因为我们只统计了英语杂志，不过很明显，纠正这一失真是次要的。⑩

表7　选出的研究生院中所有博士的杂志出版物，1950—1968年

	伯克利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威斯康星大学
1950—1955，博士人数	80	106	116	225	30	143
至少发表一篇论文的人数	58	79	82	153	18	68
至少发表一篇论文的人数所占百分比(%)	72.5	74.5	70.7	68.0	60.0	47.6
每位博士的全部论文：						
所有博士	4.65	5.56	3.66	4.94	4.17	2.06
发表过论文的博士	6.41	7.46	5.18	7.26	6.94	4.32
发表的论文篇数	372	589	425	1,111	125	294
价值和货币理论方面的论文所占百分比(%)	14.8	26.3	22.6	18.4	不详	不详

在几所主要的研究院中，发表过作品的博士所占的比例较大；大约有2/3的人至少发表过一篇文章。芝加哥研究院每位博士发表文章的篇数最多，与之水平相近的为伯克利、麻省理工学院以及哈佛研究院，威斯康星的博士水平却要低得多——从统计角度来看，只有后者的差异才具有意义。

博士间的不平衡现象非常普遍(表8，9)。在价值和货

币理论领域中，50％有作品的博士仅发表过一篇文章；而在所有经济学科中，相应的数字为21％。两位最多产的博士的作品占价值理论方面文章的13.8％，前15名（总数为107名）的文章占45.8％；在货币和财政理论方面，这两个百分比分别为10.6％和46.3％（博士总人数为96）。一旦平均主义波及到学术研究领域，杂志、期刊的倒霉日子就开始了。

我们的研究跨越了博士们将近半生的时间——16年间出版物的平均数。写作与不写作都是难以更改的积习，因此，

表8　博士在所有经济学科中发表的文章总数，1950—1968年

文章	博士						
	伯克利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威斯康星大学	总计
0	22	27	34	72	12	75	242
1	10	14	24	26	1	23	98
2	5	4	10	20	5	10	54
3	2	14	12	15	0	9	52
4	9	6	5	15	0	5	40
5	7	6	4	11	0	4	32
6—10	16	17	15	28	8	10	94
11—15	4	9	10	22	3	5	53
16—20	3	3	0	8	1	1	16
21以上*	2	6	2	8	0	1	19
合计	80	106	116	225	30	143	700

*文章发表得最多的博士为：伯克利大学的K·福克斯，22篇；芝加哥大学的E·米香，41篇；哥伦比亚大学的K·阿罗，36篇；哈佛大学的R·索洛，44篇；麻省理工学院的G·施特劳斯，18篇；威斯康星大学的R·兰普曼，26篇。

出版物总分布上的倾斜，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更严重。

表9 博士在价值和货币理论方面发表的文章，1950—1968年

文章	博士						
	伯克利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威斯康星大学	合计
价值理论:							
1	8	13	8	16	4	…	49
2	5	3	5	6	3	…	22
3	…	3	3	3	…	…	9
4	1	2	1	4	…	…	8
5	2	1	…	1	…	…	4
6—10	…	3	1	6	1	…	11
11—15	…	…	…	2	…	…	2
16—20	…	1*	…	…	…	…	1
21以上	…	…	1**	…	…	…	1
合　计	16	26	19	38	8		107
货币和财政理论:							
1	9	10	8	20	…	7	54
2	3	6	4	2	…	…	15
3	1	4	1	4	…	…	10
4	…	3	1	…	…	…	4
5	1	1	…	2	…	…	4
6—10	…	3	…	4	…	…	7
11—15	…	…	1	…	…	1	2
合　计	14	27	15	32		8	96

*米香，20篇文章。

**阿罗，24篇文章。

博士文章分布上的倾斜给衡量博士的引证属性带来了麻烦。是不是要在计算时，将米香等同于芝加哥大学的17位不多产的博士，或将阿罗与哥伦比亚大学的15名写作较少的博士划等号呢？一般情况下，我们采用的统计引证的方法(下文中将予以说明)，不考虑同一篇文章中的重复引证，而是赋予每篇文章一个同等的发言权。另外，还将采用一人一票的计量方法作一些比较。

2. 引证的方法

一位学者对他人的引证或被他人引证，日益成为他在学问上的"借贷者"的普通资料来源。引证对于任何人肯定都是个难免有错误的指标，引证的形式差别非常大。在脚注中显示其学问的饱学之士(这多少与古老的德国传统有牵连)，很难反映出已对他产生作用的强大的知识影响。而外表上很随便的学者(肯定在牛津和剑桥大学中受过教育)对引证的看法已超出了这个概念本身，他们宁愿将之曲解为卖弄学问的表现。所有研究院的学者在自身引证上都步调一致。有些人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他们最大的"债务"。当我们对学者们大量的引证进行汇总时，如同将要做的那样，你会不得不相信，凡此种种差别将大大减少。

我们说统计的合计数能淹没每个人特有的风格，并不意味着汇总是一个恰当的方法。知识影响的性质是最多变的。当我们在研究中追寻弗里德曼，并引用永恒收入和暂时收入

的概念时，或在援引萨缪尔森所揭示的偏好的时候，影响的方向或是影响的范围从道理上说是很清晰的。一个创新者的著作会被其他人所接受并利用。而当我们简单地一律不加引证时，影响力也有可能最大，马歇尔的长短期平均价格理论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济学家不断地利用这种声望，但却常常是不仅没有认识到马歇尔将它引入了经济学，而且也不明了无论是马歇尔还是其他任何人都还没有承认它的实证意义。引证分析对还算新的著作可能最适用，因为在文献中，这类著作还没来得及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

我们并不想夸大引证作为衡量影响的尺度所存在的缺陷。学术争论吸引着注意力，因而引证和注意力对学者产生着影响。引证是将你的文章中对某一理论或某一问题的阐述，转移到其他人的文章中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式，因此，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引证体现了一种智力协作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引证就是影响，它们是通过对引证文章的读者产生作用，进而影响到学识的。

引证的范围

我们选择了经济学文献中的两大领域用于引证分析："价值"理论（我们这样称它）与货币和财政理论。按照《经济学文献索引》的条目，这两个领域所包括的范围如下：

Ⅰ.价值理论

2.1 价值，价格和配置理论

22.2 生产要素和分配份额

15.23 垄断·集中·竞争

Ⅱ.货币和财政理论

2.3 总量和货币理论
(特别是2.30—2.33)
9.6 价格·通货膨胀·通货紧缩
9.9 货币政策
(特别是9.90—9.93)
10.2 寻求经济稳定与增长的财政政策
10.5 公共债务与债务政策
13.3 战时融资与稳定政策
(特别是13.32—13.33)

对于1950—1955年间获博士学位的人在1950—1968年间所写的每篇文章(在编入索引的杂志中),我们都将其中的每位经济学家被引证的次数以及引证的类型(赞成的，反对的;或中立的)进行了编集。出版物被分为三个阶段(1950—1957年,1958—1962年和1963—1968年),以便于研究引证的变化——通常得不出重大的结论,这也许是由于样本量太少的缘故。我们的主要研究是基于这部分文章的影响迹象及其看法而进行的。

应该如何统计引证的数量?

在某篇文章的字里行间中，一个人被提及的次数是对他的影响范围的一种可行的衡量。但这种方法并不严密，因为在一段文字中，就某一论点，一个人的姓名可能会被引证多次,而随后就销声匿迹了。在计算引证总数时,我们统计的是符合下述条件的所有引证，即每段中对任何权威的引证不能超过一次。

然而，引证总数未必是衡量一个人影响的适宜方法。主要的博士引证者具有很大的热忱，因此，我们将所赞成的

（或不赞成的！）经济学家的引证堆积如山。这种冲动的引证者之一就是E·J·米香，引证希克斯66次，利特尔55次，卡尔多43次；而迈伦·戈登常常想到莫迪利阿尼（引证55次）；类似的还有罗伯特·多夫曼（引证里昂惕夫41次）和罗伯特·斯特罗茨对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引证（每人31次），等等。这种注意力的集中能从参照表1中所列的价值理论领域的主要博士引证者中得到一定的反映。⑦

这些迸发的热情或许并不能令人大吃一惊，但它们却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希望我们的引证去衡量哪种影响？我们会发现，瓦尔拉在价值理论领域被引证最频繁的名单中位居第三，共被引证160次，其中93次来自库恩耐（而且在30位最多产的博士引证者中，另外只有10人曾提到瓦尔拉）。这个影响面比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要窄得多，马歇尔仅被引证107次，但其中只有18次来自最频繁的引证者（米香和H·莱文），并且在30名主要博士引证者中有17名对他进行了引证。还存在大量其他的引证面或窄或宽的例子。你不妨仔细看一下表10中价值理论领域的引证样本。

为了更好地衡量权威的影响面，我们可以在各种引证的统计方法中进行选择。对曾经引证过权威的博士人数的统计方法，前面已经采用过，这种方法看起来是过分严密了。而另一方面，如果肯尼思·阿罗在不同的文章中重复不断地引证萨缪尔森（40次），那么与他对贝恩和马夏克的引证仅为一次相比，在统计时，萨缪尔森应更有价值。对引证的完全合理的度量应从一种合意的衡量学术影响的方法出发，但我们恰恰缺少这样的方法。

作为现有几种方法的折衷产物，我们将采用对权威至少

表 10　价值理论方面的引证

姓名	引证总数	三个最频繁的引证者对每个人的引证(%)
希克斯	268	50.4
萨缪尔森	209	39.7
瓦尔拉	160	80.0
利特尔	151	73.5
马歇尔	107	44.9
卡尔多	83	79.5
冯·诺伊曼	68	83.8
施蒂格勒	67	31.1
兰格	63	79.4
奈特	49	38.8

引证过一次的文章的数量作为统计引证的基本方法。我们主要的兴趣在于度量研究院的选择对博士的影响，为此，就需要有一种度量影响的方法，能够避免一些引证较多的人主宰整个结论。"至少引证一次"的采用是一种妥协，即剔除了一篇文章中对某位权威的多次参照，但在揭示学术影响时，赋予多产的博士以较大的发言权，因为我们确信他们当之无愧。③ 当我们说(表 11)萨缪尔森被引证 72 次时，意思是指博士写的文章中有 72 篇对他至少引证过一次。

赞成性的与反对性的引证

两位从事引证分析的研究生被要求将引证分为"赞成性的"、"反对性的"和"中性的"三类——如果实在弄不清一个引证是"赞成性的"还是"反对性的"的话，就归入最后一类。在他们划分的 5,581 个引证中，大约 648 个是赞成性的，566 个为

反对性的——这种温和的抵触正如休·多尔顿的著名评论，即经济学家互相接受别人的脏衣服去洗。

通常，引证是很容易区分的。例如，当埃克斯坦(还有威尔逊)发表如下见解时，肯定是赞成H·M·莱文森的："我们从莱文森开拓性的研究中受益匪浅，他在其定性分析中强调了工资总额和关键谈判交易的重要性。莱文森从对两位数的制造行业全年数据的分析中，发现了利润的中心意义。他得出的另一个重要的否定性结论是生产率和产出变化不是解释工资的重要变量"(埃克斯坦和威尔逊1962年，第402页)。⑨然而，分类常常要运用一个人的诡辩才能。不妨细想一下希克斯对帕廷金的评论文章，它是这样开头的："我(从这本书中)学到的主要东西并不是作者意欲教诲我的那些知识。"(1957年，第278页)。说一个人居然没有弄清自己要表达的中心意思，这并不是充满敬意的，但同时又说一位经济学家能教诲这位约翰先生一些东西，这是赞美性的——因此，这一段话被归入中性组。虽然不存在明确的、恰如其份的分类，但我们相信这种划分是比较连贯的。⑩

谁是被引证者？

我们可以将在1950—1968年间经济学博士所写的我们这一领域的文章中，每位经济学家(或其他人)被引证的频率列成表。为测定学究们的忠诚和有才智人士的派别，我们本着简略的原则，在基础数据表中省略了一些潜在的权威。因此，我们在制表中仅包括了对下列人员的出版物的引证：(1)各研究院1950—1955年从事研究的全体成员；(2)文献中的杰出人物。⑪

所选择的权威比我们在回顾中所希望的要少一些。不属于学院的权威是从适当文献的非常简单的概况中搜集整理的。比如，按我们的标准，唐·帕廷金这个被引证次数最多的货币经济学家之一，没有列入符合条件的价值理论家的行列，这样，表中就没有包括有关价值理论的文章中对他的引证。依此类推，我们排除了许多引证，特别是对一些研究院许多研究人员的引证，因为我们的研究中不包括这些研究院的博士。可以肯定，被漏掉的人名即使出现的话，也将主要分布在表的后半部分。

由博士所进行的引证在杂志文献中当然不具有代表性。在规定年代中的一组人，其志趣——阅读和写作，要比一般同行更近似，而这种相似性由于对少数几所主要研究院的限定又得到了加强。然而，这几所研究院造就了大部分杰出的经济学家，因此，可以证明与更广泛的分组相比，这些研究院的博士们在从事科研的主要年代中所反映出的引证习惯，为衡量影响力提供了一条更佳的途径。

写作乃至少数异常多产的博士引证焦点的过分集中，都会对引证统计产生很大影响。在这方面，这些博士与一般的同行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多数经济学家很少写作，多产的只有少数；在作者中，有些人在引证上表现得非常吝啬，而另外一些人滥于引证，似乎每引证一个姓氏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总结引证的频率，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引入译文作为衡量被引证权威的重要性或影响力的指标。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在货币和财政经济理论中，我们总结出的杰出者是：凯恩斯，被引证 61 次；弗里德曼，45 次；希克斯，34 次；帕廷金，31 次；以及庇

古，31 次。没有人会怀疑其中的前四位是战后数十年这一领域中最有影响的知识界泰斗。(庇古很可能将其名望归功于对庇古效应的讨论。)但是，我们的方法并不很准确，这是由于名单中有许多遗漏的缘故。我们必须提醒你，一个经济学家无论被引证得多么频繁，除非他在概览性的文章中被提到过几次，或者他是我们的研究中所包括的几所研究院之一的研究人员(每个领域 5 个研究院，在两张表中出现 4 次)，⑫ 否则，就不会将他统计在被引证者中。

3. 研究院对博士的影响

最后再回到引证上来。让我们立刻描绘一下我们已经作过分析的两种文章的样本：有关价值理论的文章及有关货币和财政理论的文章。这些杰出“权威”(这个十足的维多利亚式的字眼也不会使我们忘记，对那些引证“权威”的人来说，有些“权威”是对手或笨伯)的名单按每篇文章“至少引证一次”的原则列在表 11 和表 12 中，相应的总的引证名单可参照表 2 和表 3 。与有关货币和财政理论的文章相比，有关价值理论的文章中引证的经济学家人数较多，因此，在前一领域，我们列出的人名范围要更广泛一些。

我们最后再一次强调，由于对所包括的经济学家规定了标准，因而许多杰出人物从名单中漏掉了。不过，尽管存在这个强硬的限制性条款，称下面几位为迄今为止博士们所涉及的综合经济理论方面的权威，还是相当有把握的：⑬ 两张表中引证次数，希克斯为 105 次；凯恩斯，91 次；萨缪尔森，

表11 对权威至少引证一次的价值理论方面的论文，1950—1968年

权威	博士学位来自 伯克利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五所院校总计
P·A· 萨缪尔森	6	15	17	27	7	72
J·R· 希克斯	9	18	13	25	6	71
A· 马歇尔	4	16	10	14	2	46
G·J· 施蒂格勒	1	15	14	9	1	40
K·J· 阿罗	0	11	5	15	2	33
M· 弗里德曼	1	9	12	11	0	33
W·J· 鲍莫尔	4	5	6	16	1	32
J·M· 凯恩斯	3	7	4	13	3	30
L· 瓦尔拉	6	5	7	9	1	28
T· 西托夫斯基	3	10	5	7	2	27
F·H· 奈特	5	9	7	5	0	26
F· 莫迪利阿尼	0	6	3	16	1	26
V· 帕雷托	1	7	10	7	1	26
A·C· 庇古	2	10	5	6	2	25
W· 里昂惕夫	4	4	1	13	1	23
J· 冯·诺利曼	1	5	9	8	0	23
O· 摩根斯坦	0	5	9	8	0	22
R·M· 索洛	3	5	4	8	1	21
N· 卡尔多	2	8	2	8	0	20
O· 兰格	0	3	8	7	2	20
K·E· 博尔丁	2	7	3	7	0	19
I·M·D· 利特尔	0	10	5	3	1	19
H· 霍特林	0	5	5	7	0	17
H·A· 西蒙	0	3	6	8	0	17
A·P· 勒纳	1	5	4	6	0	16
J· 罗宾逊	5	2	1	7	1	16
J·S· 贝恩	0	0	8	6	1	15

（续表）

权　威	博士学位来自					五所院校
	伯克利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总计
T· 库普曼	2	4	5	3	1	15
J· 马希克	3	2	2	8	0	15
J·A· 熊彼特	2	1	3	8	1	15
A· 伯格森	0	2	7	5	0	14
E·H· 张伯伦	2	2	2	8	0	14
J· 杜森伯里	3	2	3	5	1	14
M·W· 雷德	0	3	4	7	0	14
R·G·D·艾伦	1	4	2	4	1	12
A· 古诺	1	1	5	4	1	12
R· 多夫曼	1	1	0	9	0	11
R·F· 哈罗德	0	2	2	6	1	11
L·R· 克莱因	2	0	1	8	0	11
E· 库	0	1	1	9	0	11
J· 托宾	0	2	2	7	0	11
G·S·贝克尔	0	1	2	5	2	10
J·M·克拉克	1	1	4	4	0	10
P·H· 道格拉斯	2	2	0	6	0	10
J·T· 邓洛普	0	1	1	8	0	10
O· 埃克斯坦	0	2	1	7	0	10
W·J· 费尔纳	1	0	0	8	1	10
L·A· 梅茨勒	0	2	5	3	0	10
D·H· 罗伯逊	3	4	0	3	0	10
其他被引证者:						
5 次及 5 次以上						
(39人)	22	52	57	115	9	255
1—4次(73人)	18	28	32	70	4	152
总计(163人)	127	325	324	595	59	1,430

表12 对权威至少引证过一次的货币和财政理论方面的论文，1950—1968年

权威	博士学位来自 伯克利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	五所院校总计
J·M· 凯恩斯	6	26	11	17	1	61
M· 弗里德曼	1	21	14	9	0	45
J·R· 希克斯	4	13	5	11	1	34
D· 帕廷金	3	18	5	5	0	31
A·C· 庇古	1	18	6	6	0	31
A·H· 汉森	3	7	5	8	2	25
J· 托宾	1	8	4	8	3	24
A·P· 勒纳	4	7	6	3	1	21
G· 哈伯勒	3	1	5	11	0	20
A· 马歇尔	3	7	3	5	0	18
P·A· 萨缪尔森	3	5	2	5	3	18
E·S· 肖	3	2	5	7	1	18
J· 杜森伯里	1	4	3	8	1	17
R·M· 古德温	2	2	1	12	0	17
J· 格利	2	2	2	9	2	17
W·L· 斯密斯	0	4	5	7	1	17
L·A· 梅茨勒	2	8	1	5	0	16
L·R· 克莱因	3	7	2	2	0	14
D·H· 罗伯逊	3	5	0	5	0	13
R·M· 索洛	1	4	3	5	0	13
W·J· 鲍莫尔	1	0	2	8	1	12
M·布龙芬布伦纳	2	0	4	4	2	12
J·M· 克拉克	3	3	0	6	0	12
A· 斯密	0	3	2	6	1	12
A·F· 伯恩斯	3	1	1	4	1	10

（续表）

权威	哲学博士学位来自 伯克利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	五所院校总计
E·D·多马	2	3	0	5	0	10
I·费雪	0	7	1	2	0	10
A·G·哈特	0	2	4	3	1	10
S·C·蒋硕杰	2	1	1	6	0	10
R·F·哈罗德	2	1	1	5	0	9
H·G·约翰逊	1	3	1	4	0	9
J·A·熊彼特	2	1	1	4	1	9
K·布伦纳	0	4	3	1	0	8
S·库兹涅茨	0	3	0	5	0	8
O·兰格	0	3	1	3	1	8
R·T·塞尔登	2	1	5	0	0	8
D·G·约翰逊	3	3	1	0	0	7
F·H·奈特	1	4	0	2	0	7
T·库普曼	0	3	0	4	0	7
E·R·罗尔夫	1	2	2	2	0	7
S·H·斯利克特	0	2	1	4	0	7
W·J·费尔纳	4	0	1	1	0	6
W·里昂惕夫	1	2	1	2	0	6
A·W·马吉特	1	2	2	1	0	6
A·E·里斯	0	2	0	4	0	6
R·特维	0	1	1	4	0	6
J·W·安杰尔	1	1	2	1	0	5
O·布朗利	0	4	1	0	0	5
J·T·邓洛普	2	1	0	2	0	5
J·K·加尔布雷思	1	0	1	3	0	5
E·J·汉密尔顿	1	4	0	0	0	5
F·马克卢普	0	0	0	5	0	5
L·W·明兹	0	3	1	1	0	5
A·W·菲利普	0	1	0	4	0	5
其他被引证1—4次的人（56人）	16	36	19	40	3	114
总计（110人）	101	276	148	294	27	846

90次；弗里德曼，78次；庇古，56次。(如果我们以引证总数为依据，则前四名不变，第5名易为帕廷金。)但是，倘若我们将研究的触角伸向其他经济学领域，那么许多名字出现的频率会相应地有所提高：加德纳·米恩斯很可能在产业组织方面独占鳌头；约翰逊，梅茨勒，米德，纳克斯和瓦伊纳在国际贸易方面处于支配地位；而在劳动经济学中统领风骚的是斯利克特和道格拉斯，如此等等。如果再将研究的面扩展到其他研究院，得出的结果就更是捉摸不定的了，但是，列在名单之首的几个人的排序大致上不会有什么变化。

不同研究院权威名单之间的相似性足以说明，人们仅仅需要一种价值理论与一种货币和财政经济学理论。因此，3个大研究院(芝加哥、哥伦比亚和哈佛)各自的博士生引证了各自的价值理论领域中26名突出的权威，以及货币和财政理论领域中18位杰出人物。为了更概要地衡量出不同研究院间的一致性，在表13中我们引出了相关系数(通过log[C+1]计算得出的，这里C是指引证统计数)。⑭

在价值理论方面，不同的相关系数(涉及49位突出权威)大体上在0.3—0.4之间，只有三个例外很惹人注目：伯克利和哥伦比亚之间互不相关，而芝加哥和哥伦比亚之间却相关密切。在货币和财政理论方面，相关程度要低一些——我们首先发现，在经济学的这一分枝中，权威们的观点明显地不大一致。⑮

除了博士们所具有的引证本校学者这一嗜好外(对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还将述及)，很难找出这些研究院之间在引证习惯上的系统性差异。在价值理论方面，能够找出一部分较多地引用数学方法的经济学家，所有研究院的博士引证数学

方法的相对频率大致相等。同时，还能辨别出一部分在福利经济学方面比较活跃的经济学家：这里差异要大一些，但是也只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对这一学科显示出近乎病态的兴趣。最终，如果区分出著有大量实证性著作的经济学家，那么他们被每所研究院的博士引证的次数大致相等 伯克利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可能稍少些。总的说来，这一结论与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我们自己)头脑中的印象是一致的，即价值理论是一个为大多数有能力的经济学家所接受的定义完善的学科。

在货币和财政领域，研究院之间的差别较大。如果我们不严格地将凯恩斯主义者划为一组，⑯那么，各研究院的博士间就不存在大的差别——每个研究院的引证中大约有1/5是针对这一组的(实际上，芝加哥这一比例最高，为22.5%)。但是，类似的对货币主义学派的分组却带来了很大差异：⑰ 哈佛和伯克利的博士对货币主义学派的引证仅占1/10，而哥伦比亚为1/6，芝加哥为1/5。

狭隘的效忠

研究院的博士很自然地对本院同仁的著作引证得更为频繁。仅仅是熟识就会导致这个结果，更何况还存在着友谊，甚至可能是灌输的因素。与熟识相同的因素——非常了解情况——导致英国经济学家优先引证英国人的著作，美国人也是如此。对情况的了解还可能导致博士们的引证过分集中于其他著名研究院的学者。为提供价值理论的样本，表14中列出了"至少一次"的引证分布。诚然，许多经济学家不包括在我们所说的权威中，他们都在列出的几所研究院之外，然而

表13　研究院间在对权威引证方面的相关性：引证过(至少一次)权威的文章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威斯康星大学
价值理论，突出的49名权威：					
伯克利大学	0.36	0.07	0.33	0.39	…
芝加哥大学	…	0.60	0.39	0.42	…
哥伦比亚大学	…	…	0.27	0.39	…
哈佛大学	…	…	…	0.47	…
货币和财政理论，突出的54名权威					
伯克利大学	0.19	0.31	0.23	…	0.21
芝加哥大学	…	0.46	0.25	…	0.09
哥伦比亚大学	…	…	0.31	…	0.42
哈佛大学	…	…	…	…	0.40

注：相关系数介于$\log(C_i+1)$和$\log(C_j+1)$之间，这里C_i是指i研究院博士的引证数。

表 14　价值理论方面"至少一次"的引证(百分比分布)

博　　士	本院的权威	其他四所院校的权威	其他权威
伯克利大学	7.1	41.7	51.2
芝加哥大学	13.2	26.8	60.0
哥伦比亚大学	9.6	32.1	58.3
哈佛大学	13.7	31.1	55.2
麻省理工学院	15.3	27.1	57.6

尽管如此，博士们的引证还是大量集中于那些高产学者。

表 15 和表 16 是各研究院所属博士的矩阵表。"地方主义"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a)计算其他三所大研究院的出版

表 15　五所院校学者间"至少一次"的引证：价值理论(百分比分布)

博士的院校	被引证者所属院校 伯克利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合计
伯克利大学	14.5	32.3	8.1	27.4	17.7	100.0
芝加哥大学	13.8	33.1	13.8	20.8	18.5	100.0
哥伦比亚大学	17.0	29.6	23.0	12.6	17.8	100.0
哈佛大学	20.4	19.6	10.7	30.4	18.9	100.0
麻省理工学院	12.0	16.0	8.0	28.0	36.0	100.0
地方主义指数	.76	1.19	1.89**	1.44**	1.83*	

* 与整数显著差别10%的水平。

** 与整数显著差别5%的水平。

表16　五所院校学者间"至少一次"的引证：货币和财政理论(百分比分布)

博士的院校	被引证者所属院校 伯克利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合计
伯克利大学	23.1	25.0	17.3	28.8	5.8	100.0
芝加哥大学	3.6	61.8	10.0	23.6	0.9	100.0
哥伦比亚大学	16.2	29.4	17.6	30.9	5.9	100.0
哈佛大学	9.4	24.5	10.8	51.8	3.6	100.0
麻省理工学院	7.7	15.4	15.4	38.5	23.1	100.0
地方主义指数	1.87*	2.05**	0.98	1.49**	4.95**	

* 与整数显著差别10%的水平。

** 与整数显著差别5%的水平。

物中，对 i 学院引证的百分比分布，其中，不包括博士对本院学者的引证。⑱ (b) 取四所大研究院的这些未加权(“预期”)分布的平均数，并调整为 100%，从而得出对五所研究院学者引证“预期”的相对频率。⑲ (c) 用这一引证的预期百分比去除该研究院博士的实际百分比。这个计算过程能推导出地方主义指数。例如，在价值理论方面，伯克利的博士对本院学者的引证(“至少一次”)占对五所研究院学者全部引证的 14.52%。在其他大研究院博士的引证中，对伯克利学者的引证占 19.20%，则这一指数 (14.52/19.20=0.76) 表明，在这个学科的地方色彩不浓。其实，地方主义指数也有一点狭隘色彩，因为它们取决于博士对其他研究院学者的引证，不过要想加以改进，需要对引证进行复杂的研究（这项工作也许得由著名学者从事)。⑳“至少一次”的地方主义指数和引证格局在表 15 和 16 中也有体现。

所有统计上可信的地方主义指数都超出1。㉑ 哈佛一贯唯我独尊，芝加哥的(货币理论)和哥伦比亚的(价值理论)也毫不逊色。总的来说，博士论文很少的研究院，这一指数比较高(麻省理工学院和威斯康星大学)。如果分析全部引证——这些表格以“至少一次”的引证为基础——那么，通常会发现本位主义色彩甚至更加浓厚。

如果我们把整个时期分成三小段，会发现地方主义指数不太稳定，但并没有显示出随时间的推移有明显降低的趋势。

对于只发表过(1) 3 篇或 3 篇以下文章，和(2) 4 篇或 4 篇以上文章的博士，也计算了本位主义指数。因为以下假设似乎是有道理的，即越多产的学者，其本位主义色彩越淡，

因为他们从事的研究范围更广，而且对于所在的研究院提供的学术支持依赖更小。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上述差异。

将引证划分为赞成性的或反对性的(或中性的)，能使我们进一步了解研究院间学术往来的情况。㉒在价值理论方面，在对5所研究院学者的引证中，赞成的与不赞成的比例为3：2，而在对所有权威的引证中，这一比例大体为1:1，大多数引证属于中性；在货币和财政经济学方面(见表17)，态度要明朗得多。非中性引证的比例高出一大截，这是对这一学科易引起争论的特点的补充证明。详细情况见表18。

表17　引证的分类(百分比分布)

	五所院校	其他权威	总计
价值理论			
赞成	9.4	4.8	6.7
中立	84.6	86.6	85.8
反对	6.0	8.6	7.6
货币和财政理论			
赞成	24.1	18.2	20.6
中立	60.3	67.5	64.5
反对	15.6	14.3	14.8

如果我们承认所发现的赞同性与反对性引证之间大致为3：2的比率是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在价值理论方面，各研究院间就不存在什么重大的差别。芝加哥的博士在提到哈佛时饱含贬意(张伯伦经常将这种态度归咎于奈特的影响)，㉓同样地，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对芝加哥也不友好，但是，总的分布格局是随机波动的。在货币和财政理论方面，情况照

表 18　博士引证中的赞成与反对*(百分比分布)

	被引证的院校									
	伯克利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赞成	反对	赞成	反对	赞成	反对	赞成	反对	赞成	反对
价值理论:										
伯克利大学	20.0	5.0	7.5	9.4	14.3	0.0	10.4	0.0	4.0	4.0
芝加哥大学	7.1	7.1	10.9	7.3	5.6	11.1	2.0	18.0	13.6	2.1
哥伦比亚大学	3.3	11.5	4.3	8.7	7.8	4.7	2.9	0.0	9.8	0.0
哈佛大学	16.4	7.8	8.0	6.8	8.5	2.1	10.6	4.0	15.2	2.2
麻省理工学院	10.0	0.0	10.0	35.0	0.0	0.0	0.0	0.0	3.0	6.1
货币和财政理论:										
伯克利大学	31.6	0.0	12.7	34.5	12.5	6.2	22.7	0.0		
芝加哥大学	20.0	0.0	22.6	14.5	14.3	14.3	15.6	28.4		
哥伦比亚大学	23.1	0.0	13.8	22.5	6.2	0.0	24.0	4.0		
哈佛大学	38.7	32.2	27.0	23.0	13.2	21.0	44.2	6.5		

* 由于样本规模的限制，此表没有包括威斯康星大学。

例是变化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很明显(哈佛的博士在44%的引证中对本校的同仁表达了敬意，含贬意的只占6%；伯克利也同样走极端)。交叉引证也同样暗示出了思想体系的斗争：一般来说，伯克利和哥伦比亚的博士对芝加哥学者反对性的引证为同一时期的1/5～1/3。

4. 权威与博士

仔细的考察可以发现，在我们的研究中，被引证的突出权威就是他们自己。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基本的问题：一个人是通过大量写作而成为权威的吗？还是引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写作？我们的分析中省略了书籍，这就意味着答案肯定不够全面，存在着一点偏差，不过，即使是不全面的答案也不是毫无价值的。参照表4和表5，我们列出了从1886年到1968年间，每位权威所写的有关价值和货币理论文章的篇数。㉔

我们预料，并得到证实，尽管我们的名单仅限于杰出的权威，但出版物和引证之间存在的某种对应关系却使得出版物对引证的影响不太明显。罗伯特·默顿已论述过科学中的“马太效应”，并将其解释为作者的知名度越高，其著作也越受赏识(默顿，1973年，第439～459页)。正如他所指出的，对于潜在的读者来说，当他们从浩瀚的文献中选择所要学习的著作时，作者的名望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向导。不过，相对于对作者情况的了解来说，仅仅受作者名望的影响而接受一

本著作，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不管怎么说，被引证最多的权威是最多产的权威：在价值理论方面，五位杰出权威发表了 112 篇文章，在货币经济学方面，相应的数字为 73 篇。

对 1950 年以前和 1950 年以后的有关价值理论的文章中“至少一次”的引证数进行回归，我们会得出

$$引证 = 11.8 + 0.93文章_{1886-1949} + 0.95文章_{1950-1968}$$
$$(t = 2.55)(2.40)\ (2.78)$$
$$(R^2 = 0.327)$$

在货币和财政经济学领域中，类似的引证方程为

$$引证 = 8.09 + 1.10文章_{1886-1949} + 0.58文章_{1950-1968}$$
$$(t = 2.31)(3.19)\ (1.69)$$
$$(R^2 = 0.254)$$

由此可见，价值理论方面的引证对 1950 年以前和以后的出版物给与了同等的关注，而货币理论方面的引证对早期的出版物更加重视，这与一般认为文章应该而且确实是随时间的推移而贬值的看法截然相反。很可能是由于仅包括 1950 年后被频繁引证的权威，使得文章贬值的趋势被抹杀了。这里，我们还证实了引证和出版物间的线性关系，以及文章存在着“报酬递增”的趋势。文章的数量在价值理论方面达到19篇，在货币理论方面达到 11 篇之后，对文章引证的弹性就超出了 1 。㉘

对于权威发表的文章，各研究院的博士在引证中没有大的差别。在价值理论方面，各研究院的相关系数在 0.431 (哥伦比亚)至 0.601 (伯克利)的范围中；在货币经济学方面，相关性较低，变异度较大 (从 0.189 [伯克利] 至 0.432 [芝加哥])。货币和财政经济学与价值理论相比，其出版物对引证

的影响较弱，这一点与我们一贯的结论不谋而合，即在前一领域中，相关性较易改变。㉘

权威间的关系

为了了解在科学著作中，什么人可以被称作伙伴或对手，我们研究了活跃的（那些1950年后仍在写作的）权威间的相互引证。我们假定，除非大量的引证明显含有贬意，否则它们会揭示出伙伴关系，特别是伙伴之间会相互引证。即使是在这个简单假定的基础上，权威间关系的划分通常也是轻而易举的。

首先，让我们从简单的关系入手。我们确信，下面是一些明显的伙伴关系的实例（都是在价值理论方面）：

1．萨缪尔森(1)——索洛(2)。令${}_1C_2$为(1)对(2)的引证。令F为赞同的百分比，U为不赞同的百分比，则

${}_1C_2=20(F=10;U=0)$，

${}_2C_1=19(F=15.8;U=0)$。

2．阿罗(1)——索洛(2)：

${}_1C_2=6(F=0;U=0)$，

${}_2C_1=9(F=22.2;U=0)$。

3．阿罗(1)——萨缪尔森(2)：

${}_1C_2=40(F=10.0;U=0)$，

${}_2C_1=20(F=15;\ U=5)$。

也许还应该再添两对：

4．希克斯(1)——萨缪尔森(2)：

${}_1C_2=8(F=12.5;U=12.5)$，

${}_2C_1=56(F=12.5;U=16.1)$。

5. 伯格森(1)——利特尔(2)：

$_1C_2=9(F=33.3;U=11.1)$，

$_2C_1=6(F=0;U=0)$。

如果认可下面的关系为对手关系的话，那么，这方面明显的例子就更多了：

1. 萨缪尔森(1)——勒纳(2)：

$_1C_2=16(F=0;U=12.5)$，

$_2C_1=28(F=0;U=67.9)$。

2. 萨缪尔森(1)——卡尔多(2)：

$_1C_2=23(F=0;U=13.0)$，

$_2C_1=10(F=0;U=70.0)$。

3. 索洛(1)——卡尔多(2)：

$_1C_2=13(F=0;U=7.7)$，

$_2C_1=5(F=0;U=60)$。

4. 索洛(1)——罗宾逊(2)：

$_1C_2=7(F=0;U=42.9)$，

$_2C_1=18(F=0;U=66.7)$。

5. 阿罗(1)——伯格森(2)(并不是礼尚往来的)：

$_1C_2=16(F=6.2;U=0)$，

$_2C_1=56(F=0;U=48.2)$。

6. 阿罗(1)——利特尔(2)：

$_1C_2=26(F=11.5;U=61.5)$，

$_2C_1=30(F=0;U=50)$。

7. 卡尔多(1)——希克斯(2)：

$_1C_2=10(F=0;U=50)$，

$_2C_1=6(F=16.7;U=33.3)$。

8．萨缪尔森(1)——罗宾逊

$_1C_2=15(F=0;U=6.7)$，

$_2C_1=7(F=0;U=42.9)$。

由于交叉引证太少，我们无法对大多数其他可能的对手进行分析。㉗

这里出现了两组伙伴。由阿罗、萨缪尔森和索洛组成的剑桥组(美国)始终团结一致，并一贯地受到由卡尔多和罗宾逊组成的剑桥组(英国)的反对。希克斯更倾向于美国的剑桥组。此外，如果我们对那些交叉引证还算多，但与上面所需要的数量(每方 4 个)相比又少一些的搭档进行分析，还能区分出另外几组伙伴：

1．垄断性竞争学派，包括贝恩、张伯伦、莫迪利阿尼和斯坦纳。㉘

2．投入—产出(及有关分枝)组，由多夫曼、里昂惕夫和索洛组成。㉙

3．其他人含糊地称之为芝加哥学派(虽然施蒂格勒被划归哥伦比亚派)：贝克尔、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㉚

另外，还揭示了一些明显的对手。㉛

我们在表 19 中将价值理论领域内已划分出的各组博士的引证进行了汇总。很显然，投入—产出领域主要受到伯克利和哈佛的关注，而其他院校很少有人感兴趣；垄断性竞争对哈佛的独一无二的号召力更为突出。一方是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另一方是芝加哥，它们引证的倾向截然相反，这一点非常惹人注目，而哥伦比亚却位于两极之间，态度模棱两可。

货币权威很少能被划分为界限清晰的小组。我们只能挑

出少数搭档：

1．梅茨勒——哈伯勒：

$_1C_2=13(F=0;U=7.7)$，

$_2C_1=10(F=40;U=0)$。

2．希克斯——约翰逊：

$_1C_2=3(F=0;U=0)$，

$_2C_1=9(F=22.2;U=0)$。

3．汉森——萨缪尔森：

$_1C_2=3(F=33.3;U=0)$，

$_2C_1=8(F=37.5;U=0)$。

如果不要求相互的引证，㉒ 我们可以统计凯恩斯的同盟者和敌手，如同表 20 中所显示的那样。这个名单说明了引证的局限性。凯恩斯与罗伯逊之间的大辩论主要是在杂志以外进行的。

对于主要的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存在一张类似的表(表21)，从而形成了有趣的比较。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表格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勒纳和托宾的立场，克莱因(没有引证凯恩斯)很可能是凯恩斯主义者，而哈罗德(没有引证弗里德曼)很可能是非货币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即非凯恩斯主义者的权威是布龙芬布伦纳、布伦纳、弗里德曼、约翰逊和塞尔登。在表 22 中，我们汇总了博士们对这两组权威的引证。

芝加哥学派对凯恩斯主义非常关注，对其持有较温和的反对意见，在所有其他院校持赞成态度者占优势。货币主义者的被重视程度要低一些，不过，也仅有两所院校（哥伦比亚和哈佛)总的来说对这些权威持异议，而且并不过分。（从表格中能明显看出，我们样本中的英国经济学家非常推崇凯

表 19 价值理论中对几组同盟的经济学家的引证：赞同的与反对的（百分比分布）

被引证组	博士 伯克利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总计
剑桥（美国）（阿罗，萨缪尔森，索洛）	（19）[a]	（77）	（74）	（133）	（35）	（338）
赞成	0.0	5.2	9.5	21.1	2.9	11.8
反对	0.0	11.7	1.4	0.8	5.7	3.8
剑桥（英国）（卡尔多，罗宾逊）	（10）	（48）	（4）	（46）	（3）	（111）
赞成	0.0	0.0	0.0	2.2	0.0	0.9
反对	0.0	0.0	0.0	8.7	0.0	3.6
垄断性竞争（贝恩，张伯伦，莫迪利阿尼，斯坦纳）	（8）	（38）	（35）	（151）	（4）	（236）
赞成	12.5	7.9	2.9	13.2	0.0	10.6
反对	0.0	21.1	2.9	21.9	0.0	17.4
投入—产出（多夫曼，里昂惕夫，索洛）	（50）	（13）	（17）	（90）	（4）	（174）
赞成	10.0	15.4	11.8	21.1	0.0	16.1
反对	2.0	0.0	0.6	6.7	0.0	4.0
芝加哥—哥伦比亚（贝克尔，弗里德曼，施蒂格勒）	（2）	（48）	（85）	（49）	（19）	（203）
赞成	0.0	12.5	4.7	6.1	10.5	7.4
反对	0.0	2.1	15.3	12.2	36.8	13.3

a. 圆括号中为引证次数。

表 20　权威对凯恩斯的引证

引证者	次数	赞成(%)	反对(%)
勒纳	33	6.1	0
希克斯	28	17.9	0
托宾	20	10.0	0
哈罗德	14	21.4	0
罗伯逊	16	12.5	6.2
汉森	44	9.1	6.8
梅茨勒	18	0	0
W·史密斯	12	0	0
布龙芬布伦纳	18	5.6	11.1
弗里德曼	26	11.5	15.4
约翰逊	51	3.9	19.6

表 21　权威对弗里德曼的引证

引证者	次数	赞成(%)	反对(%)
布龙芬布伦纳	20	15	0
塞尔登	45	17.8	4.4
约翰逊	23	43.5	13.0
杜森伯里	9	33.3	22.2
布鲁纳	98	11.2	25.5
托宾	54	14.8	35.2
勒纳	8	12.5	37.5
克莱因	16	0	56.2

表 22　博士对货币与财政经济学中几组同盟的经济学家的引证：赞成与反对（百分比分布）

被引证组	博士 伯克利大学	博士 芝加哥大学	博士 哥伦比亚大学	博士 哈佛大学	博士 威斯康星大学	合计
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勒纳，托宾，克莱因)	(66)[a]	(127)	(53)	(93)	(5)	(344)
赞成	22.7	12.6	20.8	12.9	20.0	16.0
反对	7.6	19.7	1.9	8.6	0.0	11.3
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布龙芬布伦纳，布伦纳，约翰逊和塞尔登)	(15)	(66)	(105)	(39)	(12)	(235)
赞成	23.1	21.2	17.1	15.4	16.7	18.7
反对	7.7	6.1	17.1	20.5	16.7	14.0

a. 圆括号中为引证次数。

恩斯，而对货币主义者不屑一顾。）

权威与博士间引证的比较

我们能够统计到价值理论与货币和财政理论方面的30多位杰出权威的引证(见参照表6和表7)。这些表格根据需要剔除了1950年后没有写作的经济学家③和自身引证部分，从而成为这一节分析的基础。

权威的引证习惯显示出如同我们在博士间所发现的类似的重要影响。如果比较一下在价值理论方面美国和英国的权威对这两国经济学家的引证，我们将发现：

引证对象	引证者	
	美国(%)	英国(%)
美　　国	71.5	48.9
英　　国	28.5	51.1

用同样的方法，能发现货币方面的引证也存在着民族沙文主义。㉞唯一的问题是：哪个国家是沙文主义的？对此我们还不能马上回答。一个似乎有道理的推断是，相比较而言，哪一组人越多，它对自身的引证相对地(相对于组的大小)也就越频繁，不过我们并没有验证这一假设。

当然，在权威和博士的引证之间存在着近亲似的类同性。价格理论与货币和财政理论的简单的秩相关系数分别为0.346和0.625(以表6和表7为准)。㉟ 在世的权威相对而言都年老一些，1950年，他们的平均年龄是45岁，而博士的平均年龄为30岁。我们发现，权威与博士相比，对年老的经济学家引证得更频繁，而欧文·费雪是唯一的例外。我们还想用下面的事实来说明这两个阵营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别，即1/3的权威不是美国人，而相对来说，非美国博士却很少，不过这个事实并没有表明是很有影响的。㊱

5. 结　　论

上述分析说明，引证是度量影响或看法的一种可接受的统计手段，但是，我们确信，与到目前为止它已受到的检验

相比，下一步的检验还应更深入、更严格。如果考虑到它至少是基本胜任这一角色的，引证分析就可以引出下列结论：各院校间在对不同学者的关注和尊重方面，确实存在着差别。在学生的著作中⑳可能对本地的学者有着必然的偏爱，而教授在思想体系上的倾向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产生影响。

然而，重要的事实是这些影响并不是很大。特别是在价值理论方面，院校间的差别与它们共同拥有的权威相比是很小的。我们猜想，在讲授其他社会科学的过程中，会发现更大的分歧，不过在诸如数学等一些领域中，分歧甚至很可能更小。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研究能进行这种比较，但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在科学中树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有说服力的范例。

注释

① 芝加哥的一种影响已经很明显了。许多经济学家都分别称它们为微观的和宏观的经济理论。

② 有关博士的传记——他们的原籍是哪儿，以及目前的所在地——非常不完整。具体说来，从没发表过文章的博士（我们将看到，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和非美国经济协会（AEA）成员的博士都鲜有记载。

③ 分类以 1969 年美国经济协会《手册》中的自述为基础，又按出版物的划分和 1964 年《手册》中的自述加以增补。“价值理论”和“货币与财政理论”的范畴在《手册》中均有表述。数字为所有能取得资料的博士的百分比。

④ 从两个资料来源中得到的职业的百分比分布能说明这些差别：

	美国经济协会《手册》	校友档案
研究院	74.8	44.0
企业	10.2	16.0
政府	10.5	23.0

非赢利机构	3.8	4.0
其他职业	0.0	5.0
退休或亡故	0.7	8.0

⑤ 详尽的表格是：

博士的院校	地区	曾以不同身份在每个地区的博士百分比	
		大学生	院校教师
伯克利大学	西部	53.2	46.0
芝加哥大学	北方中部	56.1	41.5
哥伦比亚大学	东北	61.5	62.7
哈佛大学	东北	49.4	52.4
麻省理工学院	东北	42.9	46.2
威斯康星大学	北方中部	61.7	55.1

⑥ 哥伦比亚大学向13位获外语学位的学生授予了博士头衔，不过这13人中约8人永久地留在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威斯康星大学中拥有外语学位学生的比例基本相同（12—14%），而在伯克利、芝加哥和哈佛，这一比例要低一些（4—8%）。

⑦ 给作者去信可以得到下面一系列参照表：(1)1950—1968年间经济理论中引证最频繁的博士；(2) 1950—1968年间，关于价值理论的文章中对被引证最频繁的权威的引证数量；(3) 1950—1968年间，关于货币和财政理论的文章中对被引证最频繁的权威的引证数量；(4) 主要权威发表的关于价值理论的文章篇数；(5) 主要权威发表的关于货币和财政理论的文章篇数；(6) 价值领域中，博士和权威对权威的引证：含有引证(至少一次)的文章篇数；(7)货币和财政理论领域中，博士和权威对权威的引证：含有引证(至少一次)的文章篇数。

⑧ 统计至少被引证过一次的人名要比对全部引证的统计精确得多。通过反复的实验，我们发现符合条件的权威很少被漏掉，而引证

的统计数却低得多，大约总是低4—5%，这并不是偶然的。在价值理论领域中，至少被引证过一次的前30名，和在价值理论领域中在引证总数上列前30名者，其并集为35人，他们的秩相关系数是 .076。

⑨ S·C· 蒋硕杰(1956年，第540页)对勒纳的评论是一个明确的反对性的引证例子："阿巴·勒纳对流动性偏好和可贷资金说等价的证明之所以成立，是由于他对后者的曲解。为了证实这两种理论的同一性，他对可贷资金需求与供给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即储蓄与投资)作了一番解释，从事后的意义上理解，它们永远恒等。这使得可贷资金说变得毫无意义……"

⑩ 在对引证所作的小规模的重新分类中，差别一直有规律地保持在7%左右。我们的分类比起格伦·吉尔克里斯特和理查德·伊普里特米，一贯是中性引证多一些，赞成性引证少一些，他们两位使我们在引证分析中受益匪浅。

⑪ 杰出的人物是由埃利斯(1948年)和黑利(1952年)论文中的引证频率以及《经济理论概况》(1965和1966年)鉴定的。

⑫ 所列举的下列姓名，是从我们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经济学理论大师名单中删除的：庞巴维克，艾斯纳，霍特里，霍撒克，乔根森，利普赛，丁伯根和维克塞尔。另外，由于疏忽，奥托·埃克斯坦和埃德温·库也从货币理论的名单中漏掉了。

⑬ 引证能度量科学著作的"质量"，其根据见科尔和科尔(1973年，第2章)。与两位科尔相比，这证据对于我们来说很不充分。

⑭ 对数变换使相关性减弱，但产生的分布图却似乎更有道理。按实际引证，回归线从原点出发，其斜率是由对少数突出的权威所作的引证来决定的。

⑮ 在解释这些相关系数时，需要强调等级排列存在相当高的不稳定性。当我们使博士生的一半引证与另一半(划分是随机的)相互关联时，价值理论方面49位权威的相关系数为，伯克利0.56，芝加哥0.28，哥伦比亚0.27，和哈佛0.07！

⑯ 凯恩斯，汉森，托宾，勒纳，萨缪尔森，古德温，克莱因，

⑰ 弗里德曼，帕廷金，罗伯逊，蒋硕杰，布伦纳，马吉特，汉密尔顿，明兹。

⑱ 略去了文章数量最少的研究院。

⑲ 较大的研究院没有加权，以削弱最大的研究院的影响。

⑳ 见下文中权威们对引证的讨论。

㉑ 与整数相差比例的测试并不精确，因为不可能规定各研究院所拥有的自由度的确切数字；其他三所大研究院（我们使用它们的未加权平均数）的比率是建立在不同引证数量的基础之上的。

㉒ 在分析引证的态度时，我们必须利用全部引证，而不是像在别处那样的"至少一次"的引证。

㉓ 作为一名早期的垄断性竞争的怀疑论者，乔治·施蒂格勒能够证实奈特对张伯伦不屑一顾，因此，学生们不得不自己阅读这本书。

㉔ 我们省略了一些人（瓦尔拉，马歇尔，帕雷托，冯·诺利曼）是由于语言、时间或学科等原因，将它们统计进去没有意义。这个名单中还应加上熊彼特。

㉕ 在1886—1968年整个阶段中，价值理论的方程为：

引证$=26.7-1.54$文章$+0.073($文章$)^2(R^2=0.531)$，

(4.50)(1.96)(3.30)

至于货币经济学领域，在整个阶段中不存在相关性，但是在1950年以前，出版物的相关性很强：

引证$=17.0-1.24$文章$+0.13($文章$)^2(R^2=0.354)$，

(5.94)(1.51)(2.87)

这里的文章出版于1886—1949年间。

㉖ 在两个领域中，"至少一次"的引证系数与全部引证相比，始终要大一些，这使我们采用前一种统计方法的理由更充分了。

㉗ 索洛(1)——希克斯(2)这一对基本上是中性的（$_1C_2=3$，$_2C_1=5$，8次引证中除一次外均为中性的）；阿罗(1)——鲍莫尔(2)的情况也类似（$_1C_2=4$，$_2C_1=5$，基本上是赞同的）；萨缪尔森(1)——利特尔(2)（$_1C_2=8$，$_2C_1=4$，基本上是赞同的）。

㉘ 令贝恩，张伯伦，莫迪利阿尼和斯坦纳分别为 1，2，3 和 4：
${}_1C_2=9(F=77.8)$；${}_2C_1=1(F)$，
${}_2C_4=12(F=33.3;U=8.3)$；${}_4C_2=1(F)$，
${}_3C_1=30(F=33.3;\ U=13.3)$。
㉙ 令多夫曼=1，里昂惕夫=2，索洛=3：
${}_1C_2=35(F=8.6;U=5.7)$，
${}_3C_1=9(F=33.3)$，
${}_3C_2=20(F=5;U=5)$。
㉚ 令贝克尔=1，弗里德曼=2，施蒂格勒=3：
${}_1C_3=9(F=22.2)$，
${}_2C_3=3(F=66.7)$。
㉛ 贝恩——施蒂格勒：${}_1C_2=8(F=0;U=50)$，
张伯伦——卡尔多：${}_1C_2=10(F=10;U=80)$，
萨缪尔森——西托夫斯基：${}_1C_2=27(F=7.4;U=59.3)$，
赫希雷佛——弗里德曼：${}_1C_2=18(F=0;U=50)$。
㉜ 对于前面的搭档，我们要求每一方至少引证对方 3 次。
㉝ 在价值理论方面，这些人包括马歇尔、凯恩斯、瓦尔拉、奈特、帕雷托和熊彼特。在货币和财政经济学中，剔除的是克拉克，费雪，汉密尔顿，凯恩斯，兰格和马歇尔。
㉞ 相应的表格为

引证对象	引证者	
	美国(%)	英国(%)
美国	52.4	26.2
英国	47.6	73.8

㉟ 价值理论的秩相关系数稍低了一点，这是由于没有包括列在博士组中的 8 位权威的引证；而这一调整对于货币理论是微不足道的。

㊱ 价值理论和货币与财政理论领域中，美国权威与博士的系数分别为 0.462 和 0.750。

㊲ 我们想到了英国数学家 G·H·哈迪，他曾说过，一个人为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就必须相信自己著作的重要性，以及在著作中所显示的自身的能力（1957 年，第 66 页）。这种自信心很可能会对追随者产生影响。

参 考 文 献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dex of Economic Articles.* Vols. 1(1886-1924)-10 (1968). Homewood, Ill.: Irwin, 1961-71.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d Royal Economic Society. *Surveys of Economic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New York: St. Martin's, 1965-66.

Cole, J. R., and Cole, Stephen.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cience.* Chicago: Univ. Chicago Press, 1973.

Eckstein, O., and Wilson, T. A. "The Determination of Money Wages in American Industry." *Q.J.E.* 76(August 1962): 379-414.

Ellis, H.S., ed.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 Vol.1. Homewood, Ill.: Irwin, 1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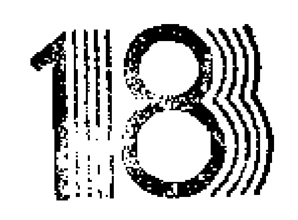
Haley, B. F., ed.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 Vol.2. Homewood, Ill.: Irwin, 1952.

Hardy, G. H. *A Mathematician's Ap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7.

Hicks, J. R. "A Rehabilitation of 'Classical' Economics?" *Econ. J.*67 (1957): 279-89.

Merton, R.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Chicago: Univ. Chicago Press, 1973.

Tsiang, S. C. "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Loanable Funds Theories, Multiplier and Velocity Analyses: A Synthesis," *A.E.R.* 46 (1956):539-64.



经济学文献：以断折的寡头需求曲线为例*

经济学文献是无数经济学家著作的积累。在最近的一年中，将近6000名不同的经济学家发表了文章或出版了书籍，而另外一组人数很可能一样多(有部分重迭)，他们出版书评、小册子或发表其他文章。前一组大约出版了800册书和5000篇论文，从而在一年中就使现有文献宝库中的储量增加了5%左右。

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读文献——这一限制产生于明智，因此，它比时间的限制更为严格。实际上，阅读文献的经济学家的人数可

---

* 原载于 Economic Inquiry 16 (April 1978)。

我谨向克莱尔·弗里德兰的不可或缺的帮助表示谢意。加里·贝克尔和罗伯特·K·默顿的评论也使我受益匪浅。这篇文章曾在1977年4月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的纪念阿门·艾尔钦安的专题讨论会上宣读过。

能仅比作者的人数稍多一些。最好的记忆力也仅能准确地回忆起文献的很小一部分，而一旦文献无可挽回地被毁坏了，其中大部分就将彻底地从人类的知识中消亡。

我怀疑，大多数人对文献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它们分别适用于我们已研究过的文献的不同部分。在对漫长历史的全面评论中，主导理论演变的主要过程倍受关注。作为例子，我们来看一下效用理论的发展过程，从杰文斯和瓦尔拉、帕雷托、费雪、埃奇沃思，斯卢茨基——希克斯——艾伦，经萨缪尔森，霍撒克直至最近的那些人。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思想史的标准线路——文献是由主要的人物和主要的进展所支配的。声援与锦上添花，枝节与混乱，有时甚至是讥讽的辩论，这些逐渐被淡忘了，而关键的进展则形成了经济学文献的要素。大量的有关一体化条件、消费者剩余等方面的文章，与少数被广为接受的观点密不可分，如果这些观点与某人的姓氏相关联的话，那么，几乎是一次偶然的命名仪式。

目前，对我们正在积极研究的文献还持有第二种看法。如果争论很活跃，看起来几乎对每个命题都敞开辩论，那么，争论过程的转变之快就如同猎狐地点的转移一般——确实是同时发生的对狐狸的一系列的交叉捕猎。参加者人数众多，因此，争论在许多杂志中同时进行，大量的经济学家投身于讨论之中。偶尔，全部文献会被证明是无结果的——垄断性竞争理论即是一个重要的活生生的例子——在这一理论领域中，某个事件绝对不同于在对文献的第一种看法中所描述的那样，会与科学进程中的新发展相结合。

当然，大多数经济学文献均不属于这两种类型。其转变

既不活跃也不迅速，这是因为，只有少数论题能够在任何时候都吸引住相当数量的活跃的经济学家的兴趣。这在历史上也不是主流，因为，只有为数不多的论题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即重要性经久不衰，为各学派广泛接受，并用来支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大多数文献局限于对一般知识的、以经验为依据、适用时间短暂以及特殊(在范围上)的运用，它们反映了作者独特的兴趣以及编辑的古怪手法。

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这种常规的文献。我想确认其存在的原因——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对这个论题进行讨论——什么人对文献感兴趣，如果确实存在着变化，那么，它是怎样随时间而推移的，以及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它的进程的最终结束。目的是弄清“正常的”文献的特征。

为达到这一目的，本文对关于断折的卖方寡头市场需求曲线方面的文献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我在 1947 年曾致力于这方面文献的研究，以后不再对其感兴趣，因而它就被束之高阁了。重温这方面的文献，目的全然不同，现在是为了研究正常科学文献中某一具体课题的发展过程。我知道没有过其他类似的对经济学文献的深入研究，因此，尚无法了解它是不是不规则的文献。①我所作的选择必须符合如下属性:

1. 文献起始于固定的时间——1939 年——所有前辈的著作都是未知的。结果至少部分地符合我们的预期。②

2. 近 40 年来，断折的需求曲线理论一直吸引着大部分杰出经济学家的注意力，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但是，文献并没有被主要的经济学家所垄断。

3. 文献既是理论性的，又是实证性的。

4. 此理论已走完其历程，行将灭亡，因此有可能用离析

法来探讨。

事实上，最后一个属性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我准备从中得到一些关于经济学文献的有用的信息。

1. 断折的需求曲线的起源

这是对经济学文献的研究，而不是对文献出处(引证)的研究，因此，我们必须既考虑这方面著作在文字上的起源和历史，又关注其科学的内容。首先，让我们再概括地叙述一下断折需求理论。

保罗·斯威齐(1939年)在一篇简要的、完全是理论性的论文中提出了这一理论。③他为寡头垄断绘制了一条需求曲线，其中考虑到在寡头垄断者制订的每种价格上，其对手的预期行为(他称之为“想象的”需求曲线，尽管他相信这一曲线会被实践证实)。竞争对手典型的反应会是攀比降价(以防止企业的产品销路受损)，而不是追随提高物价(因为企业销路扩大“令人感到舒畅”)。因此，按支配性价格绘制的寡头需求曲线就出现了断折，由此导致在相应的边际收益曲线中出现间断点。当对寡头行业的需求很旺时，断折的严重程度较小，其结果是边际收入的间断长度也较小；而如果市场需求减少，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结论是，在需求下降的阶段，降价是极不寻常的，而在需求上升阶段，涨价却是很普通的事。上述观念能圆满地解释寡头市场中价格的刚性。斯威齐明确否定了卖方寡头市场理论能解释价格水平的可能性，认

为它只能试图说明价格变动的过程。

几乎与此同时，罗伯特·霍尔和查尔斯·希契(1939年)提出了另一个有关卖方寡头市场的断折需求曲线。这一理论的牛津版本在一个主要方面与斯威齐有差别。霍尔和希契认为，价格水平将建立在"全部成本"的基础上；而生产的平均成本(包括一部分"通常计算在内的利润")是以正常的产出率为依据的。这种全部成本价格成为卖方寡头市场上的支配价格，很显然，它是形形色色影响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些影响包括相互串通，价格的长期坚挺，公平的道义观，以及对需求弹性的忽视等等。因此可以说，寡头的自信进一步证实了，竞争对手不会攀比涨价，而只会竞相降价，因此，在每家企业的需求曲线中都存在着断折。他们与斯威齐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认为，全部成本价格这一要素："在任何情况下，将所有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降低或提高相同幅度，都很可能会导致对全部成本价格的重新估价。"(出处同上，第25页)。

如此看来，在解释价格水平方面，牛津的说法比斯威齐略胜一筹，但这一优势的代价甚高：在断折的需求曲线与全部成本定价方法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如果不存在断折，则全行业的成本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企业必须联合起来，协调一致才能取得成功，而在每个企业的需求曲线中，存在着的断折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成本被调整到一个新的水平。与此类似，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其他行业的整个成本变动不存在断折。全行业的境况之一是，当行业需求发生变化时，所有企业将通过改变价格而获取更多利润——不过，这里研究断折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为什么没有发生上述价格变动。在牛津版本中存在着一些疏漏(如企业需要保持较高的

产出，以及非理性行为在大萧条时期势必导致价格下跌），因此，以后的文献明显倾向于斯威齐的观点是无可厚非的。

可以证明，关于断折的文字表达并不必拘泥于此理论的两种说法中的任何一种。即便在一个十足的已有定论的世界中，也很可能有一些买主向一位寡头购买相似的商品，而这位寡头的索价要比他的竞争对手稍高（也许是买主的咨询费用）。如果拥有这一可能存在的（或已为经验所确认的）需求曲线，则斜率的连续性就愈发可能实现。然而，如果将文字上的断折投影到按支配性价格绘制的需求曲线上，得到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弯曲，那么，这种影响是很小的。

2. 理论的科学演变

断折的需求曲线在理论上的演变非常小，尽管这一理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且，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也几乎同样贫乏。因此，我们能够迅速概括出这一理论的科学演变的几个主要阶段。

1. 布龙芬布伦纳（1940 年）和埃费罗姆森（1943 年）。布龙芬布伦纳在这一理论出现后发表的有关断折的第一篇文章中，更加详细地阐述了它的内涵：（1）在不完全的竞争状态下，价格呈刚性；（2）公开的价格协议（将价格的变动提前通知竞争者）强调指出了价格下降是缺乏需求弹性的；（3）残酷竞争是导致断折行为的一种夸张形式；（4）买方寡头的供给曲线将出现断折。但他没有谈到此理论的内部逻辑关系，

以及对它进行实证验证的可能性。

C·W·埃弗罗姆森也许是这一理论的主要支持者。已成为惯例的断折的需求曲线要优于全部成本原理，我这样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即使在霍尔和希契的文章中也肯定这一点。他主要的贡献包括对卖方寡头市场需求曲线的周期的分析。当销售量呈周期性下降时，一个卖主寡头将意识到，他的对手极其憎恨减少销售量，因此，将竞相削价而不是抬高价格。但是，当销售量循环上升，并且接近于饱和点时，情况就会恰好相反。这里价格的提高不会将消费者导向其竞争对手一方，因为他的对手也要提高产量，不能接纳太多的顾客，同样地，他的对手也不愿步降低价格的后尘。一个"反折"的需求曲线会表现为在价格降低时呈弹性，而价格上升时呈刚性。④从一种需求形态向其他形态的转化通常是"突然而果断的"。按照反折的需求曲线，利润在断折点被减少到最低程度，而价格变动的幅度和方向都还是尚未考察的遗留问题。只有在寡头的需求曲线中恢复常规的("不剧烈的")断折之后，均衡才有可能。

2．施蒂格勒的评论。1947年，激发我对这一理论进行评价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对理论的实证检验方面的兴趣日益增长，而不是对断折的需求曲线本身。

正式地说，我的主要评论是，如果价格上升是由这一理论指导的，那么，它们与断折就是相矛盾的。因此，断折也许可以解释某个特定的价格能够持久的原因，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断折会重新出现。回顾过去，我本该强调(而不仅仅是提到)每个企业行为规范上的任意的不对称现象。降价攀比得非常迅速，用以保持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然而，竞争对

手却不会为了增加其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而竞相提价。不过，通常如果没有人呼应的话，提价者肯定会将价格立刻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上，因此，即使竞争对手们没有随之提价，他们的销售事实上也未必明显增长。

然而，这篇文章的主要任务是，从经验出发对这一理论的结果加以验证。首先进行的验证比较直观：我们考查了7个行业的价格历史，以便观察实际情况是不是提价无人呼应，而降价立刻有人追随。在所记载的价格史中，大多数事例与这一理论的假设不一致。

不过，为了更深入地验证，我们研究了1929年6月至1937年5月间劳工统计局的批发价格。这一理论的下列含义得到了验证：

(1) 垄断不具有断折，因此，其价格比卖方寡头行业的价格更灵活。(在这里和下文中，需求波动的影响是通过产出的变化系数来衡量的，我们还把它作为一个调节杠杆。)而实际情况却是颠倒的。

(2) 企业的数量越少，断折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是由于认识到无人呼应的涨价将会很快回落的缘故。而事实正好相反：企业数量越多，价格变动得越频繁，波动幅度也越大。

(3) 支配性企业是变动价格的倡导者(我还认为这些“测定气压的”价格变动倡导者的作用是调整价格，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情况)不存在断折，因而价格更具灵活性。而真实情况恰恰相反。

(4) 断折越剧烈，上面的曲线部分就越具有弹性，因此，拥有不同产品的卖方寡头的价格比拥有同类产品的更易变。但这一预测也是有矛盾的。

(5) 当企业串通的时候，断折就会消失。在已了解到的企业相互勾结的时期内，价格的实际情况是其刚性更强。

3．反驳。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对我所进行的部分甚至全部验证持有异议。这些反对并无害处，但是，首先应对一个特征进行评论，这一特征为所有这些断折的需求曲线理论的辩护人所共有：坚信他们不需要提供证据来支持这一理论。如果能够驳倒我的评论，那么，很显然就能够假定这一理论可以被采纳：理论与其他公民一样，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可以假定是清白的。

对我的验证主要有如下几条批评意见：

(1) 鉴于断折是建立在竞争对手的预期反应的基础上，而预期又有可能不依赖于以前的经验，却很可能与未来的情况相吻合，或者甚至是非理性的，因此，实际经验不能用来证明断折的不存在(或存在？)。正如保罗·斯特里滕所指出的那样，只要卖方寡头相信断折，价格就不会变更。只有当他们放弃这一信念时，他们才会改变价格，但是，这些变动并不能证明他们在其他情况下对断折的不信任。⑤

我认为这类评论是不能发表的。

(2) 当一个行业中所有企业的成本普遍上升时，他们有理由猜测其竞争对手也将随之提价。对我的验证唯一最为普遍的批评是：它们不能囊括各种不同成本的变化。无需赘言，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引进这一变量来重新进行验证。答案非常特殊：如果所有企业对全行业的现象作出反应，那么，将不存在任何断折。全行业的反应包括需求的变化，而除了行业内供求的变化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明显影响市场价格呢？

(3) 反折需求曲线解释了价格变动的原因，因此，一个

不同的断折说明了价格的上涨。

(4) 7种价格的历史数据太少，不足以支持一项批评。几种不同的情况——诸如串通，对前一个事件记忆犹新，价格的引导——已经消除了断折。

(5) 验证是依据劳工统计局的目录价格进行的，而众所周知，与交易价格相比，这些目录价格刚性十足。人们可能会认为，拒绝相信断折理论所说明的现象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防卫。⑥

(6) 共谋可能不够完善，从而没能消除断折。没有说明为对付剧烈的断折而如何进行串通。

(7) 垄断价格比卖方寡头价格的灵活性更小，在卖方寡头市场中，异类产品价格比同类产品价格的灵活性更小，这只能表明，还有除断折以外的其他力量能解释价格行为的原因。

(8) 一个人需要竞争性价格行为的客观标准以便评判卖方寡头市场价格行为的模式。

4. 后期的实证性验证。对断折的需求曲线的第二次实证验证是由朱利安·西蒙于1969年进行的。商业杂志中的广告费用是"分组"(为同一市场服务的杂志)比较的，而垄断者的费用变动不像那些拥有两种甚至更多种杂志的小组那样频繁。这一点当然与这一理论的预测背道而驰。

由W·J·普赖姆奥克斯和M·R·邦伯(1974年)所作的第三次实证性验证，考察了拥有一个和两个独立电力设施的城市中的电费。再一次证明独家垄断者的费用变动比在两家寡头垄断的局面下要少，两家寡头垄断者竞相提价比竞相降价的情况更为普遍(存在，或不存在时间上的滞后)。他们二人

(1976年)还对独家垄断者与少数寡头的处方药品的价格变化作了类似的验证，同样发现断折的需求曲线理论的预测是错误的。这两项研究均由于利用价格的年度数据而被削弱了。

虽然尚未作过其他数量分析，但文献中已有许多论断坚持认为也许在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行业的需求曲线中存在着断折。下面是两个实例⑦：

(1) 人造纤维。马克姆(1952年)发现存在着轻微的断折(之所以轻微，是由于价格的引导机制已经相当完善)；企业在响应价格上涨时的平均滞后期为10天，响应价格降低的时滞为7天。⑧

(2) 钢铁。引文阐述了美国钢铁公司将不(不能？)通过削低价格来扩大其市场份额。不过，这家公司频繁地领导了价格波动。

我们引证这些例子，不是为了表明价格在任何阶段都与断折的需求曲线理论不相一致。当然，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插曲，即一个企业提高价格得不到其他企业的呼应，而降低价格却被仿效。这些实例只说明一点，任何人都没有为寻找证据而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

5．理论的增补。少量增补的论述断折的需求曲线的理论著作引人注目。但在这里值得一提的仅有两处。由科恩和西厄特所作的第一处补充是，在一个企业获知其竞争对手的行为模式之前，断折很可能存在，因此，刚性价格更可能存在于(a)新兴行业，和(b)面临新加入者的行业。⑨他们描述了钾碱行业中的一个实例。

第二处增补是由西厄特和德格鲁特作出的(1971年)⑩，可以看作是对过去观点的引伸：在特定条件下，企业的了解

行为也能产生断折。例如，A 企业相信 B 企业会追随涨价风，将价格提高到一定水平⊖，但 A企业不掌握提价的确切幅度，因此，它就按价格上涨到⊖的水平来作出对策。这一理论扩展潜在地令人感兴趣，但是，卖方寡头的行为与一般的利润最大化参数没有联系，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增补在实证分析中并无用武之地。

6．对有限定价的扩展。有限定价理论——卖方寡头价格或垄断价格将进入对未来竞争对手不具吸引力的行业——在经济学中拥有悠久历史。⑪现代的系统阐述，特别是帕多·西劳斯——拉比尼的论述（1962 年）⑫，与断折的需求曲线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莫迪利阿尼所作的更为精确的阐述中（1958 年），存在一个限定的价格，它低于竞争对手感兴趣的界限。已有的企业这样选择限定价，于是就造成了一个新企业加入行业后，如果原有企业继续维持其产量，而新的竞争者的产量保持在可获微利的水平上，那么，它的平均成本将按限定价格，等同于新成员加入后的价格。因此，原有寡头共同的需求曲线会出现断折（或者，至少是价格上升的弹性迅速增大）。这一断折价格将紧紧追随着新成员的长期生产成本。

两种断折之间的相似处很明显，在限定价格学说中，也很少出现寡头的不确定性。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限定价格理论受到有关断折需求曲线的文献的影响。⑬不论是贝恩，还是西劳斯——拉比尼，都不是断折的需求曲线理论的热心支持者。⑭然而，我们注意到，斯威齐在发表断折的寡头需求曲线之前，曾论述过限定价格的断折。⑮

7．其他断折。竞争对手对各种可能的提价与降价的任何不对称的反应，均会导致相关职能的断折。因此，应该有

人已经将这一理论扩展到价格以外的其他竞争领域中。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做到。⑯

有些经济学家已经明显地被引向了完全不同的需求现象的断折。L·福拉克和W·李(1956年)在所从事的受人称赞的研究中，力求找到每个宾夕法尼亚苹果种植者的需求曲线中的断折现象。对其他形式展开讨论的人还有：H·R·爱德华兹(1952年)，希瑟(1953年)，M·法雷尔(1954年)，格罗塞克(1966年)，霍金斯(1954年)，麦克马恩斯(1962年)，格林哈特(1967年)，莱维坦和舒比克(1971年)，以及道格拉斯(1973年)。当然，埃奇沃思的两家卖方寡头垄断理论建立在对竞争对手的强制能力的基础上，由它引出的断折的需求曲线常常被再次引用。

8. 个别企业的价格动态。有关断折的卖方寡头需求曲线文献的一个重要的潜在贡献应是，提高或者至少是引起经济学理论家对这个问题(即当市场价格变动时，每个企业的价格是如何变化的)的兴趣。断折的需求曲线理论确实包含有这一理论的或许是不引人注目的雏形，但它没有发挥这种催化作用；论述价格变化动态方面的现代文献迅速增加，是与大量的经济学信息密切相关的，然而，断折的需求曲线文献却没有受到什么显著的影响。

3. 对断折的承认

1939年对于建立新的经济学理论来说是不吉利的一年，

但是，即使是世界大战也没能阻止人们广泛地接受对遍布各地的缺乏弹性的（"管制的"）工业价格的解释，在此之前，加德纳·米恩斯曾对这个似乎有道理的解释作过成功的论证。⑰到1940年，布龙芬布伦纳已经发掘出斯威齐观点的各种含义，而在1942年中，提到这一理论的文章不少于9篇（其中4篇出自西德尼·温特劳布之手）。

在关于卖方寡头与价格固定性两方面文献的密切结合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相矛盾，因为，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一致。米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曾强调过价格的下降刚性现象。（后来到50年代，米恩斯实际上将其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卖方寡头主动提价的政策上。）但是，断折主要是否定价格上涨趋势的某一位卖方寡头对价格下降的断折需求曲线与所有寡头串通一气时的情形一样，因此，如果某种价格达到（行业）利润最大化的水平，它将会对随之而来的成本和需求的大幅度下降作出反应，该企业需求曲线的最上段以及断折段之间也就没有任何关系。显然，这一点很少被注意到。⑱

表3.1中给出了历史上对断折的需求曲线的文献资料情况的统计。文献的这一详细统计构成了我们讨论其特征的基础，因此，有必要说明表3.1是如何编集的。对断折的需求曲线的深入研究，是由《经济学杂志索引》中有关题目下的所有文章构成的，这些题目包括：微观经济理论，企业与行业的价格和市场理论，以及对垄断和竞争的公共政策等等。毋庸置疑，断折还在其他文章中出现过；但编集过程中，我们放弃了在诸如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或公共财政等领域中运用卖方寡头价格理论的所有著作。也没有包括外文文献。我

表 3·1　1939—1976 年，有关断折需求曲线的文献

年份	文章总数	主要涉及断折的文章*	书的数量(仅指第一版)
1939	2	2:斯威齐；霍尔和希契	—
1940	3	2:布龙芬布伦纳；米克塞尔	—
1941	2		1
1942	9		—
1943	2	1:埃弗罗姆森	1
1944	—		1
1945	—		—
1946	1		—
1947	6	1:施蒂格勒	4
1948	4	1:V·斯密	4
1949	—		3
1950	1		—
1951	4	1:斯特里滕	4
1952	3		2
1953	3	1:希瑟	—
1954	8		—
1955	7	1:埃弗罗姆森	4
1956	1		—
1957	1		2
1958	1		2
1959	1		2
1960	2		4
1961	2		4
1962	2	1:谢泼德	3
1963	1		3
1964	1		5
1965	2	1:斯彭格勒	5
1966	1		4
1967	5		2

（续表）

年份	文章总数	主要涉及断折的文章[a]	书的数量(仅指第一版)
1968	5		5
1969	2	1:西蒙	3
1970	6		7
1971	3	2:斯密和尼尔；西厄特和德格鲁特	2
1972	3	1:皮尔	2
1973	4		4
1974	3	2:普赖姆奥克斯和邦伯；墨菲	—
1975	3	1:科因	1
1976	1	1:普赖姆奥克斯和斯密	2
1940's	27		14
1950's	30		16
1960's	23		38
1970's	23		18

[a] 参见本文参考文献中标有星号的条目。

们对书籍的搜寻面甚至更窄，仅限于原理和理论方面的教科书，以及有关产业组织和价格行为的著作。⑲

表 3.1 中的统计结果说明，至少是内容涉及到断折的需求曲线的文章共计 103 篇，这一数字相当可观，其中的 18 篇(不包括斯威齐、霍尔和希契的文章)文章是最主要的，书籍大约有 86 本。对后者的统计(1939 年以后)只计入了第一次介绍这一理论的版本(因此，虽然在萨缪尔森后来的版本中一直保留有断折理论，但这里所包括的他的著作是 1964 年的第六个版本，因为在那时，他第一次介绍了断折理论)。根据引用断折需求曲线的每一单独的经济学文献，近些年来，每年的引证数量很可能为 300,000，甚至更多(在许多有关原理或价格理论的主要教科书中)，还要加上杂志上两三篇文章

表 3·2　对断折需求曲线的看法和运用的分类

年份	看法			理论中的运用		
	赞成	中性	反对	经济分析	提及	评注
1940	3	—	—	3	—	—
1941	3	—	—	—	3	—
1942	9	—	—	2	7	—
1943	3	—	—	2	1	—
1944	1	—	—	1	—	—
1945	—	—	—	—	—	—
1946	1	—	—	—	1	—
1947	9	—	1	2	6	2
1948	7	—	1	1	3	4
1949	2	—	1	1	2	—
1950	1	—	—	—	1	—
1951	5	1	2	1	5	2
1952	2	3	—	—	4	1
1953	1	—	2	1	2	—
1954	7	1	—	3	5	—
1955	6	4	1	1	8	2
1956	1	—	—	1	—	—
1957	2	1	—	—	2	1
1958	2	1	—	—	1	2
1959	1	2	—	—	3	—
1960	5	1	—	—	2	4
1961	5	1	—	1	2	3
1962	3	2	—	2	1	2
1963	4	—	—	1	—	3
1964	4	2	—	—	2	4
1965	7	—	—	2	1	4
1966	4	1	—	—	2	3

（续表）

年份	看法			理论中的运用		
	赞成	中性	反对	经济分析	提及	评注
1967	6	—	1	2	3	2
1968	9	1	—	1	5	4
1969	3	1	1	1	1	3
1970	10	2	1	1	8	4
1971	3	2	—	2	2	1
1972	4	—	1	2	2	1
1973	6	—	2	1	4	3
1974	1	—	2	2	1	—
1975	1	3	—	1	2	1
1976	2	—	1	1	—	2
1940's	38	0	3	12	23	6
1950's	28	13	5	7	31	8
1960's	50	9	2	10	19	32
1970's	27	7	7	10	19	12
	143	29	17	39	92	58

中的另外 15000 件。文献的数量几乎没有明显减少；事实上，对这一理论的论述已基本稳定下来。

一个作者如果当真论及某一理论的话，他对这一理论的态度会是肯定的，或至少是中立的，除非他明确打算对它进行反驳。他实际是使这一理论重新流行，并为它的存在作了广告。因此，在区分论述断折需求曲线的态度时，我倾向于认为作者大多持赞成的观点，除非他们非常明确地表示其他看法。在关于断折的 189 件文献中，143 件是赞成的，29 件为中性的，而反对的仅为 17 件(见表 3.2)。在 1939 年以来

的整个阶段中，赞成的和中立的论述一直占主导地位，但最近反对性的论述有所蔓延。㉚在这几十年中，这一理论没有得到什么系统的实证方面的支持，实际上，理论没有获得深化，但这些缺憾对其持久传播并没有构成障碍。

不同的经济学家对断折的运用方式很难再现。大多数文献只是对这一理论简单地“提及”。例如：

> 最常见的市场模式是一个拥有不同产品的卖方寡头市场，在这一市场中，需求曲线肯定会在现行价格水平上被视为断折的（边际收入曲线也是间断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真正地认为产量和就业是由（水平的）边际成本曲线和（间断的）边际收入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的。因果关系的顺序应从确定产品价格开始……

深化或运用这一理论是指包含某种新奇的因素，我用“分析”来代表这一类，在确定这一分类时，出现了难题。这一组包括所有（20篇）论述断折需求曲线的长篇大论，而不顾及其贡献是哪方面的，因为，它们的目的肯定是分析（这一课题的专业发展）。这一类的文献还有很多：

> 成本的上升可以证明提高价格是正当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利润率并没有由于成本——价格变动而发生变化，那么，就不会鼓励潜在的竞争者、卖方、买方、政府、工会或其他任何人改变他们原来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所实际施加的压力。然而，这并不能圆满解释价格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对于第一家提高价格的企业来说，是不是有可能由于其他企业没有效仿而恢复原价呢？这一举动非常尴尬且代价昂贵。我们很容易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结论是相反的。如果成本的上升幅度很大，面对其他没有随之提价的企业利润率的大量减少，一个竞争者

> 所有逾越难堪之上的满意都是虚假的；况且，这一领先是非常危险的。进而言之，许多行业在这类事情上存在着一定的低限度的勾结。当成本变动较小时，企业有较大可能将之吸收，这是因为，其他企业反应的不确定性成倍增加，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成本经常随价格而变化……
>
> 这一分析说明，更大的可能性是成本的下降将迅速导致价格的削减。这是由于，成为这种价格变动的带头人，即使无人呼应，也不用担心——如果无人呼应，好处更多！……这一点似乎是似是而非的，经济学家曾经论证了面对成本的变化，价格下降的“粘性”远远大于价格的上升。

这种对断折的论述比其他大多数论述要充分一些，但它既没有形成一个新的框架，也没有引进新的变量、新的关系式或是各种新的事实。然而，我还是始终给这种论述贴上“分析”的标签，因为，这至少表明他们对这种理论有意识地重新进行了思考。

即使按照这一宽限的标准，在189种文献中也只有39种能够被划入“分析”组的行列；其余引用断折的形式是“提及”或是教科书中的“评注”。断折的需求曲线还未成为经济学家正在使用的武库中的有力武器。

我将把断折的最后一种运用方式命名为“评注”，这一类仅限于教科书和B·F·黑利所作的一份讲解式说明（1948年）。这里的论述基本上是教授性的。正如在表3.3中所统计的那样，用2～3页讲解这一理论的教科书的数量稳步增长，而且，我从没遇到过曾一度引入教科书的断折的需求曲线后来又被删除的例子。② 目前，在我们所考查的2/3已出版的有

关经济学原理和价格理论的教科书中，都或多或少含有老生常谈的评注(见表3.3)。

表3·3　断折的需求曲线在已出版的有关经济学原理和价格理论的教科书中出现的频繁程度[a]

阶段	不含断折	含断折	已出版总数	出现断折的%
1947—1949(包括在内)	12	4	16	25.0
1950—1952(包括在内)	13	6	19	31.6
1953—1955(包括在内)	14	6	20	30.0
1956—1958(包括在内)	15	7	22	31.8
1959—1961(包括在内)	16	10	26	38.5
1962—1964(包括在内)	19	15	34	44.1
1965—1967(包括在内)	17	23	40	57.5
1968—1970(包括在内)	13	25	38	65.8
1971—1973(包括在内)	14	24	38	63.2
1974—1976(包括在内)	13	22	35	62.9

a. 我们不包括下列情况：一本教科书中没有包含断折的需要曲线，而且也未得到其已知的较晚的版本，以及书中出现过断折的需求曲线，但其较早的版本没有得到。如果没有出现修订的话，我们就假定某本书在其出版七年后已绝版。

断折的几何意义是这些教科书讲解的主要题目：几乎不曾有过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对垄断者和卖方寡头的预期价格行为所进行的比较。但是，如果对学生就平均量曲线中断折的边际曲线所作的教导，是讲解断折需求曲线的理由，那么，教科书的作者至少也能通过对合法的最高和最低价格的分析来完成这一比较。然而，必须承认，教科书的广泛介绍正是(断折的？)市场需求的非常明显的证明。

事实上，在不同的市场结构和组合的条件下，没能利用这一理论来为各企业的不同行为建立假设，这才是断折的需求曲线文献的本质特征。人们也许指望这一理论能够解释下列现象：

——在价格刚性阶段的行业特征。

——价格刚性阶段的长度。

——卖方寡头市场中发生价格频繁变动的条件。

——所观察到的价格刚性，存在于拥有众多生产者或仅有一个生产者的行业中。

然而，这一理论却成了权威性的文献：在适当的文章中讲解它，引用它，但却没有修改过它。

4. 专业文献的某些假说

对断折需求曲线的评论引出了对科学论文性质方面的一些假说。

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假设是，不需要为保持一个理论的流行而对其加以引用。在文献中"运用"断折的需求曲线，从根本上说，是为许多价格变动得并不频繁这一事实提供一项理由。但是，这当然不是真正的用途，因为，这一理论与所要解释的价格没有联系。几乎无一例外，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一理论所包含的价格变动频率的不同格局，去解释所观察到的价格变动的差异。于是，也就不存在对能够专门解释这一有限问题的理论的特别需要：从文字上来看，断折的需求曲

线目前发挥的不是科学的职能，而成本不变动价格就不会改变这样简单的道理并不能完全概括出这一理论。

第二个假设是，一门科学的教科书在对学说的传播中起着有力而稳健的作用。断折的需求曲线是一种贫乏的理论，然而，在美国刚刚过去的10年中，经济学界新一代的博士肯定都接触过它。有些教科书的作者根本不是任何经济学分支中的权威，但是，像萨缪尔森、利普赛和斯坦纳、鲍莫尔、亨德森和匡特、西厄特、库恩耐、赫希雷佛、曼斯菲尔德和弗格森，以及古尔德这样的经济学大师在各自的著作中，都重复提到这一理论；因此，自然而然地，年轻的经济学家也肯定将它视为经济学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神秘的组成部分。显然，教科书的写作不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工作：一本教科书的不同版本中，对断折的需求曲线的有关讲解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变化。

第三个也是最普遍适用的假设是，理论永远不会消亡。人们普遍存在的但又是含蓄的信念是，一种理论会“取代”另一种理论。当然，支配性的理论经受了变迁，但是，被取代的理论也决不会全部消亡。

很少发生也许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形：两种理论针锋相对，以至于对其中一方的采纳，即意味着对另一方的全盘否定。不妨想想经济学说史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李嘉图和穆勒的价值理论宣称，对于可自由生产的商品，它们的相对价格是由其相对生产成本所决定的。而杰文斯、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断言，相对价格的基础是商品的相对边际效用。后一种理论更普及，因为它包容了不能自由生产的商品，但是，它同样缺乏基本知识，因为，它甚至不能解释为什么一

所房屋的售价要高于一根香蕉，或是为什么两镑香蕉的售价为一镑香蕉的两倍。人们可以将这两种理论融汇起来，马歇尔和瓦尔拉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用一种理论置换另一种却是非常困难的。

甚至在一种理论包容另一种理论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对前者的认可也未必导致对后者的抛弃。卖方寡头理论中的一个简单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在两家卖方寡头垄断市场中，一个寡头的收入，I，为

(1) $q_1f(q_1+q_2)$

这里，f为需求函数，q_i为i企业的产量，古诺是这样计算I企业的边际收入的：

(2) $q_1f'(q_1+q_2)+f(q_1+q_2)$，

把q_2作为常量。然而，II企业的产量q_2可以视为q_1的函数，那么I的边际收入变为

(3) $q_1f'(q_1+q_2)[1+(dq_2/dq_1)]+f(q_1+q_2)$，

dq_2/dq_1(有时被称为预测变动值)未必为0。古诺的预测模型非常明确，因此，许多现代经济学家仍然运用这一模型：比较通行的理论没有驱逐不太普及的理论。

一种科学尚没有灵丹妙药来彻底摆脱在其领域内曾流行一时的理论，逻辑上的错误除外(甚至它也未必是真正的例外)。这并不是否认流行的理论有所减少：致力于这一理论有关学科研究的科学家非常明了，一种理论会随时间的推移而衰退，因而最终这部分科学家的人数会越来越少，以致于这一理论不再是通行的科学知识中的一部分。对与一种理论有关的学科进行研究的这些科学家，实际上是在运用这种理论，他们的人数肯定下降得更快，而对于断折的需求曲线来说，

人数已接近于零。如果在这一阶段，一种理论得到再生，更大的可能是又有了新的发现，而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肤浅的修饰。

对一种在实用中尚未陷入长期衰退的理论进行研究，不能使我们了解到理论的退化速度。这里所研究的文献表明，实证研究中相反的证据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当对一种理论的运用积极而频繁时，它对被取代的敏感性比起当它基本上行使“礼仪”职能时要强烈得多，这个推断似乎是有道理的。

最后的，而且是相当可怕的发现是，落伍的出版物的数量大得惊人；这些文章肯定对严谨的理论或实证的结论的积累没有起过任何作用。为了准备这篇论文，我有机会查阅了100多篇文章，有些阅读了一部分，有些是全文通读，保守的估计是，其中最少也有2/3对了解卖方寡头市场的行为没有任何积极的贡献：它们既不包括新见解，也不包括新情况。㉒对断折的需求曲线，这一评价并非建立在事后认识的基础上，因为，在30年中这一理论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一个专业中哪个分枝更需要增加交流，这些文章是不是对这一看法的民意测验？抑或一般的科学论文与一般的社会论文是类似的：仅仅是在彼此的交流中发挥作用，因此，当一篇重要的论文需要沟通时，交换意见的同行不会由于学科衰退而减少？

注　释

① 由斯蒂芬·施蒂格勒引导，我步入了肯尼思·O·梅的文献历史的决定因素这一研究领域，他的部分研究曾在“数学文献的增长与质量(1968—1969年)”一文中有所表述，后又在“谁扼杀了决定因素？”(日期不详)中进行了补充。

② 约瑟夫·斯彭格勒(1965)发现了早期的断折需求曲线，但与我们现在所研究的非对称的卖方寡头行为的经济内容不同。R·F·卡恩(勋爵)阐述了断折需求理论的实质，但没有绘出需求曲线。然而他没有接受需求曲线的下半段，因为（对于他来说），它冒犯了“两家卖方寡头理论的核心”，即“在对手面前所有企业不讲任何信用”这一假设。R·H·科斯(1935年，第139页)在《两家卖方寡头市场问题再思考》一文中认为，间断的卖方寡头需求曲线建立在竞争者所逼迫出的不同定价的基础之上。

③ 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斯威齐在前一年画出了一条断折的产业需求曲线。

④ E·T·格雷瑟已经提出了相反的断折。

⑤ J·M·克拉克的类似观点更谨慎，他继而寻求断折存在时的独立决策。

⑥ 埃弗罗姆森（1955年）发现，在卖方寡头市场的情况下更有可能与目录价格产生差异，这是因为，公开串通掺入了秘密的削减价格——从而肯定与价格削减会互相攀比的推断不相一致。

⑦ 这些例子是由F·M·肖勒引证的；A·A·汤普逊又再一次作了重复引证。

⑧ 马克姆(1952年，第88，143，199页)。重大差异不能计算出来，但是，由于报告中所记载的是15～30天之间的不确切的天数（出处同上，第86页），因此，不可能成功地进行重大试验。

⑨ 将这一推断与国家经济研究局价格决策委员会（1943年）所作的相反论证相对比，是有启发性的，一篇署名为委员会主席E·S·梅森的报告中谈到：

“毫无疑问，这（断折的需求曲线）是每个企业在大部分时间中，所面对的大量行业市场上的需求情况的真实写照。它为解释行业价格行为一些重要方面的原因作出了很大贡献。还有更有力的证据能令人相信，汽车、钢铁、农机以及其他许多行业中的牵头企业的行为基本上符合这一曲线。然而，作为一项发挥作用的假设，在主要需求换代和

新企业的加入不重要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仅限于那些已基本保持长期稳定的行业市场。”这一段的余下部分还特别限定了要求断折的权利。

⑩ 更新的关于断折的文章默认了断折在他们的论著中仅起短暂的作用：参见寡头背景下
“An Analysis of Cooperation and Learning in a Duopoly Context”，(Cyert and DeGroot 1973，24-37)。

⑪ J.B.Clark, The Control of Trusts (1901), Ch. IV).

⑫ J·S·贝恩(1956年)提出了类似理论。

⑬ 琼·罗宾逊将一个垄断者作为断折的可能起因，这个垄断者面临着竞争对手提价加入的境况。

⑭ 西劳斯—拉比尼反对这一理论，而贝恩也对之不屑一顾。

⑮ 见③。

⑯ 多伊尔(1968年)认为广告性的断折是卡尔多的一大发明，但我却一直没能证实这点。

⑰ Industrial Prices and their Relative Inflexibility (Means, 1935).

⑱ D.H.Whitehead (1963, pp.187-195) and W. Hamburger (1967, p.268).

⑲ 特别要感谢的是，莫里斯·希夫和赫米纽·布兰克所编集的文献的基础统计表使我受益匪浅。曾利用多年的《经济学文献杂志》中没有索引。

⑳ 这篇文章就可以被归入此类！

㉑ 搜集教科书的工作是由芝加哥大学的里根斯坦图书馆从事的，西北大学的图书馆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补充，但这一统计远非完整。

㉒ 肯尼思·梅将注释1中提到的决定因素的历史上1995个题目进行了划分(有时归入几类中)，结果如下：

新观点与理论	14%
运用	12

系统化和历史记载	12
验证和教育	15
重复	21
琐碎项目	43
总　计	117%

参 考 文 献

Bain, Joe S., *Barriers to New Compet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______, "Price Leaders, Barometers, and Kinks," *Journal of Business* July 1960. 33, 193-203.

*Bronfenbrenner, Martin, "Applications of the Discontinuous Oligopoly Demand Cur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40, 48, 420-27.

Clark, J. B., *The Control of Trusts*, New York: Macmillan, 1901. Ch. IV.

Clark, J. M.; *Competition as a Dynamic Process*, Brookings, 1961.

Coase, Ronald H., "The Problem of Duopoly Reconsidered,"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February 1935, 2, 137-43.

Cohen, K. J. and Cyert, R. M., *Theory of the Firm*, Prentice Hall, 1965.

*Coyne, John, "Kinked Supply Curves and the Labour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November 1975, 2, 139-51.

*Cyert, Richard M. and DeGroot, M., "Interfirm Learning and the Kinked Demand Curve,"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September 1971, 3, 272-87.

______, "An Analysis of Cooperation and Learning in a Duopoly Context," *Ameri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3, 24-37.

Douglas, Evan J., "Price Strategy Duopoly with Product Variation—A Comment," *Kyklos*, 1973, 26, 608-11.

Doyle, Peter, "Advertising Expenditure and Consumer Demand,"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S. 20, November 1968, 394-416.

Edgeworth, F. Y., *Papers Relating to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1925, I.

Edwards Harold R., "Goodwill and the Normal Cost Theory of Price," *Economic Record*, May 1952, 28, 52-74.

*Efroymson, Clarence W., "A Note on Kinked Demand Curv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43, 33, 98-109.

*____, "The Kinked Oligopoly Curve Reconsidere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55, 69, 119-36.

Farrell, Michael J., "An Application of Activity Analysis to the Theory of the Firm," *Econometrica*, July 1954, 22, 291-302.

Fouraker, Lawrence E. and Lee, W. A., "Competition and Kinked Functions in the Marketing of Perishable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January 1956, 22, 367-70.

Greenhut, Melvin L., "A Theory of the Micro Equilibrium Path of the Firm in Economic Spac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September 1967, 35, 230-43.

Grether, E. T., *Price Control under Fair Trade Legis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Grossack, Irvin M., "Duopoly, Defensive Strategies, and the Kinked Demand Curve,"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April 1966, 32, 406-16.

Haley, B. 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in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 Howard S. Ellis, editor, Irwin, Homewood, Ill., Vol.I, 1948.

*Hall, Robert L. and Hitch, C. J., "Price Theory and Business Behavio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o.2 May 1939, 12-45.

Hamburger, William, "Conscious Parallelism and the Kinked Oligopoly Demand Cur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plement*, May 1967, 57, 266-68.

Hawkins, Edward R., "Price Policies and Theory," *Journal of Marketing*, January 1954, 18, 233-40.

*Hieser, Ron, "A Kinked Demand Curve for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Economic Record,* May 1953, 29, 19-34.

Kahn, Richard F., "The Problem of Duopoly," *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37, 47, 1-20.

Kaplan, A. D. H., Dirlam, Joel B. and Lanzilotti, R. F., *Pricing in Big Business,* Brookings, 1958.

Levitan, Richard E. and Shubik, M., "Price Variation Duopoly with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and Random Demand,"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March 1971, 3, 23-39.

McManus, Maurice, "Numbers and Size in Cournot Oligopoly," *Yorkshire Bulleti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May 1962, 14, 14-22.

Markham, Jesse W., *Competition in the Rayon Indust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May, Kenneth O., "Growth and Qualith of the Mathematical Literature," *Isis,* 1968-69, 59, 363-71.

____, "Who Killed Determinants?" *The 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 Film Manual No.4 (n.d.).

Means, Gardiner C., *Industrial Prices and Their Relative Inflexibility,* Senate Document 13, 74th Congress, 1st Session, January 17, 1935.

*Mikesell, Raymond F., "Oligopoly and the Short-Run Demand for Labo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ember 1940, 55, 161-66.

Modigliani, Franco, "New Developments on the Oligopoly Fro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8, 66, 215-32.

*Murphy, T. A. and Ng, Y. K., "Oligopolist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Revenue Maximization Hypothesis—Not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March 1974, 22, 227-3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ommittee on Price Determination, *Cost Behavior and Price Policy,* 1943.

*Peel, David A., "The Kinked Demand Curve—The Demand for

Labour," *Recherches Economiques de Louvain,* September 1972, 3, 267–73.

*Primeaux, Walter J. Jr., and Bomball, Mark R., "A Reexamination of the Kinky Oligopoly Demand Cur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1974, 82, 851–62.

*Primeaux, Walter J. Jr., and Smith, Mickey C., "Pricing Patterns and the Kinky Demand Curv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76, 19, 189–99.

Reynolds, Lloyd G., "Toward a Short-Run Theory of Wag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48, 48, 289–308.

Robinson, Joan,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Macmillan, 1933.

Scherer, F. M.,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0.

*Shepherd, William G., "On Sales-Maximising and Oligopoly Behaviour," *Economica,* N.S. 29, November 1962, 420–24.

*Simon, J.L., "A Further Test of the Kinky Oligopoly Demand Cur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1969, 59, 971–75.

*Smith, D. Stanton and Neale, Walter C., "The Geometry of Kinky Oligopoly: Marginal Cost, the Gap, and Price Behavior,"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January 1971, 37, 276–82.

*Smith, Victor E., "Note on the Kinky Oligopoly Demand Curve,"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October 1948, 15, 205–10.

*Spengler, Joseph J., "Kinked Demand Curves: By Whom First Used?"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July 1965, 32, 81–84.

*Stigler, George J., "The Kinky Oligopoly Demand Curve and Rigid Pri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47, 55, 432–49.

*Streeten, Paul, "Reserve Capacity and the Kinked Demand Curv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51, 18, 103–13.

Sweezy, Paul M.,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in the English Coal*

Trade, 1550–188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______, "Demand under Conditions of Oligopol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1939, 47, 563–73.
Sylos-Labini, Paolo, *Oligopoly and Technical Prog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Thompson, A. A., *Economics of the Firm*, Prentice Hall, 1973.
Whitehead, Donald H., "Price-Cutting and Wages Policy," *Economic Record*, June 1963, 39, 187–95.

* 打星号者与表3--1有关。

乔治·J·施蒂格勒著作目录

著作和小册子

1941.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ories*. New York: Macmillan.
1942. *The Theory of Competitive Price*. New York: Macmillan.
1946. *The Theory of Price*. New York: Macmillan.
1946. (With Milton Friedman) *Roofs or Ceilings*? Irvington-on-Hudson, N.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47. *Domestic Serv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7. *Trends in Output and Employment*.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9. *Five Lectures on Economic Problem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Co.
1950. *Employment and Compensation in Education*.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52. *Theory of Price*. revise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52. (With Kenneth Boulding) *Readings in Price Theory*. Homewood, Ill.: Richard D. Irwin.

1956. *Trends in Employment in the Service Industri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With David Blank) *Supply and Demand for Scientific Personnel.*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Editor) *Selections from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1. (Chairman) *The Price Statistic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 report to the Office of Statistical Standards, Bureau of the Budget. General Series, no. 73.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1962. *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Marketplace.* Selected Papers, no. 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1963. *Capital and Rates of Return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Market Place and Other Essay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63. *An Invitation to Controversy.* Printed privately.

1963. (With Paul Samuelson) *A Dialogue on the Proper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 Selected Papers, no. 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1964. *The Tactics of Economic Reform.* Selected Papers, no. 1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1965.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The Theory of Price.* 3r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Homewood, Ill.: Richard D. Irwin.

1970. (With J. K. Kindahl) *The Behavior of Industrial Pric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Modern Man and His Corporation.* Selected Papers, no. 3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1971. (With Manuel F. Cohen) *Can Regulatory Agencies Protect the Consume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75. *The Citizen and the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论 文

1937. "The Economics of Carl Meng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37. "Theory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August.

1938. "Social Welfare and Differential Pri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1939.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Short Ru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39. "Limitations of Statistical Demand Curves." *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September.

1940. "Notes on the Theory of Duopol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1942. "The Extent and Bases of Monopo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ceedings*, June.

1943. "The New Welfare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45. "The Cost of Subsistence."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May.

1946. "The Economics of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47.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Giffen Paradox."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47. "Stuart Wood and the 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947. "The Kinky Oligopoly Demand Curve and Rigid Pri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47. "An Academic Episod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Winter.

1949.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49. "A Theory of Delivered Price Syst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1950. Two statements on monopoly. In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the Study of Monopoly Power*.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pril 17–May 11.

1950. "Monopoly and Oligopoly by Merg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ceedings*, May.

1950. "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 part 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1950. "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 part 2.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51.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52. "Specialism: A Dissenting Opinion."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Winter.

1952. "The Ricardian Theory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53. "Sraffa's Ricardo."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54. "The Early History of Empirical Studies of Consumer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54. "The Economist Plays with Blo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ceedings*, May.

1954. "Schumpeter's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1955. "The Nature and Role of Originality in Scientific Progress." *Economica*, November.

1955. "Mergers and Preventive Anti-Trust Policy."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November.

1956 "The Statistics of Monopoly and Merg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956.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Stat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L. D. Whi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erfect Competition, Historically Contemplate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957. "The Tenable Range of Functions of Local Government." In *Federal Expenditure Policy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Stability*,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November 5.

1958. "Ricardo and the 93% Labor Theory of Valu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58. "The Goals of Economic Policy." *Journal of Business*, July.

1958. "The Economies of Scal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59. "Bernard Shaw, Sidney Webb, and the Theory of Fabian Socialism."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June.

1959. "The Pol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ember.

1960. "The Influence of Events and Policies on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60. "Prometheus Incorporated: Conformity or Coercion?" In *Social Control in a Free Society*, edited by R. Spiller. Benjamin Franklin Lectur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1.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61. "Private Vice and Public Virtue." *Journal of Law and Business*, October.

1961. "Economic Problems in Measuring Changes in Productivity." In *Output, Input, and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2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Administered Prices and Oligopolistic Infl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January.

1962. "Henry L. Moore and Statistical Economics." *Econometrica* January.

1962. "Marshall's Principles after Guillebau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62. "Inform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Supplement*, October.

1962. (With Claire Friedland) "What Can Regulators Regulate? The Case of Electricit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3. "Elementary Economic Edu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ceedings*, May.

1963. "United Statesv. Loew's Inc.: A Note on Block-Booking." *Supreme Court Revie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A Theory of Oligopol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964. "Public Regulation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s." *Journal of*

Business, April

1964. Comment on "The S.E.C. through a Glass Darkly." by I. Friend and E.S. Herman. *Journal of Business*, October.

1965. "The Econcmist and the Stat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65. "Textual Exegesis as a Scientific Problem." *Economica*, November.

1965. "The Dominant Firm and the Inverted Umbrella."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5. "The Form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In *Current Problems in Political Economy*. Greencastle, Ind.: Depauw University.

1966.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Antitrust Law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7. "The Changing Problem of Oligopoly." *Il Politico*, June.

1967. "Imperfections in the Capital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67. "The Foundations and Economics." In *U.S.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edited by Warren Weav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8. "Price and Non-Price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anuary/February.

1968. Review of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Society*, by John Stuart Mill.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October.

1968. "Competition," "Henry L. Moor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3. Edited by David L. Sills. New York: Macmillan.

1969. (Chairman) "Task Force Report on Productivity and Competition." In *Hearings before the Special Subcommittee on Small Business and the Robinson-Patman Act*. Select Committee on Small Business, Washington, D.C., October 7–9.

1969. "Does Economics Have a Useful Past?"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Fall.

1970. "Director's Law of Public Income Redistribu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70. "The Optimum Enforcement of Law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May/June.

1970. "The Case, if Any, for Economic Literacy." *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 Spring.

197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Spring.

1971. "Smith's Travels on the Ship of Stat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Fall.

1972.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Public Policy: A Plea to the Scholar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January.

1972.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Regulation." *Antitrust Bulletin*, Spring.

1972.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Public Choice*, Fall.

1972. "The Adoption of the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Fall.

1973. "Gener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National El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73. (With James K. Kindahl) "Industrial Prices, as Administered by Dr. Mea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73. "Regulation: The Confusion of Means and Ends." In *Regulating New Dru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With Gary Becker) "Law Enforcement, Malfeasance, and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January.

1973. "Free Riders and Collective Ac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Autumn.

1974. "Price System."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5th ed.

1975. (With Claire Friedland) "The Citation Practices of Doctorate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76. "Do Economists Matter?"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January.

1976. "The Sizes of Legislature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January.

1976. "The Xistence of X-Effici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76.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Professor Smi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1976. "The Scientific Uses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J.S. Mill." In *James and John Stuart Mill: Papers of the Centenary Conférence*, edited by J. M. Robson and M. Lain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7. (With Gary Becker)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78. "The Literature of Economics: The Case of the Kinked Oligopoly Demand Curve." *Economic Inquiry*, April.

1978. "Wealth and Possibly Liberty."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June.

1979. (With Claire Friedland)" The Pattern of Citation Practices in Economic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Spring.

1980. "An Introduction to Privacy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December.

1980. "Merton on Multiples, Denied and Affirmed." In *Science and Social Structure: A Festschrift for Robert K. Merton*. Transaction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series 2, vol.39.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81. "Economics or Ethics." In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Vol.2.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书 评

1939. *La Théorie des Besoins de Carl Menger*, by H. S. Block.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39.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Analyses*, by A. M. McIsaac and J. G. Smi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39. *Elements of Modern Economics*, by A. L. Meyer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40. *A Study on the Pure Theory of Production*, by S. Carls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40. *The Control of Competition in Canada*, by L. G. Reynolds.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November.
1941. *Anticipations, Uncertainty and Dynamic Planning*, by A. G. Har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41. Review of ten T.N.E C. monograph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41. *Economic Analysis*, by K. E. Bould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1943. *Fiscal Planning for Total War*, by W. L. Crum et 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943. *National Income and Its Composition* 1919–1938, *by S. Kuznets*.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May.
1943. *Entrepreneural Costs and Price*, by G. J. Cad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43. *Outlay and Income in the U.S.*, by H. Barger.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August.
1943. *Social Science Principles in the Light of Scientific Method*, by J. May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44. *The Economics of Price Determination*, by C. Clive Saxt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944. *Wage Determination under Trade Unions*, by J. Dunlop.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1945. *Economics of Control*, by A. Lern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March.

1946. *The Economics of Peace*, by K. Bould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1946. *Lapses from Full Employment*, by A. C. Pigou.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1947.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 by J. Steind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948. *A National Policy for the Oil Industry*, by E. V. Rostow. *Yale Law Journal*, June.

1948. *Investment, Location, and Size of Plant*, by P. S. Flor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1948. *Pricing, Distribution and Employment*, by J. S. Ba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1948.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by P.A. Samuelson. *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December.

1949. *Labor Productivity Functions in Meat Packing*, by W. H. Nicholls.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February.

1950. *Competition among the Few*, by W. Felln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51. *The Dynamic Economy*, by H. Moult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951. *The American Cigarette Industry*, by R. Tennant. *Yale Law Journal*, May.

1951. *Divergence between Plant and Company Concentration*, F.T. C. *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September.

1952.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of the Firm*, by F. Lutz and V. Lutz.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52. *The Malthusian Controversy*, by K. Smith. *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June.

1952.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edited by P. Sraffa. *Econometrica*, July.

1952. *The Econom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by E. Penros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1953.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H. W. Spiegel. *Kyklos* 6, no. 87.

1954. *Thorstein Veblen: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by D. Riesman. *The Freeman*, February 8.

1955. *The Logic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Industry*, by P. S. Flor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956. *The Hard-Surface Floor-Covering Industry*, by R. Lanzilotti.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56. *The Alphabet of Economic Science*, by P. H. Wicksteed. *Econometrica*, October.

1957. *The Meaning and Validity of Economic Theory*, by L. Rog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57. *A Revision of Demand Theory*, by J. R. Hick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58. *High-Talent Manpower for Science and Industry*, by J. D. Brown and F. Harbison.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July.

1959. *Ricardian Economics* by M. Blau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1961.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by W. D. Grampp. *Economica*, August.

1961.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by O. H. Tayl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63. *Economic Philosophy*, by J. Robins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63. *Fabian Socialism and English Politics*, 1884-1918, by A. M. McBriar, *The Story of Fabian Socialism*, by M. Cole. *Victorian Studies*, June.

1965. *Free Trade in Books: A Study of the London Book Trade*

since 1800, by James J. Barnes.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Winter.

1965. *The Business Establishment*, edited by Earl F. Cheit, and *The U.S. Economy*, by John Davenport.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Book Week*, January 31.

1965. *The Great Discount Delusion*, by Walter H. Nelson. *Chicago Tribune*, July 11.

1965. *John Rae: Political Economist*, by R. Warren Jam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1966.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y John Stuart Mil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966. *Modern Capitalism: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Power*, by Andrew Shonfield.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Book Week*, April 10.

1966. *The Stationary Economy*, by J. E. Meade. *Economica*, November.

1966. *New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by Walter Helle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29.

1967. *Ambassador to the Industrial State*, by J. K. Galbraith. Reith Lecture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8.

1967. *The Travel Diaries of T. R. Malthus*, by Patricia Jam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967.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y J. K. Galbraith.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6.

1967. *The Doctor Shortage*, by Rashi Fein. *Science*, December 29.

1968. *The Rich and the Super Rich*, by F. Lundberg. *New York Times*, July 28.

1968. *The Guaranteed Society*, by L. Baker.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September 8.

1969. *Events, Ideology, and Economic Theory*, by Robert V. Eagl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June.

1969. *Think: A Biography of the Watsons and IBM*, by William

Rodgers. *Science*, December 12.

1970.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Economic Theory*, by L. Robbins. *Economica*, November.

1977. *Wealth of Nations*, by Adam Smi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977. *The Early Economic Writings of Alfred Marshall*, 1867–1890, by J. K. Whitaker.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March.

1977. *The Age of Uncertainty* (book and BBC television series) by J. K. Galbraith. *National Review*, May 27.

1978. *On Revolutions and Progress in Economic Knowledge*, by Terence W. Hutchison. *Minerva*, Winter.

1980.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by James Q. Wilson.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

1981. *The Economics of David Ricardo*, by Samuel Hollander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March.

短　文

1940. Discussion of cost fun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ceedings*, March.

1940. "A Note on Discontinuous Cost Curv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1942. "A Note on Price Discrimination in Stee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46. "Labor Productivity and Size of Farm: A Statistical Pitfal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1947. "Professor Lester and the Marginalis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50. Discussion of oligopo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

ceedings, May.

1951. Discussion of methodolog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ceedings*, May.

1952. "The Case Against Big Business." *Fortune*, May.

1954.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Concentration and Price Polic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Note on Mathematics in 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ugust.

1956. Discussion of antitrust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ceedings*, May.

1959. Foreword to *Merger Movements in American Industry*, 1895-1956, by R. L. Nels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 *Alumni Association Newslet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Winter.

1962. "Archibald versus Chicago." *Review of Lconomic Studies*, October.

1962. Preface to *Diversi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American Industry*, by M. Gort.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62. Comment on "On the 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by H. Lawrence Miller, J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963. "Policies for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Symposium. Washington, D.C.

1964.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 Conference of the U.S. Savings and Loan League, Chicago.

1964. "Competition and Concentration." *Challenge*, January.

1965. "The Problem of the Negro." *New Guard*, December.

1966. "Private Enterprise and Public Intelligence."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Symposium. Washington, D.C.

1966. "The Unjoined Debate." *Chicago Today*, Winter.

1967. "The Economics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967. "Alice in Fundland." *Barrons*, February 27.

1967. Com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an Entropy Theory of Concentration to the Clayton Act," by M. O. Finkelstein and R. M. Friedberg. *Yale Law Journal*, March.

1969. "Alfred Marshall's Lectures on Progress and Povert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nril

1970. Preface to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by F. H. Kni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With Claire Friedland) "Profits of Defense Contracto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72. Discussion on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Regulation*. *Journal of Finance*, May.

1973.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ruth in Teach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March/April.

1973. "In Memoriam: Frank Knight as Tach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May/June.

1973. "Thought Control on the Campus." Commencement addres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ugust 13.

1973. "In Memoriam: F. H. Knigh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1974. "Henry Calvert Simo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75. "Buyer's Prices, Seller's Prices, and Price Flexibility: Rep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75. Comment on "Determinants of Participation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by O. Ashenfelter and S. Kelley, Jr.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December.

1975. Comment on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Policies on Votes

for the Presidency: Some Evidence from Recent Elections," by A. Meltzer and M. Vellrath.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December.

1977. "The Conference Handbook."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979. "Babbage on Monopoly Price." *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 Bulletin*, Winter.

1979. "Why Have the Socialists Been Winning?" *ORDO* 30.

1980. "Malthus on Gluts." *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 Bulletin*, Winter.

1980. "Occupational Licensure for Economists?" In *Occupational Licensure and Regulation*, edited by S. Rottenberg.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81. "A Historical Note on the Short Run: Marshall and Friedman." *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 Bulletin*, Winter.

英汉人名对照